西安交通大學

# 文革風雲——回憶與紀實

【下册】

◎本文集编辑组 编

文化藝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20 世纪 60 年代西安交通大学校门



1966 年 6 月 2 日贴交大第一张大字报




1966 年 6 月 2 日同学们贴出大字报高呼交大要革命



1966 年 6 月 2 日更换黑板报向牛鬼蛇神开炮



1966 年 6 月 3 日同学们在行政楼前听工作组进校后的广播讲话



1966 年 9 月，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应交大学生之“请”来校看大字报。



文革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左）和彭康校长被批斗后坐在地上



1966 年 9 月彭康校长被监督劳动



1966 年 8 月欢庆《十六条》发表的我校游行队伍



1966 年 8 月庆祝八届十一中会议公报发表我校游行队伍




1966年8月5日我校召开万人平反大会




1966年9月16日欢迎毛选到学校




1968 年校革委会委员及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后排：**

郑叔良 蔡元基 刘军智 丁传鹤 李能贵 何敬成 程宗武 邵乐冲 苗俊德 叶雄波 沈文钧 段会林 李印生 罗洪涛

**中排：**

徐文明 赵 瑛 郝卫东 宗正荣 李松青 尹茂林 张国强 申成仑 王学周 刘维娜 刘德成 张宗仁 史维祥 戴慕蓉

**前排：**

朱奎林 沈荣水 程快乐 武登才 苏文艺 李世英 陈柏荣 冯成武 马书林 杨 文 卢鸿兴 王春杰



1967 年文革期间被统指和工联一方砸坏的校牌




1967 年文革期间被统指和工联一方打砸坏的广播台宣传车




文革期间的交大图书馆



1968 年 8 月，欢迎军宣队进交大



2016年4月9日交大120周年校庆部分革委会成员和校友合影



2014 年 10 月 15 日交大原革委会正副主任武登才、李世英、沈荣水（左起）



2017 年 4 月 25 日杭州聚会
左起：戴慕蓉、武登才、陈柏荣、王春杰、郑叔良

# 目　錄

## （上 冊）

前　言

一、全國僅有、獨樹一幟的"交老總"

/ 鄭叔良 ........................ 01

二、西安交通大學文革縱述

/ 閻保定　陳沾緯 ........... 14

三、往事的回憶

/ 李世英 ........................ 92

四、紀念李世英

/ 李志杰 ..................... 250

五、我與交大文革總會

/ 沈荣水 ..................... 254

六、西安交大文革飄絮録

——我的回憶與反思

/ 鄭叔良 ..................... 276

七、我的西安文革回憶

/ 戴慕蓉 ························ 328

八、風雨未同舟

——我和李世英與楊克劍

/ 劉維娜 ························ 381

## （下 册）

九、懷念彭康校長

——紀念彭康逝世五十周年

/ 鄧正德 ………………………………… 393

十、難以忘懷的回憶

——游鬥彭康事件始末

/ 趙傳平 ………………………………… 405

十一、親歷文革二三事

/ 閻保定 ………………………………… 414

十二、初邁職場和湯峪學習班的故事

/ 肖國信 ………………………………… 464

十三、1966 年 8 月靜坐的起因和我所知道的“817 調查組”

/ 陳沾緯 ………………………………… 477

十四、我與“三六專案組”

/ 馮偉年 ………………………………… 490

十五、我所知道的《驚回首》

/ 黃善康 ……………………………… 496

十六、西安交大文革六六通訊社的回憶

/ 陶文銓　陳輝 ……………………… 502

十七、在六六通訊社工作的日子

/ 陳立群 ……………………………… 508

十八、將往事留在風中

——還原歷史情境

/ 戴克剛 ……………………………… 513

十九、兩篇大字報的回憶

/ 孔祥騮 ……………………………… 521

二十、文革中難忘的二三事

/ 李宣城 ……………………………… 530

二十一、西安交大文革回憶點滴

/ 王希平 ……………………………… 533

二十二、櫻花樹梢上的教室

——我與“交大六六事件”中的“應物 31 郵局事件”

/ 梁蘊綿 ……………………………… 557

二十三、交大“復課鬧革命”的始末

/ 李能貴 ························ 577

二十四、回憶文革中的復課

/ 王培鈺 ························ 580

二十五、大山裏的回憶

/ 高喜愛 ························ 583

二十六、五年的交大歲月

/ 樊哲民 ························ 590

二十七、母校歲月

——西安交大六十年代廣播臺的記憶

/ 王　經 ························ 616

二十八、我對文革初期的點滴記憶

/ 張良銘 ························ 627

二十九、文革回憶

/ 孫惠民 ························ 633

三十、念　想

——追憶與陳學俊先生相處的日子

/ 張學曾 ························ 653

三十一、風雨春秋

——文革往事

/ 付登華 ........................ 659

三十二、歷史的記憶（文革時期）

/ 李鏡吾 ........................ 702

三十三、人生的拐點

——交通大學生活回憶（文革部分）

/ 李志杰 ........................ 766

後　記

# 懷念彭康校長

## ——紀念彭康逝世五十周年

■/ 鄧正德

1963 年秋，我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入学后不久，就听说校长彭康是个老革命，级别和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差不多。他 1928 年入党，曾留过学、坐过牢、打过仗。三十年代和鲁迅、瞿秋白等人发起成立了“左联”，四十年代曾在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当过宣传部长，是解放后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

十月的一天，雨过天晴，我站在体育场门口边观看校足球队练球。突然，一球飞出场外，朝着交大最靓的那条大道顺势北滚。我冲出体育场出口竟没挡住它，快滚到医务室了，那球被一位长者拦住。他不慌不忙把球捡起送到我的手中，我深鞠一躬便转身跑进了球场。过后，学长神秘的告诉我，捡球的那位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康校长。

那年冬天，我在体育馆室内上体操课时，不慎从跳箱上跌落，扭伤了左腿半月板。同班的安原生等同学扶我到了校医务室，沈伯参大夫诊视后立即用救护车送我到第四军医大学手术。三小时后，我左腿从脚踝到大腿根被长长的石膏筒固定了起来。回校后，我住进了医务室 203 号病房。

一个月后，石膏拆除，左腿不能弯曲。我拄着双拐完成了期末考试。放寒假了，同学们纷纷回家过年去了。我加紧理疗，甩开拐杖，练习行走。

心想，我这样一瘸一拐的回家，不会吓坏妈妈？我犹豫了。直到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我终于下决心先洗澡后回家。就在我高兴清爽走出澡堂，路过第一宿舍前那段结冰的道路上，突然滑倒，不省人事。等我睁开双眼，已被众多学友抬向医务室。又是那位沈大夫随救护车送我去第四军医大学手术。这次受伤，比上次更重，还是那条左腿，髌骨撕裂性骨折。这次固定的石膏比上次更厚重。回校后，我又住进了医务室203室病房。

大年除夕，病房内人去楼空。我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眼望天花板，泪流满面。我命苦啊！七岁丧父，母亲三十岁守寡，哥哥十二岁辍学，他们在农田里终年辛苦，好不容易供我上了交大。如今过年不得团聚，他们还蒙在鼓里，这年怎么过？正在我心力交瘁之际，护士长告诉我："彭校长看你来啦。"我坐了起来，双手搬动着石膏腿，想下床迎接。此时校长已走近床前扶我坐下，他说："沈大夫已向我报告了你的伤情，祸不单行啊！同学你要坚强起来……"接着他问我，家住哪里，家人是否知情？我说，家在户县农村，没有电话，家人不知，我有个堂姐是户县电厂的总机，但是我无法去电话局联系。校长让护士长从对面办公室拉来电话机，并让交大总机查号挂上外线。电话通了，我姐正准备交班后回家，我谎称，学校有重要活动，春节假期回不了家。

校长走了，我心境大变，美美地吃完医务室小灶为我准备的年饭。第二天，彭校长托人送来一本书给我看，书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转眼到了1965年，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成立了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彭康任组长。电机系闻风而动，率先成立了教改试点班，我为团支部书记。教改班要去西安中兴电机厂边劳动边学习，时间为半年。临行那天，彭校长来到电机系，在系主任钟兆琳教授办公室接见了领队沈官秋老师和我。他说：交大重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你们这次下去，带上钟教授的《电机学》去电机厂边劳动边上课，理论联系实际，要为教改创出一条新路来。下厂之后，不要浮于表面，走马观花，要深入车间、班组和工人群众之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动手、多实践。交大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骨干，交大不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过了一个来月，彭校长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教改试点座谈会。各系试点班老师先汇报了教改进展情况，接着彭校长询问：同学还有什么问题？我提出来两个问题：一是工厂正搞“四清”运动，有同学为工人师傅写发言稿批判车间主任，造成一定影响。二是工厂劳动强度大，男同学吃不饱。彭校长笑着答道：老师定量 30 斤，学生定量 34 斤，那 3 斤是邓小平按毛主席批示，去年刚加上的。这个问题我和任梦林商量一下再说。有关“四清”运动，同学还是多受教育，少参与介入。

会后不几天，彭校长来西安中兴电机厂参观。他走后第二天，工厂为同学们提供免费午餐，不收粮票，直到年底劳动结束。

年底，教改班的同学回校上课。离开电机厂时，我们在电机厂废品处理仓库捡了一些线圈烧坏、铁芯尚好的车床变压器，五角钱一只买下带回了学校。后来又在西安城隍庙“清仓扫库”处理店买了电子管、电阻、电容、电感等元件和线材。自己动手绕制电源变压器，准备安装电子管收音机。由于没有样机，不知其内部结构和技术参数，无法安装调试。这时我把自己家里那台“熊猫牌”六灯电子管收音机搬进第十宿舍一层我的住处，作为样机供大家参考。很快，电机系、无线电系许多同学都装起了收音机。一时间学生宿舍区到处都能听到广播电台的歌声。我也趁机自装了一台收音机，音质竟比样机还好！于是就把家里带来的名牌收音机卖到了钟楼典当行，收得 35 元。我留 5 元，将 30 元钱和自装的收音机送给了家里，母亲自然十分高兴，

说我能干，书没白读。

但是，这件小事，却成了我入党的拦路虎。1966 年元旦过后，电机系党总支部开会通过了 5 人入党申请，报送校党委审核批准，我也在其中。春节过后，新学期也开始了，别人都批下来了，就我未获批准。难道我有什么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真难熬啊！我不思茶饭，夜不能寐，六神不得安定。实在憋不住了，我放胆去找介绍人，介绍人又找系党总支，系总支李善亭领我去找党委组织部。组织干事让我们等一下，说部长在彭校长（兼党委书记）办公室。我们来到彭康办公室，组织部长正好还在那里。部长当着校长之面问我：你宿舍那台高档收音机是怎么回事？我回答："是从我家里搬来的"。"你一个穷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家里能买得起'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那是外婆留给我妈的遗产。"校长开口了，他说："派人去他家乡调查一下，车费回来报销。"

一周过后，1966 年 3 月 18 日李善亭通知我：校党委已正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后我方知，有人向党委写信投诉：怀疑我为农村的"四不清"干部转移财产，因为我哥哥也是村干部。后来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调查收音机事件的人叫周传贤。在彭康校长的关照下，我终于搭上交大文革前学生入党的末班车。入党后，我心里非常激动。彭康校长号召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他还专门请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交大作报告。我见证了这位年轻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次称赞彭康为革命前辈，这使我对彭康校长的崇敬顿时倍增。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校党委在 402 会议室多次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以往大会都是彭校长坐镇，吴镇东讲话。那时候我多次聆听到彭校长的讲话，心里非常激动。

1966 年 6 月 1 日，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北大斗倒了陆平，交大揪出了彭康。陕西省委派严克伦率工作组进驻西安交大。一时间，校长成了走资派，教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党员干部成了彭康反党黑帮，我们这批学生党员成了彭康的黑爪牙、修正主义的苗子。工作组停了彭康之职，罢了彭康的官，并以批判彭康黑帮为名，挑起了交大内部群众斗群众。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出现了王永婷跳楼身亡，李世英自杀未遂……我站在东一楼东北角的天台上，胡思乱想，突然发现兴庆公园那边道路上，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拉着沉重的架子车，一个小男孩撅着屁股在后面使劲推车。这画面不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和哥哥在农村劳动的情景吗！他们千辛万苦供我上学，未得粒米之报……再过两年，我就毕业了，工作了，可以挣钱养家了，我绝不能就此了之，让自己的生命失去意义。我擦干眼泪，一口气跑回宿舍，除去床上的大字报，蒙头睡到大天亮。

1966 年 8 月，毛主席为我们平反了，并于当年 10 月在北京接见了红卫兵群众，我见到了毛主席。

进驻电机系的工作组成员来自青海省，是正在西安参加西北财贸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这批干部，思想守旧，手段粗狠，在电机系民愤很大。校文革总会委派我去西宁建立联络站，同时调查这批人的情况。我到西宁后方知青海“8·18”群众组织正在批斗这批干部，就同他们一起建立联合指挥部，共同战斗。

青海文革始于青海日报《六三》社论，报社“8·18”组织紧跟全国形势，很快成为青海文革的先锋和骨干。1967 年 2 月 16 日，原省委勒令青海日报停刊，并派对立面群众包围了报社。“8·18”组织抵制停刊，继续出版，并调动人员保卫报社。第三天过后，从草原调来的部队加强了包围力量。对立双方群情激昂，剑拔弩张。对峙进入第六天，外围群众撤离，只剩


1967 年 3 月邓正德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下了部队。指挥部感到形势不妙，大家一致决定派我去兰州、北京，向大军区、中央文革报告实况。2 月 22 日傍晚，我逃离报社现场，爬卡车来到兰州军区大院，已是 23 日凌晨 2 点。军区首长听完汇报后深感问题严重，天没亮即派一干事送我上机场乘安 –24 军机直飞北京。下午 5 点，当我赶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时，方知青海日报社现场出了事，当场死亡 177 人，包括两名外地红卫兵。

在设在北京高教部里的交大驻京联络站，我见到了正在等待中央首长接见的李世英，我将上报中央文革的材料抄了一份由李世英交给周总理。1967 年 3 月 24 日，周总理在民族文化宫二楼会议室接见了青海代表团，并为青海日报社“2·23”事件平了反。4 月 23 日青海省各界在西宁市召开庆祝大会，青海日报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实况。两天过后在交大图书馆二楼报刊厅，不知哪位同学在青海日报的字里行间中发现，西安交大驻西宁联络站站长邓正德冒着被通缉的风险，第一个进京，为青海“8·18”死难者上访申冤的事迹。他尖叫起来，图书馆炸了锅，大家争相传颂，我顿时成了“英雄”。后来我被同学们推荐进了文革总会。1967 年 7 月 1 日，交大革委会成立，我当选为常委。

在革委会，我任保卫部长，主管全校斗批改和安全保卫工作。彭康专案组属斗批改办公室管理，我自然成了彭康的主管领导。我从彭康的学生变为他的领导，简直令人无法想像。保卫部的办公人员，基本上留用文革前的原班人员。斗批改办公室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文革前刚参加工作的年

轻教师和政治辅导员。为了工作方便，我和李世英从学生宿舍搬进行政楼办公室居住，李世英住三楼西头，我住二楼东头，一楼电话总机对面即是保卫部值班室，24 小时有人值班。

1967 年夏，武斗之风在全国蔓延，西安也不例外。“九二”武斗后，第一宿舍三楼武装部的枪支被抢，我保安人员受伤。这个时期，因武斗受伤的大批“工总派”伤病员也涌入交大校园，对立面“工联”派群众则以揪斗对方人员为名，多次冲击交大北门。我们关闭了北大门，他们却趁黑夜盗走交通大学校牌，用卡车拖着在西安市游街示众。更有甚者是陕工大造反派，打着“交大不斗彭康，我们来斗”的口号，从一村住所把彭康从家里拉到陕工大操场开批斗会。以上事件逼得我们多次报警，西安市碑林分局的同志出面平息了此事，彭康被平安地接回家中。分局同志对我说，彭康是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不是随随便便东拉西斗的。你们交大一定要加强保卫工作，出了大事谁也负担不起。

根据以上情况，校革委会研究决定：（一）全校大疏散，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探亲回家或投亲访友。（二）组织护校队保护图书馆、实验室、档案室等设施免遭破坏。（三）组织彭康等人的看护小组，重点对象集中去苹果园劳动。学校放假后，我们在电机系组织了一支护校队，我班班长樊志模为队长。找人看护彭康是个难题，这是个既辛苦，又无报酬，出力不讨好的麻烦差事。我只得动员我们班出身最好的三位同学：朱耀锡、梁天晓、吴瑞裕组成彭康看护小组，由朱耀锡任组长，进驻一村彭康家一楼正对门那间司机房里。政策是：内松外紧。名义上是监管，实际是保护：（一）不干涉彭康的生活起居和人身自由。（那时期彭康既无司机也无保姆和秘书，生活全部自理）（二）外来人员未经保卫部批准不得随便进入彭康家中。（三）外调人员接触彭康必须由专案人员陪同方可入室。（四）单位批斗及苹果园劳动由

红卫兵总部派人员负责接送。（五）24 小时轮流值班巡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保卫部值班室。

1967 年秋冬到 1968 年春天，那是彭康的最后岁月。门内虽有人值守，但再无闲来人员骚扰。苹果园虽然荒僻，但仍在交大校园内活动。初冬的一天，陕工大有两人（其一为我中学校友）来交大调查动力学院事件，我领他们去苹果园见了彭康。在回办公室的路上，那位陕工大老师嘟嘟囔囔，你们交大的牛鬼蛇神也太有福气了，苹果园那有多少草啊虫啊要十三个人劳动。这分明是让这些久坐办公室的家伙松筋骨、晒太阳的世外桃源。我笑笑说："那好，你今后每天下午也来交大苹果园放松放松。"他无语。

1967 年冬，学校复课，校内外局势相对平静。我有机会去一村检查工作，探望"看护组"的同学，顺便找彭康聊聊。我接触彭康，一不怕别人怀疑，二不要别人批准，三我班同学也不会阻拦。我进入他的房间，他总是站起来迎我，行动很不自在，说起话来也是半句多多。每次都是我主动提议，我俩不谈政治，只谈私人交情。我感谢他在捡球、探病、打电话、教改班、座谈会、入党审批、402 大会等交往中对我的帮助和教诲。同时也询问了我在专案材料中所了解到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些疑问。这些传闻也是他被莫名其妙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四顶黑帽子的疑点。

开始他不愿旧事重提。我申明我别无他意，只是作为主管领导，我不想在缺乏铁证的情况下，随便签署文件给别人定性，冤枉好人。我的肺腑之言和我文革前已与他多次交往的实际行动，终于打开了这位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老人的心窗。他由上海闸北被捕、苏州反省院受刑、太湖转移遇险、上饶集中营咬舌、1937 年被营救出狱以及后来转战苏皖鲁豫四省，八年铁窗、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一直讲到又回到上海当上交通大学校长的传奇经历。按照他的提示我在专案组的保险柜里找到了他最喜爱的两本书。那是精装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战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战史》，这是中央军委发给他的纪念品。我听得入神，看得入迷，心情十分感动。这样能文能武的革命家、教育家，在我党内也是屈指可数的，怎么一夜就变成了坏人呢？

彭康在回忆从上海闸北被捕，二十年后又回到上海当上交通大学校长的传奇经历时，我曾专门问过他对康生说他是大叛徒怎么看？彭康告诉我："康生极左，在华东和延安整过许多人。因他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大家都不敢得罪他。我批评过他，他记仇。现在他说凡被捕过的人都是叛徒，刘少奇、谭震林、刘澜涛……都是叛徒，这不奇怪吗？"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回到了文革，这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他问我："你是怎么上来的？"我说，我功在青海，我和西安地区及交大文革的派争内斗毫无关系。我是被青海日报吹出来的，交大图书馆也帮了大忙。提到图书馆，彭康的眼睛突然一亮，我原以为是他夫人王琏因受他连累从图书馆馆长之位掉下来刺痛了他的心，而做出的条件反射。不料彭康对我说，他喜欢图书馆是因为门口的那两座塑像和馆前那 50 米既可观景又可游泳的一汪清水池。文革初破四旧时，外校红卫兵要砸毁这二座塑像！公务班的师傅受文革总会之命，将塑像用木板建成二座毛主席语录碑保护起来。彭康对此表示欣慰。他说，两座塑像是交大的象征和希望。谈到游泳池，文革前每到夏日傍晚，那是交大最热闹的地方。交大南方人多，他们可在深水区游泳；北方的"旱鸭子"也可在浅水区戏水泼凉。虽然落后于别的单位，交大还是填掉部分水池，在上面竖起了毛主席的塑像。听到此处，彭康默不作声。谁知半年后，就在这座毛主席塑像前，老校长被迫做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早请示"，半小时后他又被迫去见马克思了。

在谈到李世英和交大革委会时，他说，李世英出身贫苦、为人忠厚，又

有毛主席“交大学生领袖”的批示，交大师生员工都支持他，我也支持李世英，拥护革委会。我把此话放出风来，有人相信，有人怀疑。还有人说，彭康太狡猾了，那是他麻痹革命群众的烟雾弹。我认为交大在文革中，全校自成一派，内部团结稳定，是全国最早复课的少数院校之一。交大的稳定因素一是李世英，二是彭康。交通大学学生领袖的批示使李世英产生了凝聚力，而彭康的传奇革命经历和率校西迁的不朽功绩，使他在交大人心目中树立的威信是永恒的，他是交大的灵魂。文革中，彭康虽倒，威信未倒。在文革动乱年代，在交大这样最重的“灾区”，彭康能以顾全大局，坚持正义，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其人格魅力对交大的团结和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从交大文革中固为一派的实际情况看来，彭康支持李世英，未必不是出于真心。

1968 年开春，开国上将陈士渠专案组有两人从北京来到交大，调查彭康和王琏。奇怪的是在调查提纲中居然出现了我的名字。调查彭康是因为陈士渠是彭康夫人王琏的哥哥。彭康倒了，就有人把脏水泼向这位上将。调查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堂弟邓正友在装甲兵司令部为首长开小车，在司令部大院看大字报时，发现大字报里有西安交大校长彭康的名字。好奇的弟弟就把有关内容抄下来寄给了我，我看后并未在意。然而在北京，有人怀疑我们兄弟二人在为陈上将和彭校长之间“通风报信”。吴炯老师把二人带进我办公室，我把那信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见我是革委会领导，点头哈腰说：“误会，误会，没事，没事”。然而，半年后我回家才知道我那无辜的堂弟，被莫名其妙的提前复转了。真是匪夷所思，岂有此理！这也是我和彭康校长的最后一次“联系”。

1968 年 3 月 28 日早上七八点钟，“抗大战校”工企排赵传平组织三十余人，用校革委会一贯反对的“喷气式”武斗方式拉彭康校长在校图书馆前

毛主席塑像前“请罪”，并在校内长距离游斗，致使彭康校长不幸去世。当时我正进驻西安公路学院，进行西安地区高等院校红卫兵大联合指挥部筹建工作，而李世英刚好在北京，他是接到胡炜电话后才知道彭康校长去世的消息。

4 月初的一天，李世英打电话要我回学校研究工作，我来到了李世英的办公室。他说：“彭康死了，这是上报中央的材料，你看看。”我看完西安医学院所做的彭康尸体解剖检验报告书，然后打开上报材料首页，那上面有 4 段毛主席语录：

（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三）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多方面看，不要单方面看问题。

（四）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身体本就虚弱，又不常运动，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3 月 28 日清晨起床后，只吃了一片桃酥，喝了半杯水，就被抗大战校一些人拉到毛主席塑像前“早请示”。然后进行游斗，共计路程三千多米。到了医务室附近的路上，他喘着粗气说：“我不行了”。别人并未理他，以为他耍滑头，一直拖到电机实验室旁，这位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冤啊，彭康校长！

我出身农村，家境贫寒，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彭康便是其中之一。文革前他对我有教有助有恩；文革中我为保护他尽了一点责任，但还是未能保住他的性命，这成了我终生之痛，终生之遗憾！

2018 年春节于深圳



**作者简介**

邓正德，1942 年 10 月生于陕西省户县。1963 年 9 月入西安交大电机系学习。1968 年 12 月分配到兰州长风机器厂工作。1987 年 12 月被派遣到深圳华利电子公司工作。

1990 年举家迁入深圳市落户。

2002 年在深圳退休，享受高级工程师待遇。



# 難以忘懷的回憶

## ——游鬥彭康事件始末

■ / 趙傳平

1967 年 7 月 7 日，李世英代表校革委会宣布决定全校从即日起开始复课，可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复课并没有严格实行。遵照毛主席“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1967 年 10 月 23 日，交大革委会又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并制定了“复课闹革命的方案和实施意见”，全校各个专业同时开始复课。

此时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校内也有少数一些人认为大家又这样去上课，不是和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什么两样吗？文化大革命在教育战线是要“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又这样去上课教育革命到底怎么搞呢？由此，学校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复课闹革命”的讨论。

1968 年元旦，“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3 月中旬，校革委会决定派革委会委员邵乐冲等四人去上海学习抓整党和阶级斗争的经验。

1968 年 3 月 27 日晚上，在校内行政楼 402 室召开了红卫兵动员大会，那时开大会是广播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数都是些活跃人物和积极分子。

邵乐冲在会上介绍了去上海“取经”的情况和经验，主要是宣传外地高校教育革命的形势，推动本校教育革命的发展，动员大家献计献策，把交大的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在行政楼另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校革委会召开了校内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和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参加的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把学校的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我和“抗大战校”的吕国权、徐庆等同学参加了这个会。

“抗大战校”是由文革初期的“六六兵团”演变而来，是校革委会领导下的专门搞教育革命的群众组织，按专业编成“机切”和“工企”两个排，各自独立活动。我们抗大战校是想通过厂校结合，摸索一条“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幼稚的，但当年参加抗大战校的这些同学都是真心实意的，他们热情高，干劲大，充满了献身精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党员，不应只顾自己去学习，更应自觉响应号召，参加教育革命，就到了抗大战校工企排。工企排有三十多个学生，由三个年级的学生组成，每个年级推举一个人算是领导班子成员，另有两个人负责红卫兵的工作，这样工企排就有五个人被看作是领导。这五个人并没有由谁来任命，也不分主次，因为我原来是学生党员干部，又是高年级学生，作为高年级的代表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以后有关我的材料上就说我是抗大战校的“主要负责人”了。

402 的动员大会先结束，待我参加的小会完后回到宿舍时，只见大家都正在热烈讨论如何响应学校号召，便一起参加了讨论。那时我们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复古复旧，要开展革命大批判，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要跟上全国的大好形势，抗大战校要在教育革命中起带头作用。

在这次 402 会议前，校内已出现了一些大字报在讨论彭康是“死老虎”

还是“活老虎”的问题，有的还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彭康不老实。我回到工企排时，参加402会议回来的同学已经在议论如何游斗彭康的问题了，提出这件事时我和吕国权还没有回来。一些同学提出要游斗彭康造声势，激发全校师生参加大批判的热情，以响应学校的号召，把教育革命继续搞起来，对此同学们也都没有反对意见。

27日晚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学说：“彭康肯定不老实，不老实就触及他的皮肉。”（“触及皮肉”是相对于当时常说的“触及灵魂”而言，就是说不老实就动手）。我当时就说：“不能武斗，要打也不能往要害处打，不然出了问题就不好办了。”——我的这些话都有原始的证明材料（已上交彭康专案组）。余德广同学自己主动写了一张针对彭康的勒令书，我看后觉得太长，就删改缩写到只有几句话，字也大，改成不到半页纸，准备第二天早上对彭康本人宣读。这份勒令书是游斗彭康过程仅有的有形物证，后来交给了彭康专案组。

在讨论中还议定了明天的起床时间、集合地点，并派人去红卫兵总部请示，获得批准提取彭康。确定明早由周存富、张先士二人去提取彭康，他俩人都是红卫兵，张先士出身贫下中农，周存富是烈士后代，政治条件好，个子大。

讨论中没有人提议做高帽子、用细铁丝给彭康往脖子上挂大黑板的事，更没分配人去准备这些东西。此时大概已经11点多了，深更半夜，学生宿舍也不具备这些材料和工具。

以前曾经有些文章说游斗彭康时，“抗大战校”的造反派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戴到彭康的头上，把大牌牌挂到彭康的脖子上，那块大牌牌是一块黑板，很重，用的是细铁丝，特别的折磨人……。这个细节完全是作者想象捏造的，根本没这回事，有史料可以作证。

当时，我并不觉得游斗彭康是令人鼓舞的好形式，但又没什么好主意，看到大家都想到我的前头去了，便也没有反对，就和大家一起继续讨论游斗彭康的实施细节。如果此时我坚决反对游斗彭康，这件事也许就可能不会发生了，我的默许是游斗彭康的直接起因，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真是千古之恨，追悔莫及。

第二天（1968 年 3 月 28 日）早上，游斗彭康的队伍在正常起床时间之前 5 点多钟，就在校园里集合好了，等待把彭康押来。

彭康被押到图书馆毛主席塑像前，令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向他宣读了勒令书，叫他以后每天自觉向毛主席悔过，这也是头天晚上议定的。几分钟后，就开始押着彭康在院内游行。他被人押着走在队伍前头，我跟在后面观察学校的学生们对游斗彭康这件事的反应，李庆雨同学（头头之一）招呼队伍，吕国权（头头之一）同学协助，也领呼口号。

走到学生第一食堂北边时，因时间还早，不到吃饭时间，学生少，我就叫大家绕行到学生第二食堂，然后再回到第一食堂南面，经卫生室、工企实验室后押出东校门。在第一食堂南面时，彭康走得慢了，有的学生说他要死狗，于是架着他走，走到卫生室旁边，就更慢了，有的同学踢他的腿，驱其快走。原本以为他走得慢是在捣乱，没想到他是身体有病，更没想到会发生意外，也就根本没想到要去抢救。在整个游斗过程中，我们没有给彭康挂过任何牌子，也没有对彭康有其他的武斗行为。但当时有一些小学生围着看热闹，捡起树上落在马路上的枯枝条抽打过他的头。因为彭康此时的身份是“叛徒”，处于人人喊打的地步。

游斗彭康的队伍走到工企实验室时，迎来了上班的一些教职工，便有不少人开始围观。此时，校革委会的张国强也恰巧路过，便跟随队伍观看情况。游斗队伍在工企实验室北面，准备继续往东走将彭康押回家时，李庆雨

从排头走到我的身边小声说："彭康不像要死狗，他的脸色不对劲，队伍别走了，我们送他回去就行了。"随后，李庆雨和几个同学押彭康回家。我随即招呼队伍停下，讲了几句打气的话，大家解散后便各自去吃饭了，这就是当天游斗彭康路上的过程。事后，经李晨光同学测量，游斗彭康的路程约有 6 里路，历时 40 多分钟。

后来有人向李庆雨了解，他说发现彭康确实不行了后，他们便两人架着胳膊，两人抬着脚，四个人将彭康抬到他家，放在一楼的地板上，后又抬到床上，当时还摸了彭康的脉搏，发现还有，他们就走了。

彭康是如何被送到医院的情况，我不清楚，只是以后听到消息说，抢救无效，彭康死亡。

彭康的遗体由西安医学院的法医教研室进行了解剖，没有发现彭康有被打的伤痕，也没有致命伤，脸上有树枝划的印痕，脖子上并没有细铁丝勒出的痕迹。专案组传达解剖报告说，解剖发现彭康患有高血压、肺气肿、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因"心力衰竭"而死亡。当时彭康年近 70 岁，精神极度紧张，在 40 多分钟里走了 6 里路，病重的身体不能承受，而参加游斗的学生对其身体状况一无所知，只想到他是大叛徒，是阶级敌人。一位老革命就这样被游斗而死亡。

彭康被游斗致死，影响极大，给校革委会的工作造成很大被动。学校号召搞大批判，并没有叫游斗彭康。把人游斗致死，这不但使彭康本人遭受了极大痛苦折磨，直至气断身亡；也使其家人遭受了痛失亲人的悲伤。这样的结果，完全是抗大战校造成的，这种责任我们无意推卸，自责一直陪伴着我终生。

对彭康是坏人，当时我们深信不疑。省委驻交大工作团宣布了他是叛徒，交群众批斗，"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对交大的赴京代表说："彭康这

个人，我了解他，你们什么时候批斗都没有错。”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无论如何想不到彭康是革命干部。

彭康死了，各种议论很多。抗大战校中参与这一事件的学生的思想上罩上了阴影。我们自己在总结反思，学校的头头们也要我们很好地总结教训，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当时对彭康死亡一事议论的中心是：彭康死了，不值得关注，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弄死了呢？为什么交大在关键的时候总会要死重要人物呢？这是以后一段时间里，调查彭康死因时提出来的主要问题。

1967 年 5 月，交大校党委的原组织部长在兴庆公园自杀身亡；人们弄不清原因。恰在这时（1968 年）——中央的刘少奇、谭震林专案组从北京到西安找彭康这个“活舌头”提供情况时，他却被“游斗”死了。于是，人们就很合乎逻辑地责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杀人灭口”？抗大战校是何人插手其中？西北局是否有“黑后台”在活动？针对这些问题，学校的头头们去启发我们，叫我们不要有顾虑，好好想想，你们说出来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是查后台。我们对此压力很大，主要是解释不清，说实话别人也不相信，真是有口难言。

事实上的确没有黑手操纵我们。一定要查，我们也不能不被查，只能坚信：真的假不了，假的也成不了真的。让历史作证吧！

为了记住游斗彭康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在事发后的两三天内，我们组织参与这一事件的每一个人都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叫大家把自己在这件事中说的、做的都写清楚；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别人的言语、行为也都写清楚，让领导看看我们确实没有后台。同时把另外一些原始材料也都收集起来上交了，其中包括我修改写成的勒令书，李晨光同学所画的游斗路线图及丈量的游斗路线的距离等等。从这些材料中，每个人在整个过程中的一言一行，都看

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坦然地向组织提供的最详实、最完善、最可信的原始材料，是实事求是的，是经得住考验的。因为我们写这些材料，是要如实说明，彭康就是这样由我们自己游斗致死的，并不是有后台指使我们杀人灭口。后来在追究我们责任的时候，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是无需置疑的。

学校里当时的调查，时断时续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受人指使，并不存在后台。学校这样认为，我们也就卸了包袱。在学校头头的参加下，我们也都总结了经验教训。学校的头头和我们自己都认为，大家搞教育革命的热情很高，但没有经验，对彭康本人的身体状况未作了解；彭康被游斗死了，造成了损失，很多重要的线索到他这里断了头，很多调查材料的人到这里扑了空。当时认识此事的危害，也只到这种程度。

1968 年 7 月 21 日，毛主席发出了“七．二一”指示，要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听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大家认为，我们所探索的教育革命道路的问题，经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已经全部明确了，我们搞教育革命试验的使命已不复存在。有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就无须我们再搞什么试验，只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可以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大家讨论的结果，认为“抗大战校”应该解散了。于是，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抗大战校”解散。

1968 年的九、十月份，我面临毕业。为了避免人离校后再复查此事时，人找不全，所以，我们提议针对彭康死亡一事又办了一次学习班，彭康专案组的人参加了这个学习班。经过复查，结论和第一次相同。

1968 年底，我被分配到部队，离开了学校。觉得彭康之死的问题已经查清了，详细情况都留有材料，问题已经解决，我可以愉快地投入新的生活，为部队建设努力工作了。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彭康校长被游斗致死一事我被审查处理过 8 次。

第一、二次是在学校，当时的结论是革命小将响应党的号召，没有经验，做错了事，但是造成了损失，要吸取教训，增长才干。

第三次是 1971—1972 年“清查 5.16 分子”时，工作也不让我干了。后来叫我写了些检查，也不知给我做了什么结论，没有定成“5.16 分子”。

第四次是 1975 年部队派人去学校外调后对我说：“你在学校时参加游斗彭康的事，已经查清楚了，死了人，你是头头之一，有责任。省里有指示（指陕西省）：是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做错了事。不是动机不纯，对学生不追究责任，不给处分，主要是吸取教训。”部队同志叫我看着，烧掉了我写的一些检查、认识材料和其他一些调查材料。

第五次是 1979 年 8 月，学校建议处分，经过开会研究谈话申诉等环节，最后处分没有落实。

第六次是八十年代整党前夕，重新查处我的问题，说我不适合做政治部工作，调离政治部。我担任的党支部书记和机关党委委员职务（都是兼任）随之撤掉了。

第七次是上次会议不久，党组织再对我进行处理说，是好人做了错事，够不上“三种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这次处分没有下文件。

第八次处理是距离第七次处理不久，领导又集体与我谈话，说处分要减轻，不给处分了，但定性要重些，定为“三种人”，党员缓登记两年。这样，我就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编者注：“三种人”，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及打砸抢分子。）

游斗彭康事件致死是我当年的一个严重过错，这件事使我追悔莫及，而这件事的影响也伴随了我今后的整个人生。



## 作者简介

赵传平，山东泰安人，1942年生。

1963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65年入党。

1968年底毕业分配到解放军00219部队，在连队当兵锻炼后，调至部队政治部任干事。工作十几年后，被调离政治部做施工管理，先后任秘书，工程技术处处长（高级工程师），副总经济师。

1983年所在部队撤销改编为企业。1995年，任处长期间被选派带队赴非洲厄立特里亚搞建设，所承建项目的工程施工质量超过了在该国施工的韩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多国承包商的施工质量，被该国评为“国家示范工程”。我国驻厄使馆、及厄政府对此工程进行了表彰，厄总统视察了工地并题词“令人鼓舞的长期持久合作的良好开端”。

国内《国际经贸消息》曾刊登了“中建七局在厄立特里亚纪实”的报道，央视也拍摄了工地现场。他所领导团队的艰苦奋战，为祖国为单位赢得了赞誉。

# 親歷文革二三事

■/ 閻保定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打破了西安交通大学校园的宁静。五十多年来，交大校园里的樱花一次又一次地盛开，学生一批又一批地入校，人们生活在平静而舒适的环境中，徜徉在无边无际的学海里，早已忘记了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一场急风暴雨，唯有图书馆前那两尊象征着交大师生勇攀科学高峰的塑像，默默地注视着行政楼前发生的一切，见证了交大历史的变迁。

时光荏苒，当年交大文革的亲历者现在都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本不想再去打开那一段早已尘封的记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关于文革的“研究”，近年来居然多起来了，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遗憾的是有一些人，或出于无知，或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罔顾历史，歪曲真相，还把当年响应号召，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描述成一群愚昧无知、无恶不作的暴徒，这是对历史的亵渎，作为当年交大文革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

# 一、“六六事件”中的应物 31 班

##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3 年 3 月 5 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 1963 年秋季开始，大学里开展了学习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政治活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响彻西安交大校园的上空，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政治热情。

1963 年 6 月，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从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了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进行反击。我们 1963 年 9 月入学的新生，入学后政治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1965 年 9 月，我们数理系应用物理 31 班全体同学到临潼县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我们一起参加社教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部分干部。八个多月的社教工作，使我们见识了当时农村的现状，看到了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腐化堕落的现实，进一步认识到了“防修反修”的必要性。

大家也许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也曾经揭发出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甚至严重腐败的现实。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数以百万计的困难群众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时，陕西省委一位负责人的夫人居然把牛奶加在水里洗澡；在西北地区当时最豪华的丈八沟招待所，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周六都要烧一池热水，供西北局、省委的领

导及其家属享用等等。这些事实也说明了毛主席担心在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并非杞人忧天、空穴来风。

1966 年 4 月，社教结束回到学校，刚刚上课不久，5 月 10 日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一篇题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从此全国上下开展了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批判。我们的政治课也以批判“三家村”的内容为主。在此期间，各地媒体纷纷报道揪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揭发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

面对“反修防修”的严峻形势，我们这些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受党多年教育的青年学生，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准备随时听从党的召唤，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这就是当时我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六六事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 （二）“六六事件”中的“邮电局事件”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 日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 5 月 25 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随后几天，《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透漏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

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西安交大广大师生员工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校园中心楼等地开始贴出大字报，有的揭发批判校党委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有的批评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力，也有少数大字报把矛头指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

6 月 2 日，揭发和批判达到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陕西省委和西安交大校党委立即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组织反击，诬蔑贴大字报的师生是“反革命行动”，他们组织一部分人到处张贴“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誓死保卫校党委”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企图把这些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但广大师生无所畏惧，继续揭发批判，那些“保卫校党委”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很快被师生们的揭发批判大字报掩盖。

反击不成，他们很快改变策略，陕西省委抛出了早已经被停职接受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交大党委在宣布停课开展文化革命的同时，也抛出了宣传“合二为一论”的“修正主义分子”、原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引导全校师生批判。但这种“丢车保帅”的行径更加引起了全校师生的不满，批判的浪潮愈演愈烈。在同一时间，全国其他高校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为了控制局面，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陕西省委也于 6 月 2 日晚派出以省委书记严克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交大加强领导。

省委工作组刚进校时，师生们也曾经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工作组能够领导师生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工作组并没有按照广大师生的理解和愿望指导运动，而是“划框框，定调子”，讲话前后矛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大家的“革命行动”施加了种种限制，这让师生们大失所望，对西北局、陕西省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诚意产生了怀疑。同时，许多同学认

为，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是党的高级干部，级别比当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还高，在全国高教系统也是屈指可数的有影响的人物，大家因此怀疑陕西省委和工作组是否有能力和决心解决交大的问题。于是，从 6 月 5 日开始，同学们纷纷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打电报，汇报交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怀疑西北局、陕西省委里有黑帮，要求中央直接派人来领导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令师生们意想不到的是，陕西省委责令西安邮电局扣押了所有的信件和电报，并把打电报同学的姓名记录在案，报送省委和公安局。然而，纸里包不住火，邮电局扣押信件和电报的行为很快被同学们知晓，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极大愤怒，工作组与师生们的矛盾迅速激化。

6 月 6 日清晨，工程物理系 810（41）班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李世英等人贴出《冒牌的工作组》、《省委——交大党委反党黑帮的十大阴谋》、工作组及省委黑帮的《十大罪状》和《呼吁书》四张大字报；电制 43 班丁传鹤等同学在学生宿舍区的报亭旁放了一张桌子，拟了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内容是“我校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情况极为复杂，问题严重。我们急需党中央亲临领导。”征求大家签名，签名者多达 1683 人。揭发工作组的大字报愈来愈多，连图书馆前水池边的地面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学生们的革命热情愈来愈高，他们或单人行动，或三五成群，或全班集体行动，讨论、集会、讲演。当天，还有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分社等地反映情况，提出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要求党中央派人到交大领导文化大革命。但是西北局和省委坚称“工作组是革命的”，无理地拒绝了同学们的所有要求。

同日上午，我们应物 31 班文革领导小组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讨论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期间，传来了西安邮电局扣押交大师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件和电报的消息，同学们义愤填膺，一致声讨这种压制民

主、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讨论如何抵制和反击，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

第一：尽快把交大的情况和对工作组的怀疑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参加社教的总参谋部的解放军同志，决定由擅长文笔的校广播台和校刊记者梁蕴绵同学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然后分头抄写，寄给自己熟悉的解放军同志请他们转交给党中央、毛主席；

第二：决定由擅长书法的郗友农同学执笔，我和袁绥华同学协助，撰写"强烈抗议西安邮局扣押交大师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和信件"的大字报，揭露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卑劣行径，呼吁邮局职工同志们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全班同学都在大字报上郑重签名。

信件和大字报写好之后，同学们兵分两路，一部分同学负责将信件分散投递到西安大街小巷的邮筒里。由于当时的邮筒没有人员看管，投递非常顺利，可是事后得知，这些信件仍然被邮局扣押，一封也没有寄到总参解放军的手里。另一路由我和郗友农、袁绥华同学到钟楼的邮电大楼张贴大字报。

我们带着大字报和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乘公交车到钟楼下车，然后从邮电大楼西侧靠北边的大门进入邮电局大院，出示了学生证，说明了贴大字报的意图。门卫叫来了一位副局长，但他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据理力争，翻开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朗读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著名的一段话："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听到毛主席的这段话，这位副局长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但仍然坚称不允许，还煽动围观的工人阻止我们张贴大字报。由于众寡悬殊，大字报未能及时贴出，但我们已经向邮局的职工们宣讲了大字报的内容，可以看出，有些职工已经向我们表示了同

情。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邮电局党委书记出现了，书记和副局长一阵耳语之后，居然态度大变，同意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传达室对面的墙上。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引来许多职工围观。这期间，党委书记还主动与我们交谈，我们也不失时机地宣传交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可是，单纯善良不谙世事的我们，哪里知道这是一个阴险毒辣、引蛇出洞的圈套！他们假意和我们交谈，其实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救兵！事后得知，就在邮局党委书记虚与我们周旋之时，中共西安市委秘书长阎明亲自坐镇，从西安各个工厂调集了十卡车的工人，正在赶往邮电大楼的路上，准备伙同邮局职工镇压我们这三个“闹事学生”。正当我们与邮局领导交谈时，突然冲出一伙人，一面高呼“打倒反革命”的口号，一面野蛮地撕毁了我们张贴的大字报，邮电局书记也立即翻脸，露出一幅狰狞面目。接着，一大群人把我们三个包围起来，拳打脚踢，还有人用下流语言对我们进行谩骂侮辱。就在暴徒们行凶之时，那位副局长还出面进行过阻止，而那位党委书记却在一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阵殴打过后，又把我们推搡到职工食堂，几个彪形大汉抓住我们的头发把我们提拉到饭桌上继续批斗，有人扯掉我们的校徽，抢走了我们的学生证和《毛泽东著作选读》，我的上衣被扯烂，眼镜损坏，口袋中的零用钱也被抢走。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党委书记阴冷的面孔和最为凶残的暴徒的嘴脸。面对这些野蛮暴行，我们毫无惧色，小声交换意见后，立即同时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暴徒们一下楞住了！但短暂的寂静之后，却迎来了更加凶狠的殴打。在经历了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批斗围攻之后，看到我们无所畏惧，又把我们三人分开关押，企图各个击破，逼迫我们写检讨，交待幕后策划者，但遭到我们义正严辞的拒绝：“我们拿着毛主席著作，正大光明地去贴大字报，何罪之有？”看到我们态度强硬，他

们终究无计可施，就让我们留下班级姓名，在下午四点多种才陆续放我们回校。

因为身上已经一无所有，我只好忍着伤痛步行。回到中心楼的教室后，发现郗友农刚刚回来，同学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和袁绥华，不久他也回来了。同学们看到我们被折磨成这样，无不深感痛心，几个女同学伤心地落下了眼泪。黄上元、刘美荣、梁蕴绵、曾兴玲等几位女同学还到黄上元家中，为我们做了可口的大米稀饭，有同学到食堂买来了馒头和咸菜。同学们的同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这是多么纯洁高尚的同窗情谊！

就在我们赶往邮局张贴大字报的同时，曾兴玲、徐伟买来了一张大幅毛主席画像，垫上红纸，贴在黑板上，在郑景荣、陈守文等同学协助下把这贴有毛主席画像的黑板挂在了行政楼的正中央。6 月 6 日整整一天，广播里反复播送“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和“毛主席派人来”的歌曲，整个校园沉浸在一片失望、悲愤的气氛之中，同学们眼含热泪，期盼在浓云密布的天空，能骤然射出久违了的阳光。

### （三）最后的抗争

“六六事件”爆发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立即从正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财贸工作会议”上紧急抽调大批县级以上干部连夜进驻交大，加强工作组的力量。

6 月 7 日上午，工作组成员马玲茹到我班宣布工作团的条条框框，责令大字报不许上街，声称要严肃追查昨日发生的邮局事件和张贴毛主席肖像事件的真相。同学们立即纷纷质问陕西省委为什么要扣押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件和电报？工作组为什么划框框定调子，限制师生的革命行动？情绪激昂，言辞犀利，马玲茹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这就

是后来被称为围攻工作组的“六七事件”。

为了留下在邮电总局被围攻殴打的证据，我和郗友农、袁绥华抽空从教室出来到校医院验伤。医生们不在，大概都去开会了，只有一位年长的护士值班，她仔细察看了我们身上的红肿瘀伤，答应在适当的时候为我们作证。至今我还感谢这位护士，因为在后来我们挨批斗受迫害的危险时刻，她没有落井下石向工作组揭发。当然，为了避免伤及无辜，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就在从教室到校医院的路上，我们惊奇的发现：变天了！事后得知，6月6日晚，驻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了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北京的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参与“六六事件”的学生是“假左派、真反革命”，但由于陈伯达不同意，最终没有发表。在工作团的组织策划下，“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挖出潜藏最深的阶级敌人！”之类的大标语首先出现在中心楼，接着很快扩散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我们预感到形势不妙，就在匆忙赶回教室的路上，做了最坏的打算，秘密达成了三条共识，大意是：1、实事求是说明前往邮局张贴大字报的前后经过；2、到邮局张贴大字报是受全班同学委托，有签名为证；3、共同承担责任，不相互推诿，没有主谋，更没有幕后策划者。我们三人始终践守承诺，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相互推托责任，更没有为了自保而陷害他人。以后的事实证明，这几条共识保护了我们班大多数“六六事件”的参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自己。

在我们三人前往校医院的时候，应物31班同学们与工作组的唇枪舌战还在继续，但在教室之外，工作组策划的围剿已经开始，一场“白色恐怖”就要降临了！

### （四）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

由于应物 31 班不仅在 6 月 6 日“大闹邮电局”，还在 6 月 7 日围攻工作组，立即被列为“敌情严重”的三个尖子班之首。工作组首先煽动其他班级对我班进行围攻，应物 31 教室内外，直至教学楼的大门和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应物 31 班是反革命魔窟！”“把大闹邮局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之类的横幅和大标语；同时加强兵力部署，从内部分化瓦解“铁板一块”的应物 31 班，开进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最多时达到了 15 人。工作组一面向班级文革领导小组施加压力，一面利用同学们之间的些许矛盾挑拨离间，唆使个别同学贴出大字报和标语，谴责给党中央写信和去邮电局贴大字报的“反革命行为”，勒令参与者“老实交待”，声言要追查“黑手”和“幕后策划者”。

6 月 9 日，省委工作组升格为三百多人的“省委工作团”，省委书记严克伦任团长。一场名为“查上当、放包袱”，实为批判斗争的运动开始了！

首先，矛头指向我和郗友农、袁绥华，因为我们三人是“六六事件”中“大闹邮电局”的主犯。工作团坐镇指挥，几名提前“觉悟”的同学发难，让我们老实交待“大闹邮电局”的经过，交出幕后策划者。几天前还团结一致共同行动的同学们，如今却形同陌路，不敢随意言语。我们三人按照预先的约定，实事求是地叙述 6 月 6 日发生的一切，没有主谋，更没有幕后策划者。这种回答当然不会令工作团满意，于是批判斗争逐步升级，“坚决揭开应物 31 的阶级斗争盖子！”“挖出潜藏最深的阶级敌人！”的标语口号出现在教室的黑板上和教室内外的墙壁四周。虽然气氛愈来愈紧张，但在应物 31 班内部，大部分同学还是同情和保护我们的，可是其他班级就等不及了，他们贴出的大字报上，我们三人不仅被称呼为“反革命”，还在名字上打上大大的红叉，有同死刑犯背上的亡命旗，记得就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楼梯转向台

的墙壁上，贴着应力 21 班的一张大字报，上面赫然写有“大反革命阎保定”七个大字，当然少不了打上显眼的红叉！宿舍的门框上，也贴上了“揪出大反革命阎保定”的标语。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待”，恐惧、痛苦、困惑、绝望不断折磨着我，尤其听到往日同窗们的厉声呵斥，我的心底在流血！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三人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郗友农还是数理系学生会的体育部长，我是文娱部副部长，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反革命？我更想不通，往日里一起上课，一起自习，一起唱歌，一起玩笑的同学，怎么转眼之间反目成仇，有些人还成为了工作团的打手？眼看危险一步步靠近，我和郗友农私下里约定：1、任何情况下不能承认主观上反革命，否则就会被坐实反革命罪名；2、不自杀，否则就永无出头之日。这两条约定，成了我能够支撑下去度过最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

第五次批斗大会开始了，我照例做检查交待，照例受到严厉的呵斥，说我交待不老实，态度不端正，我预感可怕的事情就要来临：几天来的经验告诉我，一旦有人发难，呼出“打倒反革命阎保定”的口号，接着一片大字报专栏一出，我的“反革命”罪名就“明正言顺”了！我正在暗自做着最坏的思想准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班上一贯做事低调的胡孟浩同学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看阎保定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必要再说了！”许多同学伺机响应，形势即刻逆转，会议主持者也就势顺坡下驴，匆匆结束了这次批斗会。胡孟浩原是应物专业六零级的学生，因病休学，由于六二年应物专业没有招生，复学后来到了我们班，平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他出身书香门第，据说祖父曾经是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上海基督教的首领，以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仗义执言，确实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可见其品格之高尚！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安慰和鼓励的耿瑞林、张

年福等同学，还要感谢以各种方式保护我们的同学们，正是你们的保护，才使我们三人终究没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才有勇气度过一道一道的难关。还要说明的是，第二批驻应物 31 班的工作团成员、时任陕西省大荔县副县长的李梦熊，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同志，正是他的“右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应物 31 班同学们的压力，我们从心里感谢他。

邮局大字报事件的追查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可怕的灾难却骤然降临到梁蕴绵同学身上。因为在工作团看来，曾经“大闹邮电局”、“围攻工作团”的“反革命魔窟”应物 31 班里，竟然抓不出一个像样的反革命，那就太不正常了。于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梁蕴绵同学就被他们打成了“反革命”！在工作团组织的批斗会上，什么“蛊惑煽动大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继承了反动衣钵的资产阶级小姐”、“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一顶顶大帽子扣到了梁蕴绵同学的头上。更不可思议的是，往日朝夕相处的女同学中，竟然也有人落井下石，无中生有地揭发她的“反革命”言行，就连走道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也来凑热闹。随着全校“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梁蕴绵同学的批判逐步升级，由班级批斗升级到全系批斗。同时，行政楼、图书馆和中心楼的墙上，还张贴着批判梁蕴绵的大字报专栏，里面有一张莫名其妙的“黑线联络图”就贴在大字报专栏的中心位置。在校广播台的楼梯上，也出现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梁蕴绵”的标语。还有人别出心裁地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了她的课桌上、床单上和蚊帐两旁。这样残忍的打击和丧心病狂地人格侮辱，摧残着原本端庄、聪慧、活泼、善良的梁蕴绵，大部分同学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却慑于工作团的淫威而无法出手相救。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梁蕴绵每次都是站在靠门的讲台旁边接受批斗的。每次看到她伤心、委屈、无助的眼神，我的心情都无比沉重！ 6 月 6

日，是我们全班同学委托梁蕴绵同学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为什么现在让她一个弱女子承担全部责任？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有这种想法，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梁蕴绵同学是被冤枉的，她是一个好同学！

1966 年 7 月 9 日，传来了原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动力系压缩 12 班女学生王永婷不堪受辱，跳楼自杀的消息，同学们都担心梁蕴绵同学出现意外，纷纷提醒班级的负责人注意。就在当天批判会结束后，我和郗友农、张年福等人也找到当时的班级负责人陈铁民，希望他们安排班上的女同学尽量安抚梁蕴绵同学的情绪，多加防范。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之下，对梁蕴绵同学的批斗才渐渐有所放松。多年后听梁蕴绵同学说，在她最为困难陷入绝望之时，郗友农同学冒着危险悄悄和她见面，向她道出了大多数同学的心声，叮嘱她“千万要记住不能做傻事！”是郗友农同学的安慰和鼓励，使得她有勇气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无休无止的检查、交待、揭发、批判、人人过关，分裂了原本团结友爱的班级群体，摧毁了同学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往日的一些不同意见被无限上纲，平时的一些误会和矛盾被无限放大。例如：张良铭同学因为先后担任过班学习委员和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文革爆发前不久又接任了系学生会主席职务，被怀疑是离“黑帮”很近的人而受到冲击，令人欣慰的是班上的大部分同学还是保护了他。

“查上当、放包袱”活动搞得人人自危，昨天还在批斗别人的人，今天也有可能被揪出来遭受批斗。就在梁蕴绵同学被“揪出”接受批判不久，行政楼前的一片大字报，又把曾经担任过班长的徐伟同学“揪”出来了，罪名仍是“莫须有”，有人说她在行政楼上悬挂毛主席像时加上了“黑框”，实际上是红纸外面露出的黑板！还有人揭发她在观看“舞台姐妹”时流眼泪，在日记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徐伟同学成了又一个“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就在我们班遭难之时，全校范围内也在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残酷迫害参与或支持“六六事件”的师生，追查“六六事件”幕后操纵者，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校园，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李世英遭受工作团批斗后，6月9日留下遗书，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后经医院抢救脱险。革命师生利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制，却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最为残忍的是，工作团把杨克剑、王永婷、刘维娜等所谓的“大反革命”关在第12学生宿舍搞惨无人道的“动物展览”，强迫同学们去“认识”这些“大反革命”。我记得最初是关在二楼，轮到我们班去“参观”时，我看到一间宿舍房门大开，杨克剑坐在书桌旁写检查交代，桌子上放着一尊略微发黑的毛主席石膏像。我实在不想再看下去，就借机溜走了。后来，工作团又把他们关到一楼的一间宿舍里，派人按住双臂、揪住头发把他们的头依次从小窗口里塞出去，供全校师生“参观”，每当塞出一个头，外面的人就得立刻大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XXX！”……，还有不明真相者朝其吐吐沫、扔石块，其残忍程度举世罕见！

7月9日，王永婷不堪受辱，跳楼自杀。工作团办公室主任吴沙浪恶狠狠地说“把狗日的拉去烧掉！”并且不准通知家属，可怜王永婷的父母终究未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

令人发指的迫害仍在继续，“揪出”梁蕴绵和徐伟，还不是工作团的最后目标，七月中旬开始，一场“抓大鱼！”的活动在应物31班开场，矛头所向众人皆知。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开会学习，有人就恶狠狠的瞪着我，大声叫嚷“应物31班的大鱼还没有抓出来！”不过这时的我已经麻木了，横竖都是“反革命”，有什么就来吧！

眼看我们这几条“大鱼”即将被抓，北京传来了消息——工作组要撤消了！原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8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5日，毛

主席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解救了成千上万受迫害的师生员工！工作组被批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终于结束了。

“六六事件”及其后来的五十多天里，被工作团迫害和打成反革命的交大师生有近千人。工作组迫害广大师生的手段，更是骇人听闻。在当时，只要有一个人在工作团授意下发难，贴出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把某一位同学打成“反革命”，接着的喷气式大会批斗，低头认罪，带高帽子游街，名字上打红叉，宿舍大门、蚊帐、书桌上张贴侮辱人格的大字报，都已成家常便饭。最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任意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把一些同学关押起来搞所谓的“动物展览”。罗织罪名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记得原学生会主席杨克剑在写交待材料时，无意间把一把尺子放到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上，而旁边恰好放了一个衣架，石膏像时间久了，有点发黑，于是被诬陷为和“三家村”一样，对毛主席石膏像“狗血喷头”、“当头一棒”，还用箭射毛主席等等。还有一次数理系开大会批判应力 31 班的刘维娜，竟然说她“用吹箫发泄对共产党的仇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 : 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结束之后，这些残害革命师生的法西斯手段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一群由高干子弟组成的所谓的“红卫兵”全盘继承。他们利用老子当权、信息灵通的优势，组成了许多极端组织，诸如北京的“联动”、西安的“红恐队”等。他们把反动的‘血统论’奉为神明，头戴军帽，一身“戎装”，高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交大校园里也曾经出现过他们的身影。为了转移“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大方向，他们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号，残酷迫害“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他们破坏文物和古迹，抄家、抓人、批斗、打人、

甚至杀人。在 1966 年 8 月的北京，他们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惨案，无数“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活活打死或全家被赶出北京。在西安，也发生了多起教师和无辜群众被殴打致死的案件，其残忍血腥程度不亚于北京！

所以，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那些惩罚“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政措施，诸如喷气式批斗、胸前挂牌、戴高帽子游街、各种人身侮辱、残酷殴打等等；那些打、砸、抢、揪、抄、抓乃至武斗，那些为了派性争斗导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师徒对立，那些诸如反动血统论等等的种种荒诞言论，无不来源于这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起初由“联动”、“红恐队”等所谓的老“红卫兵”继承和发扬，后来又扩散到整个社会，而最终的源头，则是以传授如何整人而出名的“桃园经验”。

事实证明，“五十多天白色恐怖”既是文革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整个文革的一个缩影，因此更应该对这一阶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反思，那些带有选择性的“反思”和基于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都不是反思文革的正确态度。

## 二、交大“193 战斗队”的峥嵘岁月

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大的师生员工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自发组织起了许许多多的“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大多数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都有自己的“革命宣言”。但是在交大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是交大文革总会、革命委员会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甚至也没有组织名称，可他们往往承担着总会、革委会交待的重要任务，他们自觉且努力地工作，凭着自己的良心做自己认为有益的事情。我们“193 战斗队”就是这样的一群人。“193”其实是

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分机号码。交大文革总会、交大革委会领导和熟悉的朋友们习惯称呼我们为“193”，久而久之，也就有了“193 战斗队”这个名号。

“193 战斗队”在交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哪些工作，校内的大多数师生并不知晓，甚至连西安工总司的一些同志也对我们的工作有所怀疑，以至于在汤峪学习班上曾出现“交大 193 是什么神秘组织？”的大字报。本文略述“193 战斗队”在文革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以期回应五十年前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 （一）协助筹备成立工总司，反击极左思潮泛滥

1966 年 8 月，西安高校的革命造反派为了便于协同战斗，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行动指挥部”（简称“统指”），西安交大文革总会李世英是“统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与此同时，也诞生了“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统指”和“红造司”成立初期，各院校造反派团结一心，在西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久就在贯彻《十六条》精神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分歧。



交大 193 战斗队部分队员合影

交大李世英主张要正确对待曾经“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保守派群众，要讲究斗争策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帮助教育，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但西工大、西电等校的一些领导则认为李世英“右了”、

“修了”，是“调和”、“折中”、“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叭儿狗”，主张搞“挤、压、砸”，提出了“打倒右倾！”“打倒折衷！”等极左口号。李世英主张要严格执行《十六条》提出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西工大、西电等却支持打、砸、抢、抄、抓的极左行为，“红造司”领导的《西安红卫兵报》还公然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口号。

1967 年 1 月 15 日，“统指”某些领导人指挥东方红广播站向全市广播批判李世英“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专题节目，提出“西安落后，西北落后，出路何在，坚决反右”、“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把“反右倾”当作斗争大方向。

1 月 23 日，“统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打、砸、抢、抓、揪、抄”等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当时，西安地区的全市性工人文化革命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的少数领导人不仅不抵制这股逆流，反而违背广大基层组织和工人群众的意愿，跟随“统指”某些领导人“大反右倾”，支持“打、砸、抢”。

但是，交大的正确主张得到了西安广大工人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曾经在“五十多天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交大师生对这些极左口号深恶痛绝，亲眼目睹过“西安红色恐怖队”暴行的西安广大工人和市民群众也对这一反动口号和打、砸、抢行动进行了坚决抵制。

2 月 9 日，陕西省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东郊联络站等二十九个群众组织在《革命造反报》上发文紧急呼吁停止“反右倾”，指责“打、砸、抢”打的是阶级兄弟，砸的是群众组织，抢的是国家财产，是违背“十六条”的极“左”行为，并指出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

权斗争，而不是“反右倾”。这就是在当时影响巨大的《二九呼吁》。

《二九呼吁》发出后，得到了西安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但“统指”、“工联”少数领导人利用其操纵的“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强令邮电局扣押已经印出的《革命造反报》，并“武装”接管《革命造反报》社，打伤报社职工多人。

2月10日，《革命造反报》社发表严正声明，揭露和控诉“统指”、“工联”少数人的“打、砸、抢”行为。同日，西安铁路系统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西铁联）等23个组织发表了《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大联合夺权，夺取新的胜利》声明，表示对《二九呼吁》“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拥护！”并于晚上举行支持《二九呼吁》的游行，交大宣传车应邀参加，但在《革命造反报》社前被“红造司”和所谓的“夺权委员会”无理没收，并打伤司机。

同日，“工联”等21个组织发表《就当前西安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紧急呼吁》中，继续鼓吹“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红卫兵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西安的打、砸、抢、抄、抓之风日益盛行，1月28日，西安庆华电器厂因“夺权”问题发生武斗，2月10日，西北光学仪器厂发生严重的打、砸、抢事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交大师生和西安广大工人群众以极大的耐心，努力帮助“统指”、“工联”等组织改正错误，但收效甚微。鉴于“工联”领导同志继续坚持错误，许多原属于“工联”的基层组织迫切要求建立真正代表自己意志的工人联合组织，以充分发挥领导阶级的作用，更有力地抵制错误倾向，使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指出的大方向胜利前进。”

2月13日，陕西省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东郊联络站、西安电力机械

制造公司系统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筹委会、西安保温瓶厂文革临委会、西铁联、西安地区印刷业造反总指挥部所属新华印刷厂文革筹委会等二百多个工人群众组织组成的“西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处”发出《火急倡议》，认为工联积极追随西工大、西电“热衷于搞小动作，打内战……甚至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革命同志和革命组织，我们对此感到十分痛心，我们革命工人绝不允许这种不利于大联合大夺权的形势发展下去。”并火急倡议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以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筹备处设在西安新华印刷厂。同日，交大万余名师生上街游行，最坚决支持《火急倡议》发表。


——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火急倡議

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7 年 2 月 13 日关于成立西安工总司的火急倡议

与此同时，“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时间仓促，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利用交大的威望和组织能力进行协调，因此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希望交大总会派人协助。于是交大文革总会派出“怒潮战斗队”的顾明芳、杨国康、赵惠芳、顾光锡老师等，还有张晓铭、刘洪、王绍伟等同学到筹备委员会协助工作。

1967 年 2 月 9 日，我和陈铁民同学步行串连回校，见到交大文革总会的副主任沈荣水，他向我们介绍了西安打、砸、抢之风泛滥的形势，希望我们参与“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筹备工作。因为我们在湖南亲眼目睹了极左派组织“湘江风雷”的种种暴行，所以也认为必须尽快煞住西安的打、砸、抢歪风，于是爽快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我们二人急速赶到西郊土门的西安保温瓶厂，并和早先到达的同学一起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

2月18日，十多万工人群众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大会，宣告成立“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西安工总司”或“工总司”），交大以及支持交大正确主张的部分大中专院校师生、郊区贫下中农、干部、文艺工作者等数万人参加大会。大会主席、西铁联的马希圣同志讲话，指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是大联合、大夺权而非反右倾”，并强调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既要求搞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西铁联、西安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四0四厂等工人组织代表、交大文革总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030部队等群众组织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西安工总司总部设在西三路西安市总工会办公大楼。

西安工总司成立后，立即发出《迎接西北的新曙光》的最紧急呼吁：坚决反对“借口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之名，行破坏大联合夺权斗争之实”，坚决反对“打、砸、抢”；呼吁造反派“要联合，不要分裂，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使西安的文化大革命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规上来。”

1967年3月2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北京连续接见西安交大、西工大、西电和工联的代表。周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态：“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口号，必须取缔、批判。长达70天的“反右倾”告一段落。

为了稳定西安局势，中央决定派21军赴陕西支左。3月3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即：“支左委员会”）成立，后改为“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

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遵照周总理“努力整风，准备夺权”的指示，解放军于3月15日进驻交大开展军训，交大文革总会指示参与工总司筹备工

作的同学全部回校参加军训，只有我和张晓铭同学在参加军训的同时适当保持与外界联络，掌握西安地区工人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直至4月21日军训结束。

西安工总司成立后，旗帜鲜明地支持交大的正确主张，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反对打、砸、抢、抄、抓等极左行为，有力地遏制了西安极左思潮的蔓延。

### （二）落实毛主席的《四二三批示》，参与工总司组织整顿

1967年4月中旬，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就“支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连续召开西安交大、西工大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批评和建议。交大李世英在会上就军队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得到军队领导的认可和支持。有记者把此次座谈会的情况以《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为题报送给了中央。

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时，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关于李世英作了三处批注。当《报告》中写道“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时，毛泽东在“李世英”后面批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对李世英提出的第6条意见“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后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对第8条意见后批注：“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这就是著名的《四二三批示》。

遵照毛主席的《四二三批示》，为了落实李世英同志八条意见中关于帮助工总司进行组织整顿的任务，支左委员会在征得工总司负责人同意后，建

议交大派人协助。因此，校文革总会责成戴慕蓉同志组织一批同学到工总司协助工作。由于早先参与筹备工总司工作的顾明芳、杨国康、赵惠芳等同学已经临近毕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再介入，重新选派进驻工总司帮助进行组织整顿的人员有：

数理系应物 31 班：阎保定、陈铁民、耿瑞林；

数理系应力 21 班：王东平；

电机系电制 53 班：沈元秋、张晓铭、朱泽一；

电机系工企 41 班：李道本；

无线电系无线 31 班：王心杰；

无线电系电真空 51 班：孙少华；

动力系内燃 32 班：沈云飞等 11 人。

负责人：阎保定，沈元秋

1967 年 7 月份，电制 31 班徐幼玲同学到战斗队工作。

这些同学就是 193 战斗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间，沈元秋的沉着冷静，张晓铭的多谋善断，朱泽一的巾帼风范，陈铁民的组织才能，耿瑞林的老成持重，王心杰的吃苦耐劳，王东平的精明能干，李道本的能言善辩，沈云飞的胆识超群，孙少华的勇猛果敢，徐幼玲的坚定顽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团结一心，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一年多的工作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的办公地点设在校内东三楼三楼内燃机实验室办公室，电话：31011–190，所以有一段时间也称我们为“190”。戴慕蓉同志召集上述人员开会，明确了基本任务和注意事项，强调我们只是协助工作，要注意尊重工总司的领导，不要包办代替。然后我们进行了分工，分别到工总司各个部门以及各个分部协助工作，我和沈元秋统筹全局，并负责工总司负责人马希圣

等人与交大文革总会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等同志的联系。

整顿工作从 4 月下旬全面开始，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1、明确斗争目标，出版刊物加强宣传**

斗争目标是努力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准备夺权。3 月 2 日，工总司主办的《红色工人报》创刊。

**2、完善总部和分部组织机构**

工总司总部由办公室、参谋部、组织部、政治部、宣传部和生产部组成。根据下属组织成员的分布情况，除了西铁联、总后系统的特殊情况仍需单独活动外，设立了东郊分部、西郊分部、南郊分部、北郊分部、市区分部、阎良分部和纺织城分部。

**3、调整总部和分部的领导班子成员**

选拔出身好、政治可靠、品行端正、革命造反精神强、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工人同志进入总部和分部的领导班子。调整后的总部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由主任委员马希圣（西安铁路局）、副主任委员刘安全（西安新华印刷厂）、李本树（西安筑路机械厂）、委员吴文杰（煤炭部西安煤矿机械厂）、章谦（建工部五局机械修配厂）、崔三河（西安新华印刷厂）、芦志芳（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变压器电炉厂）、赵志云（西安保温瓶厂）、何里（陕西国棉五厂）、杨树贵（建工部五局木材加工厂）等人组成。

**4、制定领导班子学习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

**5、核查和清理基层成员单位**

协助工总司清查了所有的下属组织，清退了极少数来历不明或者群众反映有问题的组织，吸收了经过核查的新的组织，编造了正式的花名册，首批在册的工人群众组织有三百多个，三十余万人。在工总司基层组织的成员中，大多存在着党团员多、老工人多、技术骨干多的“三多”现象。这一特

点决定了工总司反对打、砸、抢、抄、抓等极左思潮的基本理念。

当时，交大校内的一部分同学受到统指、工联的舆论影响，对工总司的情况不放心，4 月中旬，交大还为此事专门召开了 402 辩论会，我带着工总司的花名册在会上介绍了工总司的概况，逐一澄清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并且汇报了协助整顿工总司的计划，消除了同学们的怀疑。这是我在 402 辩论会上唯一的一次主体发言。

工总司的整顿工作大约到 6 月中旬结束。此后，在工总司总部只留下陈铁民和孙少华了解情况，战斗队人员大部分撤回学校。从 6 月中旬到“八五静坐”开始，战斗队主要负责了解校外工矿企业的文革动态及时向总会汇报，负责交大总会与工总司的联络，间或接待工总司的马希圣等负责人。

### （三）协助工总司开展工作

在工总司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和帮助工总司整顿组织的过程中，我们也协助工总司开展了一些工作。

#### 1、努力求团结，反分裂，求进步，反倒退，促进革命大联合

工总司成立后的第二天，即 2 月 19 日，统指等五个组织在体育场集会，单方面宣布成立“新西安革命委员会筹备处”，会上大喊“反右倾”。会后举行游行，高音喇叭带着队伍高喊：“打倒大杂烩！”“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大街上到处贴满“打倒反革命小联合！”“绞死大杂烩！”的标语。

2 月 20 日，文艺兵团少数人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包围工总司宣传车，制造所谓“朱德像事件”，污蔑工总司。

2 月 27 日晚，“工联”西郊二分会组织部分工人，高呼“反对大杂烩！打倒工总司！”的口号上街游行。

2月28日，统指、工联等组织举行游行示威，高呼“绞死工总司！”“打倒大杂烩！”等口号。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工总司总部要求各分部和基层组织人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采取各种形式和工联的工人同志们开展谈心活动，消除分歧，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实现大联合。

工总司还分别于3月1日、3月11日、4月8日、4月27日发出书面声明，呼吁西安地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坚决执行周总理“努力整风，准备夺权”的指示，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5月3日，工总司所属中国人民解放军3404厂临委会等三个单位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后发出紧急倡议，强烈指出无原则的“内战”打不得，呼吁“召开西安地区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寻求大联合的途径实现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

工总司的大联合倡议和释放出的善意，曾经感动了部分工联组织的基层群众，使得这些单位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但工联领导层固执己见，继续对工总司采取打压手段。4月27日，工联等组织单方面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刘、邓，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违反协议私自动用全市性有线广播，引起工总司等组织的不满。周总理两次电话指示：大会改日再开。但工联等无视周总理指示，仍开大会、游行，高呼“会议照常，气死保皇！”“打倒大杂烩！”等口号。同日，工联、红造司组织七、八十人到位于西安市总工会的工总司总部捣乱，从上午十点到夜里12点，围斗工总司工作人员，砸烂办公室门窗，还绑架了三名工作人员。工联领导层的不配合态度，使得工总司大联合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 2、响应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西安工总司对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非常重视，在成立之初，就设置了生产部，负责“抓革命，促生产”。后来组织整顿时，又加强了生产部的力量。

2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做好准备，为春耕生产积极工作”。工总司积极响应，多次组织支农大队，包括技术人员、文艺队、医疗队，分别到东方红、向阳公社等三十多个生产大队支援春耕生产。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发表，工总司所属各分部、各工厂、企业组织纷纷响应。工总司所属水电系统司令部等 8 个单位，组织三百多人，利用星期天去火车西站参加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号召。

3 月 21 日，工总司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并发出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倡议，并与 3 月 26 日、4 月 21 日和 5 月 9 日召开了三次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

1967 年 4 月 4 日，西安工总司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的“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

西安北郊的红旗机械厂，当时是一个大型的军工企业，该厂的群众组织“红总司”是西安工总司的下属组织，他们顶住种种压力，把总工程师保护起来，竭尽全力维持正常生产，还向省里上报过完成任务的捷报。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各级党委和行政机构全部瘫痪，社会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形势下，西安工总司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能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以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 3、开展拥军活动，加强军民团结

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成立后，西工大、西电和工联一方面向陕西省军区施加压力，要求为被逮捕的西安庆华电器厂和西北光学仪器厂的打、砸、抢罪犯平反，一方面离间交大、工总司和21军的关系。面对这一复杂形势，工总司坚持一碗水端平，对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陕西省军区和21军一视同仁，积极开展拥军活动，搞好军民团结。

4月28日，由工总司、文总司等单位发起，在新城广场召开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并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的发表。第二天，工总司、农总司、文总司、机总司等群众组织分四路前往陕西省军区、西安军分区、8133部队、8118部队慰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极左思潮抬头，武斗之风泛滥，军民关系遭到了令人痛心的破坏。

在这一段时间里，交大总会戴慕蓉同志直接领导193战斗队，武登才、沈荣水、邵乐冲等总会领导也常来指导工作。

## （四）高举“军民协力，制止武斗”大旗，抵制“军民联防，文攻武卫”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英明指示，以及以交大、工总司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的抵制，使得“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之类的极左口号曾经一度在西安失去了市场。但是，从1967年5月初开始，由于打、砸、抢和武斗之风开始在全国蔓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安，为“打、砸、抢”翻案的暗流也在西安开始涌动，武斗频发。

1967 年 5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公布了 5 月 14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通告》，要求“坚决执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6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要求纠正打、砸、抢、抄、抓歪风的有关通令，史称《六六通令》。

但是，《六六通令》在西安没有得到认真执行。由于支左委员会在支左工作中逐渐倾向西工大、西电和工联等极左派组织，西安工总司基层群众组织屡屡受到排挤和打击。1967 年 6 月中旬，西工大、西电和工联等提出了一个口号：“军民联防，文攻武卫！”西安的大街小巷、工厂车间在很短的时间里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大标语，显然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其势汹涌异常。“文攻武卫”这一口号，是河南省一个造反组织“二七公社”的火线指挥部负责人袁庾华于 1967 年 5 月 31 日提出来的，传到西安，变成了“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其用意非常恶毒！其一：把武斗合法化、革命化；其二：把武斗挑起者打扮成受害者，为镇压不同意见的群众提供借口；其三：把军队拉进来，拉大旗作虎皮，制造军队支持自己的舆论，同时挑拨军队和另一派群众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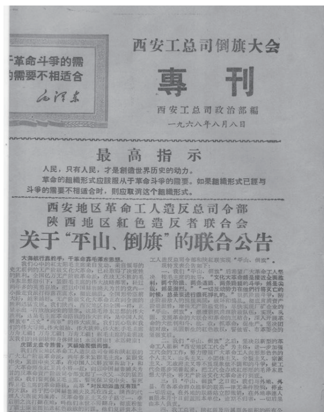
当时社会上，经常见到西工大、西电和工联一派贴出的大标语：“21 军好，21 军好，21 军支左不支保！”就是明显离间 21 军和交大、工总司关系的口号。面对“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的泛滥，我们战斗队经过讨论认为：必须坚决地、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为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军民协力，制止武斗”口号。在请示戴慕蓉同志同意后，由我和沈元秋、孙少华找到工总司负责人马希圣，建议发动工总司所有基层组织宣传“军民协力，制止武斗”。马希圣等同志对我们的建议非常赞同，立即召开各分部负责人会议进行布置。我们也迅速把已经撤回交大的队友派往各自熟悉的分部临时协

助工作。第二天一早，西安的大街小巷、工厂车间几乎同时贴满了“军民协力，制止武斗”的大标语。与此同时，工总司各分部派人深入基层宣传这一口号，使得“军民联防，文攻武卫”的错误口号很快失去了市场。

工总司的这一口号道出了西安广大市民的心声，同时也得到了省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理解和支持，西安的局面一度缓和。如果这时支左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能站在公正的立场，旗帜鲜明的批评“军民联防，文攻武卫”的错误口号，支持“军民协力，制止武斗”，那就不可能再有后来的“八五静坐”、“九二武斗”的发生。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支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倾向性越来越大，交大和工总司的努力很快随着他们由“支左”到“支派”的转变而付诸东流！

为了制止武斗，193 战斗队还协助交大革委会作了许多工作。1967 年 7 月下旬，西安武斗日渐猖獗，交大革委会组织了以火线兵团惠毅老师为负责人的调查组进行调查，向中央汇报。当时红旗机械厂是调查重点，我们派熟悉该厂情况的朱泽一队友前往协助，取得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1968 年 5 月 1 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于革命斗争的需
……的需要不相适合
毛泽东

西安工总司倒旗大会
專刊
西安工总司政治部編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

最高指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革命的組織形式应該服从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如果組織形式已經与斗爭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組織形式。

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陕西地区紅色造反者联合会
关于“平山、倒旗”的联合公告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澤东思想。

《红色工人报》的西安工总司倒旗大会专刊

1968 年 8 月 8 日，西安工总司响应中央号召，在西安率先举行倒旗大会宣布终止活动，为其他群众组织作出了榜样，为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作出了最后的贡献。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副主任黄经耀、胡炜以及交大革委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从 1967 年 2 月 18 日成立至 1968 年 8 月 8 日倒旗，西安工总司一共活动了一年零六个月。

## （五）我所知道的“八五”静坐

1967 年发生的“八五”静坐是交大师生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片阴影。关于“八五”静坐发动的过程、“八五”静坐对交大荣誉的损害、“八五”静坐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和严重后果等，已经有很多当事人回忆和反思。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我了解的情况，便于大家更全面的了解“八五”静坐发生的历史背景。

1967 年 5 月，西安极左思潮重新抬头，典型的表现为“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的出笼。虽然这一口号受到交大、工总司针锋相对的批评和抵制，使西安的紧张形势一度缓和，但由于支左委员会的包庇和纵容，相对平静的局面没有持续很久，武斗之风就又重新刮起，并且愈演愈烈，工总司基层单位屡遭工联组织的打、砸、抢、抄、抓。

1967 年 6 月，听到西安西郊西电公司发生武斗，为了解现场的真实情况，我急忙前往西郊，潜入西郊职工医院传达室，在门卫老师傅的帮助下，从传达室临街的小窗子悄悄向外看，看到打了胜仗接着游行示威的工联的游行队伍，人人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用钢管制作的长矛，一边高呼“军民联防，文攻武卫！”一边行进。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的武斗队伍。后来听说，这次武斗，工联抓了许多工总司“俘虏”，出现了徒弟抓了师傅，到后来又不得不把师傅释放的故事。由于工总司基层组织的成员中，“党团员多，老工人多，技术骨干多”，用工联人的说法：“不经打”，所以在争斗中屡占下风，办公室被砸，负责人被抓，有家不能回，有厂不能进，有工不能上，越来越多的工总司基层工人只好流浪到交大暂住，而交大也只能临时提供遮风避雨的场所。他们没有了生活来源，有的还携家带口，生活十分凄惨。由于支左委员会对打、砸、抢、抄、抓和武斗制止不力，引起了工总司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许多工总司分部和基层的负责人都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办公室在东三楼。他们遭受到工联组织的迫害后，找支左委员会求助无门，只好到工总司找马希圣，如果在工总司找不到，就到我们这里找，如果找不到马希圣，就要找李世英寻求帮助，这样的情况日益增多。有一次西电公司西安微电机厂有个叫徐富贵的工人，找不到马希圣、李世英，气忿之下，把我们办公室的门踢了个大窟窿。说实在的话，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很难想象到那么多的工总司工人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

还有一件事，也加剧了交大、工总司和支左委员会的对立，那就是关于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的问题。西安工总司成立后，西工大、西电诬蔑西安工总司是“保守派”、“大杂烩”，他们还强迫原省委、西北局的领导干部为他们张目。原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林牧在《我所知道的习仲勋》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67 年初，西派发动了‘反右倾斗争’，反对东派的右倾。当时，习仲勋住在西北大学，受西派监控。有一天，西大几个造反学生问习仲勋：你对我们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持什么态度？习仲勋说：‘我看反右倾恐怕不对，现在不是反右倾的时候，而且群众组织应该团结，不应该分裂’，西大几个学生拍手大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你是敌人，你反对反右倾，这就说明我们做对了。’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习仲勋的品德和风骨，一是，他在西派监控下还敢说西派做得不对；二是，他受到造反派的残酷斗争，还要顾全造反派的团结而不分裂。

与此相反，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书记处书记肖纯，在西派控制下，公然发表了支持西派的声明并同西派合作，想成为第一批‘三结合’的领导干部。”林牧同志的这些回忆基本属实。早在 1967 年 2 月 23 日，西安农民总会等组织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坚决响应《中共中央给全国

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誓师大会”，在会场上却出现了“打倒右倾投降”、“反对大杂烩”的口号，霍士廉在大会上亮相，攻击工总司是“反革命小联合”，交大师生不堪受辱，高呼“霍士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退出会场。当时我还曾听到过霍士廉的讲话录音，霍在讲话中轻蔑地称呼西安工总司是个“什么东西”，还说了一些不利于交大、工总司的话。

当然，现在看起来霍士廉同志当时也可能有自己的苦衷，但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该预想到这样表态的后果，为什么不能像习仲勋同志那样做呢？由于霍士廉明显表示了选边站的立场，导致了交大、工总司一方和西工大、西电及工联一方在批斗、军管霍士廉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交大、工总司要打倒霍士廉，西工大、西电和工联一方力保霍士廉，支左委员会也明显地偏袒霍士廉。6 月 13 日，支左委员会传达总理有关批斗霍士廉的“三点指示”时，交大经过调查认为支左委员会擅自篡改总理讲话，导致对立情绪加剧。

1967 年 8 月 5 日，传来了支左委员会同意《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消息，犹如一颗重型炸弹在西安上空爆炸，震动了整个西安城！一个以宣传“打、砸、抢万岁！”反动口号而臭名昭著的报纸，在被勒令停刊 4 个月后，竟然死灰复燃，在西安武斗之风蔓延成灾时，由支左委员会支持下复刊，表明了支左委员会支持极左派的立场，显然是对坚持正确路线、极力反对打、砸、抢的交大、工总司一派群众的重大打击。

还有一种说法是支左委员会个别领导人背着支左委员会决定“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如果属实，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当天下午，许多被工联组织暴力驱赶、无家可归的工总司的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位于玉祥门省工会的支左委员会接待站门前集会抗议。当天晚上，交大 402 辩论会后出动大队

人马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讨要说法，工总司等组织队伍前去支援，但是接待站里人影全无，支左委员会负责人胡炜、黄经耀等更是避而不见。交大、工总司的队伍又来到建国路的支左委员会联络站，也找不到人，于是队伍停到建国路等待支左委员会负责人的答复，持续四十多天的“八五”静坐由此爆发！

我们再审视一下“八五”静坐发生、发展的过程。首先，陕西省支左委员会负责人胡炜等人借助全国极左思潮蔓延之势，暗中扶持西安的极左派使得极左思潮死灰复燃，然后打着“军民联防，文攻武卫”的旗号迫害工总司的基层群众，当工总司群众的愤怒快要到达极点时，又突然决定《西安红卫兵报》复刊去激怒他们，当工总司、交大的群众按耐不住走上街头抗议时，又有意怠慢他们的谈判代表，使得“八五”静坐队伍失去理智，无法回头。这样，乱军罪名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交大、工总司一派的头上。这种深思熟虑的“连环套”陷阱，也只有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人才能想得出来。

总而言之，在“八五”静坐问题上，工总司和交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自己应该认真检讨和反思。但“八五”静坐的发生、发展有其特定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八五”静坐引起的严重后果也绝非交大和工总司单方面的责任。我们现在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澄清这段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期盼仍然健在的当事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揭开真相，给人民和历史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八五”静坐的指挥部设在建国路上原张学良的公馆。为了维持秩序，革委会派我和几个队友到指挥部办公室工作，负责出入证件的发放。开始几天，进入公馆的人需要出示盖有指挥部印章的出入证，秩序井然。但没过多久，出入证发放越来越多，指挥部院内也越来越乱，只好发放新的出入证，盖一个半章有效，而后又改为盖俩个章有效，直至增加到盖俩个半章有效，

还是控制不住局面。此时，遭受工联迫害的工总司下属的一些组织的负责人，已经被派性和仇恨冲昏了头脑，丧失了理智，他们纠集起成群的工人冲击指挥部大门，大声呼叫要见马希圣、李世英，谁阻挡就打谁。记得是8月16日左右，193队友张晓铭被打伤，我们一怒之下撤出了指挥部，从此再没有踏入半步。我们虽然撤出了“八五”指挥部，但是依然关注着西安的形势。早在工总司整顿结束时，我们已经觉察到工总司的一些领导开始飘飘然，听不进不同意见，派性也开始抬头。“八五”静坐之后，更发现工总司领导层中思想比较极端的人日益活跃，派性也急速膨胀，我们已经隐约预感到继续静坐下去，势必加剧两派的对立，甚至可能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解散“八五”指挥部，中止静坐。但我们却没有郑重地向李世英等领导同志提出这个建议，作为193战斗队的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这也成为我终生的一个遗憾。

后来在汤峪学习班上，我曾经问过武登才：“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果断地撤出‘八五’指挥部？”武登才回答：“在交大最困难的时候，工总司支持了交大，现在把那么多工人扔在那里不管，于心何忍呀！（大意）”，我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想到过撤退，而是承受着工总司等群众组织的巨大压力，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错过了战略收缩的最佳时机。

9月2日清晨，听说西郊发生了武斗，我打电话到西郊新华印刷厂财务科找李惠兰女士询问情况，她告知西郊发生武斗了，又过了二十多分钟，她说听到密集的枪声，不知是哪派开的枪，又过了一会儿打电话过去，已经没有人接电话了。整整一天，我们都在揣揣不安中度过。直到吃晚饭时，在第一食堂饭厅遇到几位西郊某厂的工人，其中一人好像认识我，他向我们诉说了早上的经历：当天凌晨，他们随着工总司的队伍，拿着长矛向庆安公司大门冲锋，突然间枪声大作，他身边的战友即刻倒下了一大片，由于他是复转

军人，反应迅速，立刻卧倒，才幸免一死。接着，他乘枪声间歇的瞬间滚到路旁的沟渠里，和几个幸免遇难的战友从庄稼地里绕到一个变电站的后面，再绕过厂区继续潜逃，直到下午才走到交大。据他所说，这次开枪事件，庆安公司工联的人早有准备，而且从枪声来看，是步枪、机关枪齐发，火力十分凶猛。庆安公司工联从哪里搞到这么多制式武器，始终是一个谜。

汤峪学习班上也有人提出九二武斗时庆安工联武器来源的问题，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因为这个学习班由 21 军主导的支左委员会主办，21 军的包涤处长坐镇，军宣队全是 21 军干部战士，工宣队是宝鸡虢镇某军工厂的极左派，其目的就是针对交大和工总司，所以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愿以后内部资料公开，当事人良心发现，或许能够揭开其中的秘密。

**（六）临危受命，保护学校安全**

九二武斗发生后，交大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9 月 2 日夜晚，坦克兵学院的两辆坦克从交大南边通过，故意碾压交大的篱笆围墙示威，和平门被西电派人武装封锁，交大周边也不时有载着全副武装的工联武斗队的卡车绕行并在校门口耀武扬威，不断喊口号进行挑衅，但是始终没有人敢攻进学校。原因之一，是因为交大师生无一人外出参与武斗，对方找不到攻击交大的借口；原因之二，是由于当时交大的威望极高，在对方的眼里，交大高深莫测，他们的武斗人员担心交大早有准备，不敢贸然进入。实际上，交大几乎没作什么准备，只有实习工厂做了一些匕首，铸铝的手柄，相当粗糙，数量也不多，我也仅仅是在别人那里见到过而已。当时还听说交大的一个战斗队假借对方某某战斗队的名义印发传单，“谴责”交大“丧尽天良，在竹篱笆墙后面布下各种地雷和威力巨大的放射性武器（大意）”等等，实际上是为了恐吓对方，虽然这是子虚乌有的空城计，却也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

用。原因之三，是对方担心住在交大的大量工总司工人持有武器，不敢贸然进攻。

尽管如此，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交大革委会还是果断决定疏散全校教职员工，动员大家回原籍避乱，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到学校财务科借路费，同时留下了少数学生组成护校队，保护学校的财产安全。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一是保证了全校师生的安全，二是践行了不参加社会武斗的原则。

由于我们战斗队熟悉外面的情况，革委会副主任武登才希望我们留下做几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保卫学校电话总机的安全，二是调查师生的安全状况。于是，我和沈元秋、张晓明等几位男生随即搬到行政楼一楼西边电话总机室隔壁去住，昼夜值班守护电话总机。同时，战斗队全体同学分散到各系了解师生有无失踪、受伤等情况，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全校师生无一人参加校外武斗，更无一人因参与武斗伤亡，这在全国高校中间是绝无仅有的。

可是，我们 193 的队友陈铁民和徐幼玲却先后失踪了。原来 9 月 2 日傍晚陈铁民从市内返回交大，途径和平门时被西电的武装人员盘问，陈铁民如实声明自己是交大学生，却被武装人员无理劫持关押到西电校园里，幸被路过的群众发现，报告了交大总会。9 月 3 日晚，交大总会领导沈荣水派徐幼玲到市内了解情况，直到深夜未见她回来，情急之下，我和沈元秋、张晓明、顾洹老师乘车绕道到人民大厦，然后步行经过通济坊去青年路附近寻找。时值夜半，又是九二武斗刚过，南大街上一片寂静，只有几个巡更的老太太带着严防“五湖四海”的红袖章拿着棍子巡逻。我们询问了几家单位的传达室值班人员，一无所获，只好返回人民大厦。第二天有西安塑料一厂的工人到交大报告了徐幼玲被抓的过程，我们才知道了她的下落，原来徐幼玲到西安塑料一厂门口问路，也是先声明自己是交大学生，却被把守大门的工

联人员扣押，关押到西工大的教学楼里。队友陈铁民和徐幼玲失踪，全战斗队的同学们都十分焦急，随后的几天，我们一边守卫电话总机，一边四处联系营救。省军区后勤部的几位干部和工总司的工人们给于了许多帮助。我们曾经设计了几套营救方案，为了实施营救更有把握，9 月 7 日我只身一人到西电和西工大实地勘察。到西电门口后，见出入的学生全部身着军装，我一身的平民打扮必然引人注目，所以没敢进入。随后，我顺利混入了西工大，发现教学楼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把守，如果强行解救，必然爆发严重冲突。回校之后，经过商量，决定采用稳妥的方式实施营救。我们先打听到抓徐幼玲的西安塑料一厂工联组织头头的家庭地址，然后以交大红卫兵决死总队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求他立即设法释放徐幼玲同学，否则后果自负，吓得这个头头连夜举家潜逃回了老家。大概信寄出的第三天，徐幼玲就被放了回来。隔了一天，正当我们另想办法解救陈铁民时，他也回来了，估计是交大义释西电的李洪明之后，他们良心发现，放了陈铁民。两位队友被非法关押期间，吃了不少牢狱之苦，但他们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交大声誉的话，着实令人敬佩。

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之后，形势有所缓和，但校革委会得到情报：有校外的对立组织企图到交大寻事，可能危及图书馆的安全。于是责令我们战斗队移驻图书馆一楼东边，保护四楼的珍贵图书资料。这间办公室的电话分机是 193 号，从此我们就被称为“193 战斗队”。我们在一楼办公室安装了报警电铃，报警按钮安装在四楼珍藏室，并日夜值班守护。这些资料中，记得有完整的原版《蒋介石传》、清廷和慈禧太后的照片全集、解放前交大历届毕业生照片和纪念册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为了贯彻中央“九五”命令，交大革委会派人到工矿企业的工总司下属组织做工作，要求 193 战斗队配合，队友朱泽一曾陪同校革委会副主任武登

才到红旗机械厂动员红总司上缴武器。胡家庙建工部五局一个工厂的工总司下属组织在九二武斗发生后的第二天动用了本厂武装部的民兵武器，不久也在我们的劝说下上缴了。

### （七）协助清理校外人员，确保复课顺利进行

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校革委会立即响应。10 月 23 日，学校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由李世英作动员报告，师生们喜出望外，摩拳擦掌准备复课。但是，当时的大部分教室都住有外单位人员，他们都是被工联一方压迫无家可归的工总司基层组织的工人，有的甚至携家带口，生活十分困难，看起来也十分可怜，他们把交大作为自己最后的保护伞和栖息地。

为了自卫，他们中有些人还持有武器，还有人把炸药、雷管带过来自制手雷、炸弹。在这些人当中，也不可避免有闲杂人员混入，清理起来十分困难也十分危险。但为了复课大局，也为了校园的长治久安，校革委会决心全面清理，由各系部组织学生动员这些工人离开学校回原单位或回原籍避难。鉴于我们熟悉工总司的情况，校革委会让我们 193 战斗队配合保卫部门处理在清理外单位人员过程中出现的紧急状况。

在这一段时间，谢富珍、张彦奇、潘小豹、钮守正、姚国贤、田志刚等同学也加入到 193 战斗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清理校外人员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次危急事件，都由我们出面处理。

有一次，革委会电告住在中心楼 1203 教室的校外人员手持武器与学生发生对峙，让我们速去处理，我和战斗队的几位同学火速前往，刚赶到楼梯口，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到了 1203 教室门口，只见满屋白色鸡毛乱飞，

地上跪了 2 个人，满脸满身都是鸡毛，细问得知：住在这里的校外人员见同学们要他们离开交大，拿出自制的手榴弹与同学们对峙，不小心拉了弦，情急之下把手榴弹塞到床下面，把填有鸡毛的床垫炸飞了，幸亏是自制的手榴弹，威力不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学们气愤之下，让那 2 人跪在了地下。我们问清情况后，担心这些人的同伙赶来报复，赶忙让跪着的人起来，好言安抚，向他们说明请他们离校的原因，晓以利害，终于平息了这次事件。

再有一次，革委会来电说在西二楼机械系学生与校外人员发生了严重冲突，情况十分危急，让我们速去处理。我和沈元秋、沈云飞、孙少华急忙赶往西二楼，一上到二楼，看到楼梯口、楼梯上、走廊里站满了学生，足有一百多人，离楼梯口二、三十米远的走廊上，有校外人员用课桌垒起的工事，上面架着一挺转盘式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那群学生，可是学生们仗着群胆，还在不断地呼叫口号，让占领者“滚蛋！”形势十分危急，一旦激怒对方，必然出现严重的流血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简单交换意见后，决定由沈云飞、孙少华给同学们做工作，让他们保持安静，稍安勿躁，我和沈元秋去和校外人员谈判。我们边走边对着校外人员大声说：“我们是交大 193，代表交大革委会来处理问题，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同时拍拍手表示没带武器，说完就迎着机关枪的枪口走了过去。当时，工总司的一些主要的下属单位负责人都知道交大 193，听到我们来解决问题，他们的负责人马上出来相见。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了复课是中央的指示，清理校外人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十分了解和同情你们的处境，但还是请你们积极配合。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谈判，他们同意撤出交大，但拒绝交出武器。为了打破僵局，我们也适当做了让步：走廊上架设的机关枪必须交出，其他有没有武器我们没有看到，不再过问。他们勉强

同意了这个解决方案，随即交出了那挺机关枪，这场冲突总算化险为夷。

还有一次，红卫兵总部收缴了一批炸药，让我们协助处理，我们赶到第一学生宿舍二楼，看见东头的大房间里放着十几箱黄色炸药，每个箱子里还放有一把把的电雷管。看到这个场景，确实吓了一跳，因为我们知道，黄色炸药稳定性好，没有起爆装置很难起爆，但是把雷管放到炸药箱里，一旦雷管爆炸，那十几箱炸药必然起爆，不仅第一学生宿舍会夷为平地，附近几栋宿舍也难以幸免。我们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叶雄波，他派人和我们一起从炸药箱里捡出雷管，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发生。

上述几件危急事件是我亲自参与处理的，其他队友处理的突发事件还有很多。

记得有一次某系的同学们在清理校外人员时，发现他们用迫击炮弹改装成的武器，称为“地老鼠”，一旦击发，可顺着地面窜出二、三十米爆炸，谁也不知道如何处理，革委会让我们前去协助，几个队友去后，和校保卫处徐老师一起商量，由徐老师右手托着这个“地老鼠”炸弹，坐在摩托车上，小心翼翼的送到了公安局，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多起。

在开始清理校外人员时，大约是 1967 年 10 月底，交大武装部接连两次被抢，第一次被抢去 50 支小口径步枪，第二次被抢去一支小口径手枪。武装部的张自升老师怀疑是住在交大的校外人员所为，希望我们协助破案。我们经过摸底调查，怀疑是住在交大的东方厂人员作案，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事有凑巧，一天，东方技校几个女学生到我们战斗队驻地找人，我冷不丁的说了一句话：“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头，住在交大，吃在交大，还干对不起交大的事，如果还有良心，就过来把事情说清楚！”几个女孩听后脸色大变，赶快找借口离开，我们心里也就有数了。果然，当天下午，东方厂工总司的头头就来找我们道歉，承认抢了武装部的枪。此案告破，总算证明了交大革

委会和张自升老师的清白。西安局势缓和以后，我还和张自升老师到东方厂讨要这批枪支，但没有成功。武装部被抢后，张老师担心剩下的几十把刺刀被抢，就移放到我们的驻地代为保存。

在这一段时间里，193 战斗队利用在工总司中的声望，协助交大革委会清理住校的外单位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为全校师生的安全和学校全面复课做出了贡献。

几十年后，2010 年 5 月我在交大招待所见到李世英，偶然间谈到此事，他十分动情地说："当年有很多像你们 193 这样的同学们，主动为我们化解了许许多多的危机，确实令人感动！"

交大 193 战斗队当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曾经引起过统指、工联一方的仇视和支左委员会的不满，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捏造事实对我们进行迫害。

1967 年 10 月，工总司东郊分部工作人员高玉明被工联一方非法拘禁，严刑拷打之下，高玉明编造了许多诬蔑中伤 193 战斗队的谎言，还交待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到西安策划了"八五"静坐，交大 193 战斗队负责杨成武的警卫工作。支左委员会某些负责人如获至宝，大肆追查，终因情节太过离奇无法落实而不了了之。

支左委员会负责人胡炜等人还利用"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对我们进行迫害（详见中共陕西省委陕发〔1979〕175 号文件）。他们非法拘禁顾洹老师等人，用刑讯逼供得到我的办公桌上放有"康生黑材料"的"口供"，导致在这起陕西省"第一大案"中，193 战斗队的陈铁民、孙少华、顾明芳和我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1968 年 12 月底，我和沈元秋、朱泽一还被指名参加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汤峪陕西省第一干部疗养院举办的"西安地区原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

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汤峪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被列为重点追查对象，有一段时间把我隔离起来不准参加集体活动，还在全学习班大会上点名批评。

我们毕业分配到工作岗位之后，也没能逃脱他们的迫害，致使许多同学的工作和进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71 年清查“五一六”期间，驻交大工宣队派了两个人到我工作的陕西国棉九厂找我，开口就叫我交待李世英的所谓“五一六”罪行，并蛮不讲理的叫嚷：“他有五一六思想，就是五一六分子”，被我断然拒绝后，二人恼羞成怒，竟然到厂革委会领导那里信口雌黄，致使厂方以为我是隐藏很深的“大反革命”，迅速立案并派人四处调查，厂里一些派性十足的人也急不可耐地到处放风，大会点，小会批，十分得意忘形。

后来，得益于王世昕等交大老师为我仗义执言和队友朱泽一等人的耐心解释，才使外调人员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当时厂专案组负责人对交大有所了解，实事求是地向厂领导作了汇报，再加上我到该厂之后，工作出色，厂领导对我印象不错，此案才得以“查无实据”就此终结。后来听朱泽一说，工宣队也派人找她外调李世英的所谓“五一六”罪行，态度也极为恶劣，朱泽一气愤之下把红印色抹到外调人员的脸上，才刹住了他们的威风。壮哉泽一，吾等愧不及汝！



自左至右：孙少华、朱泽一、阎保定

往事如烟，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如今已是满头银

丝。193 的队友中，潘小豹、沈元秋、张晓铭都已经作古，每当回首往事，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不能离去。民族英雄林则徐曾言道：“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我们 193 战斗队和当时交大的许多同学一样，之所以在明知有风险的情况下，还敢于承担交大总会和革委会交给我们的任务，都是基于这样的家国情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追求真理的执著，没有私心杂念，更没有任何利益追求，虽然我们没有能够挣脱时代的局限，但终究没有在坎坷中跌倒，没有在惊涛骇浪中沉没。我们难以忘却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是因为那里留有我们青春的足迹，有我们曾经的信念和追求，还有风雨同舟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

## 三、武汉实习历险记

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交大革委会和全体师生迅即响应，各系、部和教研室组织老师们克服种种困难编写教材，实验室的老师们积极准备实验，同学们也纷纷找出久违了的课本，到处可见身背书包匆匆而行的学子，教室里不时传来了老师们铿锵有力的讲课声，整个交大校园恢复了往日浓厚的学习气氛。

我们数理系应用物理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经过调研，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将应用物理专业分为压电陶瓷和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制造工艺两个专业方向，我选择了半导体方向，于是学习了半导体物理、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制造工艺、金属 X 射线学等专业课程。由于交大内部没有派性争斗，校文革总会和后来的革委会又非常重视对学校资产的保护，所以实验室的设备完好无损，这就为复课后的课程实验创造了条件。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高频感应加热装置的操作，做了《四探针法电阻率测量》、《半导体材料提纯》

等实验，尽管时间仓卒，只学习了专业课中的重点内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很不错了。

1968 年 4 月，学校安排我们毕业实习。我和陈铁民、耿瑞林、刘荆州、韩国栋、陈长叨、王启成、张治秀等十几位同学在亢润民老师带领下到武汉东湖半导体厂实习了四十多天。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我们深入到车间科室，拜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为师，亲手实践，熟悉了半导体三极管制造的全过程，掌握了晶片研磨、切割、扩散、烧结、焊接、封装和测试各道工艺，收获颇丰。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我后来没有从事半导体专业的工作，但这一段毕业实习经历，仍然使我终身受益。

武汉东湖半导体厂坐落在美丽的东湖之畔，我们借住在东湖中学，距离东湖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每天下班晚饭过后，同学们成群结队，穿着从学校实验室借来的、当时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海绵拖鞋，走过两边种植着夹竹桃的林荫大道，在游人羡慕的目光中，一路欢笑一路歌，去东湖游泳场游泳。这个游泳场有四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四周有木栏杆围着，浅处不及腰，深处达数米，准备横渡长江的队伍也经常到这里训练。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我的游泳技术大有长进，不仅学会了蛙泳，还学会了仰泳、侧泳和踩水。实习结束前，我们还进行了比赛，我的技术在同学们中间充其量只能算是中下等，也不间断地游了十七圈，至少也有一千七百米，这是我游泳生涯的最佳纪录了。

在武汉实习的四十多天里，我们收获了宝贵的知识，培养了专业实践能力，锻炼了体魄，但同时也目睹了武汉地区的混乱局势，甚至还多次遭遇过危险，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我们是 1968 年 4 月 30 日乘火车从西安出发，5 月 1 日上午到达武昌车站的，按照预定的计划，需暂时先住到湖北中医学院。刚出火车站，映入眼

帘的是贴满大街小巷的“讣告”，死者全都是各派群众组织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数“钢工总”的人最多，治丧委员会主任无疑都是“朱鸿霞”，我们心里明白这都是武斗中死亡的人员。初来乍到，看到这种场景还真有点毛骨悚然。好不容易走到大路上，迎头开来了几十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每辆卡车上都装满了枪支弹药，车帮上贴着“缴枪光荣”的大标语，大喇叭播送着关于缴枪的中央文件，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上方还架着机关枪，枪手紧握枪托，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每辆卡车的驾驶室两侧各站立着一个武装人员，一手抓着车门，一手拿着半自动步枪，边走边朝天上开枪。

到达湖北中医学院后，我们被安排到一幢小楼的二层住宿，就在隔壁的一个大房间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晚上十时许，我们正要入睡，忽然从门外闯入一伙人，手持冲锋枪、步枪和手枪朝着天花板一阵扫射，当时我睡在上铺，眼睁睁看着天花板被打得稀巴烂，心想这下完了。打了一阵子，那些人看看天花板上没有什么动静方才住手，临走时还安慰我们不要害怕，说是得到密报，怀疑天花板上有人，为了我们的安全这才有此动作，我们也只好千恩万谢打发他们离开，然后迅速关灯睡觉。谁知整整一夜，外面枪声不断，后来得知是因为第二天要缴枪，那些持枪的工人、学生趁天黑朝着蛇山放枪过枪瘾呢！

当时，武汉半导体厂也算是“机密单位”，我们实习学生的档案需要先送到厂里审查，所以需要住在这里等待审查结果。第二天闲来无事，大家分头自由活动，有同学在房间里看书，有同学出去逛街。到了晚上，韩国栋、刘荆州从街上回来，拿出一枚油光锃亮的子弹头让我们看，原来他们走到武昌商店附近，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到他们前面一米多远的路面上，随即反弹起来射到路边的墙上，又从墙上反弹回来落到他们面前，二人捡起弹

头朝枪响处观望，只见一栋楼房的阳台上，一个男子正拿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朝他们讪笑。我们急忙安慰他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同时也想起了时任湖北省省长、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的一句名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看来此话确实有些道理。

在湖北中医学院住了两天后，经过努力，档案总算通过审查了，大家赶快收拾行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乘公交车到了住宿地点东湖中学，心想这下可安全多了。谁知东湖中学是某群众组织警卫连所在地，男同学几乎人人全副武装，还把大炮抬到了楼顶备战，周围仍然枪声不断。到了晚上，中学生们拿着信号枪朝鱼塘射击，信号弹从水中弹起，光芒四射，仿佛一束束美丽的礼花。不过没几天，枪声就逐渐平息下来，也再没有人骚扰我们，日子过得倒也平静。不料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正在烧结车间实习，突然闯入七、八个持枪武装人员，对着我们高声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赶快缴出武器！"我们在举手的同时赶忙说明我们是来实习的西安交大学生，没有武器，同车间的几个女工也说没有，可来人不理不睬，到处翻箱倒柜，最后竟然从风道里搜出了十几支步枪、冲锋枪和子弹。几个女工立刻吓得面如土色，不过还好，来人只是收走了抢械，说了几句难听话，没有为难我们。

还有一次，我们从滨湖机械厂职工食堂吃完饭回住地，走到厂门口，突然"哒哒哒"一阵枪响，子弹从我们的头顶嗖嗖飞过，吓得我们赶紧蹲到地上，仰头一看，原来传达室房顶上有人端着机关枪正朝远处射击，射手见我们吓得不轻，居然哈哈大笑，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啥话不说，赶紧离开了事。如果这几次遭遇算是有惊无险，那后来的一次遭遇就是惊心动魄了！

当年实习的时候，我们还都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年轻人天生好动，明知外面不太平，还总想出去看看。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十几个同学准备结

伴而行到武汉市内，正巧东湖中学一辆卡车也要进城，在几个中学生的盛邀之下我们一起上了车。谁知驾驶卡车的学生初学开车，连方向盘都把握不住，车一启动就东扭西歪走 S 形，为了避免撞人，只好在正副驾驶室外的脚踏板上各站一个学生，一面前行一面大叫“我们不会开车呀！赶快让开，赶快让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战战兢兢到了市内，总算没有出事。

下午 4 点左右，我们乘公交车回东湖中学，可是车开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前面两站时，司机不往前开了，也不说明理由，只是粗暴地赶乘客下车。我们一行人只好由此步行，好歹距离目的地不算太远，于是边说边走，也挺高兴，不过走了一段路，就觉得有点奇怪：宽敞的马路上，死一般寂静，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可我们还是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仍旧在柏油马路中央信步而行。

当走到武汉重型机床厂门口时，有位同学发现厂门口办公大楼的窗户上架着机关枪，就指给大家看，我们稍微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议论，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周边的宁静，接着“哒哒哒哒”的机枪声骤然响起，一排子弹射到马路旁高大的铁质标语牌上，发出“咚咚咚咚”的敲击声，在标语牌上留下了一排弹孔。我赶紧喊了一声“快跑！”大家不约而同跳到标语牌后面的排水沟里弯着腰朝前快跑，这时枪声更加密集，子弹从我们身旁射入排水沟的土壁上，发出“噗噗噗噗”的声响，令人胆颤心惊！跑出二十几米远，发现马路旁边有一片玉米地，大家急忙跳上土坎沿着玉米地中的一条小路继续向前跑，跑出没有多远，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就落在我们身后爆炸了，幸好威力不大，谁也没有伤到。就这样又跑了一阵，总算脱离了险境，这时我才发现，我手里还提着从旧货店买来的两个 8 吋大喇叭没有扔掉，那时大家都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8 吋大喇叭可是稀罕之物，这件事后来就成了笑谈。

后来听说，当时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组织和厂技校的学生组织之间发生武斗，工人在厂里，技校学生在工厂大门对面的庄稼地里，估计是厂里的工人怀疑我们是前来支援技校学生的武斗人员，所以朝我们开了枪，或许是技校学生的掩护，我们才得以大难不死，这是后话。

我们避开武汉重机厂区，绕道湖北医学院回到东湖中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汲取这次教训，大家从此很少进城了，每天白天进厂实习，下班后游泳，晚上看书或者自学英语。王启成同学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所以每天钓鱼调节情绪，我们也帮他制作咸鱼，足足有十几斤。到了 6 月中旬，当时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愈来愈热，王启成同学抓来的乌龟下的蛋已经孵出了小龟，实习的任务也已经完成，看来该回学校了。我们借来了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勺，买来了大米、蔬菜和咸肉（没有肉票是买不到鲜肉的），加上王启成钓来的鲜鱼，美美的聚餐了一次，第二天就踏上了归程。

回到交大，同学们都对我们在武汉的遭遇惊叹不已，大家庆幸西安曾经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更感谢交大给了我们十分宝贵的实习机会。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当年的交大师生员工曾经在以李世英为首的文革总会和校革委会的领导下，面对甚嚣尘上的“打、砸、抢万岁！”极左思潮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想到交大在那样混乱的形势下没有一人参与社会上的武斗更无一人伤亡，学校的校舍、档案、图书资料、实验设备等等完好无损；想到全国大部分高校还在派性争斗时，我们已经坐在课堂上书声朗朗，我就为曾经是一个交大人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祝愿亲爱的母校永远年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谱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 谢 词

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应物 31 班的学友梁蕴绵、郗友农、张良铭、王希平、李宣城等同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得到了 193 战斗队的朱泽一、孙少华等队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2018 年元月 19 日修改于海南



**作者简介**

阎保定，男，1946 年 4 月 1 日生，1968 年 12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应用物理专业，河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中国高等学校电工学研究会荣誉理事。



# 初邁職場和湯峪學習班的故事

■/ 肖國信

对于我们 1963 年入校的学生，非常幸运的是 1968 年 12 月就毕业分配了，要求在 31 号以前报到，大家都知道这样可以领取半个月工资，这对从没有挣过钱的大学生是很兴奋的一件事。在拿到了报到证和户口粮食副食迁移证并领取了单程路费后，托运了行李（被褥和书籍），就向人生第一个工作地进发了。



我在交大原校门

我是 29 号到达了辽宁省抚顺市煤矿电机厂，这是个有 2000 多名职工的中型电机厂，主要生产煤矿用防爆电机。报到后赶上吃中午饭，于是拿着带来的全国粮票买了饭菜票。结果食堂只能卖给我高粱米饭或玉米面饼子，因为我们的户口粮食副食关系尚未入户，尚不能享受每月仅供应的几斤细粮，连续数日皆是如此。到了厂里我才发现，我们交大就分来了 11 人，除了 2 人分配到分厂（矿灯厂），其余 9 人均在总厂，另有 3 名 66 届电机系的学长。

31 号晚饭，食堂传来好消息，在新年到来之际，可以给从全国各高校刚分配来近百名大学生供应大米饭，还有猪肉燉白菜。可我是个回民，在学校有回民食堂，鉴于有近三天没吃过细粮，更不要说是大米饭了，况且当时人

月供应只有半斤肉的情况下，除了大白菜，粉条外，根本也见不到肉，不管怎么样，那是三天来吃的最饱的一顿饭了，从那天起，我不清真了。

新的一年来到，上班第一天，全厂下午在礼堂召开大会，从沈阳拉来了20个知识分子进行批斗，近百名大学生安排在前面就座，批判什么早都忘了，但至今不能忘却的是每批判一个人都要提到文化程度，大学。而且声音逐渐提高，批到最后一名的时候，文化程度大学这二个字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们都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这也是正式上班第一天所受到的阶级教育第一课。接着宣布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办学习班，除了学习毛选和有关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外，就是学跳忠字舞。当时东北流行跳忠字舞，工厂的工间操改成了跳忠字舞。每天必跳的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后还学了个雪山上升起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

一个星期后，我被分配到了铆焊车间，由该车间的主任把我领到车间，再分配到班组，我是焊接专业的，自然跟了一个电焊师傅当了一名电焊工。幸运的是，1968年三月中旬，我到上海实习时，曾在锅炉厂当了几个月的电焊工，因此到了车间拿起焊把子就能干活，根据不同的焊件可以正确选择用什么焊条，如何调节电流大小，焊出来的焊件焊缝比较规整。因此，很快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他（她）们对我们也很友善，说你们这批大学生比以前（文革前）大学生要能干。我的师傅是位女的，40多岁，因没有文化，只是个三级工，她跟我说，你有学问，又有实际操作能力，我教不了你什么，我跟主任说一下，给你换个师傅吧，果不其然，没多久就给我换了个五级工的男师傅。换了师傅后，她邀请我到她家去坐坐，还割了点肉，晚上请我在家吃个便饭。我受宠若惊，刚好天天吃粗粮，总觉到很饿，于是连忙说声感谢，下午下班便随师傅到她家去了。

师傅家离厂很近，是厂里给老工人和领导盖的。师傅的爱人是原该车间

的車间主任，50 年代，國家挑选一批老工人随苏联专家到苏联学习管理和技术培训，回國后都担当一定的领导职务，文革时期，把他打成苏修特务，一直闲赋在家。到师傅家后，脱鞋上炕，在炕桌上摆上几个菜，并倒上白酒，师傅爱人与我同饮，不断地述说他的故事，如何随大人闯关东到抚顺，如何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个中层领导，国家与苏联交恶跟老百姓有啥关系，我们去苏联学的是技术，对我们就是很好嘛，怎么我就成了苏修特务了，看来师傅找我来他家是在满足她爱人叙说心中的苦闷。在给我倒酒的时候，说年青人不要喝酒，你到我家我请你必须喝，出了门就不要喝，喝多了就爱唠叨，酒后失言啊！原来他被打倒就是说了些老毛子的好话。

不过我也没出息，出了门，又喝酒了。当时物资紧缺，每个职工每月发二两酒票，这批学生大部分都给了自已的师傅。也有特殊的，那就是也是 68 届清华分来的，是清华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同时也是北京高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可能跟我同班一宁波好友是交大足球队的守门员的关系，很能谈得来。他家是长春的，父亲是个司机，爱喝两口，他每次回家必然和父亲对酌。因此他的酒票自已留下，还把一起分配来的另四位清华校友的酒票也要了过来（其中二位是学原子能的）。他打了酒后找到我，要我陪他喝酒，但我得出菜。于是我到处去找，特别有意思的是重庆大学二位女同学（66 届的），均有男朋友在外地，我和她俩拉了个老乡关系，我虽是江苏人，但我出生在重庆。我知道她俩有个小秘密，因生活条件差，她俩的男朋友经常寄些吃的，于是我会从她俩那儿讨点花生米之类的小吃，再加上到隔壁电修厂食堂买点高价菜，做为下酒菜。

还有一位直到现在经常联系的北京矿院 67 届毕业生，他的姐夫文革时期是总理的联络员，知道很多故事，我们彼此经常在一起聊天。很快到春节了，除辽宁籍学生外，都得在厂里过了。这位老兄回鞍山结婚，邀请我去，

于是大年初一我就到鞍山去了。在鞍山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他爱人回娘家住，把新房让给了我。以后他和我一起去了宁夏三线厂，平时只要买了肉就邀请我去他家去喝酒。后来，他当了厂长后就调到天津一个地委级别的厂当厂长，因两个孩子都在北京，因此退休后便住在北京了。十年前，我到他北京四惠东他的住地，他拿出了珍藏多年他唯一的一瓶地方國营茅台酒厂出厂的茅台酒（据网上说五十年代的茅台酒现在值上万元），开怀痛饮，他怕我喝多了，酒没喝完，让我把剩的酒带回去，现在这瓶茅台酒空酒瓶还在我家珍藏。我时常想，现在还有这种友谊吗？

我们交大分配来的九个人，其中七人住在单身公寓一楼以前是做为饭厅的一间大屋子，用木板支起来一个大通铺，大家把被褥一字排开，一个挨一个。和隔壁紧挨的屋墙上有一窗口，那是用来卖饭票的。现在却住着66届分来的一对校友夫妇，男的天津人，女的上海人。我们这七个人全是江浙和上海人，有意思的是，女学姐经常把窗口打开和我们聊天。

春节过完刚上班，车间主任找我说厂组干科让你去一下，当时穿着工作服就去了组干科。科长跟我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给厂里来一函，因过春节没人收，今天刚收到。陕西省调你回西安参加学习班，我们也不好打听怎么回事，我已和车间主任说了，你立刻回西安，厂里给你出西安的路费，你去财务室领。于是他把回西安参加学习班的报到调函给了我，我一看调函写着原陕西省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我即刻动身到陕西省革委会政工组报到。我自已也糊涂了，我在学校就是一普通老百姓，连个战斗队长都没当过，当时又不便问，也不知问谁，稀里糊塗的回宿舍换了衣服，带了简单换洗衣裤和洗漱用品和同舍校友告了别，把被褥卷了起来，在到工厂还不足两个月的情况下，就又回西安了。

到西安后即去革委会政工组报到，简单说明了调我回来的原因。因学习

班在蓝田汤峪，马不停蹄用吉普车把我送去蓝田汤峪。到了汤峪，一看原校文革主任李世英，副主任武登才，沈荣水，委员戴慕蓉，张国强等革委会成员都在，我同班同学黄胜辉是校红卫兵总部派驻西安地区红卫兵副司令也从张家口的单位回来了；再就是文革时期，在校的主要有影响的战斗队如 193 战斗队，惊回首战斗队成员，三六专案组，817 调查组成员，校三结合办公室的等，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也来了，当年他也是校文革三结合办公室的成员。



后排左起：梁德群、冯伟年、李世英、苏建农、孙国樑
前排左起：肖国信、陈绍魁、武登才、张德柱（摄于汤峪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大部分都是在校的老师和尚未毕业的同学，像我这样分配到外地又调回来的不多。其他参加学习班的人员，有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院校的校文革主任及相关人员。工矿企业原两派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西北局、陕西省委机关原两派负责人等。而且工总司，交大，西工大，冶院的一把手均是陕西省革委会

副主任，其他人员中有的还是省革委会委员，所以这个学习班规格确实够高的。

整个学习班包括部分工宣队，解放軍在内有一百多人，分成三个队，工人两派组织为一队，大专院校为二队，西北局，陕西省委等机关为三队，而这次的重点显然在二队。其他院校如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有十几个人参加外，剩下院校就几个人，而交大参加人数是最多的，先后有 30 人之多。

学习班从 1968 年 12 月 28 号就开始了，他们新年就是在汤峪过的。1969 年元月 2 日举行开班典礼，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和 21 军軍长胡炜都出席了开学典礼。他们强调这次学习班主要就是摆敌情，提线索，查事件，挖幕后，揪出黑手，剷除黑线，挖出黑根。通过学习，两派消除分歧，团结一致，达到巩固革命大联合，推动全省斗批改向前发展。

学习班设在蓝田汤峪陕西省干部疗养院内，我住的是两人一间，每间屋内都带有卫生间，有冷热温泉水供应，另有泡温泉的单人浴室，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了，吃饭也是不要钱，细粮面食占多数，也有米饭，偶尔吃粗粮，因设有回民灶，我又变得清真起来。伙食不错，比起在辽宁的日子，简直是到了天堂。这样的日子一直到 6 月 15 日结束，我的体重初到汤峪时是 69 公斤，而学习班结束时体重已增加到 75 公斤。直到现在，我的皮肤都比较好，我想应该跟泡了几个月的温泉有关吧。

汤峪学习班历经 5 个半月，每二、三个星期休息一次，休息的第一天下午，用大轿车把大家拉回西安，第三天下午到省革委会集中回汤峪，经常周未在驻地放映电影，通常是新闻简报，再就是老三战，显得不是那么紧张。通常遇到重大事件，晚上听新闻联播后便集中起来到镇上游行，喊口号。记得有一天听广播，播毛主席关于一个人有动脉、静脉，吸收氧气，呼出二氧

化碳这段新指示后，也到镇上游了一次行。学习班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摆问题。学毛选是天天读，然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二报一刊社论等，结合学习查找极左思潮在西安的表现。

半个月后，开始动员大家写大字报，揭问题，号召我们老百姓揭各自头头的问题。既然吃的那么好，总要有所表现，于是大家纷纷写文革中自已知道的有关事情。学生队分为几个班，每个班都由各院校的参加人员和工宣队员，解放军战士交混组成，我所在二班就有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委会主任杨梦云，我校革委会副主任沈荣水，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缪钧达是院革委会委员。写好的大字报可张贴以便大家观看，二派观点不同，对问题看法不一样，经常会引起争论，同时又写大字报对某些事提出质问。

学习班开班前，省上肯定对发生在西安文革中的主要事件进行过疏理，对一些两派争议比较大的事件，认为两派学生后面有无形的黑手在操纵，按当时的设想是西北局、陕西省委原主要负责人在幕后，这次学习班的目的就是找证据，说操纵交大的黑手就在西北局。

1966年刚开始文化大革命，两派学生是团结的，后来由于对一些做法产生分歧，如极左思潮、武斗，交大是反对的，在西安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起主流作用，加上交大在高校中的地位，很显然成了文革领导者。而西北工业大学（属國防科工委），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生源中红五类出身比例明显高于交大，在讲阶级，阶级斗争的年代，造反这杆大旗肯定不能让交大扛。

1966年12月份交大师生批斗西北局主要负责人时，时任西北局秘书长韩劲草、宣传部长刘刚、调查研究室主任候永（解放前后长期担任刘澜涛的秘书，文革后任内蒙革委会副主任，安徽省副省长，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陪斗。会后，候永就留在了交大，听说刘刚、韩劲草也被留了下来。因当时校




文革初期硬骨头战斗队成员前排中间曾为西安地区红卫兵副司令黄胜辉，后排左边为战斗队队长樊润根，两人均已去世。

红卫兵派驻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副司令的黄胜辉是我班原团支部书记，我们关系较好，就让我班几个班干部组成的硬骨头战斗队代为看管候永。于是，我们在西二楼找了间房子住下，先后住了有一个多月，原是等待下一次批斗会，再就是希望他能揭发点什么材料。实际就是每天陪他聊天，替他买饭，他早上起的早，陪他到校园里面听广播，早上有时还要陪他去交大二村买油条吃，每个星期从学校要车送他回西北局院内家里拿换洗衣服。

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每天陪他也没什么意思，在征求红卫兵总部意见后就把他送回去了。他爱人在西北局机要室工作，机关另一派的人从她那儿知道了候永在交大的情况，这就成为后来成为统指派反交大右倾，说刘澜涛黑手早就伸进交大的证据。

由于这层关系，我和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参加造反组织红总（交大派）的人员关系密切，经常到那儿去串联。与我联系最多的研究室里参加红总的，除尚行韬当过长武县委书记外，其余都是些1958年前后毕业的大学生，



左2为原学鲁迅战斗队张松春，（左1为其爱人，戴慕蓉班的陈舒霞），右1为天天向上战斗队的黄善康。此3人后合为惊回首战斗队队员。

与我们相处很好。当时在西北局时常碰到自控专业的天天向上战斗队和研究生班学鲁迅战斗队的成员，再以后三个战斗队除天天向上战斗队有几个人经常去西北局，学鲁迅和硬骨头战斗队仅剩下我和张松春了。

为了活动方便，记得一次在研究生宿舍碰面，校园喇叭里正播放毛主席诗词十六字令谱写的歌曲，听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于是有人提出我们三个战斗队合并，几个经常联系西北局的这几个人改名为惊回首战斗队吧，就这样我们合在了一起，而正式对外。

由于西安两派分歧愈来愈严重，对立派反对交大右倾，这时陈杨信件的出现无疑对交大是一反击的最佳事件，以刊物形式对外公布，第一次以惊回首战斗队出现。陈姓，杨姓两人原是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文革初期两派合力与刘澜涛拚刺刀的时候，他二人给刘澜涛写了封信，我们称之为效忠信，信中充满对西北局的信任，而对交大造反表示不满，也就是初期社会上传的交大狗崽子多（出身红五类比例低），加之 57 年定右派的也多，认为交大造反是右派翻天，要与交大划清界线。这就是有名的陈杨信件。

这封信得到纯属偶然，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刘今菁（原北师大毕业，分配兰州，58 年大炼钢铁是甘肃有名的铁姑娘队队长，后调西北局，爱人是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见到张松春，说我们手里有一些重要资料，西北局对立派可能要到我室搜查，想放到肖国信哪儿，你去问一下行不行。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将一包材料（约 2 尺高）交给了我，当时拿到宿舍收藏。

由于好奇心驱使，我班几个人就打开了这包材料（没有封存），里面除陈杨信件外，还有一些陕西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要情快报，发放范围为省领导及有关部门，报中央，西北局，刘澜涛等。还有刘子久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情况（即薄一波等 61 个成员问题）。

刘子久（5 级干部，听说由于右倾问题，文革前从劳动部副部长位置降

到河北，后到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当了一名研究员）。当然还有一些其它机密材料包括卢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等。第二天，我们就把这包材料交到了红卫兵总部保管。以后形势好转，我们又取出归还给调查研究室。

得到这封信后，首先交到了革委会武登才手里，他看后认为对我校很有利，等到什么时候辨论时可拿出来作为炮弹。当时只印了 20 份，其中送中央 10 份，交大只是在小范围内有人知道，由于社会上反交大右倾思潮愈演愈烈，学校决定把这一封信公佈到社会上去，看看到底谁右倾，因该信件出自于惊回首战斗队，于是决定搞个编缉部，用惊回首做为刊名，把该信件公开，并配文陈杨信件的前前后后。

由于该刊发表后在整个西安引起哄动，不少单位还翻印。社会效果特别好，于是该刊就这么建起来了，该刊以文笔犀利，内容新颖而著名，对西安发生的一些大事常发表长篇文章，并附有一些花絮新闻，深受同学们和社会上的喜爱，名气也很大。創刊刊头当时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惊回首战斗队主办，而实际上，我们除写过二，三篇有份量的长篇文章，和时常提供一些内部消息外，该刋实际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刊物编辑部一直由苏建农负责，以后在调查交大文革中一些问题，包括公安厅调查惊回首的问题，从未找过惊回首战斗队的任何人，看来苏建农真够朋友，没有出卖我们，一个人替我们顶了缸。对于文革后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真正的惊回首队员一直很内疚，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敬意。

另外，我班原硬骨头战斗队队长樊润根同学也一样，他被分配在红安公司，后调汉中分厂。省公安厅调查惊回首的问题时，以为他也是成员，可能因他在陕西省调查比较方便，经常找他。他确实对后期的事没有参与，就是不知道。对他的结论是态度恶劣，不老实，不宜重用，在提拔使用中受到限制。但后来他在专业上有所建树，成了教授级高工。

我则一直很幸运，在从工厂调到设计单位时，该院党委书记是经历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在一次偶然事情中，看了我的档案，跟我说，你的档案很脏，在中央有关清理大学生文革档案的时候，他让档案室把我的文革档案全部消毁。以致于我 1984 年调入现退休前工作单位时，由于档案很干净，我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直接任命为处级干部。

自我参加工作以来，调换过多个单位，遇到的领导对我都很好，所以做人要与人为善，我当了领导后也一直遵循这个做人原则。

到了 1969 年 3 月下旬，学习班第一阶段结束时，回西安休息了三天。工宣队宣布有些问题已搞清，部分人员可回原单位不再参加学习班了，交大回去的有叶雄波，陈绍魁，梁德群，闫保定，沈元秋，李金忠，岳佩麟，其余人员于 27 号又回到了汤峪。接着转入另一专题，深揭，深挖阶段，对前一阶段发现的问题要进一步搞清楚，陈杨信件仍是被追问的重点。从各个方面论证是原西北局负责人为分裂造反派布下的一个局，交大则始终不同意这个结论，这个事情一直到学习班结束的最后总结，还是这个结论。

现在看来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搞三结合的时候，对立派提出的人选是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王林也公开出来讲话，明显站在另一边，交大派就反对。西北局红总负责人李德友找我，准备派人调查王林的历史疑点，要我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带了西北局组织部的介绍信，我则带上交大红卫兵总部介绍信并在介绍信上加盖陕西省三支两軍的公章。我们去北京找到华北局、水电部原与王林一起工作过，当时还被群众专政的领导，到沈阳找东北局熟悉王林的人，还到吉林省延边等地进行了调查。

后来中央决定李瑞山当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所以学习班认为王林也是受刘澜涛操纵的，这边通过西北局调研室，故意把陈杨信件透露给交大，这样从候永到刘澜涛，幕后黑手就清晰了。在学习班我就把当时和西北局红

总联合调查王林的经过写了出来。这样调我来学习班的目的就十分清楚了。

1969 年 4 月，九大召开。汽车把我们拉到西安参加了西安市庆祝九大胜利召开大会。游完行，过了五一，又回到汤峪。

刚学习没几天，省上通知我们全体学员参加陕西省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干部大会，这样又回到西安，从 5 月 8 日到 21 日住在西安矿业学院北院，听李瑞山、胡炜传达参加九大的盛况，而且指名学习班人员在主会场人民大厦听报告。然后就是领会九大精神，贯彻九大精神，使学习班有个完满的结果。23 号再次回到汤峪，情况又有所变化，强调了团结，其它问题都不搞了，

整个气氛变得比较懒散了。平常我们没事也可以在外溜弯，甚至到外面小河沟里摸魚捉蟹，接着匆匆搞了个总结，6 月 15 日，经过 5 个半月瞎折腾，学习班终于结束了。

结束时，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军区司令员黄经耀等时任有关方面领导参加了大会。在工宣队领导小组宣读了学习班总结后，领导发表了讲话后，学习班正式结束。对于总结我们虽有些保留意见，但已于事无补，随后宣布去延安参观学习。会后每人发了一份盖有陕西省原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大印的介绍函给原单位。我觉得不妥当，我是省革委会政工组调函来的，于是又到省革委会政工组加盖了个公章。



从左至右，苏建农（已故），肖国信，陈绍魁（已故）于延安

对于大部分人，串联时都去过延安，再就是有些人着急到单位报到，于是我校只有苏建农、陈绍魁、段会林、李印生、刘芙蓉和我去了延安。参访了枣园、杨家岭毛泽东故

居，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在回来的路上，顺便到黄陵参拜了轩辕黄帝陵。

6月底，我和李世英、武登才、戴慕蓉、蒋正华去了上海，然后我和戴慕蓉乘船去大连，她去大连探亲，我则是回厂。在大连除了去老虎滩，星海公园观光外，还去了旅顺口。

7月上旬，我终于又回到阔别近五个月的工厂，开始继续过着继续吃高粱米、玉米面的生活了。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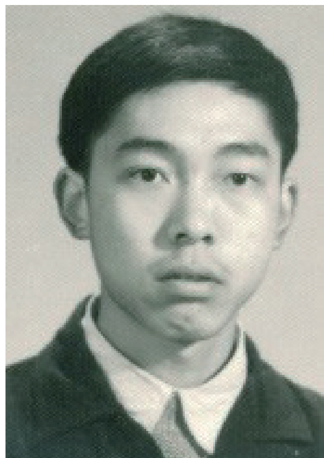
肖国信，1945年出生，江苏高邮人，1968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焊接工艺及设备制造专业，先后在工厂、设计单位、金融系统工作，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2005年退休。



# 1966 年 8 月静坐的起因和 我所知道的“817 調查組”

■/ 陳沾緯

## 一、1966 年 8 月静坐的起因


陈沾纬大学毕业照

1966 年 8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西安各高校师生立即响应，纷纷到中共陕西省委（建国路）门前贴大字报，掀起了西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8 月 13 日我们金相 42 班的同学到陕西省委门前贴大字报，鼓励省委机关干部、革命群众起来揭发省委和严克伦（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交大工作团团长）的问题。当吴新民、刘百胜和我在省委大楼前看大字报时，发现一个专门抄大字报署名名单的省委机关通讯员方根纪（后来才知此人的姓名），我们和他进行了辩论。我们认为方根纪抄大字报的目的是准备秋后算账，是不合法的，便追问谁指使他这样做？方根纪却一言不发，于是我们把他抄黑名单的笔记本收缴了。当时在场的还有交大焊接 21 朱志杰等 3 人及其

他院校的同学。临走时我们严肃提出：要求陕西省委机关处理此事并将结果告诉交大，否则一切后果由省委机关负责！

当晚，省委机关干部屈坚忍告诉省委机关党委书记何志云："交大学生明天来就方根纪的问题进行对等辩论，你看能不能安排阶级教育展览馆（与省委机关一起过政治生活）的人来参加？"何说："可以！"正好，当晚陕西省阶级斗争展览馆的人来省委报喜，何志云便给带队的杨勇健布置，并让屈坚忍向杨勇健介绍情况及如何组织辩论。杨勇健说："我们不了解交大的观点，不好辩论。"屈坚忍说："你们拿上《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如果有些人辩论不了，可以呼口号！"何志云说："回去不要大动员，可找几个骨干谈一下。有些同志来看看大字报也可以受阶级教育。"随后何志云还给阶级教育展览馆党支部书记党公忍打电话，询问展览馆是否有交大冶院调来的？回答是和交大有社会关系的有两个人。

13 日晚上，省委办公厅通知各部委办："交大革命师生要和我们机关干部工人进行辩论，双方已商量好了，在省委大食堂辩论。我们已约好阶级斗争展览馆和印刷厂的职工参加辩论，要求各部委办再选人到大食堂接待革命师生。""当有人问及组织这次辩论是经过谁同意的时，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说是经过章泽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意的！""可是 14 日交大、冶院等院校的革命师生并未来和我们辩论，而我们部分干部工人却同少数同学因'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两句口号发生辩论，以致后期发展到 8.15–8.16 的围斗打人事件"（摘自陕西省委机关邢天才、胡崇彦、侯福元、祝培仁、贺民、王升文的大字报《干部斗学生、工农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省委是有责任的》）。省委机关革命硬骨头战斗队的大字报也揭露："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白瑞生召开部委负责人会议布置，何志云四处打电话，通知各单位组织工农群众来斗争交大、西工大等院校的革命学生。"

14 日晚上省委办公厅王封家（18 级干部）给西安人民大厦党总支书记张如峰电话：“以交大为首的右派学生围攻省委，请大厦派 30 名可靠的党团员来保卫省委！”庆安公司、西安东风平绒厂、省话剧院、抗大（原民众）豫剧团等单位也接到了类似电话。

8 月 14–16 日，省委门前既有学生贴大字报，又有机关干部和工人农民来报喜。报喜队伍喊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不给右派吃，不给右派穿！”等口号，并贴出了同样的大字报标语。据省农机公司平型关战斗队揭发：省经委副主任、工业厅厅长贾晓东 14 日早晨带头写大字报《打垮交大一小撮的进攻》，声言“要保卫省委、西北局，坚决镇压交大右派分子！”副厅长、机械工业局局长张成功签名，贴到省委门前，并亲自指挥人员直接参加围斗学生。

就“炮打”还是“保卫”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学生和来报喜的人员双方辩论很激烈，围斗殴打学生的现象很严重。14 日下午 1 点多，抗大豫剧团的朱东江在省委门前十字路口看到一个交大同学被围斗，同学被戴高帽子，上写“牛鬼蛇神”，背心也被撕破，身上脸上都涂了墨，还看到 7 个同学同时被分别围斗。在围斗学生的人群中，他看到两个身穿白色绸衫的人，内面背心写着“省工业厅”，其中一人还打了学生几拳。

15 日早晨，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出面接见同学，回答了几个问题，但同学们不满意。肖纯说：“同学们回去吧！我们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提出的问题以后答复。”同学们不愿走，于是就发生了拉人打人、强行将学生往外拉的情况。

16 日上午，很多同学来到省委常委办公大院内，要求贴大字报，要求见领导。省委机关党委书记何志云等人极力劝说同学们不要进常委楼，门外有

人劝说，门内多人挡着大门。最后大门被同学们推开了，蜂拥而入。16日中午开始，交大、冶院等各高校师生到省委门前静坐，要求省委立即制止群众斗学生的局面，保证学生人身安全，确保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由此拉开了8月16–18日西安高校静坐的序幕。

## 二、“817调查组”的由来

西安高校师生在建国路陕西省委门前静坐的过程中，交大、冶院、无线电工业学校、26中等学校的同学们，发现了一些8月14–16日在省委附近建国路一带围斗学生的人。16日先后抓住何志云等14人，作为打人凶手和幕后策划者扭送到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要求碑林分局严肃处理。碑林分局在省委、市委、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指示下执意不收人，拒不处理。还对学生横加指责、百般刁难。同学们一直留在碑林分局进行说理斗争。

8月17日，碑林分局出现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政治部主任张世卿和市公安局副局长钟希武等来到碑林分局。他们对学生们说：“由于学生一天一夜的纠缠，已引起犯人暴动，犯人暴动就要开枪，同学们的安全没法保证，后果由同学们自己负责！”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说：“请你们看看现场，我们已经控制了制高点，架起了机枪，如果犯人暴动起来，就要开枪。枪子没有眼睛，那时你们的安全没有保证！”公安局动用枪杆子，以防止犯人暴动为名，行逼迫同学们撤退之实！

后经调查：所谓“犯人暴动”纯属子虚乌有，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辛步亮后来也承认：“并未形成暴动！”

为了调查碑林分局所谓“犯人暴动”事件的真相和14名打人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的情况，曾参与碑林分局事件的部分交大师生组成了调查组，取名




1967 年初 817 调查组部分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王弘毅（制冷 11），杨翼白（金相 42），范明强（内燃研究生），顾洹（精密仪器计量室），朱文宝（绝缘 11）；后排左起：兰思祖（金工教研室），邵乐冲（文革总会委员），许静远（压缩 42），陈沾纬（金相 42）。

为“817 调查组”。

9 月份，我们金相 42 班的几位同学开始调查省委机关通讯员方根纪抄大字报黑名单导致 8 月 14–16 日在省委门前发生围斗学生的事件。从省阶级斗争展览馆杨勇健、赵家杠等的揭发中发现了何志云组织群众斗学生的线索，又听说何志云也是被学生抓到碑林分局的 14 人之一，便和 817 调查组联系，调查组负责人顾洹（精密仪器计量室老师）欢迎我们加入调查组。11 月初，金相 42 的杨翼白、吴新民、王尚鸿和陈沾纬 4 人参加 817 调查组工作。

动力系压缩 42 班许静远、无线电系无线 41 班林彩美、电机系绝缘 11 班朱文宝等同学因调查“吴婉贞案件”而加入“817 调查组”，事情的起因还是 8 月 16–18 日在陕西省委门前的静坐。吴婉贞是许静远高中同学的妈妈，家住西安市建国路仁寿里 3 号。8 月中旬，许静远经常去建国路看大字报，有一次遇到吴婉贞伯母，老人家拉着许静远的手说了一会话。后来才知道，这个场景被公安局的便衣盯上了。8 月 17 日上午，静坐指挥部派人找许静远，说吴婉贞有事，叫许静远赶快去。去后才知道，8 月 16 日晚上吴婉贞在静坐现场交大“九头鸟”宣传车的广播里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讲话。第二天早晨，和平路派出所就来人抓吴婉贞，她就跑到指挥部来了，因为公安局的人



1968 年 8 月 817 调查组部分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刘生友（制冷 52），林彩美（无线 41），xxx，xxx（这两位女同学记不清了），白福玲（机制 22）；后排左起：吴新民（金相 42），陈沾纬（金相 42），许静远（压缩 42），王忠富（涡轮 32），伍时和（元件 51）。

不敢到学生静坐的地方抓人。指挥部让许静远带吴婉贞去和公安局的人确认一下，如果是因文化大革命支持学生就不准抓人；若是其他问题我们就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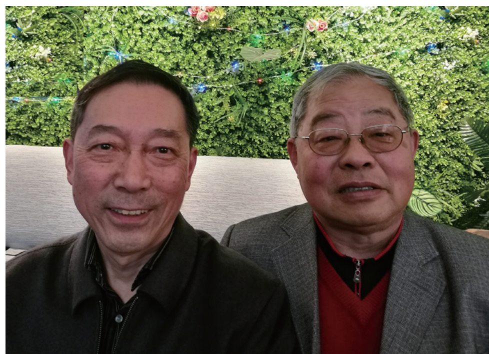
许静远陪同吴婉贞回家，一进门，警察一言不发"刷"的一声就给吴带上手铐。许静远一把抓住吴婉贞不放，问为什么抓人？警察递过来一张《逮捕证》说："历史反革命有现行活动！"便立即将吴婉贞推上车，带往莲湖分局关押。许静远向指挥部汇报，回答是："既然如此，我们也不用管了。"

第二天就有人借助吴婉贞的事情发难，《看什么人支持交大！》、《反革命分子……》等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学校文革总会成立后，决定组建"吴婉贞专案组"，彻底查清吴婉贞的问题，以给社会一个交代。

在多次和西安市公安局及碑林分局的领导面对面的交锋过程中，许静远等同学质问为什么抓吴婉贞，公安局的人抛出了针对吴婉贞的种种不实罪名。为此许静远等同学到



1972 年 3 月 23 日许静远和陈沾纬合影于西安



2018 年 3 月 27 日许静远和陈沾纬相聚于上海

街道居委会和吴婉贞的老家泾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驳斥了公安局的污蔑不实之词：公安局认为吴婉贞是历史反革命，而她却是街道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公安局说吴婉贞是地主家庭出身，赴其原籍调查的结果是下中农。公安局的人还欺负交大工科生，玩弄政法术语糊弄我们，后来我们请了西北政法学院大四的曹致加同学参加会谈，他们就不敢再糊弄我们了。许静远等的调查结果得到了公安局的认可，支持学生运动的吴婉贞在关押一百天后无罪释放。

## 三、西安市公安局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1966 年 12 月，北京传来北京的红卫兵到北京市公安局及其西城分局造反的消息。817 调查组分析了西安的情况，认为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问题也不小，并且也有公安局内部的同志到交大反映碑林分局有人在烧毁黑材料。我们觉得事态严重，为了防止黑材料被烧毁，应该马上采取措施。于是立即向交大文革总会报告，得到文革总会的强力支持。文革总会决定：12 月 28 日由文革总会副主任沈荣水带领师生到碑林分局，12 月 31 日由文革总会常委戴慕蓉带领师生到西安市公安局，先后召开大会彻底揭露批判公安系统负责人在文革中的问题，并提出了五项强烈要求：

1. 必须在全市召开群众大会，市公安局、碑林分局负责人必须向全市革命群众公开检讨，必须交代在文化革命期间镇压和迫害革命学生、革命群众的全部罪行。

2. 市公安局和碑林分局必须立即为受迫害、受打击的所有革命群众、革命学生平反，必须在限期内交出所有黑材料、黑照片、黑展览品。

3. 市公安局和碑林分局必须肃清所谓犯人“暴动”黑展览的流毒。

4. 市公安局和碑林分局必须交出策划“碑林分局事件”的后台老板和主谋。

5. 马上由西安市革命群众推派代表组成检查团（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西安公安系统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省、市、区各级公安机关必须给予一切方便，并接受检查。

西安公安系统负责人接受了上述五项要求。

1966 年 12 月 29 日晚上，陕西省公安厅厅长尚寅宾、副厅长鲁夫、王健、政治部主任张世卿、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辛步亮、副局长钟希武、碑林分局局长刘瑞祥等到交大中心楼 2239 室（817 调查组办公室）与我们洽谈，交大文革总会副主任沈荣水和 817 调查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洽谈会，会议主要是和西安公安系统负责人洽谈如何落实上述五项要求。通过充分协商，西安公安系统负责人同意交出一些黑材料，西安市公安局长辛步亮满口答应一两天内即可交出。

此后他们交出了一些黑材料、照片（主要是大字报、大标语及其单位、姓名等），还有李世英遗书的照片；好像还有“碑林分局事件”的报告和照片。

西安公安系统负责人虽然口头答应上述要求，但却找出种种借口不予落实，说：“有些事情我们不好决定，要通过省委。”为落实上述要求，1967 年元月 5 日晚上，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政治部主任张世卿、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辛步亮，还有省委文办副主任刘维汉和工作人员陶润宝（这两人好像是鲁夫找来的）到交大中心楼 2239 洽谈交黑材料的具体事宜。但省委文办

两人说他们不能代表省委发表意见，我们就让他去找能够代表省委意见的人来。后来他们把李瑞山同志（时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找来了。李瑞山同志坚决支持我们的行动，他说：黑材料应该交出！通过协商，决定公安局立即交出黑材料，由交大 817 调查组吴新民（金相 42）、王忠富（涡轮 32）、沈官秋（电机教研室老师、党支部书记）和辛步亮一同前往西安市公安局取黑材料。因当时来不及清点，就按公安局各处室分别封包起来，运到交大。交出材料的有：西安市公安局三、四、六、七、八、十和十一处、教育处、办公室、政治部等部门，各处室材料多少不等。

这天晚上还决定着手筹备组织公安系统问题检查团，由交大联络各群众组织筹建。为了工作方便，先成立检查团筹备处，并刻“中共陕西省委公安系统问题检查团筹备处”公章一枚；办公地点由李瑞山同志的秘书（可能是叫陈仿平，与李瑞山同来的）帮助解决；李瑞山同志批了 1000 元办公经费。

后因部分造反派“反右倾”导致内部分裂，检查团没有成立起来，检查团筹备处公章虽已刻制，但一直未启用。因 1967 年元月 12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并发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社论，李瑞山同志批的 1000 元办公经费我们也没有去取。检查团筹备处公章和批钱的条子一直放在 817 调查组办公室（中心楼 2239）保存。1967 年 5 月中旬几个外地中学生砸开 2239 的门锁和办公桌抽屉锁，把检查团筹备处公章和几角钱偷走了！我们立即向公安局军管会报案，三天之内就破案了。当时检查团筹备处公章和批钱的条子放在一个纸盒内，检查团筹备处公章被盗后，公安局警察来现场勘察时把批钱条子连同纸盒一起拿走了。

1967 年元月 6 日晚上 11 点多，顾洹对朱文宝（绝缘 11）、张晓铭（电制 53）、杨翼白（金相 42）和我说：“今天晚上辛苦一下，咱们把这些材料

看一看。”我们认为这些材料是封存的，我们单方面启封不太好！顾洹说：“我们已给他们讲清楚了，是交大文化大革命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不要，既然是交来的黑材料我们当然可以看！”

我们觉得老顾说得有道理，同时也想尽快把材料清理出来，好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于是各人分别看各处的材料。这批材料中有不少是公安局 1966 年 8–9 月份的《情况报告表》，主要内容是各学校的动态、各学校游行队伍情况以及学生串连的情况。也有少量文化大革命初期各街道的敌情、社情报告；公安局内部干警对学生运动的反映；还有几个中等技校教师的材料。我们看到第二天（元月 7 日）凌晨，基本把这些材料看了一遍。从其中选出少部分材料作大批判之用，其余材料仍然按各处室原来的包装包好存放，拿出的材料也按各处室分别包装，以免混淆。

此后，这批材料一直放在 817 调查组办公室，我们再也没有动过。其中几个中等技校教师的材料因他们本单位需要，他们凭公安局的介绍信取走了。

1967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之后，我们决定将这批材料交给公安局军管会。三月中旬，我们集中几天时间，清点了这些材料，按各处室交来的材料分别列出清单：什么材料、几份、多少页，于 1967 年 3 月 18 日送往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军管会李凤阳副主任接待了我们，军管会找来了公安局内部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一起协商。协商后大家一致认为：材料太多，不便一一清点，仍然封存。于是将所有材料包好，放在市公安局政治部一个柜子内封存。双方在一式两份的清单上签字，我们带回一份。参加清点材料的有顾洹、朱文宝、杨翼白、许静远（压缩 42）、吴新民、范明强（内燃研究生）、林彩美（无线 41）、聂勋福（无线 11）和陈沾纬等人。前往市公安局交材料的有：朱文宝、吴新民、杨翼白和陈沾纬。




风雨同舟俩战友　五十年后再聚首
2016 年 4 月交大 120 周年校庆期间顾洹和陈沾纬合影

留下的那些材料连同我们 817 调查组的一些材料一起存放在交大中心楼东楼 2236 小房间内。1967 年九二武斗以后，形势严峻，交大革委会决定疏散师生员工，只留少数人护校，把有关资料和所有新旧档案都集中起来保管。交大 193 战斗队通过蔡元基（交大革委会委员、原 817 调查组领导小组成员）把 2236 小房间内的材料全部取走，存放于交大革委会档案室。

## 四、到省公安厅要黑材料的经过

1967 年元月 6 日晚上，我们把西安市公安局交出的黑材料看了一遍，发现其中与交大有关的很少，因为交大的保卫关系是直属于陕西省公安厅的。省公安厅除交出了李世英遗书照片及大字报大标语照片外，没有交出其他黑材料。顾洹提出要去省公安厅要黑材料。元月 7 日，顾洹和我前往省公安厅，与省公安厅二处处长黎影（公安厅厅长尚寅宾的爱人）和李干部（男）交谈很久。开始他们推三阻四，说没有黑材料。我们不相信，一定要他们交出黑材料。快到中午时，他们才答应。让二处管材料的令时英、赵佩琳（副厅长王健的爱人）两人拿材料给我们看。拿出的材料很少，我们当着令、赵两人的面把材料翻阅一下，其中有一份交大保卫处 1966 年 4–5 月份汇报材料，是交大内控人员最近（1966 年 4–5 月）的思想动态。我们认为：这根本

不是黑材料，坚决不能要。于是全部如数交还给令时英、赵佩琳两人，我们空手而归。此后省公安厅再也没有交出过什么黑材料。

## 五、关于顾洹的一些情况

顾洹系西安交大精密仪器计量室老师，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交大“817 调查组”工作，调查西安公安系统的问题，常和西安公安系统领导面对面地开展斗争。1968 年 11 月顾洹被陕西省革委会军管会以调查问讯的名义拘捕，关押在西安市少管所（东郊建工路，现在东二环外），直到 1976 年 2 月才被释放，非法关押七年零三个月，竟然没有任何手续。被关押期间，经常遭受刑讯逼供，要他交待“整理康生黑材料”、公安局档案和李世英等人的问题，受尽了折磨。顾洹是交大因文革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人，关押的目的是以调查公安局档案为名，行追查李世英等人问题之实！

顾洹 1979 年 12 月 16 日给我写了一封信，此信 1980 年 1 月 14 日才收到（正常情况下西安到我家的信是一周左右）。信中写道：“见到了省委（79）175 号文件，对‘康生假案’平反。这次平反只是省委的，市公安局并没平。所以我又去找市局五处，他们答应立即着手复查。”“现在我的事卡就卡在档案问题上，因军队、市局包括市领导总以为我这方面有问题。”“我看到一份油印的 66 年 12 月底收缴市局黑材料会议的小报，这是西派 67 年 3 月印的，其中有尚寅宾、辛步亮等不少人写的材料。不论当时环境如何，这些材料相当多的地方是歪曲事实，通过 817 会议攻击交大。而如今却成了我的定罪旁证材料，我当然不服。”有关西安市公安局黑材料的来龙去脉本文第三节已做详细介绍，1966 年 12 月 29 日晚上和 1967 年元月 5 日晚上两次在交大中心楼 2239 与省市公安系统领导洽谈交黑材料的会议，都是在心平气和的

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任何威胁逼迫。顾洹在信中说：“按当时情况，这种会是相当‘右倾’‘保守’的，没采取任何强逼手段，而有人却背着良心说我顾洹逼他们！”

文化大革命之后，顾洹先在交大从事工人培训考核工作，后来负责建筑室内装饰行业培训，还当选为陕西省室内装饰协会施工委员会副主任，2015 年 77 岁高龄的顾洹被评为“陕西省装饰行业十大贡献人物”。

## 致 谢

拙文得到压缩 42 班许静远同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提供详细材料并提出修改建议，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2018 年 7 月 30 日初稿

2018 年 9 月 22 日修改

于无锡万科城市花园二区



**作者简介**

陈沾纬，男，1945 年 11 月出生于江西修水，1969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金属学热处理工艺及设备专业（金相 42 班）。先后就职于江西省修水柴油机厂、修水县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工程师。2006 年元月退休。

2000 年退居二线后，应聘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培训中心从事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咨询培训工作。退休后，受聘于 TUV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和北京信标技术培训中心从事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培训工作。

# 我與“三六專案組”

■/ 馮偉年

文革不堪回首。1968 年 10 月，我作为 67 届毕业生分配到宁夏灵武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因为我在文革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曾支持李世英广播反对省委工作组的稿件，曾参与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61 个叛徒”的调查工作，曾当过西安交大“三六专案组”和“四二专案组”的组长，参与调查过原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原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原陕西省军区一位负责人等的历史问题，被点名从宁夏 21 军 63 师部队农场召回，参加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蓝田汤峪第一疗养院举办的“西安地区原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竟然长达半年之久。

学习班的兰空军宣队、615 厂工宣队头头怀疑我整康生、江青等的黑材料，将我隔离起来，不让我与外界接触。

1969 年春节学习班放假，不让我回交大住，在西安市人民大厦被两个解放军战士看管住。后来我巧妙摆脱了两个小兵的跟踪，只身去交大会朋友，吓得那两个军人不知所措，但是晚上我还是回到人民大厦去住，那两个小兵才放心。没有做亏心事，我怕什么？

历史把我这个无名小卒，交大一名贫农出身的普通学生党员，推到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在交大英语师资班学习，兼任

“西安交大”校刊记者，交大广播台编辑记者组副组长、广播台团支部宣传委员，管辖台里 40 多名编辑、记者。

1966 年 6 月 6 日那天，以李世英为首的 810—41 班的部分学生要闯广播台，要求广播他们反对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当天我值班。李世英对我说：“我叫李世英，810—41 班的，我是共产党员。现在有人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要不要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李世英还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他说：“既然你也是共产党员，那你开机广播我们的稿件。”我犹豫了一下，想广播台是党的喉舌，要播这样的稿件，一定要工作组批准。但在李世英等人的强烈要求下，我也豁出去了，决定让机务组开机广播。正在这时，省委工作组组长严克伦带领一批人上来，阻止了我的行为。随后，李世英与严克伦在广播台旁的 402 大教室展开辩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交大“六六事件”。事后，我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广播台。

1966 年 8 月底，原广播台以李功振为首的 7 位老编辑发起成立了“人民交大炮打司令部红色尖兵队”，推举我当队长。其宗旨是反对社会上一些红卫兵组织盲目的大轰大嗡和打砸抢，要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调查西北局、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向交大文革总会提供走资派的可信材料。这一做法得到交大文革总会主要负责人的肯定，专门分配东一楼 248 作为办公室，在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还争取到 3000 元活动经费。这就是“三六专案组”的前身。

取名“三六”，指的是交大红色尖兵队主要成员参加了由北航、南开、北地、北农大、北化工、西安交大等 6 家联合发起的，得到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同意的“1936 年的 61 个叛徒案”调查。西安交大常驻北航代表是李功振，让我负责西北地区的调查事务。

1967 年 4 月 24 日，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支左委员会主任黄经耀，接到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的电话指示后，在陕西军区办公室专门接见了我和军区负责专案的同志，鼓励我们好好干，有困难可找他。

所谓“三六专案—61个叛徒案”指的是1936年被国民党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关押的61个共产党人在刘少奇的指示下登报“反对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的反共启事后而获释。关于此案，61人都有书面笔录，白纸黑字，历史自有公论。中共中央也有正式文件为证。

在山东调查时，我们了解到，1942年，现陕西省委负责人在任鲁中区委负责人期间，曾发文件指示基层共产党员，在被日本鬼子俘虏时，可以承认是共产党员，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当时，我们的对立面，西安冶院也在派人调查这个案子。由于派性作怪，为了抢头功，交大总会决定以“三六专案组”为骨干，又从交大各系抽调一部分人成立了“四二专案组”，加快调查步伐。

1967年5月30日晚，在交大的大操场举行的批斗会上宣布：现陕西省委负责人是刘少奇式的大叛徒。此举轰动整个西安，人们称这是“5·30原子弹”。这一做法更加加剧西安两派的对立。周恩来后来批评说，你们红卫兵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为了找到鲁中区委指示变节的油印文件原件，“四二专案组”又三进山东，跑遍济南和鲁中沂蒙山区各个县的档案馆。因为战争的残酷和时间的久远，始终未找到原始文件，对于定案来说，证据不足。一些变节者的口头叙述则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文革中搞专案调查，我没有参与任何“打砸抢”，也没有对老干部“逼供信”，所有调查材料，都交给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968年对陕西省军区一位负责人17岁那年东渡黄河被俘变节问题的调查，我们按照兰州军区的要求，始终没有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由李世英亲

自向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同志汇报，全部书面材料都交给了兰州军区。过后不久，中央把军区这位负责人调离了陕西。处理陕西军区负责人一案，交大文革总会一再要求专案组要谨慎稳妥，要吸取“5·30 原子弹”的教训。我们是吃一堑，长一智。为此，兰州军区还表扬了交大。我们的行为光明磊落，经得起历史的审查。

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全国大学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才卷入到文革浪潮中去的，最后为什么要让红卫兵来当牺牲品？那时我才 24 岁，经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政治压力。此后我无论走到哪，政治审查就跟到哪。

70 年代在陕西机床厂，经历了“清查 5·16 分子”、“一打三反”运动的审查。外调人员一批接着一批来到偏僻的虢镇机床厂。

80 年代，宝鸡师范学院为了查清我的历史，兵分三路外出调查，仅调查经费就花了五六千元。宝师院图书馆小张私下对我说：“冯老师，我们越是调查你的材料，越发现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

90 年代初，全国整党开始，又是我的文革问题，把我的党员重新登记问题搁置了半年。每次基层党组织要提拔我当中层干部，如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之类的职务，材料一报到上边，就被打了回来，因为我是“政治内控”人物，说此人不可重用。这就意味着，我在仕途上将“永世不得翻身”。这也是迫使我以后拼命走学术、业务这条路的原因。

1996 年，我已调到西北大学，我申请国家留学基金会首批出国留学项目，有幸被批准到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当高级访问学者一年，研究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化。出国前，又对我进行政治审查，西大外事处干事看了我的档案，说足足有一尺多高。他要我写一个对文革的说明，写一个保证书之类的东西，押在他那里，害怕我出去了叛国不回来，他向学校不好交代。我坚决不写，我对他说：“没有党的培养，我根本上不了大学。也当不成教授。说

不定到了国外，我比谁都爱国，我保证学成按时回国。”看我态度如此坚决，他再也没有坚持。我说到做到，1997 年 8 月 18 日离京赴美，1998 年 8 月 18 日学成回到北京。此后，我一直从事翻译理论和美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迄今，我已出版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方面的专著、教材 15 部，翻译了《美国历届总统竞选内幕》（西北大学出版社），《凋谢的荣耀——下野后的美国总统》（黄山书社），《权力的角逐——美国副总统上台始末》（商务印书馆），《美国十二名人传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等 5 部有关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书籍。还翻译了机械、电子、公路建设、人文社科等资料二百余万字。我是陕西省翻译协会理事，西安市译协常务理事，陕西省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西北大学学报和西安翻译学院学报特邀英文编辑，西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曾担任过陕西机床厂子校副校长、校党支部副书记，宝鸡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英语教研室主任、外语系党总支委员，西北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英语系主任、外语系党总支委员，西安翻译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多次被评为宝鸡师范学院、西北大学的优秀共产党员。现在是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业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

为表彰我 50 余年来在我国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2014 年 11 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我“我国资深翻译家”称号。

对我而言，文革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2017 年 5 月于上海珐朵公馆



**作者简介**

冯伟年，1944 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63 年考入西安交大电机系工企专业，后抽调至英师班学习。

1968 年经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曾在陕西机床厂、宝鸡师范学院工作。1994 年调至西北大学任校教学委员会委员、英语系主任、研究生导师，赴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进修美国外交史一年。2005 年起任西安翻译学院专职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西安译协常务理事，西安外大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著作、教材、译著 21 部。被评为陕西省高校教学名师。2014 年，被中国译协授予我国“资深翻译家”称号。



# 我所知道的《驚回首》

■/ 黄善康

2014 年 11 月中旬，为欢迎沈荣水回国探亲访友，我们在上海搞了一次聚会，见面后许多朋友希望我能写一点文革的回忆，其中付登华兄为鼓励我写作专程给我带来了他的两本大作。

沈荣水是我在文革中最早认识的校革委会领导，有一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参与文革，相互交流很多，临别时他也希望我能够为这次聚会和文革写一些东西。好友肖国信更是极力鼓动。时隔一年了，我却一直没有动笔，带外孙女确实耗去我不少精力，但主要问题还在于我纠结于“写什么？“和”怎么写？”

要写文革免不了要回忆起许多事件，而我们在文革中曾经被迫写得最多的是“交待材料”和“检讨”。思维决定情绪，使我难以落笔。文革五十年了，直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当年我们满腔热血投身文革，单纯坦荡，光明磊落，没有搞过什么阴谋诡计，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什么可以交待的？我们在文革中了解社会，增长阅历锻炼磨砺自己，没有搞过“打、砸、抢、烧”，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有什么可以检讨的？而对于我们曾经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毕竟时过境迁，最好让它烟消云散。我们知道历史，但不要受困于历史之中。

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写的呢？只能写写纪念我们曾经的风雨同舟朋友。通过一些回忆，相互回味、相互鼓励，以期欢度晚年，做到如罗曼罗兰所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也想作一些探讨，五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虽然饱经磨难，却拆不开、打不散。在有微信之前，其实我们并不经常联系，但却经常挂念，一有机会、只要可能，就又聚在一起，紧紧地握手，亲密地拥抱，从内心流淌出真诚的微笑和祝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挨过整，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也许是政治思想上的共振共鸣，经济生活中的互助互爱，受到交大相同的文化熏陶，甚至是命中注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的经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听过黄钟大吕之响，看过惊涛裂岸之势，其实也是我们的造化。尽管我们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在各自的生活中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对这种价值观有非常强烈的自豪感，当然也免不了有点历史的沧桑感，由此对风雨同舟的朋友有了深深的爱。

“六六”事件平反后，交大和西安的文革澎湃地开展起来了，校文革总会有相当健全的组织机构，还成立了许多战斗队。但我在当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独自处在观望状态。有一天我在校内观看大字报，无意之中遇见了沈荣水，我知道他是文革总会的副主任，但从未打过交道，因此他不认识我。而我那天对沈荣水谈了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交大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已经很大了，别人都在说交老总成立了一个革命的“大杂烩”。但我感到我们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西北局。学校的大字报反映了西安地区众多的消息，就是没有西北局的文革情况的消息，我准备到西北局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沈荣水非常赞同我的看法。鼓励我努力去干，并说有什么困难或需要帮忙的，可以找他。

得到沈荣水的支持鼓励后，我只身去了西北局。因为我们刚参加过“社

教”运动，已经学会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很快我就了解到西北局内部分支持交大观点的干部、群众已经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总部”，但人数较少，准备和交大挂钩。我找到西北局“红总”的头头李德友，作了自我介绍，向他要了笔墨纸张，在西北局院内刷了一批大标语和大字报，表示支持西北局“红总”的革命造反派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我以交大革命师生的名义热烈祝贺西北局“红总的成立”（未取得文革总会的授权不能以交大文革总会的名义）并署名《天天向上》战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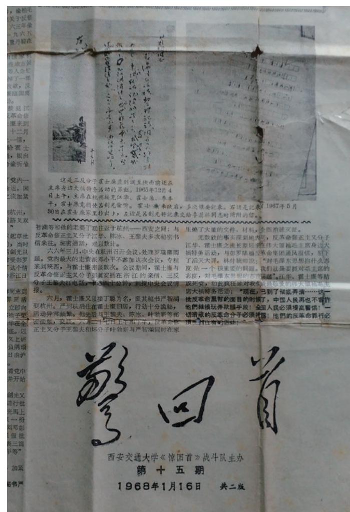
此后，我几乎天天跑西北局，在西北局刷大字报，内容主要是介绍交大文革动态和“北京来电”，借用交大的影响力，很快有一批干部参加到西北局“红总”。西北局原来以“统指”观点为主，转变成支持交大观点的和支持“统指”观点的两家平分秋色。我感到我还应该将西北局文革的开展情况在校内做些介绍，这样我就把我们班上我的好朋友张德柱、李兆锟等都拉进来，在校内以“天天向上”战斗队的名义写出了一批介绍西北局文革情况的大字报。随后我去找了一次沈荣水，汇报了我去西北局开展工作的情况，希望校文革总会对今后的工作给予指导。

不久，苏建农（已故）主动来找我，此前我俩并不认识，他自我介绍，他是校文革总会的，希望我能多和他联系。我当时的印象，他是沈荣水领导的，可能是沈荣水派他来指导我们工作的，因此表示一定积极配合他的工作。苏建农是个非常随和、有亲和力的人，组织能力也很强，许多朋友都是通过他的介绍结识的。我和大鬼（陈绍魁）、肖国信等接触都和苏建农有关。以后还通过他介绍认识了梁德群、景存斌等。

西安造反派发生观点分歧，交大被西工大等院校指责为思想“右倾”。为了反击他们的指责，我依据从西北局群众来信中找到的西工大文革委员会副主任陈启顺和一位姓杨学生写给西北局刘澜涛的一封效忠信，1967 年 1 月

底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陈杨信件的前前后后》，因为那时我们“天天向上”战斗队和肖国信他们的“硬骨头”战斗队，陈绍魁他们的“学鲁迅”战斗队关系非常密切，我想通过这篇文章把我们几家凝合在一起，决定以一个新的战斗队的名义发表。经过商议确定以“惊回首”战斗队的名义发表。我将这篇文章抄写成大字报后贴在了学校。

苏建农见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找到我，说这篇文章非常好，可以有力地反击“西派”的“反右倾”，希望我将文章写成大字报贴到社会上去。我说文章太长，抄成大字报太费劲了，要想产生更大效应最好搞成印刷品。苏建农说他去想想办法。我说那只有请你帮忙向校文革总会去申请了。果然不久他就把事情給办成了。他告诉我，他争取到了校文革总会的支持，办成报刊并取名《惊回首》。接着文革总会就成立了《惊回首》编辑部，我也算是成员之一，但我忙于西北局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没有参与编辑部的事情。苏建农几次向我约稿，我后来大概又写过 1~2 篇文章。


驚回首

西安交通大学《惊回首》战斗队主办

第十五期

1968年1月16日 共二版

惊回首报照片

《惊回首》的其他文章和我们“惊回首”战斗队没有一点关系了。我们没有被《惊回首》编辑部收编，我们仍然独立活动，只不过是《惊回首》编辑部引用了我们的战斗队名“惊回首”而已。

这份报纸一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效果巨大，成为当时牵动西安地区文革发展动向的重要舆论报纸之一。因此我对苏建农的眼光和魄力非常敬佩。此后他只要有事找我，我也尽力去办，关系非常密切。看了陈沾纬介绍的情况，苏建农因《惊回首》受到牵连，心里十分难过。没有我们以“惊回首”

名义写的第一篇文章，哪来的《惊回首》报刊，哪来的引人注目的社会效应？因为后来的《惊回首》编辑部我们基本没有参与，所以除了少数人知道我们是“惊回首”战斗队之外，都以为苏建农才是《惊回首》。我写的那两篇文章，在那时的环境下，足以作为罪名，苏建农是条汉子，自己承担了，换作某些人咬我们一口，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汤峪举办的“西安地区原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大专院校分成八个班，一，二，三班是重点。交大在一班的是李世英，在二班的是沈荣水，在三班的是武登才。我开始在三班，为保武登才和“西派”（工联派）斗得很凶，后来学习班为对武登才施加压力，就把我调开，调到一班，我又成了保蛮子李世英的干将，因此学习班认为我的派性很大，表现不好，让我交待问题。我说，我早就参加省革委会专案组工作，其他事情都没有参与，也不知道。学习班派人去省革委会专案组调查我，省革委会专案组表扬我，说我工作干得很好，还说曾经想等我毕业后留我在省革委会专案组工作。这样学习班才放过了我！

在蓝田汤峪学习班进行最后总结时，两派各出一人，参加总结文件的起草工作。交老总委派的就是我，西派是“光阴迫”兵团的徐文光。

当年《惊回首》报刊在西安文革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为了和《惊回首》报相抗衡，西派成立了“光阴迫”兵团，创办了《光阴迫》报刊，我记得《光阴迫》创刊号头版头条的文章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将《惊回首》比喻成二战后一些潜藏的纳粹军官组建的一个企图复兴第三帝国的秘密组织——“条顿剑”。而徐文光就是《光阴迫》的负责人。我俩相遇在一起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但徐文光并不知道我是《惊回首》成员。

该如何写总结，我去请示蛮子（李世英），为此我和蛮子有过一些分歧，他认为只要把事实写清楚就行了，结论是无所谓的。他举例说，历史上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些结论现在不就改变了吗？我却认为重点在于对一些事实的分析，用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同一事实可以给出不同的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文革后期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小人物，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而一些结论对我们可能是致命的，难以承受的！蛮子的悲剧就在于没有看清楚，我们是没有能力改变历史结论的。在蓝田汤峪学习班当时说交老总有两条主要罪状：1. 公开陈杨信件是分裂造反派，2.“八五静坐”是反军。

其实第一条罪状完全不符合事实，在公开陈杨信件之前，西安的造反派已经因为“反右倾”而分裂了。第二条罪状完全是夸大事实真相，上纲上线。蓝田汤峪学习班结束后，又加了一条，整霍士廉是整革命老干部，而在汤峪学习班时霍士廉还是“黑手”。

因为“八五静坐”，胡炜对交大恨之入骨，又捏造了所谓整中央文革黑材料（整康生黑材料）假案，交大许多人涉案。

这些结论影响了交大许多人，使他们蒙冤难伸。

苏建农校友为《惊回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大义凛然地解脱了我们，其人格魅力值得大家永远怀念和敬仰！

最后慎重声明：也许有点老糊涂了，因此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

黄善康，上海市人，生于 1945 年 5 月，1968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先后就职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194 所，成字 137 部队 909 基地，后调宝鸡供电局任副总工程师，陕西电力公司的 A 级专家，2005 年退休。

# 西安交大文革六六通訊社的回憶

■/ 陶文銓　陳輝

## 1. 概况

西安交大六六通讯社成立于1967年5月，结束于1968年8月，前后历时1年3个月。其成员最多时达60余人，所编印的刊物散发到校内外，是当时西安交大乃至西安地区有一定影响的校办通讯机构。兹将有关史实回忆如下。

1967年3月，中央首长接见西安地区两大派的代表后，交大文革总会对学校机构进行了调整，成立了专管外事的第一办公室，下设各种机构，其中有材料组和动态组。交大文革总会要求两组应负责编印反映校内外文化革命动态的小报，收集、汇编中央首长讲话，并和校外通讯单位做资料交流。当时从我校驻北京联络站回校的几位成员，陶文铨（热工教研室教师），王清祚（元件教研室教师），宋柏春（制冷41学生），赵家贞（工物系学生）等均在这两个组工作。经商议决定出版《动态》及《北京消息》两个油印小报。参加这两个小报的撰稿编辑的成员还有王茂时（机切51学生）及郑汉培（锅炉52学生）等。小报出版了近40期后，大家认为《动态》这个名称没有西安交大的特色，又因北京的一些学生组织都有通讯社，编辑部就向交大

文革总会负责宣传的委员邵乐冲建议，把《动态》改为《六六通讯》，得到交大总会的同意，于是从 1967 年 5 月 12 日起，原来的《动态》就改为《六六通讯》出版了，一般每天或者间隔一天出版 1 期（除周末外）。




六六通讯社部分成员合影

1968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又加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通讯社成员经过几天学习一致认为六六通讯社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于 8 月 26 日宣布解散。留下来的部分工作人员（陶文铨，陈辉等）并入文革总会政治部资料组，其余成员回原单位参加活动。

## 2. 通讯社成员来源

六六通讯社在一般情况下有工作人员 30 余人，最多时达 60 余人，先后在通讯社工作过的有 130 余人，陶文铨自始至终为负责人。成员主要来自：

西安交大的学生和教职工，这是主要的组成来源；还吸收交大附中的学生，先后有 7 人，主要担负材料的整理，登记，印刷，分发等工作，最小的年仅 10 岁左右；还有西安市 20 中、26 中、29 中等校学生，有五六人，担任记者及校外单位采访等。

## 3. 内部的组织

六六通讯社曾先后分设以下各组：

六六通讯组：负责编刻《六六通讯》，主要成员有：陶文铨、李明怀（物理教师）、胡朋子（工企教师）、熊应培（控制 4 字头学生）等。

北京组：负责编刻《北京消息》、《北京之声》（不定期）、《内部资料》（不定期），工作过的成员有：王清祚、王惠明（绝缘教研室）、唐义明（无线 43 学生）、夏厚银（应物 41 学生）等。

祖国各地组：负责收集各地文革情况，首长讲话，编辑对外交流材料。人员最多时，一般一个省区就有 1 人负责。主要成员有：赵家贞、翟九西（内燃 3 字头学生）、周伯和（锻压 31 学生）、俞容明（锅炉 51）、李文业（工企 42 学生）、包冠周（金相 51 学生）等；

记者组：负责采访校内和西安市文革动向，成立于 1967 年 9 月份，到 1968 年 3 月份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主要成员有：戴耳东（65 年研究生）、陈辉（锻压 41 学生）、20 中与 26 中及 29 中个别学生。

斗批改通讯组：负责编辑《斗批改》不定期刊物，成立于 1967 年 10 月份，主要成员有：李明怀、林曼莉（强度室）等。

大批判组 : 负责收集当时已经点名的领导干部的材料，成立于 1967 年 10 月份，由刘炳宗（860 教研室教师）负责。

大字报组：负责将重要首长讲话抄成大字报，张贴于校内供师生阅览。孙庚西老先生（原校团委职工，写得一手漂亮的柳公权字体）为专职抄写员。

材料发行组：徐润泽（应物 41 学生）负责日常校内材料的发行，具体工作主要由交大附中几位学生承担。

## 4. 六六通讯社存在期间的主要出版物




六六通讯社编印的部分书刊

（1）《六六通讯》：共出版 368 期，每期通讯社自己油印 1000–1500 份，主要分发校内，部分邮寄到各地联络站。

（2）《北京消息》：共出版 363 期，每期通讯社自己油印 1000–1500 份，主要分发校内，部分邮寄到各地联络站（除北京外）。

（3）《北京之声》：每 1–2 周 1 期，主要刊载首长讲话，共出版 49 期，每期印数 800–1000 份，主要分发校内，同时校外交流。

（4）《斗批改通讯》：报道校内斗批改消息，每期 800–1000 份，主要分发校内，部分校外交流。

（5）《内部资料》：多为某一问题的专辑（如湖南的省无联专辑），每期 500–600 份，内部分发，不对外交流。

（6）《内参》：1968 年 4 月开始出版，不定期，每期印数 100 分左右。

有些资料编辑部认为不便刊登在《六六通讯》，但值得让文革总会的领导知晓的事情就刊登内参，出版过 4 期。

（7）《头头报》：手抄本，每期 5–10 份，主要供文革总会主要领导参考，共出版 10 余期。

## 5. 六六通讯社办公地点

六六通讯社在交大中心楼 2204 和 2206 教室。2204 教室分为 3 个工作区，即大字报抄写区，各种期刊稿件起草、讨论、审核、编辑及蜡版刻写区，出版物油印区。油印区用一块屏风与其他工作区隔开，内安装一台滚筒手摇油印机和电话机，总编陶文铨就住在这个工作室。每晚陶文铨油印所有出版的期刊，除此之外他每天还要接听记录来自各地联络站的电话，作为第二天通讯的一部分内容。2206 室是六六通讯社的资料室及仓库。2206 室一个窗口每天下午 4 点向全校各单位发行《六六通讯》《北京消息》等出版物。

## 6. 其他出版物

二本书：

（1）《毛主席诗词学习资料》

这本资料性著作是由陶文铨主编，陈辉等五人撰写的，出版于 1969 年 6 月。该书收录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和部分尚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诗词是继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之后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又一座高峰，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史诗”，博大精深，意境深远，韵味无穷，语言流畅。为了有助于读者学习和体会毛主席诗词的深刻意义，《学习资料》

除撰写了每首诗词的历史背景和注释外，还收集了毛主席有关诗词的书法及信件，收集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和图片，附录了有关每首诗词的文献资料，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出版于 1969 年 7 月，深受读者喜爱。

（2）《马恩列斯毛论辩证法》

为了配合学校教育改革，交大政治部组织了是十多位交大年轻教师和学生编辑了《马恩列斯毛论辩证法》。这是一本语录性文集，是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选编而成，该文集分“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及“自然辩证法”等五个专题，供我校师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唯物主义及辩证法，学习革命导师的思想、方法和立场，树立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



**作者简介**

陶文铨，1939 年 3 月生，浙江绍兴人。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传热学及传热与流动问题数值模拟的研究



**作者简介**

陈辉，1969 年毕业于西安交大机械制造工程系，就职于中国航天第四研究院（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 在六六通訊社工作的日子

■/陳立群

1966 年文革爆发时，我是西安交大附中高一学生。当时交大附中是交大领导的下属单位，文化革命的进行也与交大相关联，比如省委派工作团到交大，我们附中也派有工作组。再加上我的父母在交大工作，我属于交大子弟，所以，我对交大的文革动态还是比较熟悉，印象也比较深刻。但文革中，我没参加过什么群众组织。

1967 年我在交大六六通讯社一段时间工作，是在那年秋天，大约 9 月初的样子。当时西安和其他地方一样也发生了武斗，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气氛还是紧张的。交大的师生员工根据学校革委会反对武斗和保证学校人员安全的部署，疏散了很多人，一时校园里很清冷，人数稀少。剩下的人还是上班或保卫学校安全。有一天，我遇上了一个同班女同学，她说她还在交大六六通讯社给大学生帮忙，缺少人手，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中学班长，学习较好的缘故，她问我能不能刻蜡板（也叫钢板，用于刻写传单之类），我说会，她说那你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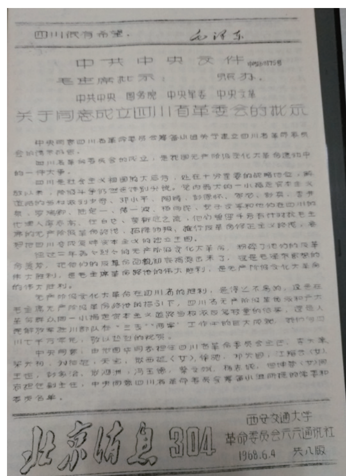


六六通讯社在工作

到六六通讯社来帮帮忙不。我也空闲，就跟着她去了六六通讯社。

六六通讯社是交大革委会的下属机构，当时负责学校内外通讯信息的收集和传递，本身不发表消息。办公地点在工字型中心楼东北小门（即1200大教室北面的那个门）进去的二层左手第一间教室。社长是陶文铨同志，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动力系的研究生，留校当老师了。其他成员我曾先后见过有七八位，有本科生、研究生，还有两位我们附中学生。每天不是所有人到齐，大约总有四、五个人在工作。老陶是天天来的，从上午忙到下午，甚至下班都还在工作，他十分认真细致，平易近人，话语不多，令我肃然起敬。

通讯社每天出钢板刻印的《北京消息》、《六六通讯》两份小报，每份一二页纸，纸张大约相当于现在的A4纸两张那么大。文革初期北京的各种消息特别多，《北京消息》就是专门报道北京传来的消息的。《六六通讯》则是反映本省市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文革动态消息（参见附照）。由于西安交大在文革中是一个地位很突出的高校，因此各地各单位与交大的联络十分频繁密切，每天收到的各地报刊、文电、传单等都极为丰富繁多，这些东西都由校收发室收到后交到通讯社来处理。其中重要的，通讯社报告校革委会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其他消息则由编辑人员阅览后编纂成《北京消息》、《六六通讯》或其他材料集子，


四川很有希望。 毛泽东

中共中央文件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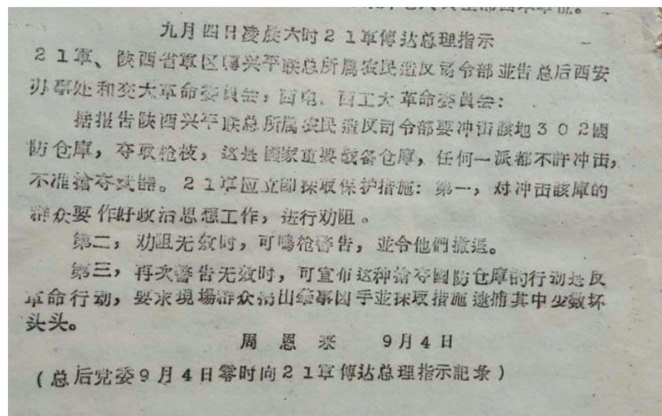
北京消息 304

西安交通大学
革命委员会六六通讯社
1968.6.4 共八版

66通讯社出版的北京消息

处理非常及时，凡是时效性强的消息都在一两天内刊登。消息的处理也很谨慎，不可靠的消息不发表。

我的工作就是刻钢板，每天刻一张。刻写的内容都是由编辑人员编好后交给我的，这些改编后的消息文章都很短小，一张篇幅的蜡纸总有十余条消



九月四日凌晨六时２１軍傳达总理指示

２１軍、陝西省軍区轉兴平联总所属农民造反司令部並告总后西安办事处和交大革命委員会，西电、西工大革命委員会：

据报告陝西兴平联总所属农民造反司令部要冲击該地３０２國防仓庫，夺取枪枝，这是國家重要战备仓庫，任何一派都不許冲击，不准搶夺武器。２１軍应立即採取保护措施：第一，对冲击該庫的群众要作好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劝阻。

第二，劝阻无效时，可鳴枪警告，並令他們撤退。

第三，再次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搶夺國防仓庫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要求現場群众揪出肇事凶手並採取措施逮捕其中少数坏头头。

周恩来　9月4日

（总后党委9月4日零时向２１軍傳达总理指示記录）

当年66通讯社刊印的总后党委传达的总理指示记录

息。刻钢板的还有夏厚银同志，他每天都来，河南籍学生，朴素忠厚热情，刻写老练，字迹工整，比我强多了。我桌子对面是编辑林瑶珠女士，每天阅读各种材料。听说她是位女研究生出身的教师。

刻好的蜡纸下午交给老陶，他亲自用滚筒印刷机印刷，一张蜡纸要印几百份。他还负责邮寄等事务。我们附中的两位同学负责整理装订等工作。

我记不大清在通讯社工作了多长时间，可能前后有两个月。后来怎么离开的也不记得了。通讯社保持到什么时候也不清楚。

在通讯社期间，没有碰到过什么大事。唯独有一次，可能是在9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我还没走，社里就剩老陶和我在，此时，李世英来了。他穿着十分简朴，挎着个那时常见的军绿书包。他来了后问起要看一份总后党委9月4日零时向21军传达总理指示记录。指示内容大致如下。

21军、陕西省军区转兴平联总所属农民造反司令部并告总后西安办事处和交大革命委员会，西电、西工大革命委员会：据报告陕西兴平联总农民造反司令部要冲击该地302国防仓库，夺取枪枝，这是国家重要国防仓库，任何一派都不许冲击，不准抢夺武器。21军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第一，对冲击该库的群众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劝阻。

第二，劝阻无效时，可鸣枪警告，并令他们撤退。

第三，再次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国防仓库的行动是反革命行

动，要求现场群众揭（这字有点不清楚）出肇事凶手并采取措施逮捕其中少数坏头头。

由于这件事让我当时很吃惊，所以难忘。李世英当时看了记录后，显得很镇静，没有说什么。（编者注：李世英此次到六六通讯社应是9月7日以后，据李世英本人文章记载，9月4日晨他在接到周总理电话指示（内容与此记录相同）后，当日上午即赶赴兴平落实总理指示，9月6日晚才回到学校。在兴平经调查表明，此记录所言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虚假报告所致。李世英已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兴平302库的真实情况）

特别还记得，他问我，你们看了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没有。他说的是最近才贴的一张学生写的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字报。我是看到了的，大约贴在东二楼西边大马路上的大字报栏。当时，武斗气氛紧张，学校里人烟稀少，更少有人还贴什么大字报，因此，我见到这样一张似乎与文化革命没有关系的大字报，感到诧异。大字报好像是讲世界酝酿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读了让沉浸在文革中的我们头脑里生出点与当下世界相隔的感觉。我是浅薄无知的中学生，没有可能回答李世英。就听他停顿一下，微笑着说了一句：这样的大字报，如果是由陈大燮（编者注：陈系一级教授，时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来写，会写得还要好。李世英的话听不出是称赞还是略带微词。我想，陈大燮是交大知名大教授，在文革当时空气下，也属于资产阶级权威一份子了，谁都不会贸然去提他，更不会肯定他什么。不过，当时我觉得李世英还是有独立思想的。

后来，事情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

几十年过去了，前些年在网上看到有一篇采访前21军军长胡炜的文章，还讲到过这个冲击302库事件，不知何谓。

在交大六六通讯社的短暂工作经历是我中学生岁月的事迹，从中我体会

的是年长的大学生们对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对社会发生的事情冷静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保存了一些那时的文本材料，看到它们，就想起自己少年时代是如何开始学习做工作的。



**作者简介**

陈立群，原西安交大附中高六八届学生，1968年首批上山下乡插队宝鸡晁峪公社，后进宝鸡地区棉织厂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考入西北大学，是我国最早一批文艺理论硕士研究生。1987年调入文化部艺术局工作。现已退休。



# 將往事留在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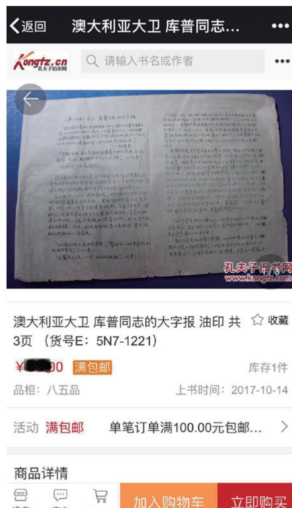
## ——還原歷史情境

■/ 戴克刚

毛主席当年推荐中央文革小组阅读的那张大字报其实是我写的。

## 一、引子

1971 年，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宣读文件时，当我听到第一条，心中便‘咯噔’一惊，那是毛泽东主席对澳大利亚专家大卫·库普的一份大字报的批示，毛主席批示说：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其实，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其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出自我的手笔。

近日，有人在网上拍卖这篇文章的油印传单，是由文革保存至今的，我在大陆的亲友为我拍买到。与此同时，一位朋友查找到当年的那份中央文件，转发给了我。

大卫·库普，澳大利亚青年，当年由澳大利亚共产党介绍来华，在西安外语学院教英语。西安外院有多名外教，包括教西班牙语、法语、英语等，这些外教都是短期来华工作。不同于李敦白、阳早、寒春等一批抗战时期或内战时期来华的国际友人，已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通晓中文，“文革”开始后，均不同程度地牵扯其中。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主席关于宣传工作的批示**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 1971 -7-1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

1971.07.12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而西安外院的大卫·库普等人，是短期来华工作的，基本上不懂中文，不会听也不会写，在中国居住时间很短，和中国社会及中国的政治生活比较隔膜，对中国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了解很深。但大卫·库普却居然写出了这样一张详细剖析西安地区文革形势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就有蹊跷，加之大卫·库普本人也声称，‘文革’开始以来，他在西安居住了仅仅一个多月。所以许多人都怀疑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有人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直至一九七一年这份中央文件下达后，大家才肯定确曾有过这份大字报。但是，此中疑窦却并未释然。

## 二、还原历史情境

说来话长，此事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就是当时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一位吴姓女同学，她家住梁家牌楼

街，从我家出门向北，步行大约不到十分钟的距离。那时我在西安交大读书，因为两家地理相近的原因，便自然地相识相熟。有时也会相互到对方学校探望。

一九六七年春，某天，云淡风清，春日和煦，我信步来到南郊外语学院，准备约吴同学一起回家。在校园里找到吴同学时，却看到英文外教大卫·库普正在和她说话，嗓门很大，情绪激动，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发现自己的自行车铃盖被人偷走，而且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的到来又多了一个听众，他讲得更加起劲，欲罢不能。我向他建议，不妨写一张大字报对此予以谴责，我可以代你起草。于是，一干人众便移步到大卫·库普的房间。

房间里有一张长方形的写字台，我便坐在写字台边开始起草，大卫·库普和其他人散坐在各处。屋内除了大卫与吴同学之外还有其他人，我至今仍记得两位，一男一女，虽然已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当时的样子。一位娇小的女同学，此后我还遇见过她，她告诉我自己身体不好，多病，吴同学告诉我说，这位女同学在学校很出名，是学校树立的学雷锋标兵。那位男同学进房间比较晚，我向他逐句逐字将文章念了一遍，是他将文章拿出去转抄的。

当时西安地区大专院校分为两派，西安交大为一派之首，被另外一派批评为右倾保守，两派正在开展激烈的辩论，我也积极地参与其中。我曾起草过多篇文章，有的在西安地区影响较大，如《交大要说话》等。交大成立了一个由七、八个人组成的演讲队，我是其中一员，机械系一位名叫周道的同学担任队长，多次在各处举办演讲会，听者人众，动辄数万甚或更多。这就使得我对西安地区文革形势以及两派的观点了解得较为清楚。

既然是由我写文章，就必然要为交大一派的观点张目。那几天正在传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西安代表的讲话及录音，通过吴同学等人翻译，我把大

致内容向大卫作了介绍，经他同意，行文时就以他自己的口吻叙述。于是，在这篇文章中，纪录了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让交大师生最感兴趣的部分内容，如：1966 年 6 月 6 日，西北局刘澜涛想让中央发表一篇社论《假左派真右派》，攻击交大师生和学生领袖李世英，被中央拒绝了。（我记得这篇同名社论当时仍然在陕西日报上发表，并由西北各省省报转载。）文章中还说，中央文革从 1966 年六月份起一直都在支持西安交大，并说我（即大卫·库普本人）虽然对整个情况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但我坚信，对交大和李世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是一股左倾机会主义的逆流。

外院学生中有多名现役青年军人，是为军队代培的，在当时‘全国大学解放军’热潮中，这些军人学生在学校颇为引人瞩目。吴同学曾介绍我和这几位解放军认识，有过几次交谈，颇为投缘。某日吴同学从学校回来，语带悲愤地告诉我说，学校有些人把这几位军人同学抓起来游街，撕去领章帽徽，翻穿军装。我将这件事也写入文中并予以批评。

那时有一阵风，群众组织召开大会宣布开除某些人的党籍，并将其入党资料当众烧毁，这股风首先在某些大学里开始，然后蔓延到社会上。交大师生对这种作法不以为然，并说，既然群众组织可以开除党员，那么群众组织是不是也可以吸收党员呢？戏谑地称其为全民党的作法。我将这几句话也写入文章中，并经过大卫·库普的同意，在文章中以‘我认为’的口吻表述。后来周恩来总理在这段话的下边做了批注，说“北京有些大学生也有此事——周恩来注”。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反对极左，反对武斗，反对打砸抢，反对乱抓乱斗乱遊亍。文章中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幼稚病”，引用了十六条中“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毛的语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等

等。明确地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

大字报公布后（那天是 1967 年 3 月 10 日），西安市外事办公室一位名叫高智的工作人员，他曾在主席机要室工作过，将其抄录上报毛主席。毛主席于 3 月 20 日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随即总理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

## 三、将往事留在风中

白云苍狗，物换星移，倏忽间五十一载已过，当年参与其事者均已年过古稀，且分居于世界五大洲中的三大洲——美洲、澳洲、中国大陆。此刻我若还不吐露实情，真相恐将永远湮没于历史的粉尘之中。

这件事情有三个环节：执笔撰写——大卫·库普署名公布——毛主席批语。缺少了第一环节，这事情总归令人满腹狐疑，因为不合情理，经不起推敲。第二个环节也不可或缺，若不是用大卫·库普的名义发表，市外办高智就不会抄录上报毛主席，这篇文章就自然而然地淹没在大字报的浩瀚海洋里。那个年头洋人在中国稀缺，洋人大字报就更为新奇，必然引人注目，我之所以乐意捉刀代笔，知道这正是推销自己观点的好机会。路遇大卫纯属偶然，提笔为文率性而行，写自己所想，写平日与同学聚会所说。因为吴同学和我经常见面，外院发生的事情她会事无巨细的讲给我听，所以我并不缺少可资议论的有关外院的话题。又因为模仿大卫的口吻，所以不需要雕琢文字。当日现场我仅认识吴同学一人、其他人以前从未见过，是不期而遇，所以匆匆为文，匆匆别过，这样就把丢铃盖的事情忘到脑后了。幸而大卫和其他同学

都附和赞同，合众人之力，成就了一篇议论时政的文章。从而能被加急送到主席案首，从而能引发主席批语，也正是主席批语以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应，暴露端倪，让我们终于能揣摩到当时的‘上意’。

你若细心推敲主席批语，会悟到弦外之音。

毛主席批语中说：“…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一连用了两个‘很’字，这在主席的文章中十分罕见。但是对究竟是什么‘问题’，究竟是哪些‘分析’，却语焉不详。须知，这篇文章主题鲜明，就是反极左、反武斗、反打砸抢。转到总理手中，总理顾左右而言他，批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北京有些大学生也有此事”。中央文革小组则是三缄其口，装聋卖哑。有一位史学家对这件事做了研究，他在论文中发表了他的观点：这篇大字报强调的是，人们的行为要有规范，群众运动也须要有所限制，而这一点正是文革的发动者不愿意宣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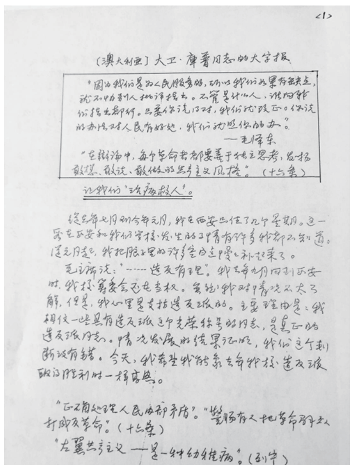
交大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无惧于被别人贴上‘右倾’标签，我自己文章署名就曾用过一个浑名‘钢杆右倾’。当年历经了将近半年的论战，交大师生的认识更为统一和坚决，对这一点决不要等闲视之，正是因为这一点，交大师生才可以在文革中创造了全国奇迹——一个万人大学，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没有派性斗争，没有任何武斗现象。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当时公认的第一第二，清华、交大，一东一西，两个万人大学。清华大学是在天子脚下，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近在咫尺，却烽火连天，武斗持续百日之久，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都用上了，造成 13 人死亡，30 多人终身残疾。【见《长江日报》2012 年 8 月 16 日第 9 版，作者：杨毅，原题：《清华大学“文革”武斗内幕》】。而此时西安交大校园却是一片祥和。整个文革时期，在刘少奇工作组撤走后由学生自治的数年里，我在学校没有见过任

何一次动手打人的事情，连吵群架也没有见过。二者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难道不值得史学家们深入研究吗？

鉴于此，我将我在文革中经历的这件平凡却又特别的事情纪录下来，并极力还原细节的真实。

让往事留在风中！

附：大卫·库普大字报油印传单拍卖件（共四页）



〈1〉

〔澳大利亚〕大卫·库普同志的大字报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毛泽东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十六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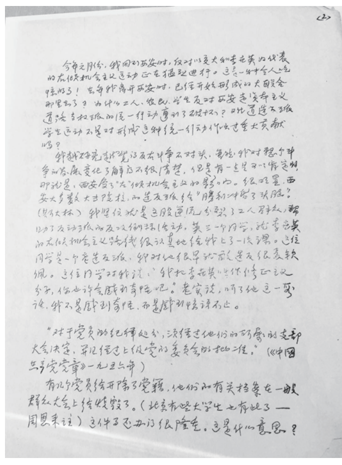
让我们"治病救人"。

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元月，我在西安只住了九个星期。这一段在西安和我们学校发生的事情有许多我都不知道。从元月起，我把脑子里的许多空白逐渐补起来了。

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我去年九月回到西安时，我校筹委会还在当权。虽然我对情况不太了解，但是，我心里是支持造反派的。主要理由是：我相信一些具有造反派这个光荣称号的同志，是真正的造反派同志。情况发展的结果证明，我们这个判断没有错。今天，我希望我能象去年我校造反派取得胜利时一样高兴。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十六条）

"左翼共产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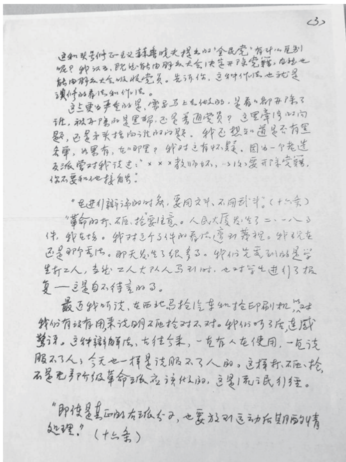
〈2〉

今年元月份，我回到西安时，反对以交大和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正在猛烈进行。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去年我离开西安时，已经开始形成的大联合哪里去了？为什么工人、农民、学生反对西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一行动遭到了破坏？难道造反派学生运动不是对形成这种统一行动作出过重大贡献吗？

我越来越觉得这反右斗争不对头。虽然我对整个斗争的发展变化了解得不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安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很明显，西安大多数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给"胜利冲昏了头脑"？（斯大林）我坚信就是这股逆流分裂了工人群众，帮助了反动派的反攻倒算活动。第三个同学，就李世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很认真地给我上了一次课。这位同学是一个老造反派，我对他很早就敬佩。这位同学对我说："我把李世英叫作修正主义分子，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吧"。老实说，听了他这一番话，我不是感到奇怪，而是感到惊讶不止。

"对于党员的纪律处分，须经过他们所属的支部大会决定，并且经过上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五六年）

有几个党员给开除了党籍，他们的有关档案在一般群众大会上给烧毁了。（北京有些大学生也有此了——周恩来注）这件事还办得很隆重。这是什么意思？



〈3〉

这和苏修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党"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既然能由群众大会决定开除党籍，自然也能由群众大会吸收党员。告诉你，这种作法也就是[illegible]的看法和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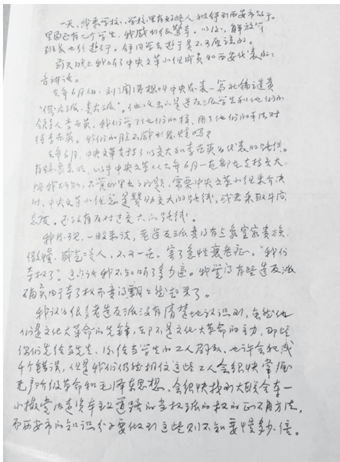
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马上去做的，是看看都开除了谁，被开除的是黑帮，还是普通党员？这里牵涉的问题，还是[illegible]的问题。我还想知道是否有黑名单，如果有，在哪里？我对这有怀疑。因为一个老造反派曾对我说过："×××教师坏，以后要开除党籍，你不要和他接触"。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十六条）

"革命的打、砸、抢要注意。人民大厦发生了二·一八事件，我在场。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遭到蔑视。我现在还是那个看法。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我们先看到的是学生打工人，当然工人大队人马到时，也对学生进行了报复——这是自不待言的了。

最近我听说，在西北局抢汽车和抢印刷机，说这对我们有没有用来说明不砸抢对不对。我们听了后，连感惊讶。这种辩解法，古往今来，一直有人在使用，一直说服不了人；今天也一样是说服不了人的。这样打、砸、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这是流氓行径。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十六条）



一天，我来学校，学校里有好些人被绑到西安市游街。里面还有几个学生。我感到很惊奇。以后，解放军班长也给赶了。绑同学去游街是不应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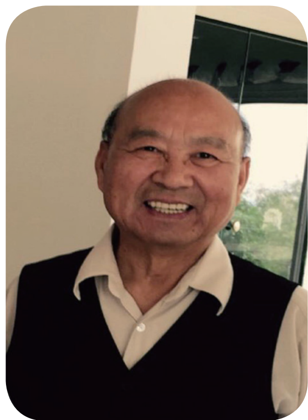
前天晚上我听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西安代表的录音讲话。

去年6月的，刘澜涛根据中央发表一篇社论谴责"假左派、真右派"。他攻击的是造反派学生和他们的领导人李世英。我们学了他们的样，用了他们的手法对待李世英。我们的脸不感到发烧吗？

去年6月，中央文革支持了以交大和李世英为代表的路线。有趣的是，以后中央文革从去年6月一直都在支持交大。据我所知，不管哪里出了问题，需要中央文革小组来解决时，中央文革小组总是赞助交大的路线，或者采取中间态度。还没有反对过交大的路线。

我发现，一般来说，老造反派变得有点象皇家贵族，傲慢、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害了急性衰老症。"我们夺权了"。这句话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觉得有些造反派确实由于夺了权而变得飘飘然起来了。

我认为很多老造反派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却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那些你们先给当先生、你给当学生的工人群众，也许会犯成千个错误，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些工人会很快掌握无产阶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会很快找到大联合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的正确方法，而西安市的知识分子要做到这些则不知要慢多少倍。



## 作者简介

戴克刚，汉族。1962 年入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力学 21 班。文革结束后在西安交大教授“生物力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赴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校研究血液循环学。曾在纽约和洛杉矶等地成立中西医联合诊所，致力于临床医学。现退休，定居洛杉矶。



# 兩篇大字報的回憶

■/ 孔祥騮

【编者按】：此文提到的两篇大字报反映了文革期间交大学子的一些思考。尤其是第二篇突显了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科学纵横观》一文已被交大档案馆收藏（藏件非原稿原件），部分内容与此文也有所不同。

老同学沈荣水微信告诉我，有校友还记得我五十年前写过一篇《科学纵横观》的大字报，是贴在中心楼旁的大字报栏中的。”荣水说：“你有两篇高水平、高见解的文章，许多同学至今记忆犹新。大家真想让你那两篇杰作再现。”

闻得此言，我深受感动。但也只能是太遗憾了，至少现在不可能马上再现。其实“再现”也没有必要，五十年可以算一段历史，过去了，即使再现当年的文章，也不会有当年的感觉了。但是，我又相信，应该会有有心人保留着这两篇大字报的油印稿，把我写的这篇回忆权当“寻物启事”，也许有一天这两篇大字报还会冒出来吧。

## 一、第一篇大字报《坚决平反 坚决平黑》

这篇大字报张贴于 1967 年 5 月 1 日。所谓“反”，就是把当时的党政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有学问的老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所谓“黑”，就是认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是一帮一帮的黑帮。《坚决平反 坚决平黑》，就是要把上述两类人的“反”和“黑”，坚决地、统统地平掉！该大字报之所以至今被人们记得，在交大的老人中流传着，就是因为这篇大字报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了不仅仅是被打倒的干部（包括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老师们的心里话，也获得了广大师生员工和普通老百姓的支持。因此，这篇大字报出来以后，并没有引起争论和受到批判，反而在社会上快速传播，我也依然是自由自在的。

大字报按当时流行的写法，以大段的毛主席语录为前导。我查了当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些话有：“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字报行文直截了当，没有多余的说明，全是干货。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一个点名，为交大当时已经被打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人平反。他们是：彭康校长，林星党委副书记，凌雨轩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吴镇东党委宣传部长，以及主管科研的陈大燮副校长和主管教学的张鸿副校长。

当时批判这些人，无论他们怎样申辩，都一概被斥之为“不老实”，不让他们申辩，接着就是呼喊口号把谁谁谁“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时候还用成瓶的黑墨汁从头顶倒到他们的身上。我当时对这种“审讯”极为反感，我在大字报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要允许他们申辩，要相信他们的话，不能一概否定他们的话。

有的人恶意整人，给这些老人挂很重的牌子，把他们当动物一样牵着走。我对这一类体罚或变相体罚极为反感。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话：反对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厄运降到了我的身上。1968 年 9 月分配后，我到了河北省怀来县沙城解放军 4627 部队（65 军 194 师 577 团）学一连，连长刘明月，四川人，指导员李增祥来自北京。

大约在 1969 年，学校工宣队来了两个人，他们是专门来向我调查这篇大字报的后台，要我揭发是谁指使的。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无数次地劝说我交代在我后边的人，他们启发引导我把矛头指向当时的党委办公室主任王玉璋，王玉璋的后边就是党委书记彭康校长。我诚实地告诉他们，没有后台，没有人指使我，确实是我自己写的。他们不相信。

如今，我已经 74 岁了，“文革”也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我不需要再说谎了：这篇大字报确实没有后台，确实是我自己一个人写的。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诚实的回答，他们说我“不老实”。我这个人特别珍惜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我反动，但绝不接受说我不老实。我极其愤怒，说了以下的一段话：“是的，我不老实，我告诉你们的是假的，真的，我知道，就（！）不告诉你们！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地主富农我够不上，历史反革命我够不上，坏分子右派分子够不上，叛徒特务走资派我更够不上。我能够上的，顶多就是现行反革命，你们回去查，查到了，你们把我揪回

去，爱批就批，爱斗就斗。”说完以后，我把桌子一拍，扬长而去。他们气昏了，就对坐在旁边的指导员和连长说，要把我带回学校。

后来，我听说，指导员回答他们：“（对我）就地批判。”没让他们带走我。（这一段，可向戴克刚同学求证，这些发生在背后的事，他应该知道的比我准确，我们同在一个连队）。

幸运的是，解放军不但没有批判我，反而让我在连队专门写作总结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从此，我下地干农活少了，经常叫我列席连队党支部会议，以便我了解连队思想工作的状况。

几十年后，我慢慢地老了，我常常想：当年解放军为什么保护我？我那么强硬地顶撞了工宣队，解放军不但不惩罚我，还保护了我。也许，作为军人，指导员也是有血性的人，也许在他的内心，他认为这小子有胆量。

在我的一生中，解放军在最紧急的关头救了我两次，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一生都感谢解放军！

## 二、第二篇大字报《科学纵横观》

1967 年进入冬天的日子，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我又突发奇想，写了《科学纵横观》。

回想起来，1）大学五年，家境极度贫困，还要特别注意跟反革命家庭划清界限，整整五年未回家（上海）。留校度假，时间多用于阅读，“饥不择食、囫囵吞枣”，没有阅读计划，兴趣尽在科学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问题。2）大学期间，同寝室同学相约每天分工阅读全国报纸，熄灯后“卧谈”交流阅报摘要。3）彭校长提倡“三活跃”（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我的“思想活跃、学习活跃”就是思考、猜想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的背景，例

如为什么牛顿会发现三定律，牛顿、莱布尼茨为什么会同时异地发明了微积分，等等。平时脑子里充满了各种问题，在那个时段如喷泉一般，我用了一句话：书写赶不上思想喷涌的速度，纵横了出来。

我现在还能硬回忆出来的，有以下几点。

1、我们学校图书馆中有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译本）这本书，大开本（相当于现在的 A4 纸），很旧也很厚，我浏览了这本书，原来牛顿力学最初并不是像我们学的教科书那样，而是对话。于是我就想，原始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没有读完这本书的全部，但只要捧起那本又厚又大的书，内心就激动，感受到神圣。

世界浑然一体，任何学科只能是某个层次、某个侧面、某个部分，到处都有局限性。随着思维方法的不断发展，非欧几何突破了在欧几里得空间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和运用；相对论突破了人们基于牛顿力学对宇宙和运动的理解和想象。

所以，思考不应该拘泥于某一学科某一知识某一边界，要从事物本身最核心的本质和最朴素的现象出发。

2、纵横观提到了电场强度的定义："单位电荷在电场中受到的力"。按照这个定义，电场强度 E 是测不准的，因为测出来的是测试的单位电荷的电场与被测电场共同形成的电场的电场强度。推而广之：任何传感器都是被测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感器本身一定会影响测量精度。

3、中学时我阅读过一篇题为《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及其实现法》，留下了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第五公设的质疑。后来又知道了还有各种各样的非欧几何。那个时代，几何学是中学生的基础知识，尤其是几何证明题和作图题，养成了我坚实的基础知识、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不拘一格的解题技巧，我兴致勃勃做了很多很多的几何题。既然第五公设（公理）可以另外构建，还有

什么也可以重新构建呢?

4、计算机正在初期，二极管是最基础的记忆运行元件。同时，那是一个电学发展被认为相对成熟、而磁学知识很少的时代，于是电学与磁学的此消彼长、兴衰互替，成为了一个话题。今天看来，我自己并没有做过任何有实用价值的事情。

5、医学上，那个时代是“尸体解剖”。我认为，人从生到死，在解剖学上必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尸体解剖不能反映活体的真实问题，应该发展“活体解剖”。今天，癌症诊断中的“活检”已经通用了。

6、那个时代，边缘科学正在发展中，例如生物物理学，在美国，听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多来自于物理学家，而中国物理学家很少，中国生物物理学的研究者多来自于生物学家。这样，东西方发展的生物物理学将会不同。

7、那个时代，认为每一个大脑细胞存储一个信息，细胞和细胞之间通过神经纤维相连，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网格，彼此一一对应。后来出现了战斗英雄麦贤得（他至今还活着）。麦贤得在大脑严重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清楚地坚持战斗。因此，我猜想大脑的每一个细胞不是只存储一个信息，而是多个信息；每一个信息也不是仅仅存储在一个大脑细胞中，而是同时存储在多个细胞中；他们之间不应该是一一对应，而是多对多的对应。还有，人在认识上的飞跃，应该在大脑脑细胞之间和神经纤维之间找到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印痕或证据。

8、有一个想法，我至今还“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现在计算机用的是二进位（0 和 1），我一直认为，可以找到一种三进位（–1，0，+1）存储元件，用于计算机的记忆和运算中，这将大大减少内存量，加快计算速度。当然，三进位将可能重构一个完全不同的计算机世界。但是，这个想法至今也没有实现。

9、我想象自己在科学的大海中游泳，在字里行间匍匐爬行，有时候要像孙悟空那样跃上各个科学技术的云端。

数理力学系力学专业的高等数学课上了三个学期（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学期），我几乎读遍了图书馆所有的高等数学及微积分学教材和习题集。直到今天还记得在阅读华罗庚《高等数学引论》时所感受到的快乐和激动。它和所有的高等数学教科书不同，开篇就从第一宇宙速度和第二宇宙速度讲起，真正感受到“开门见山”的突兀。他在序言中说，他的这本书既是急就章，也是拖沓篇。

《科学纵横观》就是急就章，写得很快，几乎是一笔挥就，没有次序，很乱，也没有修辞讲究。那时候真是轻薄得很。

感激校友们提起这件事，感慨良多。

1）本文的回忆，仅仅几个要点，大部分遗忘了，记错之处多多。我已经没有能力恢复当年的语境，只是还记得当年愣得很。

2）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地）回想起张鸿副校长在 1962 年 9 月初在草棚大礼堂新生开学典礼上的一句话：“即使你将来拿着放羊鞭子，也不要放弃你的专业。”我一直在内心深处谴责我没有始终坚持张鸿副校长对我们的教诲，尽管时代潮流把我们冲击得完全不能把握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但也庆幸自己一辈子忠诚于科学技术，没有旁骛其它。我不羞愧自己把一生献给了祖国，没有谋取私利。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讲：“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做到了，虽然很渺小。

退休十四年，我一直坚持在深圳培养工程师出身的在职硕士研究生，主要是为了兑现当年“为社会主义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自己对自己的承诺，我内心在坚持着“春蚕到死丝方尽”。

一切都在老化，迟钝了，也一直腾不出时间回忆。本来，我把想写的第一篇回忆定题为《感恩》，由于老同学们的督促，关于两篇大字报的回忆成为了第一篇。

小时候，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每学期班主任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都有“骄傲”的缺点，同学和老师告诫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分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分子”。我的这篇回忆，很有高抬自己的嫌疑，只能作为分母。我将无条件尊重别人的评价。

这两篇大字报，后来听说，前一篇被定性为“二月逆流在西北地区的代表作”，后一篇，在 1967 年底、1968 年初，被时任上海的领导人（第三把手）徐景贤评论为“在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下，不谈阶级斗争，而大谈什么科学技术，这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反映。”

关于科学纵横观回忆的补充说明：

我的记忆：《科学纵横观》原稿是写在一个练习本上（当年写作业的本子），这个本子在力学 21 班的同学中传阅着，我自己没有把《科学纵横观》写成大字报，应该是别的同学抄成大字报的。后来，我用心找过这个练习本，找不到了。当时还出了油印版（刻蜡纸，然后丝网油印）的《科学纵横观》。

我在前边提到“应该会有有心人保留着这两篇大字报的油印稿，把我写的这篇回忆权当‘寻物启事’，也许有一天会冒出来吧。”



**作者简介**

孔祥骝，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已退休）。1944年10月出生于湖南辰溪，籍贯山东兖州。

1962年入学西安交通大学力学21班，1984—1987年留学美国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制造工程），获博士学位（Ph.D），同年9月归国。

1989年起，出任西安交通大学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长期致力于教学、科研与高科技产业相结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 文革中難忘的二三事

■/ 李宣城

1966 年 8 月 16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派到大学的工作团。当天西安交大、西工大等院校师生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抗议 8 月 14 日至 16 日在省委门前围斗、殴打学生的暴行。陕西省委除了派人录像录音，准备“秋后算账”之外，再没有什么好的对策，学生与省委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于是，交大校运动队有人建议自费组织赴京反映情况，我也是成员之一。

我们 8 月 22 日到北京，当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我们也参加了，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那天晚上有雨，当清华文革筹委会负责人贺鹏飞（贺龙之子）和刘涛（刘少奇之女）給总理撑伞时，总理不要。台下齐声高



1966 年 8 月 22 日周总理在清华大学讲话

呼；打伞，打伞。总理说：“让我们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吧！”

人太多了，我们被挤在外面，为看清总理，我们递字条传给总理，总理看到后说；清华的同学，让西安交大和兰州大学的同学到前面来。清华的同学们还真的在人群中让出了一条小道，让我们挤到离总理仅有二十多米的地方，能那么近看到伟大的周总理，使我终身难忘。

后来，我们到人民日报社“告状”，受到了热情接待，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大照片，我们参观了人民日报社。

8 月 24 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接待了我们，详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給我们办了回西安的火车票。

这次活动是校运动队的同学在静坐现场自发自费组织的，校革委会成立后，还报销了我们赴京车票的费用。我们这次赴京告御状，是我校文革中的第一批。

我和运动队的几个同学赴京告状出车站时，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学生冲上来，大声问道，什么成份！我赶紧回答：店员。下一幕，吓坏了我，几个戴红袖章的学生在拖一个老太婆的头发，老人浑身是血，脸色煞白，披散着头发如同死人，躺在地下。我不敢看，但一路上还有几个同样躺在地上的人。后来才知道这是红卫兵要把地富反坏分子赶出北京。戴红袖章的是北京的红卫兵，大多由中学生中的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是著名的“红色恐怖队”——“联动”。这种情景实在令人难忘。

整个文革时期，我没有参加“红卫兵”，没有戴过红袖章。至今总有一个问题总缠绕着我，那时死了多少人！杀人者受到惩罚了吗？



**作者简介**

李宣诚，1946 年 5 月生。1963 年至 1968 年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应用物理专业。校篮球队主力队员，1966 年获国家篮球一级运动员称号。1978 年至 1980 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高校师资班进修。1981 年评工程师，1984 年赴意大利引进我国第一条旋装滤清器生产线。1987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89 年晋升高级工程师。



# 西安交大文革回憶點滴

■/ 王希平

## 前言

时过境迁，如今中国的许多年轻人，大多不知道 50 多年前的那场席卷全国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5.16 通知”的红头文件，在全国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6 月 1 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后，各地高校都进驻了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抓“反对文化革命”的“反动学生”。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打倒走资派的号角，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而撤离学校。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全国各单位各阶层都投入了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各级党政组织瘫痪，全国学生免费“革命串联”，以破四旧为名的“革命的打、砸、抢”席卷全国。之后有的农村发生了对地富反坏右及家属的规模性的侮辱和残杀，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对立两派的武斗，死伤无数。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又不知屈死、冤枉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伤亡之多、破坏之巨，世界罕见。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各省市的领导

大都已经离世作古，而和我一样当时还是意气风发、满腔热情的大学生，也都已成古稀之人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尊重历史、正视历史的，而不是歪曲、回避、掩盖历史。认真全面的从理论、政治、思想、制度、文化、历史等各个层面上分析、总结文革，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世界文明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 独树一帜的西安交大

西安交大的文革，跳不出全国文革的圈子。但是在各级组织瘫痪、只靠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来运动群众的年代，特别是 1967 年 3 月军队进校军训和 1968 年工宣队进校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各地文革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西安交大在全国却独树一枝，有显著的特点。

1、1966 年 6 月 6 日，西安交大率先在全国贴出质疑工作组进校后镇压学生的大字报，这就是著名的“六六事件”。8 月又率先冲出校门走向社会，成为西安地区最早的造反派，所以在以后成立的“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中被推举为主席单位。

2、虽然文革初期西安交大也出现过“誓死保卫校党委”的“保皇派”大字报，工作组进校后大张旗鼓抓“反动学生”，大肆批斗镇压对工作组提过意见和建议的人。但在工作组撤离后，“造反派”掌了权，交大却再没有出现“造反派”、“保皇派”对立的两派。全校师生员工只有一派的组织——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交大文革总会）。

3、1966 年 11、12 月期间，一些造反派对“保皇派”、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家属大打出手，以“破四旧”为名破坏国家财产，砸毁古迹文物，抢夺国家和私人财产。交大文革总会却带领全校师生在社会上坚决反对打、

砸、抢，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是反动口号。校内从未发生过打砸抢事件，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4、交大文革总会认为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反对把“保皇派”、“保守派”作为对立面，群众斗群众。不仅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坚持团结大多数，受到西安地区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5、应工总司筹备组的要求，交大文革总会派人前往协助筹备工作，使得西安地区出现了两大工人造反组织，而不是像其他地区形成两大对抗性组织，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抗组织的大规模武斗。

6、1966 年 10 月到 1967 年 3 月，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电）、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西北大学（西大）等学校造反派头头鼓动西安地区大部分大专院校，在西安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交大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运动，西大造反派打砸了交大宣传车。1966 年底“统指”在西安市召开大会批判“右倾投降主义”；“统指”夺权西安晚报后，又连续发文批判“交老右”。交大文革总会团结全校和西安各界群众，顶住了这股“反右倾”的暴风。1967 年 3 月，周总理接见西安大专院校代表，代表中央明确表态，西安的“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要团结不要分裂”，这场反“交老右”的暴风才嘎然止住。

7、1967 年夏秋季节全国各地武斗严重发生之际，西安也出现了武斗，有人还发出了“血洗交大”的叫嚣，交大革委会向全社会公告“交大不参加武斗”。革委会一方面组织护校队伍，加强校内的巡逻和保卫，同时对教师学生进行了有组织的保护性疏散。交大在文革中所有教室、实验室、工厂和设施全部完好无缺，无一人在武斗中伤亡，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8、在北京高校还在大打出手之际，全国各地高校一片混乱之时，西安交大已经全面复课。教授、系主任也全部上讲台，夜晚教室、实验室灯火通

明。约有 1500 余人的 1968 年毕业生在 1968 年暑期前全部安排到全国各地对口企业和研究所进行实习。

上述几点，在文革大混乱时期西安交大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全国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虽然我对中央上层的情况和文革的来龙去脉并不了解，但趁现在自己头脑尚清醒之时，将亲身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文革点滴记录下来，也许对年青的交大学子，对后人总结反思西安地区的文革会有用。

##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交大代表

1966 年文革时，我是西安交大数理系应用物理专业 31 班三年级的普通学生，不是校、系文革委员会的成员，但在 1967 年 2 月作为西安交大的代表，三次参加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

当时的背景是 1966 年 6 月 6 日，学校出现了质疑陕西省委进驻交大工作组的大字报，被省委工作组定性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在全校掀起了大抓“反动学生反革命”、“查上当，放包袱”的运动，对工程物理系学生李世英、动力系学生王永婷（女）、数理系学生刘维娜（女）等夜以继日的批判，致王永婷被逼自杀，李世英自杀被救活。工作组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被撤离后，学校重组文革组织，李世英被推举为交大文革总会主任，刘维娜为常委。

李世英认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不应该吧“誓死保卫校党委”、“誓死保卫西北局”和整过他的的师生打成“保皇派”，应当团结他们，反对群众斗群众，这一点通过公开辩论，被校文革总会和广大师生接受。

7月下旬8月初，交大学生首先走出校门宣传文化大革命。在陕西省委的策动下，交大学生在邮电大楼等多个单位被不明真相的职工作为“反动学生”殴打。学生们在寻求解决无门的情况下，8月16日交大数千学生冲出校门到陕西省委门前冒着酷暑静坐示威，要求解决问题。一日后，多个高校的一些师生也来支援交大。最后在中央干预下，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17日有一讲话，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18日晨到建国路讲话说当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并接见红卫兵。刘澜涛出面道歉并保证解决问题，学生们结束静坐。

在此之后，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交大为主席单位。

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座右铭下，社会上越左越革命。统指中“西派”学校推出了所谓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口号，交大文革总会认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口号是反动的，一直反对打砸抢。

1966年8至11月，在走向社会、革命串联时期，交大在西安地区各单位的基调都是反对群众斗群众、团结大多数，包括造反较迟的保守派。“统指”中西电、西工大、西大等校的头头，文革中一直较左，他们认为交大的团结大多数是“敌我不分”“阶级阵线不清”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社会上散布交大海外关系多（当时可是里通外国的大问题）、右派分子多、反动学术权威多，应该把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的主席位置从交大手中夺回来，先在“统指”反交大右倾，很快在西安召开群众大会，公开的大规模反对交大右倾，在西安晚报连篇刊登反“交老右”的文章，西大少数人还砸坏了交大的宣传车。

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西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交大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西安全市都处在反右倾和反反右倾的争斗中，这就是当时的情景。

1966 年 9 月以后，交大校内出现了许许多多自愿组织的的“战斗队”，大到几十人小到几个人。当时，我是校团委军体部干事兼校军体队团支部书记，工物系的郝兴汉（后改名郝卫东）是团支部委员，他参加了“红旗战斗队”，我将位于学生 1 宿舍 2 楼的校航模队活动室的钥匙给他，作为“红旗战斗队”的活动室。

那时，全国掀起了大串联，1966 年 12 月“红旗战斗队”大部分成员外出串联，留守的动力系学生党员是红旗战斗队的政委，他让我来当红旗战斗队的队长，我说只能当临时的，待串联的回来后，我就卸任。于是他召集开会，总共就六、七个人，通过了我担任“红旗战斗队”临时队长。

1967 年元月下旬的一天，吃过晚饭我去交大东二楼路过电工实验室旁边的教师休息室，里面的张国强老师叫我进去坐坐，教师休息室内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

我大一入校不久就认识了张国强，后来他毕业留校成了老师。文革中他是交大文革总会的宣传部长。和他刚说了几句话，只见文革总会的副主任沈荣水、副主任武登才、主任李世英、常委戴慕蓉、陈柏荣等先后来到休息室，总共约 10 人左右，这里面我只认识沈荣水（他和我同系）和张国强，李世英、武登才、戴慕蓉、陈柏荣我认得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其他的我名字也叫不出来。

我一看都是总会头头，认为他们要开会便起身要离开。沈、张叫住我说“不开会，你坐你坐。”我便坐在床的一个边角上听他们讲话。此时，这些头头们开始向主任李世英问话，有的说，反右倾愈演愈烈，人家大字报都贴到学校里来了，你是不是在外面真的说了不该说的话？真说了也不要紧，告诉我们，大家帮你出出主意。外面传言你和杨梦云（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冶院造反派筹委会一把手）走的比较近，是不是给她说了什么，外面说

你和杨梦云那个（指谈恋爱），有没有。

李世英个子不高，脸有点黑，不善言表，憨厚老实，有时有点倔。虽然他是主任一把手，但那时只是一个大二的 20 岁的学生，屋子里面他年龄最小。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追问下，他无奈的应付着。此时我才明白，总会担心李世英在外面不小心真说了什么，给交大带来被动，所以在这里“审问”他一下。问了二三十分钟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不知谁说了声散了吧，于是大家陆续离开，最后只剩下沈荣水、张国强和我。沈对我说：“王希平，你最好这两三天里能抽空到冶院去访问一下杨梦云，摸一下她的底”。我立即明白了，说，可以。

第二天我找到射击队动力系的一位同学，中午吃完饭后，认真的看了看西大造反派贴在交大的反右倾的大字报，拟了几个问题，便从交大北门出发（那时交大还没有南门），一起步行去冶院。步行约 30 分钟，进入冶院后门（北门，那时冶院只有南门和北门）。

我们先看了看冶院由北到南沿路的大字报，大约下午 3 点到了北院图书楼二楼冶院筹委会要求会见杨梦云，一位女同学对我说，杨正在开会，你们可能要等一个小时。随后带我们进入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没有沙发，只有几把椅子。

我们坐下约十多分钟，那个女同学带杨进来。以前，我从未见过杨梦云，她的个子大约 1 米 6 左右，长得漂亮清秀，好像是大二、大三的学生，比较稳重，一看就是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杨梦云大方的和我们握手问好，那个女同学出去，杨搬了把椅子坐在我们两个对面，便开始了访谈。我说我们是交大的学生，现在西安高校造反派在反交大的右倾，到底是怎么回事；交大的右倾具体表现在哪些事件上；社会上说交大李世英什么事都跟你说，李世英是不是说过什么右倾的话……等等。杨梦云谈话很随和也没有架子，她

对交大“六六”事件，对交大率先走向社会宣传文革的革命精神表示敬佩，她明确说李世英没有对她说过什么丧失原则的右倾的话，她认为现在也只是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她对反右倾的某些过激做法也感到不一定对，但希望交大一方也可以多听听对方的意见和观点。

和杨梦云的谈话进行了约 50 分钟后，便握手告别，她希望冶院和交大的革命师生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通过这次访谈，我感到杨梦云对交大还比较友好，也没有说出交大右倾的什么事实，难怪西电、西工大、西大的造反派头头说冶院是“右倾老二”。此时我似乎感到反右倾的背后，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回校后即向副主任沈荣水和总会复命了事。

一周后，大约是 1967 年元月 30 日或 31 日左右，晚上 9 点多钟，我从交大中心楼一楼走廊由东向西，走过一间门开着的房间，只见沈荣水面向门口、戴慕蓉侧向门口在交谈，我向他们挥挥手走过，沈荣水追出来叫住我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能不能去一趟北京。我说可以，什么时候，干什么去。他讲，现在，别的不要问。我说总得回宿舍拿上毛巾牙具吧。他说，跑步去拿，30 分钟后在中心楼门口集合。我跑步回宿舍拿了牙具和一件破棉衣，又到学生一宿舍告诉了红旗战斗队的政委。

当我满身大汗的跑到中心楼门口时，只见一辆三轮摩托车已经停在那里，开车的是校摩托车队的刘震宇，坐在车上的人我都不认识。沈荣水递给我两个冷馒头介绍说，这是总会秘书吴翼健（坐在驾驶员后座上），他是总会组织部部长郑叔良（坐在车斗里），你听他指挥。

我一挤进船斗里，摩托车就开动了。1 月底的冬天，一路上寒风呼呼，冻得张不开嘴。西安铁路局和交大的关系一直都很好，那时铁路局是造反派“西铁联”掌权，交大和声望很高的西铁联等造反组织，正紧锣密鼓的筹备成立 20 万人的“工总司”。

摩托车通过西安站旁边的一个铁门，径直开上一站台。站台上停着西安到北京的列车，车上已经挤满了串联的红卫兵，大多数车门和车窗已经关闭，有一两个开着的车窗还有人爬着上车，有两个没有关门的车厢下一大堆人都在挤着上车。“西铁联”的什么人立即叫来了七八个身强力壮的车站工作人员，从人堆里扒开一条路，从后边把我们推上了车。我们一上车乘务员就关上了门，此时我还不知道去北京干什么。晚 11 点多车开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车已经开出好几个站，我们三人才挤到稍微松点的车中间坐到车厢地下。肚子早已咕咕叫了，我拿出冷馒头啃着，郑叔良才告诉我赴京的任务。

原来是这一天“统指办”收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要求“统指”派代表赴京，中央文革小组将于某日下午 3 点钟，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统指联络站”听取西安地区文化革命情况的汇报。“统指”办公室随即通知各高校头头开会，商议派代表赴京汇报一事。按理来说，在西安大规模反交大右倾之时，交大是分歧的一方又是“统指”的主席单位，理应有交大的代表。但西电、西大的头头下面早已串通好，以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为名，强行确定了西电、西大、西医、冶院等院校派出代表赴京汇报，唯独排除交大派代表赴京。于是，当晚交大文革总会决定自己派代表赴京汇报，组织部长郑叔良主动请缨，秘书吴翼健同行。此时，我刚好在交大中心楼碰到副主任沈荣水、常委戴慕蓉。西电、西大头头反右倾最为积极，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头头杨梦云和交大李世英接触最多，他们把杨作为反交老右的重磅炸弹，而我一周前刚刚访谈过杨梦云，于是临时决定让我一同赴京。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想方设法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汇报会场，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交大的意见和观点。

经过十多个小时坐在车厢地下迷迷糊糊的颠簸，第二天到了位于高教部的交大文革总会驻京联络处。联络处共有八、九个人，主任是交大的研

究生贺相。我们三人吃了点东西稍作休息，便马上召开全体会议。郑叔良说明了来意，贺相要求大家全力配合学校代表的汇报工作。那时十分民主，所有问题、方案都是一起讨论，最后郑叔良拍板定下来，大家都全力执行。郑叔良认为汇报必须有书面材料，要能全面概括出西安地区文化革命的情况和发生的重要事件，写明当前反右倾中我们和对方的观点及分歧。大家认真讨论了材料中应该写出的内容，吴翼健立刻按1、2、3一条条起草。两小时后拿出第一稿，大家逐条讨论后，吴又开始改写第二稿。晚上我已睡了一个小觉，半夜睁开眼一看，郑叔良、贺相、吴翼健三人还在灯下逐字改定材料。

那时没有复印机，贺相派人买来复写纸，一次只能用手复写4页。驻京办每人分发了两页草稿，要求复写字体大、工整。很快十几页的汇报材料就准备好了好几份。然后我们讨论如何进入汇报会场。郑叔良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去早了，不排除“统指”驻京办可能阻止我们进入汇报现场，去迟了汇报已经开始，最好能先于听汇报的领导5分钟到达，这样当着中央文革领导的面，他们也很难撵我们。大家讨论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了三个不同的对应方案。

到京第二天下午2:30分，我们按计划提前到达电影学院门口，等了一会，2:45进入北京电影学院，2:55走到“统指驻京联络站”。它设在一间教室里，桌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着被褥。郑、吴、贺、王依次进入。西安主要高校的代表都在里面，多是各校文革组织的成员，由于只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统指”驻京办的一般汇报，西安各高校的一把手大多没有来，只有西大头头高XX和被拉去的冶院头头杨梦云是一把手，也许高XX以为汇报中排除了交大，他就可以领导“统指”了。郑、吴、贺大多认得他们，上前握手打招呼；而我除了一周前去访谈过的西安冶院的一把手杨梦云外，其他人都不

认识。我和杨握手时，她吃惊的看着我，也许她在想一周前访谈她的这位交大学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和杨还没有说一句话，中央文革领导已到。来的是两位军人，一位40余岁，一位只有20来岁。西大的高XX立即迎上去，带着他们进入对面的教室，于是大家陆续进入。这是一个只能坐十余人的小教室，比交大的小教室还要小，也许是电影学院多是十多人的小班吧。讲台的一边放了一个课桌，两位军人坐到讲台桌子后面的凳子上，各校代表像上课一样也都坐下。说来也巧，杨梦云和我最后进入教室，她一看座满了就搬了个凳子在前面靠窗户一边的讲台下面背着讲台坐下，我也搬个凳子在第一排课桌前面对着讲台坐下，与她面对面相距只有1米。

不知是商议好的还是当仁不让，西大高XX站到了讲台上。军人没有发言只说开始吧，他便主持起了汇报会。他说，大家要举手，允许后才能发言，然后他就进行了主旨发言。在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最高指示以后，便开始了批判交大右倾机会主义，给交大扣了一些“敌我不分”，“混淆阶级阵线、投降主义”等帽子。

他在让五、六个西安高校代表发言后，才让一直举手的交大郑叔良发言。郑简略谈了西安文革的大致情况以及交大的观点。

各个代表发言中，只有西大代表的发言是全力的反右倾，给交大扣帽子，其他学校代表汇报了西安和他们学校的情况，只说到要防止右倾倾向。所有发言没有列出一例交大右倾的实例。

有意思的是坐在我对面的冶院头头杨梦云一直不举手，主持汇报会的西大高XX几次示意杨发言，有一次走到杨旁边推了推杨说“你说嘛，你说嘛。”杨梦云竟无动于衷，整个汇报会一言不发。而我离讲台近在咫尺，一

直举手，他却视而不见，就是不让我发言，气得我恼火。

转眼5点到了，军人说就到这里吧。于是高XX宣布汇报会到此结束，下面请首长作指示。年纪大的军人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我刚刚调到中央文革任西北组副组长，对西安地区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请你们来听听意见，我会把大家的意见向领导汇报。"说完离开课桌准备离开。我一看此景立即站起来，手一挥大声说："等等，我只说一句话，对于刚才的一些发言，交大有不同的看法。交大的观点、意见和西安地区的情况都在这份汇报材料里，请首长过目"。然后一步上前，将我手中的材料递给这位西北组副组长。这是这次汇报会上唯一送上去的书面材料。我想其他学校的代表也是仓促来京，根本没有时间写出系统的汇报材料；如不是一把手，一来没有时间写，二来向中央递书面材料还要请示学校主要头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圆满完成了总会交给的赴京汇报的任务，也使我体会到了郑叔良的准确分析判断，高超的组织能力，群策群力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也是我们汇报代表和贺相领导的交大驻京联络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连夜奋战的结果。

睡了个懒觉，一天无事，我们都以为赴京汇报一事已经结束，约好第二天去天安门看看便打道回府，这是1966年2月3日。

谁知2月4日陈毅秘书来电话说，2月5日上午陈毅副总理将在中南海接见交大代表。很快确定了郑叔良、吴翼健、王希平、贺相和另外5名驻京办人员，共9人参加。大家又忙了起来，又重新充实复写了汇报材料，郑叔良为主发言人，吴翼健、王希平为副发言人，其他人补充。

2月5日上午，我们准时到达中南海北门，和警卫的解放军通报后，他讲了纪律，不能摄影不能录音，要求我们排成一纵队，随他进入。中南海是国家领导圣地，又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接见，我们每个人都是又兴奋又紧张，所以几人推推搡搡谁也不愿意站在第一位。

此时郑叔良说："王希平你站最前面。"我想第一个就第一个，就站到前面，郑叔良是第四个。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正对北门的大道跟着解放军进入了中南海。中南海像个公园一样，绿树成荫，非常干净漂亮。走了不远向右拐了个弯来到一座不大的中式房子面前。解放军说你们进去吧，他却没有进去。

我推开大门，刚迈进半步，只见身穿白衬衣黑长裤和中式黑布鞋的陈老总从里面向我走来。我一脚屋内一脚屋外一下子惊讶的定在那里，我身后的同学推我一把说"走呀你"，我才猛回过神来，大步迎上陈总，双手握住陈总的手。

房子里有一个长方形的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我们先进去的就依次沿着桌子的座位站着，陈老总和每个人握手后，最后走到会议桌的端面并示意大家坐下，我成了距离陈总最近的一位，只有不到一臂之遥。

陈总讲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犯过的"打倒一切"的错误，要"准许犯错误，准许改正错误。"对革命干部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西安高校的两派都要多做自我批评，等等。陈总说已经看过我们送来的材料。此时我才体会到，我们一到北京，郑叔良就全力组织日夜兼程的拿出一份全面的书面汇报材料的决定是多么重要和正确。郑叔良又递给陈总一份我们新改写补充的材料，详细介绍了西安造反派的分歧和反右倾的来历。此时我才想到应该让郑叔良坐到我的位子上，但面对陈总也不敢造次。吴翼健、我、贺相及其他人都做了补充发言。对于西安的反右倾，陈总始终没有任何的表态，说谁对谁错。

这时候接见已经进行了 40 多分钟，陈总看了看表。我想可能快结束了，于是写了一个小条子"是否给陈总献上交大红卫兵袖章"传给郑叔良。郑回复"你办"。当陈总站起来和大家告别时，我从手臂上卸下交大红卫兵袖

章，走到陈总面前说“我代表交大革命师生员工给陈总献上交大红卫兵袖章”，说完便给陈总戴到手臂上。此时陈总爽朗的哈哈大笑说：“好！交大，革命的交大！”然后进入边门，离开了这间房间。

回到高教部交大驻京联络处后，郑叔良宣布纪律，陈总讲话没有整理出来以前，谁也不许向学校和外面透露。晚上，郑、吴、王、贺四人到高教部打长途向学校总会头头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汇报陈总接见情况。

郑主要讲了我们汇报的内容，然后吴、贺各讲了四五分钟，最后把电话给我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我接电话时，那一头是总会的一个秘书，他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他一直在说，王希平，把陈总的讲话给透露一点吗。刚好电话机在这个房间的一个角上，郑、吴、贺讲完了电话在较远的一边交谈，我经不住他再三央求，就在电话上小声说告诉他，陈总说“好！交大，革命的交大！”结果第二天西安大字报满天飞，郑叔良知道了还在交大驻京联络处追问“谁讲的，谁给学校讲的”，大家面面相觑。我想反正是事实迟早要知道，也没有吭气。

2 月 6 日一天无事，就又提起去天安门的事，谁知 7 日周总理秘书来电话，要李世英来京汇报，郑随即电话学校总会。文革总会决定副主任武登才、沈荣水在学校主持工作，组织筹备工总司成立大会；主任李世英、常委戴慕蓉、宣传部长张国强赴京汇报。

2 月 9 日李、戴、张到京，2 月 10 日总理秘书到交大驻京联络处通知，周总理 2 月 11 日在中南海接见西安大专院校代表，交大李世英、戴慕蓉、郑叔良、张国强、吴翼健、王希平、贺相 7 人参加接见。

2 月 11 日下午 2 点多钟，我们 7 人依次排队从中南海北门进入，来到一座较大的中式房子。房间大小和中学的教室差不多，进门是三排椅子对着两

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占了房间右边的三分之二，左边的三分之一空着，正对桌子的椅子上已经坐满先来到的西安其他高校的代表，靠近房间的右面的边墙还有一排椅子空着，旁边有侧门。我们依次坐到边墙椅子上。

2 点 30 分边门打开，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进来，先和离边门最近的交大代表一一握手。当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时，慈祥的用那总是弯曲的右手有力的握着我的手，问了姓名、学习专业、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每一个人几乎问的都是这几个问题。当周总理和陈总人座时已经过去十多分钟。

总理和陈总并没有让大家一一汇报西安地区的情况，而是直接问了西安某单位发生的具体的事情。坐在周总理右前方的西大头头高 XX 立即举手发言，高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说上两句，就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总理问第三个问题时，高 XX 又举手发言，又是言不及题的说“谁是我们的敌人……”批判右倾。总理十分严肃严厉地对着他和大家说：“请你们来是要了解西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要一人不快，搞得大家不欢”。此后，高 XX 再也没有举手发言。

周总理问到我们，你们是交大哪个组织，李世英、郑叔良答道：“交大只有一个组织，交大文革委员会”。总理说：“啊，交大就一个组织，在全国可是独树一帜啊”。周总理一个个的问题都是西安及周边县、市具体时间、地点发生的具体事件，只有三分之二左右的问题有人举手回答，交大代表戴慕蓉对许多问题都做了详尽回答。一个多小时后接见结束，总理没有明确指出反右倾的两派谁对谁错，但却说了团结起来打倒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话。

第二天 2 月 12 日下午总理秘书来到交大驻京办，告诉我们 2 月 13 日下午 4 时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交大代表，李世英、戴慕蓉、郑叔良、张国强、吴翼健、王希平、贺相 7 人参加。我们就又忙了起来，开会讨论如何汇报。

以前的材料中反右倾的来历及我们的观点已经有了，周总理肯定已经看过。根据昨天总理接见双方代表中，大家没有回答出来的问题和回答不全面的问题，立即电话学校予以了解落实；总理没有问到的西安及周边县、市发生的我们又认为需要汇报的事情、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列出。汇报材料仍是按1、2、3……，一条一件事写的，而每一条都有另外单独的一页纸，详细说明了这件事和涉及的群众组织的来龙去脉。

由于是单独接见交大代表，考虑可能问到反右倾的事，讨论了我们怎么回答。回答内容仍是吴翼健按大家的讨论起草，修改后，由驻京联络处的同志们复写。大家决定李世英、戴慕蓉主谈，郑叔良、张国强副谈，吴翼健、贺相补充；王希平负责所有材料，随时将汇报问题的单页材料找出来递交周总理，并补充汇报。

2月13日下午3点40分，我们进入中南海，来到一个中式房屋小房间等候，正中桌子四周有几个椅子，进门左手有个厕所间，右手有个边门。三十分钟后总理秘书来说，总理在接见外宾，你们的接见要往后拖一会。冬天的下午5点天开始黑了下来，5点半总理秘书又来了，说周总理还在接见外宾，只要一结束，马上接见你们。总理让我给你们一人一包饼干先垫点肚子。周总理日理万机日夜操劳，总理没有吃饭，却想到给我们送来饼干，大家都十分感动，心里却又不是滋味，没有一个人打开饼干吃。我们对周总理秘书说，无论如何请总理先吃饭，可以把接见我们的时间缩短。总理秘书说，我跟总理这么多年，我知道劝告总理先吃饭是没有用的。晚6点左右，总理秘书让我们从边门进入了一个小套间。小套间里有一个小点的长方形会议桌，每一边放了三把椅子，会议桌的一端放了两把椅子，另一端一把椅子。我坐到了会议桌一端的椅子上，我的右手一边是李世英、戴慕蓉、吴翼健，左边是郑叔良、张国强、贺相，李世英的背后又是一个小门。

刚坐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小门进来，我们起立鼓掌，总理和陈总坐到会议桌一端的两把椅子上，我正对着总理陈总坐下。我们把新准备的材料交给了总理和陈总。周总理先让李世英较详细的谈了他的“三句半”和西安反右倾的情况，然后又是问一个个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代表都发了言，只要总理问的事情我们有单页的材料，我都及时递给总理。总理问的都十分具体详细，又是只有大约百分之七十的问题我们能回答出来。戴慕蓉是学校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思考问题细致，记忆力很强，又负责校外联络的工作，故在回答总理提出的问题时，好些问题都能做具体、详尽的回答，并提出我们的看法，难怪总理在之后接见西安大专院校代表时说：“戴慕蓉是交大的外交部长”。

在言谈之中周总理谈到了“要团结不要分裂”、“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是对的。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总理秘书给总理拿了饼干和一杯水说吃点吧，周总理吃了两口饼干喝了点水，我们心里都酸酸的。周总理、陈总微笑着和我们挥挥手告别，就又接着去会见外宾了。周总理鞠躬尽瘁日夜操劳为人民的伟大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出了中南海已经晚上 8 点半了，我们几天绷紧的心情放松了许多，肚子也饿了。找了个路边馄饨摊，张国强说戴慕蓉请客，戴说请就请，我粮票不够你们得交粮票。每人两碗馄饨，各自付粮票，戴付钱，记得是每碗一毛二分钱二两粮票。这时候已经快晚上 9 点半了。

回到高教部我们立刻和在校的武登才、沈荣水副主任通话。武告诉我们，一切组织准备工作就绪工总司即日成立。打完电话，张国强建议李世英应该约一下冶院的头头杨梦云，单独谈谈，因为在向中央文革西北组的汇报会上和 2 月 11 日总理接见双方代表时，杨梦云没有说一句不利于交大或反右

倾的话。李应该代表交大向她和冶院表示感谢，并表达希望今后两校相互学习、互相支持的意向。大家一想也对，应该大度一些。于是李拨通了北京电影学院“统指”驻京联络站的电话，杨梦云电话中和李商定第二天晚 6 点 30 分在电影学院门口会面。谁知第二天李世英喉咙沙哑、头痛，下午有点发烧了，也许是几天来的日夜紧张劳累引起的。去不去会面呢？天气下着小雨，冷冷的。张国强说，王希平你代表李世英去。我说我不去，我又不是总会的委员。张说：“你刚刚访谈过杨梦云，几次我们汇报的材料你也熟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回旋余地大，你最合适了”，郑叔良、戴慕蓉没有异议，李世英也同意。这时已经下午 5 点多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6 点半我准时来到北京电影学院门口，杨梦云已经在小雨中打着伞在校门外等着。我代表李世英表示了抱歉并说明了情况，杨表现十分大度，没有一点不快。天黑又下着寒冷的毛毛细雨，路上行人很少，我和杨梦云便沿着北京电影学院门外街道的人行道压开了马路。主要还是围绕西安地区反右倾所发生的具体事件，边走边谈。只谈了两三件事，我已经感觉到，虽然她和我年龄相仿，大约 22 岁左右吧，但她是冶院一把手，了解西安地区的事情比我多，每件事都和她辩论不是我的强项。由于西安发生的主要事件在汇报中我们都准备了单页材料，毕竟这些天我都反复熟悉了，有些事情杨可能并不了解详情，一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抓住机会反驳一下。这样反复两三次，杨梦云已经知道她所听到的有一些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她也表示交大的一些做法是对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已经走了几个来回，交谈中感觉到杨梦云谈话还是比较直爽、真诚的，对交大也很友好，最后都表示今后交大、冶院要多交换意见相互支持。

2 月中旬我们回到了学校后，红旗战斗队去串联的陆续回到学校，我的临时队长卸任，退出了该战斗队，然后去串联了。

2 月底北京来电又要接见西安双方代表，张国强找我无果，我没有参加 3

月的接见。3 月 1 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西安双方代表，3 月 2 日下午周总理接见西安造反派双方代表，代表中央明确表态，西安的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至此，西安地区连续三四个月的大规模反对交大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 交大不参加武斗

1967 年 6、7 月份，在“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动下，全国各地出现了两派都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武斗，大规模的武斗甚至是机枪、大炮齐上，死伤无数。

1967 年 8 月 5 日，西安发生了“八五静坐”事件，交大学生和部分“工总司”群众向支左委员会静坐抗议，表示对 21 军军长胡炜有意支持一派打压一派做法的不满。

8 月上旬“工联和”“统指”中的一些人从武装部、公安局军火库中大肆抢劫枪支弹药，十分顺手。“工联”与“工总司”两派之间的小型武斗不时发生。

8 月中下旬，“统指”、“工联”中的部分人员开始对“工总司”的群众、干部有组织的武装进攻，在西郊造成“工总司”群众伤亡惨案。之后，还发生了向劳动技校进攻，火烧技校的事件。

9 月 2 日，“统指”的西工大、西电和“工联”调动 3000 多名武装人员，包围了西郊“工总司”的几个单位，在“工总司”群众外撤时猛烈扫射，造成双方群众 50 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而西工大派学生去支援，由于通讯联络不够，又是夜晚，发生了十多名西工大学生被自己一派开枪伤亡的惨案。

此时，“工联”和“统指”中的部分人已开始密谋对交大的武装进攻。他们进入交大侦察绘制道路地图；“工联”人员开车撞坏交大校门，摔坏交大校牌，装甲兵学院甚至开着坦克架着机枪，在交大校门周围武装示威，扬言要“进攻交大”，“血洗交大”；同时还在交大对面的兴庆公园和附近的计量局等制高点架设机枪，学校处于极为不利的武斗威胁之中。

学校的主要决策者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等人召开革委会决定立即成立护校队，加强了日夜武装巡逻，对实验室和重要部门封门并专人值守。向全社会发出了“交大不参加武斗”的公告，指出交大承担了许多国家和国防科工委的重要尖端科研课题，如有人胆敢入侵破坏，后果自负。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防范万一，对师生进行了有组织的疏散。

文革武斗期间，交大没有发生一件打砸抢和武斗事件，没有一人在武斗中伤亡。经过文革浩劫，交大所有实验、教学设施和校园财物均保持完好、无一损坏，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 校长彭康之死

1966 年 8 月中旬很短一个时期里，学校曾发生过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游街、戴高帽的现象，随着文革总会的成立，此类现象被很快制止了。但是像全国高校一样，交大也成立了许许多多的战斗队，个别战斗队成立时只接受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参加，这类战斗队的行动也比较过激，交大的“抗大战校”由多个战斗队组成，有的就比较左。

1968 年 3 月 28 日，“抗大战校”的学生，在校革委会主要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拉着年高体弱的老校长兼书记彭康在校内游斗，老校长支持

不住，就再未醒来而过世，这是彭康校长致死的直接原因。

早在 1966 年 7 月，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为首的工作团就宣布彭康是“叛徒”、“黑帮分子”、“走资派”，依据是彭康“入狱变节”，“拥护蒋委员长”。工作团撤离后，校文革总会组织部长郑叔良从档案中发现，国共合作时期，彭康出狱的陈述中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且中央早已有定论，觉得彭康不是“叛徒”。郑将此事告知总会主任李世英，此事不知怎么被传到了“统指”，便成了“统指”抓住交大右倾包庇走资派的证据。由于彭康是省委定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在全国“打倒走资派”的喊声中，校文革总会也不可能给彭康摘帽平反，这是深层原因。

更要命的是，当时刘少奇已被批判。刘少奇任华北局书记时，彭康任华北局宣传部长和刘住同院，彭康的爱人王琏给刘少奇整理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央文革掌握生杀大权的康生又放话“彭康什么时候斗都没有错”，这也是彭康校长被斗而死的根本原因。

1968 年 3 月 28 日彭校长过世时，李世英不在西安而是在北京汇报工作。“抗大战校”游斗彭康的战斗队只是向学校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打个招呼说是要批斗“走资派”、“叛徒”彭康，并未说清要游斗。而当时在校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武登才、沈荣水并不知情。

三十年后的 1999 年，我见到李世英谈起彭校长之死时，李世英说：“造反派掌权的一年多里，交大沒有游斗过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却没想到会出现游斗彭校长致死的事件，真是交大的一大损失。”

2016 年交大 120 周年校庆，碰巧我和李世英在交大招待所同住一房间三天，长谈之中又谈到彭康校长，李对我说：“彭校长为交大的西迁和建设做了很大贡献，在师生中威信很高。文化革命中彭康过世，太可惜了。”言表

之中，尽显对老校长的尊敬、爱戴、怀念和惋惜。

彭康之死交大革委会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是四人帮倒台后，将彭康之死算到了革委会李世英的头上也确实冤枉。李世英被不公正的取消党籍，撤销职务，降级并到一线当工人多年。直至退休，一直被内部监视，直到他2017 年含着不平去世。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四十一年了。

## 复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的社论一发表，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戴慕蓉、张国强、李能贵等人日夜召开各系、专业会议，布置复课。大约一周左右，交大已全面复课，晚上图书馆、教室、实验室灯火通明。此时北京高校正打得不可开交，全国大多学校还乱成一团。

以我所在的数理系应用物理 31 班为例，为了赶回耽误的时间，上午下午都排满了各门课程，而做实验、答疑大多排在晚上。系主任屠善洁、总支书记罗普生、著名教授赵富鑫、应用物理专业支部书记周犹默、教授刘恩科、讲师李中江都给我们上过课，理论物理全部是赵富鑫讲授的。工业电子学、理论物理、半导体基础、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中级物理实验、压电陶瓷等课程，都是复课闹革命时日夜兼程讲授的。

1968 年 6 月，学校有的专业已经去工厂研究所毕业实习了。我和班文革组长张年福、袁绥华商议后，去找了革委会的戴慕蓉、张国强、李能贵反映实习和毕业分配的问题。戴、张建议我以学校名义给高教部打个报告，让我立即赴京，请高教部协助解决，系主任屠善洁、书记罗晋生也十分支持。于是，我写了报告，经戴、张修改批准，张国强给我开了校革委会的介绍信，应物专业老师写了条子，让我找已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当老师的学生解决住宿问题。

此时，高教部蒋南翔部长早已靠边站，几经努力终于找到当时主持高教部工作的黄辛白副部长，给他反映了希望协助安排实习和对口毕业分配的要求。黄辛白说高教部还乱得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他将会把报告转给相关司局，尽力协助解决。交大 1968 年毕业生约 1500 余人几十个专业，全部安排到了全国相关专业的工厂、研究所实习，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我们全班同学分别到了洛阳、南京、苏州、无锡等地进行了毕业实习。

## 后记

当年交大文革委员会中的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陈柏荣、戴慕蓉、郑叔良、王春杰等和文革总会全体委员，他们作风正派，群众威信高，亲和力强，凡事和群众商量。

特别在 1966 年 8 月到 1967 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各级组织基本瘫痪，社会复杂混乱、险像丛生的情况下，以他们的道德、良心、信仰、激情，始终坚持团结大多数，使交大师生从未分裂，顶住了“反右倾”的巨大压力，协助组织成立了 2O 余万人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提出了“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的鲜明口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了师生员工的安全和学校财产；迅速部署了全面复课，夜以继日的安排了 1968 届毕业生的专业实习……等各项作为，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文化革命中他们为交大，为交大师生员工无私地燃烧了青春，为交大和西安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会记住他们，交大当年的学子同样也会记住他们。



## 作者简介

王希平，河南清丰县人，数理系应用物理31班学生，参加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多次接见。文革后在河南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工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櫻花樹梢上的教室

## ——我與“交大六六事件”中的“應物 31 郵局事件”

■/ 梁蕴綿

前日无事，重看去年春天在母校交大所拍的录像。有一幅画面使我久久凝视、思绪万千。那是专门拍摄的一棵最为繁茂的樱花树梢的画面。当时，只因这棵树梢的樱花团团紧簇、色彩嫣红而并未留意周围的景观；然前日仔细看时，却发现这一团花絮的上面，正是我三十多年前读书的数理系应物 31 班教室的三扇窗户，它位于这座楼的三层中部。



梁蕴绵 1965 年 8 月在交大大操场

31 年前的 1966 年初夏，正当我们应物 31 班 45 名学子在这间教室里潜心读书时，猛不防迎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也正是在这间教室里，我被打成了反革命！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聂元梓《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是一篇意义非凡的大字报，毛主

席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校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字报全文，大家立即认真学习，热烈讨论，分析西北、陕西和全国的革命形势。随着对这张大字报的深入学习，年轻的学生们愈来愈激动，觉得交大校领导乃至西北局、陕西省委都被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揭露批判修正主义。

交大沸腾了，上课秩序也不正常了。学生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教室再也不是潜心读书之地，校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只几天功夫，“炮轰交大党委”等大字报就布满校园，矛头直指以校长彭康为首的校党委。同时也出现了“誓死保卫校党委”“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等大字报，还有同学到西北局、陕西省委反映情况，要求大字报上街，到北京上访等。

面对学生的一系列行动，陕西省委于 6 月 3 日紧急派出了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率领的交大工作组。工作组一进校，立即组织学生学习，要大家相信西北局，相信陕西省委，相信交大党委能够领导好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的行径，使学生们的情绪愈发激动，大家更加坚信交大、西北局、陕西省委都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革命变色，防止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学生们或单人行动，或三五成群，或全班集体行动，议论、集会、讲演；还有不少学生走出校门，上大街，进工厂，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动员市民工人一起行动，揭发批判西北局、陕西省、西安市出现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由于不少市民工人和学生的观点不同，故学生与市民工人相互辨论、学生被围攻挨打的事时有发生。

6 月 6 日清晨，行政楼前游泳池边人头攒动。原来，大家都在观看李世英等同学刚贴出的“工作组的十大阴谋”“工作组的十大罪状”等大字报。一时间，声讨工作团、赶走工作组的呼声响彻校园。认为西北局、陕西省委和交大革命形势危急，给中央写信发电报、上街贴大字报、到工厂讲演的班

级和学生越来越多，还有学生要上街游行，赴京面见中央领导等。我们应物31班同学也都热血沸腾，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小课教室。大家一致认为，西北地区形势危急，西北局、陕西省委不但出了赫鲁晓夫，而且对中央封锁消息，必须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让党中央毛主席派人来领导革命。于是，全班同学在班文革小组的领导下，一致决定，立即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

由于我是交大广播台和校刊的记者编辑，故班委会决定由我执笔，即刻起草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我当即动笔，根据大家的意见快速写好了信，随即向全班同学宣读，征求意见，稍作修改后再由几位同学分头抄写。由于当时又得知了邮局扣压学生信件的消息，故又写了一份“强烈抗议西安邮局扣押交大师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和信件”的大字报并决定贴到钟楼邮局，呼吁邮局职工同志们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在信和大字报上，全班45位同学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许多工人、居民并不理解学生的革命行动，经常与学生发生辩论、冲突甚至殴打学生。鉴于这种形势，为了防止我们的信再被邮局扣压，也为了防止遭群众殴打，全班同学共同商议、出谋划策，制定了周全的行动方案。我们如同地下党员搞地下活动一样，把信抄写了十几封，地址没有直接写北京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而是写着1965年解放军总参谋部几位和我们一起搞社教的军官的地址，请他们收到后转交中央。这是我们自以为聪明的、万无一失的计策。

一切准备就绪，才由几位男生兵分3路行动，其中两路分别奔向小寨和纺织城邮局投信，还让他们不要集中投到一个信箱，而是要一路上见邮箱就投，分散投递。另一路由身材高大的郗友农、阎保定和袁绥华奔向钟楼邮局张贴大字报。留在校内的同学都担心着外出同学的安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归来。果然不出所料，郗友农、阎保定和袁绥华一到钟楼邮局就遭到了工人的围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继而被殴打，很晚才步履蹒跚衣衫褴褛地回到了学校，我们几个女生都十分难过。所幸另外两路平安无事，秘密而顺利地将信投了出去。我们松了口气，庆幸中央一定能看到我们的信，一定会派人来挽救即将变色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了。但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些行动早就被陕西省委和西北局的当权派掌握了，我们的秘密活动早就被暗中盯稍了，发出的信一封不漏的全部被拦截了，信根本就没出邮局！

面对学生们愈来愈高的激情和愈来愈广泛的行动，陕西省委紧急行动，增派工作组人员，把省委工作组升格为工作团，加大控制。他们把交大 6 月 6 日发生的事定性为‘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我班给中央写信也就成了闻名全国的‘交大六六事件’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应物 31 邮局事件”。随后，工作组在全校大力展开了对‘六六事件’的揭发批判，大讲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特别是交大阶级斗争形势的特殊性；讲交大工农子弟较少，剥削阶级子弟比重很大，反动势力历来十分猖獗，阶级斗争盖子如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斗争形势尤其严峻。号召广大师生擦亮眼睛，看清形势，不受反革命势力的操纵、蛊惑和利用，坚决揭开交大阶级斗争盖子，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坚决打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

顷刻之间，形势急转直下，校园里每个班都由原来大力揭发西北局、陕西转省委、校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变成了同学间的互相揭发、相互批判。我班的形势也与几天前截然不同，课堂变成了战场，教室四面墙壁都贴上了“坚决揭开应物 31 的阶级斗争盖子！”“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挖出潜藏最深的阶级敌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大标语。几天前还共同行动团结一致如铁桶一般的同班同学，如今个个紧绷着脸，互不搭言且彼此警惕。到邮局发信贴大字报的阎保定、郗友农和袁绥华同学最先遭到了

批判，他们多次作检查，多次被批斗。

随着揭发批判的深入，揭盖子挖根源成了问题的核心。说邮局事件不仅是学生单纯的冲动，而是背后有人操纵的反革命事件，是潜藏的阶级敌人利用学生向党发起的猖狂进攻。气氛更加紧张森严了。显然，矛头已渐渐指向了我这个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的执笔者，我知道自己被揪出是无疑的了。

一天，我一进教室，就看见江西人甘XX和四川人李XX两个男生正在黑板上贴大标语。一见我进来，就急忙溜出了教室。我一看，大标语上赫然写着：“把反革命分子梁蕴绵揪出来示众！”我的名字上还打了个大大的‘叉叉’。此后，全班开始了对我的批判。说我是给中央写信的主谋，是蛊惑煽动全班同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大家都是上了我的当，受了我的骗；说我是继承了反动衣钵的资产阶级小姐，是梦想恢复已经失去了的天堂的剥削阶级孝子贤孙；说我平时斯斯文文，貌似追求进步，却原来是骨子里仇恨党的反革命急先锋赤膊上阵了！有一次，当我被罚站在讲台前接受批斗而感到委屈默默落泪时，又是甘XX在黑板上大书了标语‘鳄鱼的眼泪’，并带头高呼口号‘痛打落水狗梁蕴绵！’

更有女生徐X，江苏宜兴人，她不但厉声批斗我，还在批斗会上诬陷说：‘梁蕴绵的母亲是音乐教师，她曾经给我唱过歌颂蒋介石辱骂共产党的歌’。她还揭发我保存有父母解放前的老照片，是不忘资产阶级的反动衣钵，是妄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剥削阶级的天堂。听着她的这一揭发，我的头嗡嗡作响！我何曾唱过歌颂蒋介石辱骂共产党的歌？何曾知道有这样的歌！我气愤至极，反驳不出一个字！

我被揪出后不几天，来到了位于行政楼楼上的校广播台。一上楼，就看见了贴在广播台走廊上的“把反革命分子梁蕴绵从交大广播台赶出去！”的大标语，我注视着名字上赫然打着的大红色‘叉叉’，望着广播台记者组办

公室的房门，默默地转身离去。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这个我非常热爱的曾经每天必去的地方。当时，广播台台长宗立文老师也正在挨批，于是，又有人把我和校广播台台长宗立文、数理系团工委书记王世昕以至校长彭康连成了一条黑线，这张黑线联络图就贴在图书馆东墙中心位置我的专栏大字报中。

除了图书馆东墙中心位置外，行政楼南墙、中心楼东边西北入口处等醒目位置也都贴上了我的大字报专栏。这些地方都是学生们每天来回于教室、食堂、宿舍的必经之路。我每天由此经过数次，都会看到自己名字上打着红色大叉叉的刺眼的大字报专栏。也正是这几处大字报专栏，使我父母和我所有的家人都知道我在交大出了大事。原来，我被揪出后不久，与我同村的电机系学生王长余就在校园里看到了我的大字报，消息很快传到了与王长余家一个生产队的我姑耳中。我姑慌做一团，立即告知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顿时震惊。父亲立即进城，到广济街找我大姐，让她去交大打探消息。

六六事件后，交大规定学生一律不准出校门，已成反革命分子的我更是被规定不准乱说乱动，不准与外界联系，连信也不准写。我大姐到了交大门口，只见校门口戒备森严，不准任何人进出。大姐见状，再三说明我从小由外婆抚养，现外婆重病在床，垂危之际想见我最后一面，希望能让我回家一趟。但大姐费尽口舌，苦苦哀求，终无用处。无奈，大姐又赶到我二舅家讨主意，二舅曾是杨虎城的秘书，解放前曾多次参与处理过学生运动，他让大姐给我父亲说："历来各种运动对学生都不会咋样，请你大放心。"心急如焚的父亲怎能放心得下，他又去了西门外劳动路我外婆家。外婆当时已年近七十且体弱有病，父亲本不想让她老人家担惊受怕，但此时的父亲万般无奈，只好求助外婆亲自到交大去设法见我。外婆一听，立即拄着拐杖，强撑病体去了交大。也许是外婆的小脚拐杖和年高体衰引起了门卫的怜悯，她好

说歹说，终于在交大北门外见到了我。我是由一位同学监督着去的，见面时间不长，也不敢说啥话，如同探监一样。颤颤巍巍的外婆只叮嘱我“别随便说话，别胡思乱想，别害怕。”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她老人家最爱我。如今，看到负担沉重面色苍白的我，外婆心如刀绞，由交大返家后就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五十多天后，工作组撤了，我被平反了，我第一时间赶回了家，与外婆抱头痛哭。不久，外婆去世，我悲伤不已，扶棺痛哭。

一天上午，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了我的课桌上，中午回到宿舍，同样的对联也贴在了我的蚊帐两旁；床单上还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以至于不能上床休息，否则就会触碰掉对联而罪加一等。无奈之下，我只好不用蚊帐；睡觉时，也只能小心翼翼揭掉床单上的对联躺下，起床后再按原样贴上。

在受批评的那些日子里，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受全班同学的委托而执笔起草了这封信，内容都是大家的意见和观点，每个同学都亲笔签了自己的名，怎么现在我却成了主谋？大家都是上了我的当？受了我的骗？更有女生徐 X，怎能凭空捏造出那样的罪证？那时所发生的一切，使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何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领略了人性的丑恶和残忍，知道了什么叫捏造、诬陷和落井下石。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愤怒到了极点，感到了极大的屈辱！

士可杀不可辱！我想到了死，但又丢心不下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是解放前的老知识分子，一直手执教杆，教书育人，在 1965 年社教运动中被开除公职回乡务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1979 年 2 月，父母均获平反，重返讲台）。由于不会干农活，就挣不了几个工分，又不会养鸡喂猪，日子过得一贫如洗，甚至连油盐钱都几乎没有。那时，弟弟妹妹也都没有学上，我是父母唯一的希望，我若死了，他们怎么办？

正当我在生死路上徘徊的时候，救命恩人出现了。他就是和我同班同组的同学郗友农。这位出生于陕西省大荔县的身高一米八的大男生相貌英俊，身材修长。我们同窗数载，几乎没有说过话，然而，正义和善良的天性使他在危难时刻救了我。郗友农同学的善举，使我深刻地体味了人性的另一面，那就是真诚，正义和善良。

我被揪出后，不但接受全班同学的批判，还在大教室里接受全系师生的批判。文革前，王世昕老师任数理系团工委书记，我和应物专业 1 字头学生柳永智（校舞蹈队队长）曾被树为数理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这成了出身黑五类的王世昕老师的一大罪状。一天下午，全系 5 个年级三个专业（应用物理、应用数学、应用力学）十多个班数百名师生集中在一个大教室，召开对王世昕老师的批斗大会，我和柳永智陪斗。会上，我们三人低头站在讲台上。发言的人批判王世昕老师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刻意培养资产阶级小姐，培养剥削阶级接班人；说我们三人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勒令三人老实交代，低头认罪。

批斗大会结束了，同学们陆续离开。只见郗友农从我身旁经过，他趁人不备塞给我一张纸条。人走光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字条，见上面写着让我在那天晚上 9 点半熄灯后，到 XXXX 大教室与他见面。我如约而至。在昏暗的教室里，我们见了面，他急匆匆地对我说：“梁蕴绵，我看你这几天有些受不了，你可千万不能作傻事。咱们都搞过社教，你也知道，运动一开始都是大轰大嗡，但到了最后都是要落实的。再一个，真正批斗你的并没有几个人，绝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跟着举拳头喊口号的，像我，不也跟着一起喊口号了么。你可千万要记住不能作傻事！”说完他又急促地添了一句：“我先走，你等会儿再走”。

听了他的话，我怔怔地呆了很久。此时的大教室漆黑一片，但我的眼前

却如同出现了一盏耀眼的明灯。我慢慢地离开了那间空无一人的大教室，一路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不能死！”回到宿舍，我躺在贴着对联的蚊帐里，再次回想着郗友农的话，心中升起了希望。我告诫自己：‘要坚持，要等待，要挺过这运动初期，恶梦一定会过去，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就是郗友农的这句话，使我熬过了那段可怕的挨批斗的日子。我终生都记得，是郗友农救了我的命，他是我的大恩人！

数十年来，我曾多次给我的父母、丈夫和女儿讲过这件事，我们全家都知道：在十年浩劫那暗无天日的深渊里，是郗友农不顾危险，鼎力相助，我才免遭一死。是郗友农救了我的命！我感激他，敬重他，我们成了终生的挚友。我曾见过郗友农的母亲，当时约五十多岁，是一位面容慈善、气质端庄贤淑的女性，年青时必是一位身材娇好、有德有貌的美女子。我也曾在上海看望过郗友农的父亲，老人家更是一位儒雅俊朗的翩翩君子。郗友农有着这样的父母，其禀性自然天成。好人自有好报，郗友农的夫人剑秋女士聪慧秀美、自学成材，尤为擅长牡丹花卉，是硕果累累的国画画家。他儿女成材，特别是女儿更是人才出众，不但容貌出色，还是上海财经大学的高材生。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有一天，班文革小组通知我到男生第12宿舍观看对闻名全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批斗。因为学生们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不认识，故专门将他们押解到12舍一楼的一间宿舍里，如‘动物展览’一样供学生围观指认，同时也被批斗。为了对如我一样的反革命分子示以震慑，各系各班都押着自己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去现场观看。我是由我班一个同学陪着（实际上是监视）去的，由谁陪着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座宿舍楼前的路上已挤满了前来观看的学生，而我，则被命令站在这些学生的最前面。12舍一楼一间宿舍的一扇小窗被打开了，外面的人大喊：“把反革命分

子 XXX 揪出来示众！”然后，就有人按着那个被绑着双臂的反革命分子的头由窗口塞出来，任由外面同学围观批斗，甚至被扔石子土块。

那天被展览的反革命分子不少，记得最清的是动力系学生王永婷。王永婷的头是因为拼命挣扎而被硬挤出来的。每当塞出一个头，外面就立刻大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 XXX！”“打倒反革命分子 XXX 的嚣张气焰！”“反革命分子 XXX 必须低头认罪！”……我曾纳闷，交大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李世英似乎逃脱了这次动物展览。此后很久，我才知道了李世英早在动物展览的前几天就自杀未遂被特别看管了，否则，人胖头大的他，头被塞出来时肯定要受不少罪的。

一天上午，贴在我课桌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突然不见了，中午回到宿舍，蚊帐两旁和床单上的对联也不见了。我如释重负，但不知所为何因。后来才知道，在动物展览后，王永婷就跳楼自杀了。王永婷，河南人，时任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我在广播台工作时曾与她有过数次交往，知她为人热情开朗。王永婷跳楼自杀这件事给整我的人提了个醒，他们也怕我出事，故撤走了课桌、床单、蚊帐上的对联。

过了几天，猛不丁看见我班教室黑板上新贴了一幅斗大字的标语：“把跳梁小丑徐 x 揪出来示众！”。徐 X 并非出身黑五类，六六事件中也无啥把柄可抓，但她爱整人诬陷人的劣行激起了众怒，特别是她给我的捏造，大家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故对她揭发我的“唱歌”这一“重型炮弹”并未理睬，相反，还矛头一转将她揪了出来，直到 8 月学校文革总会来我班召开平反大会时也没有给她这个“跳梁小丑”平反。

我班还有一名女生张 X，福州人，父亲是烈士，但母亲是反革命，解放初期即被镇压。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我看她无父无母，生活能力又差，而我又会做针线活，就常常在生活上帮她。一年暑假，我和母亲还给她做了两

双很漂亮的黑色偏带布鞋。我班几个女生还合伙用退饭票的钱买了纱布，由我一针一线给她缝制了一顶蚊帐。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倍加照顾的人，不但从未见她对谁表示过些微谢意，而且在整我的时候又狠又毒，听说给我床上蚊帐上贴对联的就是她。

我班原有同学 40 人，女生 5 人，后有休学等原因返校 5 人，共计 45 人。在原来 5 位女生中，个子最高年龄最大的是重庆人刘美嫆，最漂亮的是黄上元，她们俩和我关系最好。我们三人是“红萝卜不解把”，几乎每天形影不离。刘美嫆总是如大姐姐一样照顾我，我二舅给我买了些毛线，就是她给我织成了毛衣。黄上元是交大无线电系系主任黄席椿教授的女儿，她家境富裕，曾将家中旧窗帘等旧布给了我，我和我母亲就是用这些旧布为福建女生张 x 做的鞋底。1965 年我家境突变，刘美嫆和黄上元依旧和我同出同进关系很好。‘六六事件’后，她俩因高压所迫，不得不举拳头喊口号批判我。但在我挨整最厉害的日子里，我从她俩的眼光里分明看到了她们对我的关切之情。尽管大家都知道我们三人关系密切，家庭出身也都不好，但无论怎么加压，她们二人都始终没有揭发过我一条所谓罪状。在那人人自危、落井下石、争相表功、自相残杀的日子里，她俩坚守正直，不捏造，不胡说，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我感谢她们对我的好处，我佩服她们的人品道德。

对我有恩的还有交大工作团驻我班的工作组组长，他是陕西大荔县县长。因为应物 31 给中央写信的‘邮局事件’是交大‘六六事件’中的重大事件，故上面派了他这位县长驻守我班。有一天，他叫我去谈话，我以为又是敦促老实交代低头认罪的。然我一踏进他的办公室，就看见他满脸的和善。他温和地说：“我们已了解了情况，你没有什么问题，更不是什么反革命，只是执笔写了大家要写的信。都是学生，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希望你放下包

袱，振作起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去。”当时，我只知道这位工作组组长是大荔县县长。他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中等胖瘦，浓眉大眼，一口地道的陕西话。特别是他那一双浓眉给我的印象最深。他的相貌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现在路上遇见，我也会一眼认出。

文革后，我曾打听过这位工作组组长的姓名和下落。我要亲口告诉他，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他的话如同严冬的太阳，温暖着一颗饱受创伤的心，使这颗濒临死亡的冰冷的心得以复苏。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得知他的姓名和下落。因为‘六六事件’平反后，工作组都撤走了，我又能从何处找到他呢？文革十年，我曾多次为他担忧，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善良的领导干部能逃得脱文革的厄运吗？我只能在心中为他祝福，愿他在十年浩劫中安然无恙。在此后至今的几十年中，我常常想起他，他对我有恩，我感激他，我祝愿他这位好人一生平安！

五十多天后，陕西省委派来的工作团作为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被赶走了，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被平反了。1966 年 8 月的一天，校文革总会派人带着录音设备来到我班，召开了平反大会。会上，校文革总会主持人让我发言并录了音，正式宣布摘掉戴在我头上的反革命分子帽子。

残酷的相互批斗、相互残杀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向全社会展开。秋末初冬，这些被冠以“革命小将”美称的学子们又奔赴全国各地，串联闹革命去了。我也参加了由工程物理系，无线电系，机械系共 20 名同学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6 年 12 月 1 日，天刚蒙蒙亮，我们 20 名身背背包脸盆毛巾的同学就在交大东门外集合完毕了。我们的队长是工程物理系 66 届的一名男生，他高举“西安交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和其余 19 名队员一起，人人手握红宝书并紧贴胸口，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看着东方，等待着专门选定的

时刻——太阳喷薄而出的一刹那。这一刹那一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声即刻响起。随即，我们紧跟红旗，迈开步伐，飒爽英姿，向着目的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冲进发。

一路上，每到一地，我们都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吃好吃坏，每人都会留下一斤粮票和三角钱伙食费，从不欠账。文革结束后，我看到许多描写红卫兵大串联时白吃白拿坑害老百姓的事，觉得很不真实，也很不认可。

我们历时 26 天，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每日徒步行军一百里左右，历经陕西，河南，湖北，湖南 4 省，终于按计划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红太阳的诞辰日，来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冲，大家都无比激动，非常高兴。

在韶山冲，我们将自己亲手绣的有着“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金色大字的红旗敬献给了红太阳故居，这面红旗是我们 20 个人，花费了不少心血，专门精心制作的。那是 1966 年 12 月上旬，我们途径湖北境内，看到报纸上报道说，不少红卫兵将自己戴的红卫兵袖章和队旗敬献给了韶山冲，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之情。于是，我们也决定绣一面红旗，每人都要绣，即使男生也要绣，并由会绣花的我担任指导和主绣。当时红绸好买，但绣花绷子和黄丝线却买不到。我知道我家有这两样东西，就立刻给父母写信，让他们尽快将这两样东西寄往武汉大学。几天后，我们到达了武汉大学，但在学校邮局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包裹，只好满武汉城去买花绷子和黄丝线。

东西终于买到了，我们白天行军，晚上绣旗，还边绣边唱“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12 月 23 日，红旗就要绣完了。大家商定，要特意留下一针，待 3 天后的 12 月 26 日这一天再绣这最后一

针，因为这样更有意义。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2月26日献旗时的情景。那天，前来故居敬献红旗和袖章的红卫兵络绎不绝，排着长队。轮到我们了，大家庄严列队，手捧红宝书，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然后由队长神情庄严地双手捧旗，交给韶山冲贫协主席，再由那位同样神情庄严的贫协主席敬献于领袖像前。

1967年元月10号，我们一行乘火车返回西安。我随即回到长安家中，一进家门，父母就告诉我寄去的花绷子又被退了回来，并问我红旗绣了没有。谈话间，我知道花绷子寄到武汉大学后又被退回，并又收了一次0.80元的邮费。当时，不会干农活的父亲每日只挣6分工，合计人民币0.24元。也就是说，为寄这个包裹，父亲共付了两次邮费，花了1元6角钱，这是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7天的收入。听了这件事，我的心中暗自后悔，后悔不该让父母寄这个花绷子。

文革后，我曾和父亲谈起了那一年邮寄花绷子的事。我问父亲："寄绷子要花那么多钱，你不会不寄？"父亲大声说："这是政治，是热情，不能讲钱！"父亲还说："我也年轻过，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都会热血沸腾，都有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串联后，学生们大多出外或回家了，校园里人迹稀少，教室里鸦雀无声。1967年夏末秋初，大家猛然意识到不读书，不上课，腹内空空，拿什么步入工作岗位，如何去报效祖国，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呢？"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响起来了，学子们又陆续回到了学校。

此时的校园，墙上的大字报仍时有刷新，大批判的吼声仍日日可闻，但"复课闹革命"的大标语已到处都是。大家打开封尘已久的教室，拿出久违的课本，重新坐在了这间教室，听那些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

义白专典型” 的老师们上课。讲授量子力学和理论力学的是罗晋生老师，讲授半导体物理和晶体管原理的是刘恩科老师，讲授晶格结构和热力学的是陈光遂老师，讲授半导体材料的是张娟老师，讲授制图和电工学的是张佩英老师，讲授压电铁电原理的是李中江老师。

印象最深的是讲固体物理的赵富鑫教授，文革前他是数理系系主任。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时的赵老师每进教室，必先挺直腰板，双手低垂，毕恭毕敬，一丝不苟地背诵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然后言归正传开始授课。这些语录都是不能随便背的，而是要与这节课的内容相匹配，至少不能意义相悖。想当年，这位物理学教授为了给每节课找到合适的语录，不知要费多少脑筋和时间啊！有时大概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了，他就高举红宝书，大声说：“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68 年 12 月，我们终于在这间教室里学完了专业课，填好了分配表，结束了本应 5 年却被迫上了 5 年半的大学生涯，奔向了全国各地。

1976 年 10 月，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1996 年 4 月 7 日，母校交大百年校庆，我们又不远千里汇集到了这座教室，同窗团聚，师生联欢。30 年前的反动学术权威，如今都已成了裴声中外的学者；30 年前修正主义的白专典型，如今都已是博大精深的博士生导师。如今，这些老师虽已年逾古稀，但仍目光炯炯、记忆惊人，一见我们，十之八九能直呼其名。然使我感到奇怪的，倒是我们这些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批斗的同窗学友，却常常见面还认不出来了呢。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王世昕老师，王老师是文革前数理系团工委书记，他对我有恩，我终生不忘。1965 年 5 月，当我向王老师汇报我的家庭变故时，他立刻给了我一张助学金申请表，正是这张表，我的学业才得以继续。那

天，王老师还语重心长的鼓励我，让我放下包袱，正确面对家庭变故，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可以选择。



梁蕴绵（前左二）、黄素纨（前左三）、肇敬敏（前左四 记者组副组长）、楼关沐（前左五）、卢锡钧（前左六）、华盘勇（前左七）、史重九（前左八）、徐永明（前左九）、朱文虎（后左一）、黄仕银（后左二）、徐有智（后左六）、林睿麟（后左八）、李功振（后左九）、王拈生（后右一 记者组组长）、李智信（后右二）

六六事件中，我和王老师、广播台台长宗立文老师被人与彭康校长连成了一条黑线；我还和校舞蹈队队长柳永智同学及王老师一起被罚站于大教室的讲台上接受批斗。30 年过去了，如今的王老师已是交大校级领导。百年校庆那天，他一见我就高兴地说：“这不是梁蕴绵麽！”

往事并不如烟，六六事件所经历的一切都深深铭记在心。六六事件后，我被应物 31 班第一个当作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也第一个被交大广播台踢了出去。此后月余，我遭受了全班和数理系全系师生的数次批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我的生命长河中，这一个多月是无比的恐怖，是无底的深渊，精神负担几乎压垮了我的整个身心。若不是大恩人郗友农救我，我恐怕早就不

在人世了。如今，无论整人者还是被整者，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31 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桩桩件件，有丑陋也有美好，有恶毒更有善良，它们是那样的清晰，清晰得如同眼前。

数十年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梦萦魂牵，怀念这校园，留恋这教室。它是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见证人；是我们充满信仰、热血沸腾的目击者；也是我们默默耕耘、刻苦攻读的摇篮。这摇篮，给了我们知识、能力和坚毅，也给了我们无限的回忆、留恋和思考。同时，我也深感没有辜负这摇篮，还得知在这摇篮中，不乏有我们的后辈。看着屏幕上团团簇拥的樱花，看着樱花背后有三扇窗户的这间教室，我想起了我那可爱的小鸟——我的小女儿。此时此刻，她正在西安医科大学七年制读书，正和我在这间教室里读书时同龄。我默默的祝愿她，也祝愿这间教室里的学子们，努力耕耘，辛勤收获。愿他们的前程如这教室外面的樱花般锦绣夺目。

1997 年 6 月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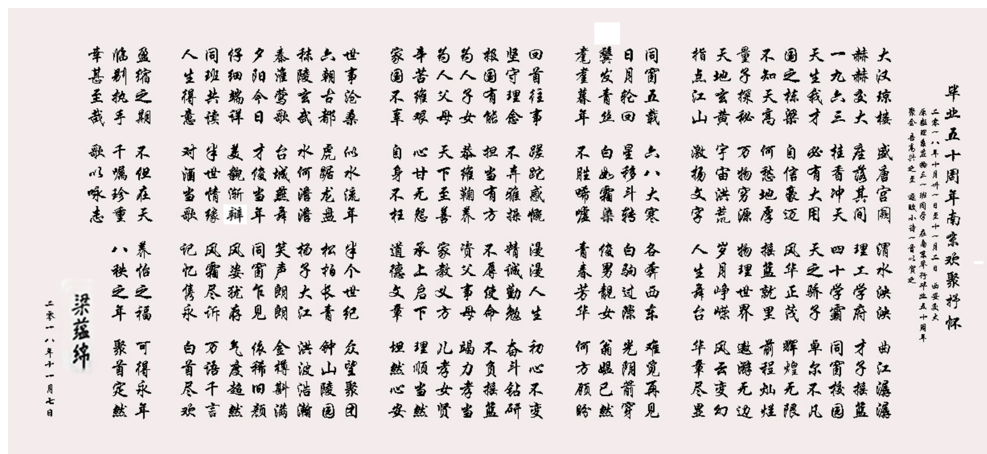
2016 年 6 月 8 日交大一百二十周年校庆后二稿

2017 年 6 月 6 日“交大六六事件”五十一周年定稿

补记：2015 年 2 月 20，我收同窗袁绥华信，知当年我班工作组组长是大荔县副县长李梦熊。在此，我衷心敬祝李梦熊县长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并向袁绥华同学深表谢忱。

# 附录：毕业五十周年南京欢聚抒怀

## 毕业五十周年南京欢聚抒怀




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西安交大原数理系应物31班同学在南京举行毕业五十周年聚会，吾高兴之至，遂拟小诗一首以贺之。

大汉琼楼　盛唐宫阙　渭水泱泱　曲江潺潺

赫赫交大　座落其间　理工学府　才子摇篮

一九六三　桂香冲天　四十学霸[1]　同窗校园

天生我才　必有大用　天之骄子　卓尔不凡

国之栋梁　自信豪迈　风华正茂　辉煌无限

不知天高　何愁地厚　摇篮就里　前程灿烂

量子探秘　万物穷源　物理世界　遨游无边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岁月峥嵘　风云变幻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人生舞台　华章尽显

同窗五载　六八大寒[2]　各奔西东　难觅再见
日月轮回　星移斗转　白驹过隙　光阴箭穿
鬓发青丝　白如霜染　俊男靓女　翁媪已然
耄耋暮年　不胜唏嘘　青春芳华　何方顾盼

回首往事　蹉跎感慨　漫漫人生　初心不变
坚守理念　不弃雅操　精诚勤勉　奋斗钻研
报国有能　担当有方　不辱使命　不负摇篮
为人子女　恭维鞠养　资父事母　竭力孝当
为人父母　天下至善　家教义方　儿孝女贤
辛苦维艰　心甘无怨　承上启下　理顺当然
家国不辜　自身不枉　道德文章　坦然心安

世事沧桑　似水流年　半个世纪　众望聚团
六朝古都　虎踞龙盘　松柏长青　钟山陵园
秣陵玄武　水何澹澹　杨子大江　洪波浩瀚
秦淮莺歌　台城燕舞　笑声朗朗　金樽斟满
夕阳今日　才俊当年　同窗乍见　依稀旧颜
仔细端详　美貌渐辩　风姿犹存　气度超然
同班共读　半世情缘　风霜尽诉　万语千言
人生得意　对酒当歌　记忆隽永　白首尽欢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临别执手　千嘱珍重　八秩之年　聚首定然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梁蕴绵　2018 年 11 月 7 日

注 1：入学时全班 40 名，毕业时 45 名同学。

注 2：六八大寒。指 1968 年冬



**作者简介**

梁蕴绵，女，1945 年 8 月生，1963 年考入西安交大数理系应用物理专业，1968 年 12 月毕业分配至西安火柴厂工作，后调入中科院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2007 年退休。



# 交大“復課鬧革命”的始末

■ / 李能貴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教学工作被迫停止，在校的 5 届大学生在大批判、大串联和大辩论的洪流中虚度了时光。1967 年 7 月 1 日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成立，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校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会议决定由我负责制定学校“复课闹革命”方案和实施意见，并组织各系革委会尽快进行落实。10 月 23 日，学校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由李世英作动员报告，并确定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三、四年级主要学习专业课，有条件安排下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五年级完成毕业设计工作。第二天，全校各专业同时开始复课，学校学习的气氛再次充满了校园，教师热情地走上讲台，渴望学习的同学认真听课，还主动请老师增加开课的门数。学校“文革”转入了校内“斗批改”。




抗大战校同学在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发言



1967 年 10 月复课闹革命，抓紧学习

为保证实践教学，学校安排 10 万专项经费用于实习。生产实习以就地就近本省为主，必须出省的应专门写出申请，说明理由，我组织审定和批准，有的还经过答辩。考虑到西安有些工厂生产不很正常，安排了将近一半学生到华东地区工厂实习，既保证了教学要求，又节省了经费，收到了好的效果。11 月初省上派 8118 部队解放军干部进驻我校帮助办学习班，12 月 7 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发表，22 日校革委会发出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学校开始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此时师生仍一方面上课，一方面开展大批判。

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同时发表了文汇报、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人员的道路”，学校有的人认为，现在的复课闹革命是“复辟”、“复古复旧”，要求停课学习讨论，学校暂时停课。

8 月 29 日工军宣队陆续进入学校，以教研室、科室、班级为单位，集中举办学习班，从而使 1967 年“复课闹革命”历时十个月后停止了。十个月的“复课闹革命”，使 1961 级 1431 名学生完全按教学计划基本完成了大学学习，1962 级和 1963 级的 2415 名学生，除学习了专业课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安排到工厂进行了生产实习，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专业知识，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1964 级和 1965 级的 3401 名学生集中学习了主要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



**作者简介**

李能贵，1938 年 2 月生，四川成都人，195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 年 9 月考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无线电技术专业学习，1960 年 7 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88 年 9 月担任学校教务长，1990 年晋升为教授，1998 年 9 月退休。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回憶文革中的復課

■/ 王培钰




王培钰 2016 年在交大北校门

文革中的西安交大是很出名的，是最早就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高校。六四级的李世英同学是文革期间西安交大的学生领袖，这个“学生领袖”的称号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封的。

在当时全国“文攻武卫”的环境里，几乎所有的院校都发生过两派武斗事件，有的甚至打死了人，而西安交大能平稳过度，以李世英为首的校革委是有功劳的。在李世英的领导下，西安交大校内是一派，没有发生武斗，没有随意批斗教师和学生，完整地保护了全校的教学设备和资料，保护了教师队伍和学生的安全。西安交大在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文革中，是出了名的温和派、右倾派，西安交大学生没有参与校外火热的派性斗争，没有参与校外的武斗，没有一个师生在派性武斗中意外死亡。

在以李世英为首的校革委会领导下，我们学校得以很快的复课，为同学们创造了好的学习环境，这在全国的高校是罕见的。文革中的复课是我们一

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为我们走向社会打下了基础。

我们电制 65 级的部分同学在复课期间联合起来组织复课，我们学习了电工原理、工业电子学、电机学和电机设计等主要专业基础课，有许多知名教授为我们讲课。在学习电工原理时，同学们采用了西安交大邱关源教授主编的《电路（电工原理Ⅰ）》，进行了重点学习。在学习《工业电子学》时，同学们根据学到的基础理论，自己动手安装电子管和晶体管收音机，我安装的收音机到毕业参加工作后一直能用。学习《电机学》时，买不到教材课本，班上同学以一本西安交大《电机学》教科书为样本，用油印的方式，我们每人人手一册到教室上课，为我们上课的教授都很感动。

李世英为首的校革委会还支持了我们电制 64、65 级部分班级的的教改倡议，我们成立了五七战校。难忘那些岁月，我们几十个电机专业同学与教研室老师一起，以原电机教研室的实习工厂为基地，开展电机制造的专业学习，创办了电机厂，成功批量制作出交流异步电机。在全国文革停课的大环境中，我们学完了本专业的主要课程，也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使我们毕业后在工作单位很快就能发挥技术作用。和我们一起复课的鱼振民同学，后来通过不断深造，在电机专业技术有很高的造诣，成了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主任、教授。

特以此文回忆我在西安交大文革中的一段生活。




**作者简介：**

王培钰，贵州贵阳人；男，1946 年出生；1965 年进入西安交大电机系电机专业学习，1970 年毕业，工作于铁道部成都机车厂（现在的中车成都公司），高级工程师，从事科技工作尽职敬业，有多项部级科技成果和发明专利。从学生时代就热爱文学，有许多文学作品发表于文学网站和刊物，皆因那未尽的文学梦。作为业余作者，散文散见于各大文学网站和报刊杂志。先后担任过国内知名杂志《读者》官方论坛原创文学区首席版主和多家大型文学网站的编辑、主编、管理员。热心校友交流，多篇文章发表于《西安交大校友期刊》，被学校委任为校友亲和使者。



# 大山裏的回憶

■/ 高喜愛

【编者按】本文选自交大《校友之声》2008 年第 1 期。

1969 年的秋日，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机制 51 班一行几十人，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派到秦岭山中的留坝县两河口公社去。

从西安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早上从凤县火车站下了车坐上汽车，便开始在山路上穿行。白色棉絮般的云朵在山腰浮动，置身于此，仿佛进入人间仙境。汽车一直在山间行驶，离开了国道后，山路仍然很好，我们都不解，为何已是大山深处，仍有如此高水平公路？带路的公社干部告诉我们，因为这儿有国家三线工厂，专门为它修的这条路。汽车走了几个小时，直到中午才到了公社。偏僻的公社小院，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变得人满为患。没地方坐，我们便满院子站着。回顾着一路上的感受，新鲜劲让我们兴奋。公社领导也很高兴，安排炊事员为我们做饭。饭很简单，每人两个大馍，一小碟菜，白水粉条萝卜。趁我们吃饭的空隙，公社干部向我们表示了欢迎之辞，简单介绍了公社的情况，并希望我们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带到山里，希望我们与贫下中农好好结合，学习他们的好品质等。

吃过饭，分配了各个小组所去的地点，我们班的同学分几个方向又随汽

车出发了。我们这辆车一路走一路播种似的陆续下人，最后到了石门子大队的吊坝子小队，只剩下了我们男女生共六个人，有史先修、焦洪德、戴呈祥、张克谦、杨玉梅和我。小队部所在地是一个学校场院，两边两排房子，一排是小学校，对面一排有的房子住着机砖厂的人，有的空着，让我们两个女生住一间，四个男生住一间。场院里农民正在打谷子，看见我们来，热情的招呼我们放下背包，指点着说，对面山上毛栗子多，你们山外人稀罕那东西，去山上边玩边捡栗子吧。我们很高兴，每人拿了个军用书包，涉过一条小河便上山了。

山连着山，但都不高。栗子成熟后都炸开了，落在草丛里。我们东一颗西一颗的拾着，大约总共只拾了一书包，天已擦黑了，我们差点迷了路，幸喜小队院子有灯光，才不致于回不了住地。后来与农民混熟了，才从他们口里听说，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听说西安交大的学生见人就打，非常可怕，所以一来就让我们上山拣毛栗子了（这也算是一种贿赂吧）。

在吊坝子的两个月，非常让人留恋。以后的岁月里，我也时常回忆起那段岁月。

我和杨玉梅两个女生，在学校时也算不上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可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我们两个不仅非常要好，而且简直形影不离，互相照顾。她比我大几岁，象个大姐姐一样关心我，照顾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商量事，我发现我的皮带头坏了，想拆开重装一下，找不到工具，便用割草的镰刀头撬了一下，谁知道用力不当，一下子把大姆指割破了，顿时鲜血直流，我疼得乱叫。还是她有经验，撕开棉袄，揪下一团棉花，让男生用火柴烧成灰给我按在伤口上，用布缠住，才勉强止住了血。下午，我没有去地里干活，手指疼得突突跳，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收工。至今我的左手拇指上还留着一条伤疤。

我们到山里，似乎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撒播“文化革命”的火种，但是这个任务却被我们抛到了脑后。我只记得当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劳动。我虽然当时只有 20 岁，正是女孩花季的岁月，却也象当地山民一样，头上包一块方巾，腰里缠一条葛麻藤，背上背个背篓，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收苞谷。

有一次我背了苞谷穗往回走，听见后面汽车喇叭响，我仍只顾自己走。我本来走在路边，也就没再躲，谁知司机嫌路不好走，嫌我碍路，一个劲按喇叭。我回头看了一眼，只好违心地走下了路边。就这样那个司机过去后还把头伸出驾驶室骂了我一句：“你是个聋子！”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想，如果在西安市你敢这么凶？还不是在山沟里显你会开个车！

还有一次去背苞谷，山坡地的苞谷长得不好，一个穗子只有一小拃长，还有许多穗尖被鸟雀啄去了籽粒，好长时间也摘不满一背兜。中午休息时，我们在附近的小河里洗手，戏耍。男生就翻石头想逮螃蟹。突然听见焦洪德“唉哟”了一声，我们几个过去问：“怎么了？”他说，被什么咬了一下手。到底是男生，够勇敢的，他戴上手套，又去河里原处摸，这回让他抓住了，一看，是只青色的鱼，一尺来长，还有四只小手，我在动物园里见过，“是娃娃鱼！”“真是娃娃鱼！”大家齐声喊了起来。怎么办呢？距收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用葛麻藤拴住它，然后把藤压在石头下。等收工时去看，果然鱼还在那里，我们象打了胜仗似的，高高兴兴拥着焦洪德回到了驻地。我们几经商量，才决定吃了它。因为是去接受再教育，吃的是派饭，自己没有锅灶，给生产队的周副小队长说了一下，借他的锅用，还从河对面的大队书记家要了点调料、葱之类，用水一煮，放点盐、葱等就行了。锅很大，足有半米多直径，一条小鱼煮在里面，很是可笑。鱼不一会儿就被煮熟了，史先修用小刀划开，我们六个人一人吃了一点便没了。说实在话，一点儿不好吃。可惜那时没有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意识，一条娃

娃鱼就这样被我们给吃了。现在有的人鸡鸭鱼肉吃腻了，想着吃生猛海鲜，飞禽走兽，珍稀动物。经常有报纸报道抓获贩卖娃娃鱼的人（现在娃娃鱼属国家保护动物），查获餐馆里有烹调娃娃鱼的消息，我真想对这些人说一句，别吃了，一点不好吃，真的。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有时候也去剥苞谷，可以边剥边听山民唱山歌，唱的什么词，我没听懂，便跟着一位女社员学唱，还没学会，就被史先修训了一句“没羞，唱那些歌！”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可能民歌都是情歌吧，不唱算了。

我们几个人中，张克谦是最学识渊博的。有一次收工路上，他给我们猜谜语，我至今还记得，是“黄绢、少妇、外孙、舌辛”，打一四字用语。我怎么也猜不出，他卖关子，让我们继续猜。谁也没猜出，他才说是“绝妙好辞”。从那以后，我对猜谜便开始有了兴趣。直到现在，看到谜语，我总想猜一猜。

秦岭山里因为医疗条件不好，许多人患大骨节病、大脖子病，孩子也缺，有的人家里没有孩子，所以上学的人也少。小队唯一的一所小学就与我们为邻。十几个学生，几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一个女老师（可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分时间给各年级学生上课。学生有的在听课，有的在做练习，挺听话的，要是放在城里，早乱套了。学生穿得不好，有的学生棉袄外面还套一个破布衫，意思是怕弄脏了棉袄。吊坝子小队几十户人家，只有几个中学生，年轻人里，有个叫张艺芳的女孩，与我年龄相仿，才上个中学，便是很有学问的了，上工在女孩子中拿工分最高，每天八分工。有几个妇女向我和杨玉梅打听张克谦的情况，想把张艺芳介绍给张克谦。这事我们听了只觉得好笑，并没有当回事，谁知他们竟然真的说给了张克谦。不管事情成不成，但过后我想，山民们真挚的心，是想找一个大学生给他们当女婿的呀。

最让我想不通的是，留坝虽然属汉中地区，但离关中并不远，可做饭的锅灶，做饭的水平，相差的却很远。在吊坝子，每家有两只大锅相连，一个煮饭，一个煮猪食。烧的是树干（每家有十亩自留山，被他们称为枒枒柴的树枝是不烧的），不用风箱，火不旺了通上竹管用嘴吹，一生火满屋烟，熏得人直流泪，好多人害眼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风箱，这么多烟为什么不想办法改造一下。他们说，烟可以熏楼上的粮食，不受潮，不出虫。这倒是真的，秦岭山里雨多，气候潮湿，家家户户粮食都放在楼上。可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反倒受委屈，真不划算，不知道现在他们的环境改善了没有。

我们住的地方还算比较先进，有一个机砖厂，所以有电灯。有一次我们还好奇的去参观了机砖厂的生产流程。虽然我们是学机械制造的，但当时尚未学到多少专业知识就“文化革命”了，年龄又小，对机器挺感兴趣，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设备真是既简单又落后，有许多地方应该加以改进。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砖厂，山区邮递员才能间隔两三天就来一次。我们给家里，给同学，包括我给后来的丈夫，当时的好友李志杰，杨玉梅给男朋友姚芒库的信，都是我们直接交给邮递员发出的。当时我在吊坝子学农，李志杰在兴平县的秦岭公司学工，隔山隔水相望，只有通过鸿雁传书似的书信保持一种心际间的联系。每次收到他的来信，我都反反复复地看数遍。后来听他说，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江口，以为就是两河口，其实江口离我们还有几十公里呢。

山里的风景很美，一架山连一架山。我们去时正是秋天，山上自然林一片一片分得清清楚楚，山坡上一片红叶子的是耳树林，耳树就是用来种木耳的一种树，当柴也好烧。有的山坡是青冈树林，有的是板栗树林等，绝不混交，这大概就是自然繁殖的结果。

从小长在宝鸡，又在西安上了几年学，也没觉得馍有什么好吃，可是到

了山里，整天吃的是一种粗细合一当地人称末糁的苞谷糁子饭，偶尔吃一顿米饭，我们六个人个个都馋馒头。有一天，我和杨玉梅与张艺芳相邀，利用一天空闲，去枣木栏镇赶集。早上天亮就出发，翻过一座山，山坡上竹林一片，虽是晚秋仍翠绿翠绿，不时有鸟儿被我们惊起。整整走了一上午，大约中午 12 点多才到目的地，也就是一个镇子，镇子上只有一条街。约好了见面地点，张艺芳便去买东西了，我们俩找见一家食堂，里面卖馒头、面条，高兴极了，美美吃了一顿，还买了好几个大馒头（一个足有半斤）带回住地给其他几个同学吃。在学校时笑话南方同学不吃米饭不算吃饭，可到了这儿，那馋馒头的劲儿，一点不亚于南方人馋米饭。

我们在山里劳动了两个多月，到了 11 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下了一场雪，地上结着厚厚的冰。接到通知，我们要回学校上课了。先一天晚上，我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第二天中午时分，接我们的汽车来到了吊坝子边的公路上，我们上了汽车，吊坝子的农民几乎全都来送我们，有几个妇女哭得呜呜的。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小队会计的媳妇，哭得最厉害。她边哭边说，你们这么好，可在这儿什么好东西也没吃到，真是对不住，以后有机会回来看看，我们一定好好招待你们。还有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也非常舍不得我们，一再对我们说，回西安后一定要给他们去信。



1969 年秋从留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校后合影
从左至右后排：高喜爱、杨玉梅、戴呈祥
前排：焦洪德、张克谦、史先修

回到西安，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但我们仍然忘不了那些善良淳朴

的山里乡亲。我们六人相约到西安最好的照相馆——钟楼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让文笔最好的张克谦执笔给吊坝子小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们的合影，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怀念。后来他们也回了信，好几大页纸，看来还是专门请人写的，文采及字体好极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可那一段日子却最使我难忘。我经常把那里的情形回忆着说给家人听，他们也都觉得生动有趣。在城里呆的时间长了，真希望有朝一日再重返留坝，去吊坝子看看那儿的青山、绿水、翠竹，还有那些淳朴的山民，会唱歌的小狗，还有那满山遍野拾也拾不完的毛栗子。



**作者简介**

高喜爱，陕西省宝鸡市人，1948年1月9日生，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51班。先后供职于兰州钢厂、宝鸡石油钢管厂、西安钢铁厂，高级工程师，著有《李志杰高喜爱文集》五卷，现居西安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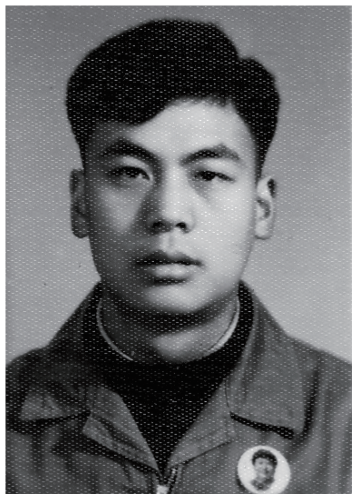


# 五年的交大歲月

■/ 樊哲民

我是西安交通大学 1965 级数理系应数 51 班学生，1970 年毕业。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无论身处何地，担负何种工作，当时大学五年的生活仍然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 一、艰辛的少年时代



樊哲民（1970 年）

我老家在陕西省蓝田县南寨村，位于“八水绕长安”之一的灞水上游东岸。从村子向东一公里便是蓝田县城，向西渡过灞水便是大名鼎鼎的白鹿原。南边是灞水与其支流辋峪河的交汇点，沿着辋峪河向南上溯就到了唐代诗人王维居住过的辋川。北边是另一个村子北寨村。南寨和北寨之间原有一个西寨村，住的是回民。清朝同治年间，西寨村的回民参加了陕甘两省的回民大起义，失败后逃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成为那里的“东干人”，但仍保留着蓝田人的

语言和生活习惯。原来的西寨村被清军烧成一片瓦砾。那一片瓦砾我小时候见过，五十年代末被平整掉了，变成了耕地。现在南寨和北寨两村已连成一片，组成了一个行政村，被重新命名为西寨村。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于 1945 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全家四口人，父母和我姐弟二人。父亲身有慢性病，母亲是家中主要劳动力，生活相当困难。我不到两岁便有记忆，记得小时候兵荒马乱的情景。有军队经过的时候，常常砸门抢东西，闹得鸡犬不宁。一听说要过队伍，村里人就把女孩子藏起来，直到平安无事了才放出来。最严重的一次，人们听说这次要过的队伍特别坏，就纷纷把十几岁的女孩子提前送到还未过门的婆家，把头发挽成髻就算嫁过去了。

1949 年 5 月，蓝田县解放。我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秧歌队，打狗队，卫生运动，扫盲运动，速成识字班，土地改革。我姐十几岁，没有上过学，便上了速成识字班。我经常跟着去识字班，在外面听他们念ㄅㄆㄇㄈ，觉得很有意思，也跟着念，无意中学会了注音字母。1953 年，我开始上小学。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只剩下有病的父亲和我二人。

初中阶段我们碰上了大饥荒，生活极端困难，幸亏姐姐经常接济一部分。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八、九个同学，都因饥荒而弃学回家。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坚持上学，学校还为此对我进行了通告表扬。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1962 年我初中毕业时患了颈淋巴结核。这个病很痛，我的止痛药就是做数学题，一进入数学的世界，就忘了周围的一切，也忘记了疼痛。当时因缺医少药和生活困难，我只能用一些偏方治疗，但收效甚微。拖到 1964 年初，我正上高中二年级，某个偏方的药物出了问题，引起肠胃大出血。当时县医院束手无策，便打电话向陕西省人民医院求救。于

是，一辆救护车把我从蓝田县接到西安市南郊的省医院。那时正赶上全国学雷锋运动，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我的诊断、治疗非常认真，从各方面热心帮助。病友们也互相帮助，我后来身体恢复时也帮助照顾其他病友，医院还因我帮助别人给学校去信表扬。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我的身体基本痊愈。但当我返回学校时，却被学校告知，我因缺课太多，必须休学。尽管我一再说明可以赶上课程，但学校以规定为由，不同意我复学。这样我就返回了农村。

回农村后，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在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我还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出纳保管、农村夜校教师和棉花技术员，并在兴修水利中组织了青年生产突击队。我还和一些青年人结成了自乐班，唱起秦腔和郿鄠戏，我在其中担任乐队的板胡伴奏。碰到农村人过婚丧大事，我们就去捧场。

1965 年春夏之交，高考通知下达了，我以社会青年的名义报了名。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我参加了高考，被西安交大数理系所录取。这样，我结束了一年多的农民生活，走进了大学校园。这是我人生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幸运的一步，赶上了文革前高考的最后一班车。否则，我如果休学以后跟着下一级，就成了高六六届，就会因文革而被挡在大学门外。另一方面，我如果 1965 年没有考上，那么，就会遇上 1966 年蓝田县开展的四清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差不多所有的农村干部都被打倒，我那个大队支部书记被整死。我当时也是大队干部，管钱管物，很难逃过那一劫。

## 二、大学生活的第一年

我家离西安四十八公里，那时乘长途汽车需要 1 元 5 角钱的车费。为了省下车费，我背着行李，步行跨过白鹿原，进入西安市区，到交大报到，被

安排住在学生第 23 宿舍。我们是按系录取的，这时经过填报专业志愿，我被分配在应数 51 班，学习应用数学专业。

开学第一个月是军训。应数 51 班 30 人，编为一个排，分成三个班，每班 10 人，分别是七班、八班和九班。我在第八班，并且担任班长。我们除了常规的军事训练以外，还进行战场救护的专业训练，学习战时使用三角巾对伤员进行包扎、转运的技能。军训最后阶段进行了夜行军、战场救护演习和实弹射击。

军训之后，我们开始了课程学习，我担任学习委员。应数专业一年级学习的课程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普通物理、英语和体育。英语分为甲乙丙三种班，原在中学里学过 6 年英语的上英语甲班，学过 3 年英语的上英语乙班，学俄语的上英语丙班。我原来学的是俄语，所以在丙班学习。当时无论是主讲老师还是辅导老师，都非常热情，经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进行答疑，还反复询问我们对教学的意见。第一学期末，两门主课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进行了考试，其余都是考察课。考试结果我的两门课都得了满分，这大大提高了我对大学学习的自信心。这也是我们在大学阶段唯一的一次期末考试。

这学期开始的时候，学校的文工团招收新成员。我报名参加民族乐队，却被戏曲队招收了，在其中的乐队拉二胡。经过一段时期的排练，我们在节日参加了学校的汇演，演出了戏曲节目。

第二学期我们的课程没有变，但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的风潮一浪接一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这个人对政治本来不太敏感，一接触到课程学习，就忘记了别的事情。这时却也被基础部学生会抽去参加写作班子，准备给报社写批判文章。我们的写作还在酝酿之时，一场排山倒海的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便席卷了一切，彻底打乱了校园原来的秩序。

## 三、文革初期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揭露北大校党委压制群众革命行动的消息，立刻在交大校园引起了反响。6月2日，交大校园里贴出了数不清的大字报，质问校党委为什么把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于是，校党委宣布了停课的决定。

这时候，陕西省委派来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为首的工作团，取代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团随后宣布了一系列规定，要全校师生在工作团的领导下，按照这些规定开展文化革命。这些规定和师生们的革命激情发生了冲突，许多同学认为，工作团是来压制文化大革命的。于是在6月6日，不少同学行动起来，有的去给中央发电报，有的去西北局反映情况，有的去报社反映情况。在交大行政楼的402会议厅，以李世英为首的许多同学和严克伦展开辩论。这就是有名的交大“六六事件”。我们班的同学比较慎重，除了在6月2日写过一些大字报以外，没有人参加六六事件中的活动。

省委和西北局认为发生在交大的事件是右派翻天，让当时正在召开的西北财经会议提前结束，与会干部被派到交大工作团，每个班都安排了工作团成员。“六六事件”很快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王永婷等带头的同学受到批斗。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王永婷跳楼而死，李世英写了三封遗书后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救活了。6月18日工作团召开了全校大会，宣告校长彭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号召师生员工进行揭发批判。在工作团主持下，7月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成立了。

全校在工作团的领导下开展了“查上当，放包袱”运动，先是自我检查，然后互相揭发，人人过关。我们班由于没有人参与“六六事件”，所以这件事没有多费时间。但工作团要大家联系实际深挖以彭康为首的黑帮黑

线。我们才入校一年，对校、系领导都不熟悉，无从揭发，矛头最后集中到和政治辅导员联系最多的团支部委员身上，对他们上纲上线，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感情。

这样的运动持续了几十天。8 月初，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师生大会，会上播放了 7 月 29 日北京大专院校师生大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陕西省委宣告严克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去其交大工作团团长职务，并解散工作团。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前一段的文化革命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予以批判，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交大原来的文革委员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被大家轰下了台。同学们选出了新的校文革委员会（简称文革总会，各个系成立分会），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等同学当选，李世英为第一把手。新的文革委员会成员多数是原来的学生干部，政策性很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不要纠缠以前群众斗群众的旧账。这样，校内基本上实现了团结统一，并根据十六条精神确定“六六事件”为革命事件。

全校一万多师生员工，只有二百人左右是反对派，他们成立了临委会。这个临委会时间不长就自动解散了，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大多数师生员工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反对派存在。所以，文革中交大就是一派，这是交大与其它大专院校最大的不同。

## 四、走向社会

8、9 月份，是交大师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和社会上的文革运动相结合的时期。同学们纷纷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兵团，以这些组织的名义

写大字报、发传单。文革总会成立了“向工农”办公室，负责与工厂、农村各个群众组织联络。

很多同学贴出了北京同学来信，里面有中央领导特别是江青的各种指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江青的讲话：“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走开！”不久北京大专院校来了很多同学到西安串联，并在大会上讲话。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觉得很刺耳，但后来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听到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心里很不同意。我想，那么多老革命，不少人家庭出身不好，怎么用这个口号来解释？我自己虽然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但也有亲戚朋友出身不好，这样的口号对他们是不公的。我对人们在辩论中动不动就问：“什么出身？”特别反感。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尽管不同意，也只能腹诽，而不能说出来。

这一阶段，西安中学生成立了“红色恐怖队”，到处炒家、打人。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是很反感的。有一天我在图书馆前，看到来了一队中学生，说交大图书馆前的两尊学生塑像是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要砸烂。我们许多同学和他们展开辩论，不让他们动手。最终他们看我们人多，只好离开了。后来，文革总会派人将那两尊塑像用材料包起来，使人们看不到，避免了中学生再来纠缠。

8 月中旬，一些在省委附近宣传文革精神的交大同学被打。消息传来，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怒。于是，8 月 16 日，全校同学向西安城内进发，到省委门前请愿。请愿没有得到省委任何人理睬，同学们就在省委门前进行了静坐示威。示威活动得到了西工大、西大、西电、冶院、陕师大、陕工大等西安大专院校的支援，持续了三天，直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来讲话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才结束。这一次行动就叫做“八一六”静坐。

8 月 25 日晚，交大广播号召大家到陕西日报社去，支援西工大同学的革

命行动。原来西工大同学发现，当天的《陕西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其中第三版的“纸老虎”三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主席像的头部。西工大同学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便到陕西日报社去抗议。我看了当天的报纸，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巧合，但在大势面前，也只能随着大家一起行动。当晚约有两万多人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直到第二天，才返回学校。

当时各单位的群众组织按照对本单位领导的态度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社会上其它单位，不像交大只有造反派一派。很多单位的保守派势力强大，造反派常常受到压制。9 月初，西安工业学院的造反派因受到打击而开始绝食。交大等院校的造反派纷纷前去支援，又一次开到省委门前，开始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这次绝食很快就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他责成陕西省委尽早解决问题，并指示绝食师生派出代表到北京去汇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绝食行动结束了。因为这次绝食是从 9 月 6 日到 9 月 9 日，所以叫做“九六九”绝食。

通过这次绝食，西安大中专院校的造反派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于是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中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交大的李世英被推举为总指挥。

## 五、大串联

“九六九”绝食之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革命大串联的风气。我参加了班上五个人的串联小组：罗建国，王炳博，郭明德，江德官和我。我们是乘火车串联的，路线是从西安到武汉，从武汉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再返回

长沙，然后从长沙到北京，最后从北京返回西安。

我们先到达武汉，住在武汉大学的学生宿舍。从接触到的武大同学说话口气来看，他们属于保湖北省委的，我们就没有暴露自己的造反派身份。在武大住了几天，看了看武大和其它学校的大字报，游了几处风景，到长江大桥拍了照，就坐车南下到达长沙。



1966 年 9 月应数 51 班 5 人串联小组在武汉大桥留影。后排左起第 1 人为樊哲民。

在长沙，我们住在毛主席年轻时曾经担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在这里我们和长沙市委进行了联系，市委批准印刷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的宣传材料。我们根据市委指示找到长沙印刷厂，厂里按照我们带的资料安排工人检字排版，打出清样后让我们校对。这是我第一次进行校对工作，三校以后付印，共印了 8000 份。然后我们分作几路，去散发这些材料。我去的是桂林，住在广西师范大学。我一边到各学校散发材料，一边欣赏桂林的山水。散发完以后，我就又返回了长沙。

我们在长沙游览了主要的景点，然后就去了湘潭的韶山冲。在那里我们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展览馆，对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活动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回到长沙，已经是 9 月底了。于是我们从长沙乘火车一路北上，直到北京。

到北京后我们住在国家统计局招待所，有一个负责接待的也是交大校友，对我们很热情。这时马上就到国庆节了，统计局安排我们参加国庆节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9 月 30 日夜我们就起床了，吃过饭后排队到了天安门东侧的小街上。我们在这里直等到 10 月 1 日上午 10 点大会开始。先是林彪讲话，然后是各界代表讲话，随后就是大游行。这次参加游行的是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据说有百万人之多。快 12 点了，才轮到我们出发，一排 20 个人，从东往西前进。到了天安门前，大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可是很遥远，看不太清楚。而且游行指挥不让我们多停留，只好很快通过。

回到统计局招待所以后，大家都觉得没有看清楚毛主席，决定不离开北京，等待毛主席下一次接见。这时，我们听说交大的同学都到北京来了，住在清华大学。于是，我们就离开统计局招待所，去了清华，和我们班的同学会合了。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到北京各个大学走访老同学，观看大字报，游览北京的景点，并参加了中央文革召开的师生大会。各方面的信息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造反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1966 年 10 月樊哲民在天安门前

10 月 18 日，我们又一次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这次学生是分布在从天安门广场到北京城外 50 里的大道两侧，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分乘 9 辆敞篷车，从大道上经过。我们被安排在城外，大约下午 1 点多的时候，车队过来了，就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经过。我清楚地看到了第一辆车上的毛主席，第二辆车上的林彪，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大家都激动万分。

这次接见结束后，我们就乘火车回西安了。这个时候的火车，车上已经拥挤不堪，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几个小时。

## 六、进入校刊编辑部

回到交大以后，已经是 10 月下旬。我看到校刊编辑部招收人员的布告，就去报了名。经过审查，我就到校刊上班了。

当时的校刊，是一张小报，叫《人民交大》。那时的印刷，还处于铅字排版的时代，需要工人照着稿子检字，印出小清样，让编辑人员进行校对，划出错误的地方，工人进行修改。每篇文章经过一校后，工人就按照版面设计，把多篇文章拼成报纸版面，印出大清样，再进行校对。一般最少经过三校，最后的清样由编辑签字付印，工人们开动印刷机印出报纸。因为这报纸是面对社会的，我们除了给指定部门送去一部分外，还要到城里去卖报。我到编辑部后，一开始就是搞校对工作。由于我在长沙曾经搞过校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很快就适应了。

这时候编辑部有十几个人，高年级同学居多，机械系六六届同学张振三是总负责人。房立民、白延生是教工，张振三毕业后由房立民总负责，后期则是由孙可平总负责，白延生是摄影记者。我做了一段校对工作后，对编辑部的工作熟悉了，也开始写稿，改稿，设计版样。

经过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的学生，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非常明确，西安的保守派组织很快瓦解了。但造反派内部出现了矛盾，我听到一个知道统指内情的同学说：造反派内一场太平天国式的悲剧正在形成。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怎么正确对待原来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群众。李世英认为应该团结这一部分群众，这一观点反映了交大文革总会的意见。但西工大、西电、冶院等院

校的学生领袖们认为李世英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一场反李世英右倾的运动就在西安大专院校展开了。

为了对反右倾运动进行反击，校刊编辑部组织撰写了《告全市人民书》，把交大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系统阐述出来，在西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章的执笔者是李广亮，其中与其它院校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部分，经过大家反复讨论修改才定稿。

文革总会对校刊的作用进行了策略性的安排，校刊作为交大总会的机关报，上面刊登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是反映交大文革总会意见的，办报宗旨是紧跟中央的指示精神，紧跟运动的大方向，而另一个小报《惊回首》则作为群众组织小报，专门刊登与统指其它院校的论战。交大还出版一份《六六通讯》，刊登北京以及各地的文革动态，提供给文革总会以及校内各单位参考。为了在校刊上以群众的名义发表文章，校刊编辑部本身也组成了一个“激扬文字”战斗队，我们有些文章就是以这个战斗队的名义发表的。

校刊的师生们对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是很反感的，并设法抵制。有一段时间人们吃饭前都要念一段最高指示，校刊人员在集体开饭前就专门念这一段：“最高指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然后在笑声中开饭。校刊编辑部从来不搞当时流行的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活动，有些人的班级搞这些活动时，大家也都借口在校刊工作而躲开。

到了 1967 年 1 月份，一场大规模的造反夺权运动从上海蔓延到全国，称为“一月风暴”。西安的造反夺权运动迅速发展成打砸抢，而且西工大等院校把打砸抢看作是造反派的脾气，把交大反对打砸抢也算作右倾的一条罪状。他们的校刊登出了“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文章。这些观点很自然地遭到交大师生的坚决反对，应数 51 班的“追穷寇”

战斗队写出了“打砸抢的十大罪状”一文，校刊立刻予以刊登。我们还根据《参考消息》上英国媒体对反右倾的评论，写出了“看所谓的反右倾赢得了英帝的喝彩”一文。这些文章对西安市反对打砸抢、不满反右倾的群众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另外，当时社会上好多地方的居委会和生产队干部受到了批斗，他们到交大来反映情况，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十六条，就写出了“不许斗争居委会和生产队干部”的文章，对社会上的纠偏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交大的支持下，西安市很大一部分群众站到了交大的立场上来。2 月份，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成立，随后“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农总司）、“机关造反总司令部”（机总司）、“文艺界造反总司令部”（文总司）、“中学革命造反委员会”（中革会）等组织陆续成立，与交大共同组成西安造反组织的一大派，而“工联”、“农造司”、“统指”的其它院校成为另一大派，形成两大派对立的局面。李世英名义上还是统指一把手，实际的领导权已经被西工大孙福林等人所控制，其它院校都跟随着西工大。所以，后来的统指就是指西工大等院校，而不包括交大。

3 月 2 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西安两大派组织负责人和 21 军、省军区等军队领导人时明确表态：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他还宣布，中央决定派 21 军到陕西参加支左，大学要整风，进行军训，工矿企业要军管，抓革命，促生产。于是，一场长达 70 天的反右倾运动结束了。

## 七、军训前后

3 月中，西安大专院校进入了军训。交大组成西安革命师生军训第一师，

由 21 军 61 师的政委孙长兴担任师长兼政委，交大总会的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分别担任副师长和副政委。校刊的同学没有返回班级，而是作为直属连队参加军训。来到校刊的解放军干部有两位，其中一位是 21 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牛明亮，他后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他们的到来把部队的政治工作作风也带来了。

这次军训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展谈心，原来在“查上当，放包袱”期间产生隔阂的同学互相谈心，消除了矛盾。这些情况我们在校刊上都报道了。我们校刊的同学自己也抽空返回班级去谈心，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去“斗私批修”。

为时 36 天的军训结束了，我们是在下雨天游行送走解放军的。一个多月的接触，使我们与解放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的时候都有恋恋不舍之意。

4 月 23 日，毛主席在“四二三”批示中称李世英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并提出“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消息传来，交大同学受到极大的鼓舞。

统指其它院校认识到了打砸抢的错误，与交大展开互访，修好关系。先是西工大校刊编辑部的同学到交大校刊来访，他们承认了宣传打砸抢的错误。我们也检讨了在论战中把他们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后来是西北农学院的校刊编辑部同学来访。我们也到其它院校的校刊编辑部拜访，交流经验体会。

这一阶段西安两大派的关系相处得相当不错。6 月 1 日，西工大、西电同时成立革委会，6 月 3 日，冶院成立革委会，交大都分别派出代表团祝贺。我自己先后参加了交大去西北大学、陕工大、西北农学院和位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的代表团，向他们成立革委会表示祝贺。7 月 1 日交大革委会成立，

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分别成为交大革委会的第一、二、三把手。这天，西安的大专院校、工人、农民等两大派组织都派出代表团前来祝贺。

但是，7 月 22 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本来已经变好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我们校刊编辑部当时就认为，这个口号不但不能制止武斗，反而会使武斗升级，因为每个组织都可以说自己是在武卫。果然，全国的武斗规模迅速扩大。西安的两大派，特别是工总司和工联下属单位，冲突剧烈上升，先是拳头，再是长矛，最后演变成真枪实弹的战斗。与此同时，陕西省各专、县两派组织也纷纷成立“武卫队”，抢夺武器，使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西安的解放军支左委员会由四家组成：21 军，省军区，兰州空军，总后 203 部队，但起决定作用的是 21 军。21 军对交大的态度，由军训时的亲密无间到 7、8 月份变得日益疏远。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与国防工业联系紧密的一派，西工大、西电是国防院校，工联在航空工业、兵器工业的单位中占优势，以致西工大、西电等院校和工联喊出了“军民联防，文攻武卫”的口号，把矛头对准了交大和工总司派。21 军的“支派”行为最终使矛盾爆发，而发展为“八五静坐”和“九二武斗”。

## 八、八五静坐和九二武斗

8 月 5 日这天，是原交大附中成立革委会的日子。李世英代表交大革委会去祝贺，并发表讲话。我也被校刊派去采访。成立大会直到天黑才结束。

当我们从交大附中向交大校园走来的时候，看到交大同学排着队向城里开去。一问之下，原来是去向支左委员会请愿。起因是西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交大红卫兵总部是它的下属组织）所办的《红卫兵报》因反交大的右

倾，在 5 月份被停刊，这时又被支左委员会批准复刊，这显然是支一派、压一派的表现。交大经过交涉无效，于是在 402 会议厅进行了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决定去请愿。我作为校刊记者，也跟着他们去了。

队伍先到玉祥门的支左委员会接待站，但一直找不到人，最后决定把队伍拉到建国路的支左委员会联络站。工总司等组织纷纷前来支援，同交大一起成立了“西安地区八五静坐总指挥部”。

指挥部发表了《八五静坐声明》，并准备办一份报纸《八五战报》，发出自己的声音。校刊编辑部派我去参加《八五战报》的编辑工作。我到了编辑部，看到有交大“抗大战校”的同学，还有《陕西日报》的几位编辑。《八五战报》是我在文革中参与编辑的第三份报纸。在此之前，除了编辑校刊，我还被派到总后西安的工业系统去，帮他们创办《军战报》。这次编辑《八五战报》，因为有《陕西日报》的编辑参加，我也从中学习了不少新闻编辑出版的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八五静坐的工人越来越多，很多工人因为工厂内部武斗无处安身而到静坐现场来。交大校园也成了许多工人的庇护所，后来又接纳了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他们在成都受到对立派武力打击，就扒火车到西安来，住在同一观点的交大。

这时西安两大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各自简化为一句口号，工联那边的车队经过，车上的人高喊：“21 军好，21 军好！”而工总司这边的车队则高喊：“八五静坐好，八五静坐好！”

统指、工联那边在积极备战，和他们观点相同的解放军装甲兵学院把坦克开到大街上来，向交大、工总司这边示威。到了 9 月 2 日，两大派终于在西郊酿成“九二武斗”。事件开始是庆安公司内部的两派武斗，工总司派了武装人员去解救自己这一派，工联则派武装人员把工总司的队伍包围起来，

双方发生冲突，死伤了好些人。工总司的一个车队在经过西安仪表厂时，发现前边有工联的埋伏，就高喊：“21 军好，21 军好！”工联埋伏的人员以为是自己一派，就放过去了。但他们很快发现上当了。后面又来了一个车队，也喊着：“21 军好，21 军好！”他们以为又是工总司的人在搞鬼，开枪就打。不料这个车队却是西工大前来支援工联的，结果被自己一派给打误会了，当场死亡 10 人，伤者更多。西工大此前在试验炸药时还炸死一人，合计死亡 11 人，是西安大专院校在文革武斗中伤亡最多的。西工大后来在校园中给这 11 人建墓立碑，把他们作为烈士对待。一年后工宣队进校，将墓和碑全部毁掉。

“九二武斗”后，西安的形势更加严峻。9 月 3 日，沈荣水到校刊编辑部来传达校革委会关于疏散的决定。他说交大周围已经被工联一派包围了，学校外面的陕工大、兴庆公园、计量局、第八设计院以及和平门城楼都架了机枪，对方不久就会向交大校园进攻。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革委会决定，让大家尽快疏散回家，等形势稳定后再发通知让大家返回。

我于是在 9 月 4 日返回了蓝田县老家。过了两天，就听到广播上传来中央发布的制止武斗的“九五命令”，心想这下西安的武斗总该被制止了吧。果然，到了 9 月下旬就收到了交大的来信，通知返校。

返校以后，我听到几则消息。有两则是关于李世英的，其一是周总理指示李世英去兴平处理所谓“农造司”抢“302”国防库的事，其实那是一件有人“谎报军情”的事，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其二是在“九二武斗”中，两大派都有更大的武斗计划，工总司准备把全省铁路工人调到西安，对工联的包围圈从外面实行更大的包围，里应外合地打击工联的武装。李世英认为这会死伤大批人，不管是哪一派，都是群众，所以他极力劝解工总司的司令马希圣取消武斗计划。最后马希圣被说服了，让被包围的工总司人员悄悄撤

出来，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冲突。这两则消息都说明，李世英对制止大规模武斗，功不可没。

还有一则关于西电学生领袖李洪明的消息。在“九二武斗”期间，李洪明被工总司抓住。工总司的人因为自己一派有人被打死，要找李洪明报仇。李世英及时阻止了他们，派人把李洪明送到交大保护起来。交大在疏散的时候，武登才派人悄悄把李洪明放了。李洪明一回去，立刻受到英雄式的欢迎。西电召开了全校大会，李洪明被抬在担架上，绕场一周，向全场频频招手。他的经历被渲染为机智勇敢地摆脱看守、逃离魔窟的传奇故事。这件事说明，交大的学生领袖头脑是清醒的，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曾经的战友，没有因为当时的两大派武斗而乘机报复。

“九二武斗”后不久，校刊有一位同学去韩森寨采访，被东方厂工联派的冷枪击中，伤及腹部。幸而他身体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恢复了健康。

## 九、复课闹革命

文化革命发展为武化革命，是交大师生没有料到的。疏散后返回的同学们，对文革感到心灰意冷，再也没有运动初期那种豪情。10 月份中央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大家又回到了课堂。原来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兵团等组织都解散了，学校又恢复了教学秩序，有些班还发生了争夺教授的现象。全校只有一个组织“抗大战校”表示要用抗大精神学习，不愿回到班级。

在文革的高潮中，交大仍然有一部分师生关注着世界科技的发展。这些师生举行了“科学纵横观”的座谈会，指出电子学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电子工业。这次座谈会发了纪要，很多同学读了后都

非常激动。后来，《科学纵横观》纪要流传到全国，受到南京大学一位老师的高度赞扬。实践证明，《科学纵横观》的看法是正确的。就在我们狂热进行文化革命时，世界上的电子革命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直到四十多年后，中国在电子和信息领域奋起直追，才逐渐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交大应数专业的主要目标是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与数学、电子学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应数 51 班在复课中学习的课程有微分方程、计算方法、103 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和 X2 计算机的程序设计。我也回到班里上课，只在课余去校刊编辑部继续工作。前一段搞革命耽误了一年多学业，这时大多数同学都争分夺秒，努力吸收专业知识，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按中央文件的规定，66 届同学从 1966 年 12 月份开始毕业分配（9 月 1 日起计算工龄），67 届同学也于 1968 年 7 月份毕业离校了。校刊编辑部许多骨干都离开了，又补充了一些低年级同学。同时，原学校机关的干部也补充进来好几位。

1968 年开始，上面又下达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使一部分人的革命造反意识又活跃起来。3 月 28 日一早，我刚起床，就听到楼下一阵喧哗。当时我住在 23 宿舍 4 楼，从窗口往下看，只见几个人推着一个人在游街。一打听，原来是抗大战校的人对已经被打倒的校长彭康进行游斗。这一段时间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复课上了，现在看到又有批斗人的现象，感到很突然和不理解。这天，曾经为交大的发展呕心沥血的彭康校长被游斗致死，这是交大在文革中特别重大的损失。

这个时候，陕西省正在积极筹备省革委会的成立，要准备两篇文章，一是《人民日报》社论，二是大会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省上让几个大学起草这两个文件。交大接受了这一任务，委托校刊来完成。当时校刊成立

了写作班子，我是其中一员。这两篇文章完成后，经过革委会审查，向省里交了上去。在5月1日陕西省革委会成立时，交大校刊所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稿被采用了，标题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这篇文章的主笔是陈克涵。但致敬电用了另外的文稿，没有采用我们的。

西安地区的武斗虽然早就制止了，但陕西省各专、县的武斗仍然在继续。例如我的老家蓝田县，当时属于渭南地区，渭南地区十几个县的两大派组织分别联合起来，组成跨县的武斗大军，攻城掠地，围点打援，大有战争的架势。中央这次下了决心，在针对广西省武斗的“七三布告”之后，又发出了专门针对陕西省武斗的“七二四布告”。为了贯彻布告精神，省军区出动了解放军部队，对武斗组织实行武装包围，宣读中央文件，强行收缴武器，终于使各专、县的武斗停息下来。这样一来，西安到各专、县的联系畅通了。

就在我们的复课顺利进行接近一年之际，北京的清华大学却武斗不止，毛主席派了首都工宣队进入清华，收缴武器，制止武斗。清华武斗的特殊情况却影响了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被派驻了工宣队。交大的工宣队是8月29日进驻的，随后军宣队也进驻了交大。工宣队和军宣队接管了学校的全部领导权，从9月份起，以班级、教研室为单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于是，我们的复课被迫停止。此后两年直到毕业，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复课。

## 十、校内斗批改

交大工宣队的组成，有原来工联的，也有工总司的，但工联占优势，而且掌握着领导权。工总司的工人师傅对同学们很客气，但工联的师傅和同学

们的关系就比较紧张。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芒果事件”。

8月份，毛主席把巴基斯坦客人送给他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工宣队又把这些芒果复制成腊制品，向全国转送。其中北京第一机床厂把一个蜡制芒果送给西安交大革委会。工宣队领导很不高兴，认为应该送给工宣队，而不是革委会，这代表着是突出工人阶级还是突出知识分子。所以，当交大同学准备开会庆祝时，被工宣队压下了。到了国庆节，有部分同学想带着芒果参加游行，工宣队知道后，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阻止，终于把芒果堵截到校内。

另一次是工宣队和我们校刊编辑部发生冲突。有一段时间校内各项工作做得不够好，上下都有意见。校刊发了一篇“关键在于领导”的评论文章，一下子让工宣队领导发火了。工宣队领导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共十几个人来到校刊编辑部，轮番讲话，严厉批评我们，我们唯有洗耳恭听。巧合的是，几天之后，《人民日报》也有一篇评论叫“关键在于领导”，内容有不少和我们的观点一致，工宣队领导再也没有话说了。

这一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头一年，交大的教职员工很多子女要去插队，校刊也紧跟形势，配合了宣传动员。

12月份68届毕业生分配，校刊编辑部又有一些同学离开。更多的机关干部补充进来。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校掀起了斗批改的高潮，从1968年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愈演愈烈。中间有一段时间大抓反标，结果弄得到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这样过了一阵子后，驻校刊的工宣队师傅告诉我们，抓反标方向错了，是阶级敌人故意布的疑阵，让我们围着反标转，而放走真正的敌人。

于是，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持续进行揭批运动，许多教师和干部、甚至

学生受到批判，致使一部分教师和干部自杀，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个时候，珍宝岛事件发生，全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与苏联打仗的方面。校刊编辑部查找了中苏边境的历史资料，在校刊上专文向师生员工介绍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来龙去脉，普及了这一方面的历史知识。接着便是中共九大召开，校刊用更多的篇幅宣讲九大的意义。

九大之后，交大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和教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整党活动，重建各级党组织。这次整党，由非党群众评议党员，我们班的同学也到教研室帮助整党。我在校刊工作，没有参与他们的行动，只是在校刊上配合宣传。

8 月份，中央发出准备打仗的命令，在工宣队领导下，学校进行了动员，准备把一部分教工、家属疏散到外县去。有些家属因为怕下放后回不来了，不愿下去，阻力非常大。我和班上同学跟着教研室领导一起去做说服工作，终于使战备疏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学校同时动员同学们下厂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于是，我随着班上同学开始了下厂劳动。

## 十一、下厂劳动和毕业分配

下厂劳动对我这样农村出身的人很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农业完全不同的生产环境。我以前就下厂劳动过，文革前我们班在交大实习工厂的热处理车间劳动过一周。到校刊编辑部之初，我也随校刊一批同学到西北国棉五厂进行劳动，担任推纱的辅助工。这次我们应数 51 班的下厂劳动差不多有一年，并下去好几次。第一次分为三个组，一组去兰州炼油厂，一组去西安铁路局机务段，一组去西安灞桥热电厂。兰炼有计算机，去的同学可以结

合专业学习编程，其余两组是纯粹的劳动。应数教研室的老师被分别安排在这三个组中。

我被分在灞桥热电厂这一组，除了十几个同学以外，还有几位老师，包括游兆泳老师和年龄很大的徐桂芳老师。我被安排在燃料分场运行值班，维护输煤皮带的正常运行。在这里上完班，手、脸都变黑了。我后来毕业分配，就被分配到这个厂工作，这次等于提前来熟悉环境。老师们在走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道路，他们参加劳动很认真，和工人关系相处得很好。徐桂芳老师会修手表，他在劳动之余帮助几位工人师傅修表，深受大家欢迎。

在灞桥热电厂劳动之后，我们返回学校。这时去兰炼和机务段的同学也都回来了。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去了西郊的西安铸造厂劳动。这次只有同学，没有老师，他们都回教研室进行斗批改。

我们在铸造厂的工作是对出炉后的铸件进行清砂，体力消耗较大。这次劳动，厂里给每人每天补助 2 角钱，一个月可有 6 元。这在当时对同学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以买 75 碗 8 分钱的阳春面。所以虽然干活累，大家情绪蛮高。

铸造厂的劳动结束后，我们又到了西安电池厂劳动，这里每天可得到 3 角钱补助，更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电池厂的产品是手电筒用的大号干电池，整个制造过程是在生产线上。我们被安排在生产线上干活，是不断重复的简单操作，但必须动作敏捷，否则产品就在你这个环节积压了。经过几天的训练，大家都能熟练操作。

这时已经是 1970 年春季了，中央发出了“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各地都紧张地行动起来。电池厂所在地属于西安市碑林区，碑林公安分局由于人手不够，看到有交大学生在此地劳动，就请求交大派学生支援，并答应同样每天给 3 角钱补助。于是，王增辉、王炳博、王兴朝、陈镕润和我共 5 位同

学被抽调到碑林分局，局里再把我们安排到大新巷派出所。

所长听说我是交大校刊编辑，就让我帮他们搞内勤，整理材料，写报告。其他四位同学搞外勤，查户口，家访，抓小偷流氓。当时我想，这不就是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吗？与“一打三反”有什么关系？后来猜想他们可能把精兵强将调去抓反革命，而让我们接替他们的日常工作。

这里要写的报告，就是申请抓捕人的报告。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三家变成了一家，没有互相的监督、制约作用，只要下级公安部门写了报告，上级一批就可以抓人。我把派出所以前写的报告看了一遍，就知道该怎么写。但派出所能处理的都是小案子，而且案件不多，所以，在外勤工作忙时，我也去跟他们跑外勤。

6 月份到了，中央发出“关于 1969、1970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要求毕业生从 7 月份开始分配，月底前分配完毕。于是，我们结束了下厂劳动，回校等待分配。

我们在工宣队的领导下，进行了毕业鉴定。先是各人写出自我鉴定，向大家宣读，由同学们提出意见，再修改定稿。然后是组织鉴定，鉴定后本人签字。

毕业鉴定完成后就是工作分配，这是教研室老师负责进行的。我被分配到西北电管局。这个单位在西安市，我就不带行李，先去报到。电管局把我再分配到灞桥热电厂，我这才带着行李，彻底告别生活了 5 年的交大校园。

## 十二、结语

总结这 5 年，我们大部分时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而这个革命已经被历史所否定，称为十年浩劫，不但没有对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反而起了破

坏作用。但在这种非常的形势下，交大的学生领袖们，面对内外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原则，运用智慧，使内部没有发生武斗，也没有组织师生参与社会武斗，还对制止社会上的大规模武斗作出了贡献。他们维护了内部团结，尽可能地保护了大多数师生员工，保护了校园和教学、科研设施，使交大在文革中的损失减到最小，没有因武斗而死一个人，在全国独树一帜。

文革结束后，交大能迅速在教学、科研上做出成绩，八十年代居于全国高校前五名之列，是和文革中人员与设施得到保护、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分不开的。尽管这些学生领袖后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在我们大部分同学心目中，他们仍然是我们钦敬的楷模，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没有正常完成学业，但在交大五年中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成长。

首先，第一学年加上后来的复课，上了两年基础课和专业课，获得了基本的专业知识，对以后的继续学习打下了基础。

其次，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负责的育人精神。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使我领悟了两点：（1）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大学不仅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学的能力；（2）在学习中，不能仅仅把自己当作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达到理解就够了，而是要把自己当作老师，达到能向别人清楚表达的程度。

再次，老交大底蕴深厚的校风和学风，使自己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自信。自己获益更多的，是从许多同学身上学到的。交大的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材生，东西南北中，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各个同学的优秀品质和多才多艺使自己无形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我在校刊编辑部几年的工作，相当于学了新闻出版专业，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写作水平。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对自己的

专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离开交大多年，我仍然时时怀念自己当年成长的美丽校园，怀念老师们的谆谆教导，怀念与同学们的朝夕相处。在离校 27 年之后，我在海外通过互联网与应数 51 班老同学取得了联系，不禁激动万分，写了如下的诗句：

风华年代荟长安，兴庆湖边不解缘。
武场演兵齐滚打，绿茵习课互磋谈。
五年风雨同舟渡，四海峰峦各力攀。
莫道天涯途漫漫，万维网上话沧田。



**作者简介**

樊哲民，旅美学者，计算机软件专家。1945 年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1965 年考入西安交大数理系应用数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西安灞桥热电厂、西安热工研究所担任工人、技术员，并参加唐山地震后发电厂控制计算机系统的恢复工作。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工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航天部第四研究院从事卫星通信和计算机软件研发工作。1987 年起游学美国，在北德克萨斯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先后从事软件工程、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系统开发。退休后定居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

从小喜欢中国古典诗词，2000 年之后，参加了西安交大老年诗社，经常利用回国之际参加诗社交流活动。

# 母校歲月

## ——西安交大六十年代廣播臺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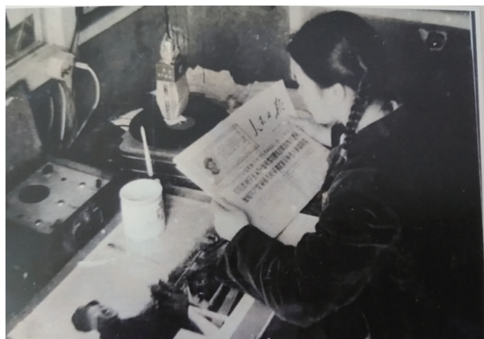
■/王　經

年轻时不相信“弹指一挥间”，总觉得那是文人的夸张，时间哪有这么快！然而随着母校 120 周年校庆的来临，看到广播台校友制作的新旧照片影集，真真切切地感到时光如梭：转眼间我和昔日校友都是年过古稀之人啦！

当我 1962 年考入西安交大时，还是一个懵懵懂懂、天真单纯的小女孩；一晃 54 年过去，现在已是白发苍苍、饱经风霜的古稀老太了！回忆在母校的日子，我的生活丰富多彩、酸甜苦辣都尝过。但在我的心目中，交大广播台播音组始终是我青春岁月最温暖的、最值得依恋的集体。我与当时所在播音组同学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我和班集体及其他课外集体的友谊。

### 一流的团队、广播台的每周一歌、周末音乐会和 402 诗歌朗诵会

我自幼喜欢诗歌朗诵，在西安高中时就参加过学校话剧队。1962 年 9 月入学那天，在热闹的新生接待处，一眼就看准招收新人的交大广播台。有幸考入播音组后，在几位高年级师兄师姐们的耐心传帮带下，很快就进入播音室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播音员。每当轮到我中午播音时，就在前几天要花费



图为 1967 年 6 月王经在播音

几倍的时间精心“备稿”。那时，我们的备稿几乎与专业广播电台一样严格：首先要明确稿件主题、中心思想，对稿件中的每句话的逻辑重音、乃至每个字的准确发音都要认真查清。

播音组来自全校各个班级，成员来自全国各省市，普通话虽不错，但许多家乡乡音总是“藕断丝连”。我是西安出生、西安长大，陕西音调常常不自觉流露。为此我没少下功夫纠正。尤其是值班当天中午，必须在上午第四堂课提前来到位于行政楼 4 楼的广播台播音室。要迅速备稿，划出应注意的地方，标上拼音、重点。即就这样，我第一次值班时还是没有念准“赫鲁晓夫”的正确音调，打了一个大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在备稿时我不仅要标出拼音四声，还要在可能出错的地方标出相近的汉字，以提醒自己。就是这样千锤百炼，播音组在 1964 年测试时，要求所有能进入播音室的男女播音员的播音水平，“打咯率”必须达到 0.1 以下，即低于千分之一！因此我们私下里骄傲地说，咱们交大广播台的播音水平一点不逊色当年专业的陕西省广播电台呢！

交大广播台的音乐组、记者组、编辑组特别是和播音组共同值班的机务组同学们，也是在报名人中千挑万选录用的。他们在各自专业班级里是学习的佼佼者，这样广播台各组成员就有精力和时间在广播台的各类业务中大显身手。那时的广播台是由四、五十名本科生自己管理、组织的社团（仅有一位工人同志全职工作，负责全台治安管理及播音设备的安全运行）。大家同心协力、无私奉献把交大广播台办成深受全校师生欢迎的、交大校园里响当当的一流社团。在当年没有电视、网络、手机的年代，缺乏业余文化生活的

同学们，除了周六晚上露天广场观看的电影外，交大广播台的活动成为大家不可或缺的文化消遣和熏陶。广播台不但在每天中午的播音时间，把学校党委、校行政的重要信息、国内外、校内外近期发生的各类新闻传达给正在午餐的同学们；同时，每天要播送音乐组精心挑选的脍炙人口的每周一歌（学



1964 年交大广播台播音组合影

校党委宣传部印发歌单发到每班文娱委员手中）；每逢周六傍晚，行政楼前绿草地上坐满了辛勤学习了一周的师生们，大家惬意而舒畅地或躺或坐的欣赏着包括时尚的、民间的、欧美古典的中外名曲的周末音乐晚会。虽是户外播放，但来自交大理科专业的机务组高手们，配置出的最佳音响效果，可以与音乐厅室内效果相媲美——更吸引人的是，在优美的音乐声中还伴有播音员柔柔的解说。这是音乐组的“专家”们精心准备的对名曲的解说词。流畅适时的解说和优美的音乐，恰似一股股清泉涤荡着听众的疲惫，也在不经意中提高着理科生的音乐素养。

配合毕业晚会、学雷锋活动等各类学校重大活动，广播台与文工团联合在行政楼 402 室不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也吸引了大批诗歌爱好者。这是 60–66 年国家自然灾害期间交大学生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和文娱活动。也是迄今为止我经历的国内外各高校里最成功最吸引学生、最健康的文娱活动。这得益于我们敬爱的彭康校长在那个时期倡导的“思想、学习、生活”三活跃号召，我们在丰富多彩的健康活动中忘掉了饥饿，快乐的度过了困难时期。

## 难忘行政楼楼梯上奇特的邂逅——我和彭校长，402 自修室

在广播台最难忘的还有行政楼 402 室。当年交大学生图书馆上自习占位子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我们广播台的同学在行政楼 402 室上晚自习真是得天独厚。402 是位于行政楼 4 楼东端的约有 1000 平米的学校行政的大会议室，其熄灯时间不受教室管制（交大校规规定所有大小教室、图书馆每晚 10 点一律熄灯）。由于广播台紧靠 402，而各组的工作需要有地方加班，所以不知何时，广播台赢得了“特权”——广播台台友们可以去 402 上晚自习。除了可以享受自由的熄灯时间，最重要的是可以和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交流学习“情报”：你们的高数教到那儿？考试是什么题目？你们的物理实验是什么？我能拜您为师学德语吗？等等话题都是为了学好功课啊。广播台的同学们虽然为了广播花费了不少时间，但大家各自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当年的交大，进入行政楼是很严肃的事。因为那时的学校行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都在行政楼。一不当心在楼梯上就会碰到校长、书记。一次，我为了晚上到 402 上自习，中午播音前就扛着制图板上楼。走到二楼碰到彭康校长下楼。他停下脚步让我先上。我慌忙放下图板怯生生的向他问好，他问我是干什么去？我说我是播音员要去 4 楼播音。他笑了笑，又问我是几年

级、哪个专业、图板重不重？你喜欢交大吗？看着和蔼可亲的校长我也不慌了，一一回答他的问题。时间快到了，急忙向他告别。他居然要帮我扛图板上楼！当然，我婉言谢绝了，美滋滋的爬上 4 楼准备播音。与彭校长的这次偶遇经历，一直藏在我的心底。它暖暖的滋润着我的心田，使我倍加热爱我的母校。为什么呢？这与当年考大学对考生的政审相关。

说来话长，1962 年我高中毕业考入交大除了依靠优异的学习成绩，还有幸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我们敬爱的彭康校长！ 1962 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大学招生计划锐减。西安交大 1961 年之前本科招生 1500 人，唯独 1962 年只招 750 人！竞争可谓激烈、残酷。但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彭康校长作为老革命、国家五级高干，他高瞻远瞩、正确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尤其是在招生中执行“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较为宽松的政策，招收了成绩优秀，表现好、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格优秀青少年进入大学校门。

那时候，地处西北相对落后地区，西安交大的招生分数相比于北大、清华名校一点不逊色，这就是得益于西安交大招生中比较宽松的政审。交大学生出身高干、革命军人的不多，普通工农兵家庭、社会各阶层出身的比例较高。仅就我所在的制冷 21 班不完全统计，全班 30 人有 60% 的同学家庭成分是小商、自由职业和职员。而职员这个家庭出身比较复杂。有的家长是教师但又是脱帽右派，有的虽是国家公务员，却有各式历史问题；有的母亲在国家机关工作，父亲则在解放初因历史问题被关押、劳改过。表面看来交大这些学生的政治条件不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非红五类出身交大学生，无论在校期间还是毕业后走进社会，在历次政治风浪中

都表现很好。大家牢记党和国家的培养恩情，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造福人民。

特别是文革时期，全国高校唯有西安交大没有校内派别恶斗，是罕见的全校一派。尽管经历过工作组的迫害，但同学们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朴素的“报恩”思想，投入那场浩劫。交大一派（交老总）的掌权，避免了在不少学校里发生的兄弟互相残杀、惨案迭起、血淋林的武斗恶果。追其原因，这似乎与交大学生人性善良、不好武斗、甚至胆小怕事有直接关系。尤其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们受家庭出身影响，尽管也有不同看法，但摄于自己低下的政治地位，哪里敢另立山头？这个可能不恰当的原因恰恰证明了彭校长执行的“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较为宽松的政策的高明和正确。他挽救了我们一代人！然而可悲的历史悖论：他这样可亲可爱的老革命，国家部长级老干部，彭校长本人却不幸死于少数激进的造反派手下！！这也是我们深受其惠却无可奈何的这个时代的学生们心中永远的最痛！

## 反动血统论的牺牲品：含泪离开广播台——不堪回首的一幕

因为我父母都是四十年代大学毕业生，1949 年后他们进入国家林业部门工作，1957 年调到甘肃白龙江林业局为国家正式干部，即是公务员。按照当时国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但如前所述，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却从中学就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我父亲是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专业 1942 年毕业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爱国热血青年，他拒绝了西安银行金融领域的优渥工作，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远赴绥远（内蒙）偏远地区办实验农场。然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他因政府拨款不到位而不慎掉进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农场以失败告终，他回到西安

步入歧途。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重回西北农学院负责园艺场工作。

1949 年解放后，他被送入人民革命大学，在这所共产党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学校，他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获得新生，学习毕业分配成为秦岭林场的国家干部。但 1957 年一场肃反又重提旧案、被定成“人民内部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



新老播音员从左至右前、王经、李罗、后李念慈、闪瑞昌、史跃武、张作民

就是这顶不是帽子的帽子，使我们子女压在家庭出身不好的大山之下。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父母对我们严格要求，学习上必须出类拔萃，稳保班级前三名。要听老师的教导，积极上进争当三好学生。1960 年、1962 年我和哥哥都以优异的成绩分别从西安重点高中毕业。那时升入大学就意味着将会成为国家干部，所以高中人事老师要对我们进行政审，首先去父母单位外调。出人意料的是，那位在深山老林的白龙江林业局局长、党委书记给我父亲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老王是我们林业局的好干部，任劳任怨，能吃苦，和工人打成一片。他的子女不应受他历史问题的牵连，可以录取进大学，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人才。”就这样 1960 年哥哥顺利考入交大机械系；我也在 1962 年考入交大动力系（我们有自知之明，没有报考当时的保密专业）。

然而正如先贤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以福所依。进入交大的年月，以文革为界，我经历了水火两重天。文革前，我感到交大不同于我们高

中，同学们不以家庭出身论高低，而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我不再把家庭出身问题压在心上。特别是进入广播台后，我知道广播台是学校党委宣传部的重要部门，我能进入广播台多么难得！这是学校对自己的信任，我要加倍珍惜这个机会，绝不能因为自己的失误给党的宣传工作带来伤害。在师兄师姐们的耐心教导下，我很快成为播音组骨干成员。1962–1966 年初，学校乃至全国的团结一心发展经济、各党派同舟共济的良好和谐风气，使我这样天真、幼稚、简单的年青人，政治上缺乏心机，简单而忠诚。这段时间我卸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用功学习、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度过我人生最快乐的青年时代！

然而暴风雨般的文革把我从山顶摔下低谷。文革初期，大家积极投入运动。随着 64、65 届播音组学哥学姐的毕业离校，我和其他 67 届同学成为播音组大哥大姐。那时年轻气盛，凭借我高亢的嗓音，我多次参加了交大与对立派的许多场唇枪舌战。装有九只高音喇叭的播音车号称“交大九头鸟”，成为我们的“战场”。每逢论战时间，大批群众聚集在汽车周围倾听我们的论战，说到关键段落，听众掌声雷动。在西安高校大辩论的“战场”，我们两位播音员的名声大振，导致对立派把我和我的好朋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首先根据我的出身把我们定为交大的“反革命喉舌”。他们居然制作出每个字近一米边长见方的大幅竖直标语，从交大校门口行政楼楼顶垂挂至楼下，内容是“绞死反革命喉舌 XX 和 XX”。我的名字不仅倒写，还被画上大红叉。以至于我父亲的好友、我的一位叔叔听到别人传说后，误以为我被对方反对派杀害！他心痛不已，专门骑着自行车来到交大门口打探。所幸我在几天后去他家看望他高龄的母亲我的奶奶，才让他们放心。尽管这样，我依然毫无顾忌的快乐而辛苦的“战斗”在播音广播车上，依然自豪而勇敢的播送着我们记者组同学撰写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檄

文——自以为是在干革命，自以为自己是捍卫革命、捍卫毛主席的小将。今天看来真是“可怜愚儿不知情，错把稻草认大树”。那时的我只是一名完全没有政治头脑的糊涂虫！

随后的事态我至今仍非常糊涂。50 年前的交大秋天，仍然炎热闷湿。工宣队进校，停课闹“革命”。记不得是 9 月还是 10 月的一天，我和好朋友双双被停止了交大广播台播音组的“工作”。从那一天我就离开了我钟爱的播音室，再也不能骄傲的呼叫“交大广播台，现在开始播音”；再也不能上到 402 做作业；再也不能在每天上午播音结束后，自豪的报上自己的名字，向听众们再见；当然，再也见不到那位和蔼可亲的瘦老头——彭康校长（他老人家已被游斗致死，离开了人世）。这个决定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按照我的急脾气，我想去质问那时的领导。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好朋友们劝住了我。他们说：王经，你太天真了！就凭你的家庭出身，你还敢上广播台？而且明年我就要毕业了，只好强忍心中悲痛复课闹革命，出外实习，专心学业和分配。没有人告诉我是何原因？我只是隐约听到，这是工宣队的领导做出的决定。因为他们认为广播台是党的重要宣传部门，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是所谓的“红五类”！他们大约也知道我和好朋友在文革初期的表现……



王经 2018 年元旦在上海交大老教授联谊会上朗诵高尔基作品《海燕》

这段插曲是广播台留给我的永久的痛！我知道，那个年月，反动血统论统治着人们的心灵，当年播音组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应属无奈！

## 尾声——幸福的晚年，从心所欲，感恩交大!

1968 年 8 月，我们 67 届终于要毕业分配了。可想而知，我不会有好果子吃——工宣队把我和男朋友双双发配到大西北兰州市，我还被送到青海黄河源头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练…….在红柳滩的地窝子里，十几个女生睡在冰凉的土炕上，仅靠一个小煤碳炉子取暖（曾发生煤气中毒，幸亏抢救及时而没酿成大祸）。我们相互挤在一起谈天，谈的最多的是我们的大学生活。在我的梦中则屡屡出现我的广播台、我的 402！我魂牵梦绕的母校啊，何时重回你的怀抱!

风云两甲子，弦歌三世记!母校 120 周年校庆之际，我和朋友们都进入人生古稀之年!我们 40 后这一代，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上幼儿园开始，我们就沐浴在新中国和谐快乐的阳光下。17 年党和国家的培养，我们这代大学生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无比热爱。特别是我，1962 级大学生更是对交大倍加感激。改革开放后，我卸下家庭出身的包袱，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奋发图强，不仅学术上刻苦努力、出国留学、获取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坚决回国，从事自己的专业，努力搞好教学科研，成长为上海交大的教授、博导；在政治上也不甘落后，积极要求进步，1997 年实现多年夙愿，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交大毕业近 50 年，工作中承蒙党组织的信任，我曾被选拔担任学校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处级）——我并非炫耀这个所谓的官位，我只是要证明我们没有给彭校长丢脸：敬爱的彭校长，您没有看错我们，我们的政治素质和我们的专业素养同样是一流的、可靠的。

祝交大广播台根深叶茂、蓬勃发展，为母校师生带来更多的欢乐和丰厚的精神食粮！祝母校在新的甲子，更加朝气勃勃，勇于创新，成为一带一路

的重要起点、国之重器！

仅以此文献给敬爱的彭校长，献给我们亲爱的交大广播台，献给我们美丽的交大！

完稿于公元 2016 年（农历丙申年）3 月 22 日交大 120 周年校庆前夕上海交大麒麟园寓所



**作者简介**

王经，1945 年 3 月生于西安市，籍贯山西省夏县。西安交大 1962−1967 年制冷 21 学生，1962−1968 交大广播台播音组。

1968 年 7 月毕业分配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1970 年 5 月至 1986 年 6 月先后在兰化公司机械厂，兰州长新电表厂，兰州铁道学院，武汉纺织工学院工作。

1987 年 9 月考取国家公派留学赴法国巴黎第六大学访问学者，攻读博士学位，1992 年获巴黎第六大学工学博士后回国，1993−1995 年华中科技大学动力系博士后流动站科研，1996 年应聘到上海交通大学至今。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两相流科学，能源应用等领域教学科研工作。中共党员，处级干部。

# 我對文革初期的點滴記憶

■/ 張良銘

## 一

对于西安交大应物 31 班的同学来说，回忆文革初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可是，在分别几十年之后，同学相聚忆旧时，它又是绕不开的话题。不过，由于年深日久，许多事情已经记忆模糊，说起来难免含糊不清，有的甚至似是而非。

冬日无事，整理旧书时，我发现了当年的日记，心想应该能从中找回一些失去的记忆。不料，翻到 1966 年 6 月的日记一看，6 月 2 日至 7 月 15 日的日记早已被我销毁了。只是在日记本相应地方仅存的一张插图背后空白处，留下了 1966 年 12 月 9 日写下的几句话："原六月二日至七月十五日的日记，基本上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我校期间整群众和我被整的最明白最直接的记录，留着它等于留着一堆无用的垃圾，……不如索性把它扯去，留下一个空白为好。"幸好，7 月 15 日以后的日记中虽然不再有整群众的记录，但"我被整的痕迹仍在"；而且 1967 年上半年的日记中还有一些回顾性的文字，再现了当初的某些情景。顺着这些线索搜寻记忆深处，当年亲历亲见的一些事留在头脑中的印象变得清晰了一点。

## 二

1966 年 6、7 两月是西安交大文革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时期。

6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广播声音刚落，西安交大校园内立即沸腾起来，揭发和批判以彭康校长为首的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全校自发地出现了“停课闹革命”的局面。为此，陕西省委迅速派出工作组进校加强领导。但是，省委工作组进校后，并没有按照广大师生的理解和愿望指导文革，而是“划框框，定调子”，对大家的“革命行动”施加了种种限制；同时，许多同学认为，彭康是党的高级干部，级别比当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还高，在全国高教系统也是屈指可数的有影响的人物，大家因此怀疑陕西省委和工作组是否有能力和决心解决交大文革的问题。于是，不少同学写信或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和意见，希望得到党中央的直接指导和支持。

广大师生的这些行动自然得不到省委工作组的支持，而且有传言说大家給党中央的信件和电报也被截留，因此大家与省委工作组的对立情绪迅速滋长，到 6 月 6 日一发而不可收拾，纷纷采取了打破工作组限制的行动，并喊出了“赶走省委工作组”的口号，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六六事件”。

我班同学也积极参与了“六六事件”，其中包括郄友农、闫保定等同学到陕西省邮电局院内贴大字报，受到一些人的围斗和殴打。我班同学得知他们的遭遇后，都感到很气愤，因而在我班还发生了一个“六七事件”（这是我在 1966 年 8 月 7 日的日记中提到的概念）。

原来，“六六事件”爆发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立即从正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财贸工作会议”上紧急抽调干部，加强以严克伦为组长的陕西省

委交大工作组的力量，并将工作组升格为“省委工作团”。

6 月 7 日上午，省委工作团员到我班与同学们见面时，同学们立即纷纷发出质问。大家态度激昂，言辞尖锐，直问得那位工作团员哑口无言。因此，在省委工作团随后导演的“查上当，放包袱”活动中，我班成了重点。

1967 年 3、4 月解放军进校对我们进行军训的过程中，发动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在 3 月 30 日的日记中写道：“确实，原省委工作团在校期间，給我班施加了多大压力啊！把我班列为‘全面围攻工作组’的三个尖子班的第一名，在外班煽动向我班进行围攻，称为‘反革命魔窟’，我们受的迫害是很深重的。”

## 三

在省委工作团导演的“查上当，放包袱”活动中，我班有不少同学受到程度不同的伤害。在我的记忆中，受害较深的是两位女同学。一是梁蕴绵，记得有一天全班同学开会批判她，突然从楼道里冲进来一个做清洁的胖女人，对她一拍桌子，大吼道：“站起来！”随即进行严厉训斥。这一幕把全班同学都惊呆了。二是徐伟，记得当时給她贴出了大字报专栏，其中包括从她的日记中找了一些所谓“错误言论”和“问题”，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不过，由于形势变化，省委工作团很快被撤销，对她们的问题好像没有作什么正式结论。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班还有两位男同学也曾受到较大伤害，不过不是在省委工作团在校期间，而是在 1968 年工宣队进校以后。工宣队进校领导我们进行“斗、批、改”时，我校曾有一个破“反标案”的浪潮，我班的李庆惠和张钟受到冲击。李庆惠在驻班工宣队员组织我们学习时信手乱画，画出

了一个人头肖像，其形象特征与驻班工宣队员有点相似，画上还有包含丑化意味的词语，因此被认为是反对和攻击工宣队，从而受到批判。张钟在1964年举报过一起“反标案”，此时学校保卫部门把他写的报案材料和内容为“庆祝双十节”的“反标”照片交给了我班，班上责成我找张钟个别谈话，了解发现和举报此案时的情况，并进行案情分析，当我根据学校保卫部门的提示，说到这条“反标”个别字的书写带有河南地方特征时，他一时语塞，犹豫了一会儿后表示，自己愿意在晚自习时说明真相。当天晚自习时他向全班同学承认，这是他自己做案后随即报案。当然，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对于他们的错误，在我们毕业分配前都作了结论，我记得是本着“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 四

我在文革初期被整的原因，一是因为我进校后就先后担任过我班学习委员和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文革爆发前不久又接任了系学生会主席职务。如果说西安交大有一个“彭康黑帮”的话，我自然是离“黑帮”很近的人；二是我的出身不是“红五类”，有人怀疑我入党时未向党组织说明真实情况，这在当时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因而被揪住不放。我在1966年7月下旬的日记中就多次写道：“对于我的家庭成分问题，……一时搞不清，真是晦气！”“对于家庭成分问题，则是紧追不舍，怀疑我对组织的忠实程度，……叫我也有口难分（辩）了。”“翻阅以前的日记，总算把写关于家庭问题材料一事的时间弄清楚了，……我相信组织会对此作出正确结论的。”当然，由于省委工作团随即被撤销，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被整时及其以后，我班同学与我的情谊并未割断。

我记得，尽管大家曾给我提过不少批评意见，但没有给我贴大字报，也没有什么歧视性的表示。相反，李宝泉、徐伟、李九龄等曾先后与我个别谈心交流，当我一度表现消沉时还鼓励我振作起来；省委工作团撤走后，王希平、闫保定等曾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张志海、刘荆州还和我一起到南京、上海串联；李宣诚、龙贤荣也与我一起受校文革总会的派遣，到渭南建立联络站，并在那里断断续续工作了很长时间……。这些不仅在我当年的日记里有记载，而且在头脑中的印象也终身难忘!

## 五

自从省委工作团撤走以后，除了解放军进校开展军训和“复课闹革命”期间我班同学有自己的集体活动外，其余时间要么参加全校的统一活动，要么各自通过不同的渠道参加校内外的分散活动，彼此的情况互不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逍遥派”。而且，自从文革风暴来临后，班干部中就没有我的位置，因此，我班的日常工作、全盘情况以及有关决策，我就无从得知了。

2016 年底完稿

2017 年 2 月 14 日再改



## 作者简介

张良铭，1943 年 12 月生于湖北省仙桃市，1963 年 9 月进入西安交大数理系应物 31 班学习，196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第九棉纺厂工作，1975 年 5 月起就一直在宝鸡市党政机关工作。1980 年 8 月以后先后任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科长，市委政研室副县级研究员、县级研究员、副主任（正县级）等，还是宝鸡市第五、六、七、八届政协委员。2004 年退休。



# 文革回憶

■ / 孫惠民

1962 年，我从西安交大毕业，我和班上共五位同学留校在物理教研室当教师。一批刚毕业的年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在学生餐厅用饭，白天上班，晚上去图书馆看书，生活仍如学生时代一样。那时年轻气盛，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在教研室里被认为是有锐气有作为的青年一代。

西安交大位于西安东郊，校门对面是兴庆公园，那里是唐朝兴庆宫的遗址，建有沉香亭，李白有诗“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兴庆公园东面是陕西工业大学，佳玲就在那里读书。

1966 年的国内形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突出政治，又红又专，抓阶级斗争。在文化界不断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如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每天的新闻广播中都有批判文章，而且批判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直接上纲为“反党”，我们预感到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5 月的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文章，《批判三家村 --《燕山夜话》的反动本质》。《燕山夜话》是一本谈古论今的杂文集，我刚读过，感觉内容和文笔都好，还向其他同事推荐过。我莫名惊诧，百思而不得其解，怎么说它是一本反动书籍呢？这其中一定另有缘故。

我每天认真读报、听新闻广播，关注形势发展。我和周围的年轻同事以及大学生门都感到新奇而振奋，作好了迎接革命风暴的思想准备。

##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 8 点，学校广播台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批判他压制学生，反对文化大革命。

听了广播，我们群情激奋，高谈阔论，议论纷纷。由北大想到交大，西安交大的校长彭康成了众矢之的。连夜由周先聪执笔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周先聪、龚华仁、刘安福、我等七人签了名。

翌日，6 月 2 日，我七点多就赶往实验室准备上课，校园里已经有人开始贴大字报。八点上课铃响了，可是没有一个学生来上课。我到校园里一看，到处是大字报，人流攒动，学生群情激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教职工怀着惊恐的心情，回想起 1957 年的反右，那时先号召大鸣大放，后来变成“引蛇出洞”，大抓右派，所以今天一定要谨慎小心，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几个年青教师，初生之犊不怕虎，没有顾虑，是物理教研室最早贴出大字报的人。

大字报的内容指向校党委和校长彭康。彭康二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革命，曾加入创造社。郭沫若文集中两次提到“彭康后起之秀”。彭康三十年代被捕入狱，关押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经党组织营救被释放，后任华东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校长是刘少奇），解放后一直任交通大学校长。他是一位老革命，今天看见学生的大字报贴到自己办公室的大门上，十分气愤，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党员站稳立场，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小心上当

受骗。会后出现了部分拥护校党委的大字报，但是，这扭转不了大势所趋。大学生在新闻舆论的鼓动下，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点燃。

6 月 3 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及时向西安交大派进工作组。工作组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担任，工作组后改为工作团，成员大多是在西安开会的西北五省部分县委书记，共三百余人。

工作组刚到校，受大学生的欢迎。然而不到一天，就受到学生的怀疑，学生提出许多问题，诸如文化革命如何搞？彭康有什么问题？当前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工作组回答或似是而非，或模棱两可。在学生的轮番逼问下，严克伦恼羞成怒，以势压人，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学生简单推理认为，北大－陆平－北京市委是一条黑线，西安交大－工作组－西北局、陕西省委也可能是一条黑线！

6 月 5 日，交大校园出现了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迎来更多的大字报响应。工作组惊恐万状，全力组织另一部分学生反击。激烈的辩论，昼夜不停。

6 月 6 日上午，部分学生冲出校门，有的到机场，有的到电信局，有的到车站要去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组慌忙阻拦。

下午，学校接连不断广播西北局、陕西省委《给交大全体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将六六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其中有李世英（工程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团支书，带领该班学生首先向工作组贴大字报）；王永婷（动力系五年级学生，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对人热情，工作积极）。工作组加强领导，大造舆论，学生中怀疑工作组的倾向被压了下去，反过来矛头对准几个“反革命”学生。

6 月 7 日早晨，学校行政搂前新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此地无银

三百两，可笑！”大字报说：昨天学校广播中声嘶力竭地反复大喊“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西北局、陕西省委的真面目不是不打自招，昭然若揭了。写这张大字报的是一位个头矮小、天真稚气的女学生刘维娜。她一下子也成了反革命分子。

事后得知，西北局、陕西省委面对六六事件惊恐万状，向西安市各个单位下发文件通报此事，说交大校内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反党，颠覆社会主义主义。

校内，工作团组织学生向这几个“反革命”进行批判斗争。广大学生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共产党是太阳、是母亲，要听党的话，对党要绝对忠诚，做党的驯服工具”。大家想工作团是党派来的，所以不能怀疑。有些人为了洗刷自己，立即与反革命划清界限。一部份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敢怒而不敢言。解放后历次运动中的批判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是历史上“文字狱”的继承和发展，到了文革时期姚文元等人的批判文章更是登峰造极。

我们教职工每天按时上班，在工作团的领导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及报刊上的文章，下午在校内看大字报，大字报此时转向批判六六事件的带头闹事者。

李世英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检讨，但是要承认自己反党，实在有违心愿。无可奈何下，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发现后及时送医院被救活。

7月下旬的一天，学生区暗地流传一个惊人的消息：王永婷自杀身亡！王永婷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成了反革命分子，往日的同学朋友都疏远了，反目成仇来揭发自己，更不能容忍的是，把自己的私人日记公开亮出，进行人身攻击，王永婷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她忍无可忍，从宿舍三搂翻身跳下，以死抗争，了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工作团说一个反革命的死是咎由自取，压制学生对王永婷的死要保密，不准乱说。可是纸怎能包住火，王永婷的死很快传遍全校，震惊了广大学生，把愤怒埋向心间，成为以后爆发的火种。其实工作团也惊惶万状，立即决定，停止批判学生，召开全校的批判叛徒彭康大会，以此转移学生对工作组的愤怒。

在被批判的几个“反革命学生”中，刘维娜年龄最小。她以另一种态度面对同学们的激烈批斗，觉得自己忽然变成反革命，往日的同窗好友突然反目成仇，这一切似乎在演戏，只觉得滑稽而又好笑。她坦然相待，毫不在乎，面对同学的批斗嘻笑自若。批斗刚一结束，她就去操场锻炼身体。有一天，她躲过监视回到西安家中，学校立即出现“通缉逃犯刘维娜”的大字报，工作组派人将她押解回校。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起的，6 月 1 日他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此后他到韶山滴水洞修养十二天，静观后效。全国高校学生闹了起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派工作组进校。学生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北大、清华、北航都发生了类似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的情况。结果出了一批著名的学生领袖：清华大学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西安交大李世英等。

7 月毛泽东来到武汉，7 月 16 日毛泽东横渡长江，报纸做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报导。1956 年，毛泽东就四次横渡长江，并写下《水调歌头 – 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7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4 日

下令撤销工作组。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召开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说：“工作祖是我决定派的，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应该负责。同学们问我文化革命怎么搞？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8 月 3 日，西安在西北体育场也召开了五万人的“大、中、小学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7 月 29 日在北京大会上讲话的录音。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团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交大工作团撤离学校。

此时，交大学生矛头所指已不是工作组而是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了。随后，学生开始冲出学校，走向社会，到大街上张贴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从学校蔓延到社会。

## 红卫兵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选举中央政治局，林彪排在第二位成了副统帅，刘少奇跌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组成）。

8 月 5 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毛泽东为了在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支持“造反有理”。到接待站会见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我在西安和平门看见中学生贴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感

到十分不解，人们也认为，在党的领导下要造反，不成了反革命。后来听说这是最高指示，仍是疑惑。

红卫兵很快在全国出现，年轻幼稚的中学生，如同阿 Q，听到“造反、革命“，新奇而振奋。他们破四旧，毁文物，烧书籍；抓四类分子游街，抄家。我家住的巷子名叫龙渠堡，西头是西安市二中，巷子里的农民住户想趁火打劫分些浮财，纵容二中学生抄家。我岳父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被拉去游街，清扫马路，家里的家具、存款被炒，而两箱古书，认为没有用处，反而保留下来。我家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母亲担心也被抄家，将几件床单、被面藏到别人家里，幸而没有遭此一劫。

最初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北京一批高干子弟，他们宣扬反动的血统论，有一篇《谭力夫讲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他们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为“狗崽子”。起初“地、富、反、坏”统称四类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称“黑五类”，文化革命中又出了“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总称“黑七类”，排在第八位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排到第九位，又称“臭老九”。

在那动乱年代，形势瞬息万变，不久有不少革命干部成了黑帮走资派，他们的“好汉”子女，反而跌为“狗崽子”。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全国红卫兵都涌向北京，开始全国“革命大串联”。

## 造反派与保守派

1966 年 8 月，当西安交大的学生冲向社会，就交大“六六事件”向西北局、陕西省委讨说法之时，广大的西安市民不理解、不支持。8 月 13 日下

午，政府组织西安各界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大会，会后游行，交大师生员工的队伍近万人，当游行到钟楼时，己是夜晚，大街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有人喊“交大的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反对省委，你们要造谁的反？”，四周群情激奋，人们冲击交大游行队伍，要揪出少数反革命分子。我们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迈步前进。有外校的学生手挽手组成人墙保护着交大的游行队伍，我发现我的妹妹惠兰也在其中，我叮咛她一定要小心。我们的游行队伍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回到学校时已经深夜。

此后西安分为两派，支持交大的为造反派，反对交大保卫省委的为保守派，亦称保皇派。一个单位也因观点不同而分为两派。保守派大部分是机关干部和工人，造反派大部分是学生。西安大街上，今天是保守派游行，高呼“西北局是革命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翌日，造反派游行，高呼“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

9 月 6 日，某校造反派学生受到该校保守派的围攻，不让吃饭。他们到交大求援。交大学生义愤填膺，冲出校门来到建国路陕西省委门口绝食抗议，其他高校的造反派听说后也来支援。当晚绝食学生达到五万人，占据了整个和平路。我们年轻教师义无反顾，一些中年教师犹豫良久，经过反复利弊权衡，也加入了静坐绝食的行列。和平路上学生整齐列坐，红旗飘展，歌声起伏。西安人民听说学生绝食，奔走相告，纷纷上街观看。和平路、大差市一带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许多市民带着吃食来到这里劝说学生用餐。

陕西省委机关大院内人去楼空，党政领导没有一个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一直坚持了三天。时令已是夏末秋初，夜晚寒冷，白天中午炎热，太阳一晒，不断有学生晕倒。交大、西工大、西电、冶院等校的学生领袖，以李世英为首组成立了指挥部，指挥绝食行动。学生们一面绝食，一面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绝食持续到8日夜，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方到现场答复了学生们提出的条件，大约五万人的绝食宣告结束。然而仍有三十多位同学坚持到9日，被接到北京，收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肯定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同时也指出搞大规模的静坐绝食这种方式不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饱了饭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总理的这一指示，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文革初期，毛泽东支持学生造反，各级党委纷纷瘫痪，保守派很快土崩瓦解。

## 大串联

9月中旬以后，全国展开红卫兵大串联。西安各大、中学的学生也拥向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然后到全国串联。全国各地成立红卫兵接待站，火车免费，不化一分钱，到处游山玩水，学生何乐而不为。

我们教师不敢轻举妄动，每天按时上班。学毛著、刻印传单、看大字报。西安各单位人们都起来造反，交大成了造反的“圣地”，每天来看大字报，咨询有关问题，朝圣取经者络绎不绝。学校成立了群众接待站，让我们教师去做接待员。我做接待员十分忙碌，一日应接不暇，也不知“真经”为何，只能就报纸上的社论文章敷衍应付了事。

11月2日，我也大胆“造反”，去北京串联。火车里塞满了学生，座椅下躺的、走廊上站的、椅背上坐的，连行李架上也是人，挤得水泄不通，车门不开，上下车只能从窗户跳上跳下。到北京站有汽车接待，我随人流上车，被拉至北大附中，教室地上铺着稻草，我穿着棉衣，晚上席地而卧，开着暖气，不觉寒冷。吃饭不用掏钱，有米饭肉菜，招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白天到各大学游转观看大字报，等待毛主席接见。

11 月 13 日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这次为了节省时间，改群众步行为乘车游行。前一天下午有解放军来到北大附中，组织学生编组，讲解注意事项。吃过晚饭，我们登上军用卡车，每车四十人，站成四排，四角有四名解放军战士把守。当夜调动 8 万辆军车，300 万学生，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指挥车、报话机忙碌调度。我们在卡车上度过一个寒夜，心情激动也不知疲劳。等到第二日早晨我们的卡车到达指定地点，前后是长长的车队。十点，游行开始，八路军车并排徐徐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检阅。十二点，我们乘的卡车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是一片红色海洋，几十万人挥动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人声鼎沸，如雷贯耳。那狂热的场面胜过今日的追星族，是亘古未有，空前绝后。那狂热的气氛，人处其中，不由全身沸腾。我远远望见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那魁梧的身影，频频向人流挥手，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也随人们一路不断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到 11 月底，毛泽东共八次接见红卫兵 1500 万人。

## 派性与武斗

11 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西安。这时中央要求各地学生停止串联，返回本地闹革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然而学生成了无头鸟，不听指挥继续在全国各地游荡滋事，又兴起徒步串联。

我作为教师，乖乖地听党的话，在学校无事可干，就约几位同事去西安北郊的黄河棉织厂。我们半天随工人劳动，半天了解文化革命情况。造反的工人只是极少数，其中有过去受压抑不得志的希望报复一吐为快，有调皮捣蛋不好好劳动的借机看热闹图安逸，有野心家阴谋家企图乱世出英雄。大部

分工人照样上班劳动，起初看不惯造反者，后来见中央号召，学生支持，也就随大流参加造反派。造反派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也无组织章程，只要参加其活动就属于一派。

1966 年底，西安的保守派已经消失，纷纷打出造反旗号。工人造反派受到西安各大学的支持和控制，西郊各工厂造反派“工联”依附于西工大、西电，铁路工人和东郊工厂造反派“工总司”依附于交大。这时学生领导小组内部产生分歧，李世英提出“造反不分先后”，并批评“打砸抢万岁”等极左口号，西工大等诬之为“右倾”。学生领袖间的分歧很快蔓延扩大，造反派分裂为两派：交大派和西工大派。两派之间整日互相攻击，昔日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今日反目成仇。派性这个怪物侵蚀了社会上每一个人，夫妻之间甚至有因派性而离婚的。

到 1967 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互相对立的两派，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派性斗争，社会混乱，工厂停工。3 月，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进驻大学、工厂实行“三支（支左、支农、支工）、两军（军管、军训）”。然而不久，解放军也陷入派性的泥潭，很难一碗水端平，稍不留意形成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使矛盾更加激化。

1 月，上海造反派王洪文夺权成立上海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要求各地仿效成立由军队领导、地方革命干部和学生领袖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在成立陕西革命委员会时结合那位革命干部的问题上，西安两派意见对立。西工大派支持霍士廉，交大派激烈反对，争论势不两立。

佳玲所在学校陕工大与交大相对，中间只隔一条大路，但是分属两派。两校都安装高音喇叭互相对骂，陕工大骂交大为“狡老总”，交大骂陕工大为“傻瓜大”。我去陕工大找佳玲，她的一群女同学围着我“辩论”，挖苦嘲讽，无所不用其极，在我身上宣泄对交大的怨气。我碍于佳玲的面子，强

忍不敢发作，因而我也不敢再去陕工大。我和佳玲在兴庆公园的约会也因派性的观点分歧而常常不欢而散。

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秉承林彪旨意，支持一排压制另一派，说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想借机打倒陈再道，数万群众围攻东湖宾馆，抓住王力。当时毛泽东秘密到达武汉，就住在东湖宾馆的另一所别墅内，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立即赶到武汉，安排毛泽东飞上海。江青说武汉发生反革命事件，宣扬“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两派武斗升级，动用真枪实炮，血腥屠杀。

8月5日，西安发生八五静坐事件，持续了四十余天。

8月下旬，西安西郊某工厂的工总司派受到围攻，消息传到大差市，工总司立即派几卡车战友去支援，当卡车进入厂区，受到工联派的开枪伏击，死伤数人。从此西安进入持枪武斗，两派都去抢枪，西安有许多国防工厂，军械库的枪支弹药被洗劫一空。

1967年夏，武斗流血事件全国到处发生。西安大街上不时有武斗队员荷枪实弹乘坐一辆辆卡车呼啸而过，高音喇叭的吼叫声昼夜不停，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我们普通人开初对文化革命的热情已经烟消云散，转而成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

这年8月27日，我和佳玲结婚，婚礼简单而仓促。婚后第三天，佳玲去学校被阻拦，不准回家，每人发一支枪，昼夜守卫学校，传言某某组织要围攻、洗劫陕工大。我不见佳玲回来，心急如焚，骑车到陕工大校门口远处观望，校门戒备森严，围墙上站满持枪的学生，校内枪声不断。几天后没有发现一个“敌人”，反而自己开枪误伤了自己，学校这才取消警戒，新娘子准许回家了。

1967年7月到9月期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说“形势大好”，又说

“干部大部分是好的，要团结大多数”。本年各省市开始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各单位也先后成立了革委会。西安交大于7月1日成立了革委会，李世英是革命委员主任。

10月，中央通知要求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交大开始复课。

1967年冬，社会流传有“红色恐怖队”、“五湖四海”等流氓组织，抢劫行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吓得人心惶惶。街巷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晚上巡逻察访。折腾月余未见异常，人们才放松了。这一年食品虽然都凭票供应，但是供应基本正常，人们衣食温饱未受多大影响。

我在派性斗争中还遭遇过一次惊险经历。1968年夏，学校清理阶级队伍，委派我去西郊某职工业余大学，找一姓张的教师了解一些情况。张原来是交大的教师，后来调动到现在的学校教书，前一天我给张打电话就预约好了。西郊是另一派的天下，有人叮咛我要多加小心。

翌日上午我骑自行车到达该校，找到张某，坐下，倒茶，刚寒暄两句，突然一伙人推门而入，气势汹汹，不顾张的解释，将我强行带走，转入另一楼五层的一间屋内。对我进行全身搜查，将眼镜、手表、证件一律拿走。塞给我纸和笔，让我老实交待。一群人围着我，谩骂攻击。大楼对面是一个工厂，空中传来阵阵哀乐声。这群人说，这是为武斗而牺牲的“烈士”开追悼会，你如果不老实，就将你拿到追悼会上去做“祭品”。他们进进出出如临大敌，面对这些人性扭曲的暴徒，没有道理可讲，我静默，不求饶，以示抗议。直到中午饭时，一个带头的进来，揪我的头发，打我的耳光，又在地上捡起一块木板，打我的脸。折腾一会儿后，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一个牌子，写着“交老总，滚回去！”一群人拿着棍棒押着我，走上大路，路上行人围着观看。他们怕影响不好，这才释放了我。我骑上自行车，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回到家中，佳玲怀孕正准备临产，听到我的经历，唏嘘不已。傍晚，交

大几个同事（杨金焕等）慌慌张张来到我家。原来我被押走后，张某也不知道我的去向，他悄悄让一个朋友立即去交大报告，“一位交大教师被人绑架，下落不明”。交大革委会将这情况反映到陕西军区，让协助查找。教研室同事到我家想说明情况，安定人心。现在见到我平安归来，大家才放下心来。

## 学校斗批改

1967 年 12 月，1966 届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当时造反派掌权，佳玲出身不好，只能分配到条件最差的地方，结果分到河南巩县一个正在筹建的化工厂。

1968 年 8 月，毛泽东命令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所谓“掺砂子”，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曾将外国人赠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宣队，首都工宣队又将这些芒果分送各个大城市的工宣队。当芒果到达西安时，身价倍增，西安车站和大街上数十万工人敲锣打鼓的欢迎，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场面比一千多年前长安街上的迎佛骨场面壮观多了。

文化革命开初，大中学生吃香，被誉为革命小将、红卫兵、左派，毛泽东接见、支持，利用他们的年轻幼稚、单纯热情，打开了文化革命的局面。而现在学生闹派性，不听使唤，于是又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受宠若惊，欢呼雀跃，登上历史舞台。

工宣队进校后开始了大学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我们物理教研室来了三位发电厂老工人，他们朴实，文化水平低，不了解高等学府的复杂性，难于驾驭，真正的领导还是原来的文革小组，教研室文革小组成员是造反最

早的龚、出身贫下中农的刘和“革命干部”吴百诗。

吴百诗五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交大，党员，留校讲授理论力学。他教学有方，很受学生欢迎。58 年交大成立工程物理系，任命吴百诗为系主任。他年轻有为，提升很快，认为是党培养的新一代红色知识分子。我在工程物理系当学生时，吴百诗给我们讲授核物理，是我很崇敬的一位老师。1961 年他曾以专家身份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1963 年回国后到物理教研室当主任。我和吴百诗，原来是师生关系，现在成了同事。

在吴百诗能否参加文革领导小组，群众意见发生分歧。我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分析认为，吴百诗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革命干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想象的革命干部是经过革命战争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人。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是革命干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某日早晨贴在教研室大楼内的墙壁上。这张大字报引起的轰动和后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不仅在教研室引起议论，有人说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击中要害。当天上午有人将这张大字报重新抄写贴到校园里的显著位置，引起广大教师干部的关注。校广播台的记者来采访我，该大字报又在广播台播放。工宣队决定对吴百诗隔离审查，抄家，批斗。工程物理系也拉吴百诗去批斗。我感到深深的不安，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吴百诗变成“敌人”，遭受批斗，并非我的原意。这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然而常萦绕在我的心中，感到深深的歉疚。

经过改组的文革小组，增加了一个出身贫农的叶。斗争对象有走资派（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反动学术权威（知名老教授）、右派分子。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学生都到社会上去造反，这些人无人过问，逍遥自由了一年多，今日轮到他们受批挨斗了。这些人被关入牛棚，不准回家，每日检查交待罪行。继续深挖又发现一些“敌人”：有人与海外亲属通信，被查

有污蔑社会主义的言词；有人是漏划右派；还有一位老教师解放前在上海交大入党，解放时在上海敌伪档案中发现一人姓名与他相同，因而就怀疑它是暗藏的特务，现在被当作真特务批斗。

教研室文革领导小组和专案组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决定批斗的对象和批斗会议的安排，我与其他青年教师作为外围的积极分子，中老年教师是随大流的群众。对每一个“牛鬼蛇神”，轮流召开批斗会。会上大家发言踊跃，知识分子能说会道，语言犀利，慷慨激昂，批判深刻，上纲上线。那个时期，大家模仿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学会一套假大空的时兴语言、激烈言辞，以备发言使用。教研室原来人多心不齐，历次运动互相揭发批判，积怨很深，知识分子又有文人相轻互不服气的恶习。文化革命中的批斗，有人相信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有人借机报复，有人幸灾乐祸，大部分人随大流以求自保。批判会上，有多少是真心话，多少是应付语，真假难辨。

我们教研室共有 78 人，已经揪出 20 名“牛鬼蛇神”。工宣队在教研室会上威胁说“你们有问题要早日老实交待，看谁要当这第 21 名”。中老年教师吓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1968 年夏、秋，阴沉恐惧笼罩着交大校园。这一年内，交大三千多名教职员工中，自杀身亡的就有十多人。

1968 年 12 月，中央发出通知，强调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时，要及时解放他们。”根据中央指示，我们觉得教研室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也找不到确凿的“罪证”，其实就是好人，因而停止了对他们的批斗，有的解放，有的挂起。

工宣队进校，带来的另一活动是大搞“忠字化”。每个会议室、办公室的正面墙上，要挂毛主席像（画像、绣像、剪纸），两旁是对联，四周配以

花环、“忠”字剪纸，装饰的像庙宇或教堂里的神坛。每天早晨八点，上班的第一件事是“五首先”。大家面对毛主席像，肃然起立，手举红宝书，由一人带领大声朗诵：“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敬祝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合）“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下来向毛主席三鞠躬。接着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朗诵几段毛主席语录。仪式完毕，坐下，开始每日一小时的“天天读”。

工宣队又带来“忠字舞”，每日下午，大家围在空地上，唱着语录歌，跳着集体舞，权当休息娱乐，苦中求乐。

后来中央发出指示，对毛主席不要搞“忠字化”，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这些形式化的东西人们早已经讨厌，趁着中央指示，“忠字化”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些残破的标语。

另一个热潮是修建毛泽东塑像。西工大派在西安新城广场修建一座毛主席全身塑像，交大派在车站广场又修建一座更高的毛主席塑像。大学及较大工厂在门前广场都修建了毛主席塑像。一个单位如果分为两派，在修塑像上也要打派仗，一派修一个塑像，另一派要在该塑像前面又建一个更大的塑像。城市中毛主席塑像林立，到了七十年代，这些塑像大部分被拆除，现在个别大学门前还保留有毛泽东塑像。除了塑像外，大街上、校园里到处是毛主席的语录牌和标语口号，如同现在的广告牌一样泛滥。

那年代，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要绝对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人们讲话、写文章都要引用大量毛主席语录，这成为一种时尚。就是两派互相攻击，骂仗，也是引用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被简单化、庸俗化到处滥用，人们已经没有自己的真正思想，盲从于毛

泽东的最高指示。右派分子不断挨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了早日摆脱“右派帽子”这个沉重的紧箍咒，整日检察，真的以为“我有罪！我要认真改造，从新做人。”

1968 年 10 月，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走“五七”道路。北京各大学、科研单位、机关都在外地农村建立五七干校，将大批闲置干部下放劳动。西安交大没有建五七干校，只是到 69 年冬，下放到陕南山区劳动接受“再教育”几个月。

这一年，各地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中央下发通知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制止武斗，但是收效甚微。大批中学生还在社会上无所事事。这年 12 月，毛泽东大手一挥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一千多万中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随大流，有的无可奈何，都纷纷下乡落户。户口离开城市再想回来就难了，一下就是八年，直到 1976 年文化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才陆续全部返城。我的三个妹妹，都赶上上山下乡，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回想文化革命开初，毛泽东鼓动中学生造反，中学生被誉为革命小将、红卫兵。现在中学生在城市不上课，没事干，惹麻烦，一下又变成了知识青年，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改造自己。中学生上山下乡，虽然受苦，但是也能了解社会，磨炼意志。

## 后 记

我的岳父早年公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富平创办立成中学，任校长，解放后土改时划为地主，1956 年安排在西安文史馆工作，家亦从华阴迁到西

安。1965 年，城市社教，受到株连，失去公职。文化革命初被红卫兵抄家，拉去游街、打扫街道。1969 年城市下放人口，龙渠堡街巷工作组找不到下放对象，便看中岳父是地主，被逼迫下放农村。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缺吃少穿，贫病交加。1974 年，岳父母相继在农村去世。十年浩劫结束，1979 年平反昭雪，两个弟妹才又回到西安。

下面用一段妻子所写的回忆作为本文的结束。

父母下乡后，我把刚满八个月的儿子寄放在西安一个保姆家。丈夫惠民又随交大教师到陕南劳动，接受再教育。我一人在工厂，由于出身不好而倍感压力，阶级斗争使我整日提心吊胆。我曾写了一首小诗：“三五中秋月儿圆，月光如水水如天。景色依稀似往年，赏月人儿各离散。爹娘被迫弃家园，夫君下放离长安。娇儿托付邻里管，我居他乡独无眠。今夜明月人尽看，天各一方泪自咽，意长反恨游丝短，两地相思衣带宽。举头望月问苍天，何时才得聚欢颜。”惠民和诗一首：“秋风潇潇秋气凉，草木摇落露成霜。长安城中秋夜长，床前皎皎明月光。娇儿憨卧露笑靥，未解为父心惆怅？佳妻无眠在他乡，牵牛织女遥相望。”来抒发我们当时的心情。

我们在这万般无奈之下，“不顾环境艰苦难，怀抱娇儿去团圆”。1970 年，惠民从西安交大调动到巩县，在中学教书。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学到中学，这种落差和牺牲，使我感动又心酸。周围舆论的压力，使我难堪又内疚。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而且惠民从无一句怨言，教学工作认真，业务娴熟，得到学生和周围同事的好评与尊敬。我们的工资微薄，生活十分艰苦，也十分节俭，得把节省下来的钱接济在农村的娘家。



## 作者简介

孙惠民，1962年西安交大工程物理系毕业，留校在物理教研室任教。1970年到河南巩县任中学教师、中学校长、县教育局长。2000年退休。



# 念　想

## ——追憶與陳學俊先生相處的日子

■/ 張學曾

2017 年 7 月 4 日中午，福州的朱泽一同学传来陈学俊老师仙逝的噩耗，感觉突然，随即上网查阅相关的报道和悼念文章。几天来难以平静，思绪如潮，如烟的往事一幕幕涌住心头，清晰可鉴，难以释怀。

我们锅炉 51 是老五届的尾巴，还轮不到上专业课就被接受“文革洗礼”。也正是文革做媒让我以特殊的方式结识并受益于陈学俊先生的。毕业前与陈先生相处过百天，值此先生追悼大会之日，自觉有责任说点众所不知的关于先生的趣闻轶事，以飨同窗。

1969 年暮春，陈学俊教授被立专案并隔离审查，我和外号叫乌鸦的同班同学吴振生被系革委会指派去当看守，交代的任务是陪睡，间或也陪吃，避免陈出走或出事，无权过问其案情并与之交谈。“牛棚”设在东三楼一楼东头的锅炉实验室，陈教授居小隔间，我和乌鸦的床铺设在大屋的仪器设备之间。



陈学俊先生

头天，工宣队员查陈学俊教授携带物品时发现有 300 元现金，随即问“带这么多钱干吗？“陈答”我不知道会出来多长时间。”工宣队员说：

“这些钱足够跑到香港的了。”陈老师苦笑。

初始，陈教授起夜，我们分头跟进。翌日陈教授劝说我们：“你们该睡睡，别影响休息，毛主席、周总理都接见过我，你们放心我是不会出事的。”寥寥几句，颇具震撼力与亲和力。随后，我们也就夜夜相安。

天气渐热，我提议到马路对过的兴庆公园晨泳，陈教授欣然同往。校园万籁俱寂我们就出了校门。起初我和乌鸦游弋于兴庆湖岸边，陈教授坐长凳上看衣物。不多日，乌鸦恋睡，就我们二人前去。我可肆意游上湖中孤岛，陈教授也在我视线内操练自如，各得其所。返校后再洗漱、早餐。如此数周后，工宣队传来警示：“有人说你们和陈搞和平共处。”我回应：“谁跟你报告就叫谁来替换我们好了！”虽然“带审查对象逛公园”被终止了，我们仨的和平共处还不得不继续下去。

某晚，我学唱“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歌曲，末尾的那个半音老是抓不准。陈教授在里屋大约是按捺不住了，出来说“那个‘4’的音要唱成‘fi’就对了。”一经示范，果然灵光，而且有了新发现：“老陈，你的嗓音很棒哪！”陈教授略带矜持地答道：“不瞒你说，我还灌过唱片呢。”至此，我暗自期待听到老陈唱歌，但又不便央求。终于有一天傍晚时分，陈教授在房间放声一曲“草原上的红卫兵想念毛主席”，声音干净，极富磁性和感情。我在外屋倾听，感佩之余，陡然想起伏契克笔下的那位贝舍克老爸爸，禁不住黯然神伤。如今想想，这命运真会开玩笑：“锅炉大王”第一次授教予我的不是《锅炉学》，也不在教室，而是声乐，在牛棚。有一次大操场联欢晚会飘来琴声，陈教授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是我的小孩在拉琴，他在附中。”随后又补充道：“大儿子到延安电厂工作了。”舐犊之情，溢于言表。我问过“除了声乐外，你还擅长的业余爱好是什么？“立马得到的答复是”网球”。这大约是我们之间少有的“拉家常”，短短的对话，先生总是表情释

然，语气平缓。其时，我浑然不知先生的夫人也正在校园的另一端遭遇隔离审查，他也从未提及。

我斥责过老陈，而且大声，唯一的一次。那些日子，陈教授似乎总有写不完的交代材料，我们也从不过问。一天中午轮我回住处带陈教授去吃饭，只见他胸前挂块大纸牌垂头坐床沿上。纸牌一面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陈学俊”，另一面是“蓝衣社特务陈学俊”，名字上都用朱笔打上大大的 ×。一阵诧异之后，我对陈教授说：“取下牌子，走吃饭去。”陈教授说：“专案组规定了只有睡觉才能取下。”我说：“那也得去吃饭！”陈教授说：“我不饿，不吃了。”我说：“就算你不吃，我还得吃呀。走！”老陈要求不走梧桐道，改从楼道南出，经足球场到二食堂，我顺应了。大晴天，陈教授带上大黑伞出门。看他拿着碗，撑着伞，佝偻个身子缓缓行进在空荡荡的球场上，我瞬间感悟到他企图借助一把伞来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又徒唤奈何。经历过三年前交大那起著名的“六六”事件，我有过同感：“树怕剥皮人怕伤心”、“士可杀不可辱”。我愤懑他们为什么专往人的痛处戳呢？于是心头一热，跨前一步厉声喝道：“老陈你给我站住！”陈教授愕然地看着我，那神情像是犯了错的学生。我放肆地吼了起来：“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要心中没鬼，就把伞收起，胸挺起，头抬起！你别以为你有多了不起，这年头连那些开国元勋们都惨遭批斗，你还没有受皮肉之苦呢。”一阵无名火之后是稍许沉默，让各自心中的翻江倒海平息下来，又一起走向食堂。说来也怪，那天食堂打饭时，陈教授的一只花瓷碗脱手掉脚背滚地上，拾起来居然完好无损。回路上，我打趣说：“老陈，你的碗都那么经摔，你呢？”陈教授依然心事重重，瞄我一眼没有作答。隔天，我找来彭德怀、陈毅元帅被批斗的影印件，违规地私下给老陈看。尤其是革命老太太杨之华站立被声讨的一幅，她身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丈夫瞿秋白的头骨（编者注：作者

所用照片的原说明如此）。老陈显然是见所未见，看得仔细而动容，一声叹息，默然良久，只让我快收好退还。那几天夜里，小屋常传来他辗转反侧的声响。

接触久了，心有灵犀相通。一次陈教授洗完衣服在室内晾挂的时候忍不住轻声说过："有些解放后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有了点名声，就被当成座上宾。我们不少解放前回来的，反而有过不完的关。"要算是发牢骚或鸣不平的话，这是我听到陈教授的唯一的一句。我是几十年以后才知道先生力主交大迁校时捐掉上海私宅、不留后路、举家前往的垂范事迹。

下厂参加锅炉改造的教学安排结束了我为专案组当差的日子。时值仲夏，我买来西瓜，给继续被隔离审查的陈教授送上一块。他笑着说："我现在还不能吃你的瓜，以后我一定请你吃西瓜。"这就是陈教授对我们的道别语，听得出一种盼望和信心。陈教授意犹未尽，还修书一封给我和乌鸦作别，多是相处百日的感怀。可惜这封私信也被专案组拿去了。

两年多后在工厂烧锅炉的日子里，我意外收到陈先生寄来清华大学锅炉教研室编写的一本新书《沸腾燃烧锅炉》，夹带告知他到上锅所讲锅内过程。书本传递的信号是：被解放，重上岗。我纳闷他怎么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回信致谢后，就再没有联系。这本书对我日后从事工业锅炉改造有过帮助，我一直珍藏着。

时隔 26 年，借百年校庆之时才又重回到交大。在建国饭店聚餐那天，锅炉专业的校友济济一堂坐满二楼大厅。想不到陈学俊教授携夫人袁旦庆教授来了，一阵掌声过后，先生说："接待任务很多，但我还是更愿和锅炉专业的同学在一起。"我挤到先生夫妇跟前，彼此寒暄了几句，惊喜了一番。袁教授对我说的"老陈还不时叨念起你呢"着实让我兴奋了一把，随即把他们请来和我班同学围坐一起共进晚餐，惹得四围众学兄学姐们徒有羡慕的份儿。

参加 2002 年的中科协学术年会，在川大见面时，正逢陈学俊教授夫妇接受记者采访。我站其身后，欲言又止，悄然离去，唯恐大好时光因我的出现又不经意地触痛文革留给他们的创伤。随后几年，相继在沈阳、海南博鳌、乌鲁木齐召开的中科协学术年会我都争取到会了，其间我的一篇交流论文《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政策研究》为《中国能源》杂志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专刊采用。可惜这几次会场专设的院士席位上再没寻到先生，想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拜望先生的机会也逐一消逝。

2016 年 5 月下旬，我们锅炉 51 班十多位同学相约来校弥补交大双甲子庆典活动。那天上午，陈学俊教授在助手陪同下从实验室出来，被我班的女婿、内燃 4 字头的老骆碰上了，求合影，得应允。遗憾的是，几分钟前，我们锅炉专业的一群在校园与先生擦肩而过。

传闻陈老先生自 90 高龄后仍然带教学生，每周还定期到实验室做研究。大家赞叹，仅凭先生安身立命于交大教育、科研七十年之久这一事实，就已构成西安交大校史上的神来之笔。

这些年，常到异邦生活，不经意间也接触过几位解放前毕业的老交大。谈起陈学俊先生或其他多位知名教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间的代沟。有时觉得离开先生越远、越久，似乎就越能读懂先生。先生以超临界的能量活出了功、德、言足以传世的完美人生，驾鹤归西之时赢得国家总理及无数团体、贤达奉挽凭吊，为霞漫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注意到早些年就有达人概括陈先生的人格精神为“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今有官方的“讣闻”称：“陈学俊先生是我国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能源动力工程专家和教育家。”所有这些，先生当受之无愧。人们在对逝者追思告别时，其实往往并不那么了解他们，在不惜溢美之词冠

冕他们之后并未能得其精要而传承。

我以为先生首先是一名战士、一个伟男子：胸怀大志，忍辱负重，敢于担当。我坚信，先生在那些厄运袭来的人生低谷日子里，就憧憬着如何创建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和多相流实验室，同时又不失“回眸时看小於菟”的柔情万种。一旦解脱捆绑，便无暇顾及哀怨，惜时如金，投身认定的事业，屡建奇功，不断升华自身价值，最终实现涅槃重生。

都说上船容易下船难，交大五年给我留下太多的梦魇，几十年淤积心头而挥之不去。唯有陈老先生等人的形象愈发清晰、灵动。没听过他一节课，但先生让我懂得了知识分子的上品是靠家国情怀支撑的那份坚韧、自信与达观。

先生没走，依然突兀眼前，虽难望其项背，亦努力跟进。

记于 2017 年 7 月 8 日夜　修改于同年 8 月



**作者简介**

张学曾，1946 年出生于昆明。1965–1970 年就读于西安交大，1970–1990 年供职于青海毛纺织企业，1991–2002 年调入昆明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工作，2002–2006 年转入昆明市社科院。退休后分别在昆明市科技局和云南省环境与健康发展研究会等单位接受聘用。

# 風雨春秋
## ——文革往事

■/ 付登華

**【编者按】**：此文节选自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的《风雨春秋——从交大红卫兵到创业者》。编者修订了个别字词。

### 我是西安交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966 年春天，我们绝缘六一级部分同学在上海电缆厂和上海电缆研究所作毕业设计。五年的大学生活眼看快要结束了。我和庞惠娟、李惠彦的课题是《南京长江大桥 22 万伏过江电缆》，做实验，作总结，十分忙碌。政治活动时间，我们参加工厂组织的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批判竟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白。前一年，我们曾在临潼县参加过半年“四清”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经受阶级斗争洗礼，自认为政治上毕业是不成问题的了。因此，对党中央“二月提纲”指出的这场“学术讨论”并不十分在意。我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读过《燕山夜话》，没看过《海瑞罢官》，也不认识“三家村”中任何一位，无中毒可言，批判也罢，讨论也罢，与我关系不大。

然而，党中央《“五一六”通知》震撼了我。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同样由党中央发布的“二月提纲”，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 月 18 日，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在讲话中指责中央书记处彭真、羅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是“三家村”的黑后台，中央以反党集团停止了他们的职务进行批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从此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代了。我意识到，这场大革命将是对自己阶级觉悟的大检验，决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将对不起把我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党和人民。

6 月 2 日，《人民日报》按毛主席的批示，发表了北大聶元梓等人 5 月 25 日炮轰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北京、西安等大中学校师生立即掀起了批判校党委，楸斗党委书记的造反行动。学校乱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领导运动，力图恢复秩序。交大的运动情况很快传到上海：校党委靠边站了，彭康校长被批斗成了“黑帮”了，省委书记严克伦带领省委工作团进驻学校了……我们在上海议论着，辩论着，纷纷要求回校参加运动。但是，工作团的回应是不同意，要求我们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6 月上旬，我们得知学校里爆发了“赶走工作团，自己闹革命“的”六六事件”；下旬又得知“六六事件”被西北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领头的李世英、杨克俭、刘维娜、王永婷等党团员和学生干部成了反革命分子，被

批斗、游街、关押，学校停课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地总结试验，写毕业论文了。7 月上旬，我们不顾工作团的阻拦，造反回到了学校。

运动在毛主席的总导演下不断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7 月 18 日，毛主席从南方回到北京，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摊牌了。他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党中央又一次否定自己的决定，宣布撤消工作组（团）。刘、邓作了检讨。于是，全国大专院校最早反工作组的交大"六六事件"平反了，写第一张反工作团大字报的李世英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后来他在一份汇报报道上称李世英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这是当时全国无二的殊荣。

8 月 1 日至 8 月 12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公布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毛主席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由大中学校师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

8 月 5 日，毛主席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楸出彭、罗、陆、杨之后，把斗争目标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主席进一步指引年青的红卫兵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精神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

8 月 20 日，在党中央"十六条"的指引下，学校成立了以李世英为首的"文革总会"，取代撤走的省委工作团领导学校运动，班级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西安交通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应运而生。加入红卫兵组织与入团入党不同，只要是"红五类"家庭出身即可。我的家庭是佃中农成份，不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不仅当上了红卫兵，还成了"文革总

会”的“向工农办公室”工作人员。我们办公室的工作是为到工厂、农村和社会上去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师生服务。我以“12·9评论员”为笔名，收集各种信息，整理各地资料，写评论出专栏。我以手中的笔为“反修防修”鼓与吹。“文革”之前，我在电机工程系系工委宣传部任通讯员、《战斗》板报编辑和学校广播台的领导随行记者，就是笔杆子。

## 我看到了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原来，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也可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决定到北京去朝圣取经，回校搞好“向工农办公室”的工作。8月26日，我和朱泽一等几位低年级的红卫兵一起到了北京，首都红卫兵联络站安排我们住进了商业部招待所，让我们等待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入住以后才知道，这个招待所里住的全是我们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来京的红卫兵。

大约过了两天，联络员传达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的指示：请西安交大派一位红卫兵代表，8月31日代表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发言。我们深感意外。我想，让我们西安交大红卫兵出这个头，可能是李世英“六六”造反给学校争来的光荣。随即，我们来京的交大红卫兵商量，推我上天安门去出这个头。这可能和我的年龄比他们大有关，也可能和“12·9评论员”在学校大字报专栏上有点张扬有关。原来能“朝圣”见到毛主席我就满足了，突然运气来了，要上天安门城楼近距离见毛主席，甚至还可能与毛主席握手合个影什么的，这意外惊喜带来的兴奋在等待的两天里，把我折腾得好惨！

8月31日下午，联络员早早把我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边。广场和长安街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人人臂戴红卫兵袖章，

个个挥动《毛主席语录》，欢呼雀跃，红旗招展，“造反有理”歌声此起彼伏。离检阅开始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咋个还不叫上天安门呢？”我有些焦急地问联络员，联络员看看表也着急了，他说：“我们都等了三个多钟头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哟？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理组长江青同志主持，但是具体安排不是她。”那时候没有手机，联络不方便。果然，不幸被联络员言中；不一会广播里呼唤：“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兰州大学XXX（我已记不清楚名字了，好像叫李贵子，后来听说是位高干子弟）请到天安门上来！”听到前半句，我心里一阵狂喜；听完全句，我晕！心里格登一下感到好失落。联络员说：“果然有变！”面对他那惋惜无奈的神色，我很快平静下来，退而求其次，心里调侃自己：出那个风头未必是好事。提起精神等待实现自己赴京的初始目标：朝圣！

17点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出发，在两边各四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驶入广场通道检阅红卫兵。毛主席红光满面，不断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像海啸在广场上滚动。我和身旁的红卫兵一样：嗓子哑了，眼泪流出来了，手还在一个劲地挥舞。车队驶到金水桥停下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下车，穿过金水桥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我不敢眨眼，想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镌刻在脑海里。可惜泪眼朦胧，我只记下了他那高大的身影和左臂上的红卫兵袖章。

18点40分，江青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袖章讲话，他称赞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好得很”，鼓动红卫兵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以后，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讲话传达的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周恩来最后讲话，号召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政府总管，他担心运动破坏生产，影响国计民生。总理讲话以后，游行开始，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在有节奏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中，我走过金水桥进入广场，侧着身子盯着天安门城楼，挥舞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留恋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8·31”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墙上的画像看到真实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距只有二三十米远啊！我实在是热血沸腾，激情满怀，暗暗地发誓绝不做“和平演变”的一代，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 8 月 18 日起，到 11 月下旬天气寒冷为止，毛主席八次接见了全国 1100 多万红卫兵。毛主席这一举世空前的壮举，使我们这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党的青年学生对他的敬仰与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候，即使半夜传达他的“最高指示”，我们这些红卫兵都会激情迸发，连夜上街游行欢呼。

## “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言论行动引起的思辨

1966 年 8 月 26 日，我和朱泽一等交大红卫兵到北京以后，最先碰到的是闻名京城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红纠队”。他们的队员，无论男女，一律穿军装，戴军帽，腰扎军用皮带，《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文革”以后，电视上、银幕上塑造的“红卫兵”形象就是“红纠队”的翻版。尽管红卫兵运动中大多数红卫兵，除了红袖章之外，并非一身军装、军帽和皮带，我自己就从没有“军人”化。毛主席像章问世之后，我连红袖章

都不戴了，只戴毛主席像章。文艺家们表现当年的红卫兵，选错了典型。

“红纠队”成员的家庭出身，不是“革命干部”便是“革命军人”。一见面，他（她）们就像表演顺口溜似的对我们宣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接待我们时，首先审查出身，好似首都公安局在查嫌犯。外地赴京师生并非青一色“红五类”出身。我们目睹了少数不知“红纠队”深浅的师生，诚实地报了自己“黑五类”家门，这下可惨了：女的被“红纠队”剪去长发，变得不男不女；男的则推成“阴阳头”，像被捉的小偷。然后，一起勒令离京。所幸我们一行人是真红卫兵，没有人遭此一劫。但是，见证此情此景，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快与疑惑。我祈祷还在进京途中的非“红五类”师生，届时随便报一个好出身，躲过“红纠队”这一劫。

在等待毛主席“8·31”接见的几天里，我们游动在首都大专院校和街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中，傍晚回到招待所则重点观察、学习首都红卫兵如何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跟踪“红纠队”破“四旧”。他们不单人行动，而是分成小分队或小组活动。有的小组带着工具砸路牌、店招，毁古迹……一切被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在破坏之列；有的提浆糊桶，墨汁桶，夹红、白纸，刷大标语、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他（她）们很威风，有种目空一切的气势。

一天晚上，我们在商业部招待所外面的马路上，遇到两位执勤的“红纠队”队员在不远处巡查。突然，一辆未开车前灯的小汽车被他们拦住了，只见男队员拉开车门把司机扯下车，不知问了些什么，司机似乎力争什么，突然那男队员抽出腰上的皮带朝司机乱抡。我们快步迎上去想劝解，旁边的女队员看看我们臂膀上的红袖章，告诉我们：“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车灯坏了还上街，存心破坏交通秩序”。我壮起胆子劝道；“念他初犯，教训一

下，让他认识你们西城纠察队的威风就放他走吧！”那女队员看看周围的人越聚越多，这才说：“看在我们西安红卫兵战友的份上，放你一马。滚！”司机不住陪不是，上车把车开走了。他后来是否还会遇上别的“红纠队”，天知道！我想，要是真打的话，司机那么大的个头，两个“红纠队”队员根本不是对手，可叹他是“资本家的狗崽子”！

不一会，一个中年人骑自行车一声不响地撞了上来，两名“红纠队”队员同时出手将人车一起掀倒在地，厉声责问：“为什么没有铃铛？”“你是干什么的？”中年男人站起来扶稳车把，只回了一句：“军体的！“两个队员”啊”了一声，闪到一边，让自行车急驰而去。我不知“军体”是干什么的，也不便多打听，只在心里思忖：汽车灯、自行车铃与“四旧”有什么关系呢？

明明“红纠队”以出身论是非，搞的是反动的“血统论，”其行为又那么乖张无法度，可“8·31”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以副统帅的身份，不仅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红卫兵袖章，讲话中还称赞“红纠队”的破“四旧”行动“好得很”。这是为什么？我把心里的困惑带回了西安。

不久，我们西安地区出现了“西安红卫兵恐怖部队”，又称“红恐队”。他们与“红纠队”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电”）学员为主，身上的军装是现成的。他们不仅鼓吹“血统论”，还以毛主席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装扮自己，疯狂地“打、砸、抢、抄、抓”。

10月份，北京出现了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大字报、传单；同时出现打倒“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大标语和批判文章。大串联的红卫兵和“北京来电”很快把消息传到各地。我们交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很快行动起

来与北京呼应，通过大字报，宣传车，传单等对我们西安的“红恐队”进行揭露、批判、斗争。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得不宣布取缔“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同时宣布高干子弟退出群众组织，更不能当领导，这给了反动“血统论”一次打击。西安的“红恐队”也被解散。不过，他们中的一些“打、砸、抢”分子回到自己的学校以后，成了随后反我们交大“右倾”，制造分裂的急先锋和“文攻武卫”的骨干分子。

## 我的“大串联”半途而废

毛主席“8·31”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各地红卫兵纷纷进京“取经”，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与此同时，北京的红卫兵也分赴全国城乡“点火”，“大串联”迅速遍及全国。红卫兵享受吃、住不要钱，坐车不买票特权；各地大专院校还设立红卫兵连络站负责接待。这确实是一个到大风大浪中去学会“游泳”，同时一览祖国山河的大好机会。乘“通知”长风，我决定走出交大去“大串联”。“通知”之前，我已自发到过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我不准备再到北京“取经”了。

10月中旬，我和张彦奇同学商量以后，组织了赴西南串联红卫兵小分队。出发以后，我们才感受到，“大串联”已使铁路交通陷入混乱。我们十多人分别从车门、窗口挤上火车，车厢里塞得满满的，进车厢难，想出去更难。立住脚后打眼一看，厕所的门开着，里面站满了人，想“方便”一下，难！行李架上躺满了人，真担心会塌下来砸着人。外面天气凉爽，车厢里却闷热如蒸笼，遭老罪了。更糟糕的是列车开动以后，一路停靠无时刻可言……

不少人受不了，在一些大站另寻“串联”路去了。我们一行人好不容易熬到成都便分头去川大、科大、华西医学院等大专院校看大字报，拜访老同学，探亲访友……到约定时间再集合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另作打算，散了。只有唐洁芳、徐幼玲等几个家住重庆、贵阳方向的低年级女同学和我一起继续登车前行。

在贵阳，我通过红卫兵联络站住进了贵州师范大学接待站，唐洁芳回到头桥家里去住了。我们到贵大、师大、医大等校看大字报，和成都各大学情况差不多，没有什么新内容，除了“北京来电”与各地消息，可学习的东西甚少。各地消息、动态，也是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带来的“礼物”，我也看到了我们交大的动态，不过都是旧闻了。我琢磨：“文化大革命”要收兵了吗？毛主席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在哪里呢？

我们准备去看看黄果树瀑布以后，再去遵义串联，瞻仰遵义会议遗址，那是红军长征中决定毛主席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地方。可是，唐洁芳重感冒了，走不动了，只好继续在贵阳休整等待。此时，学校文革总会通过红卫兵联络站通知我：立即回校参加运动。原来，北京传来消息，党中央从 10 月 9 日起召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会，十多天了，会议还没有结束。可是，消息灵通的北京红卫兵已经行动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旗号，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从“炮打司令部”里的“赫鲁晓夫”，发展到炮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司令部”了。看来，运动离结束还远。

我决定按校文革总会的要求立即回校参加运动。唐洁芳的重感冒未瘉又出现扁桃腺炎，需要回校治疗，她是我们专业 43 班的小同学，1964 年迎接新生相识。为了不给另外两位要继续“大串联”的同伴留包袱，唐洁芳决定

与我一起返校。我们对宝成线上的混乱心有余悸，于是绕道株州、长沙、武汉到西安。因为车次多，管理比较有序，又因为唐洁芳的病态，我们在武汉还换上了卧铺。两天以后，我俩回到学校。

我的“大串联”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回校后，我立即和“向工农办公室”的师生一起投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参加了“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的大批判会，静坐示威，绝食抗议，还与西北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拼刺刀”……我像一只上足发条的陀螺，不停息地表现着自己的活动能力，释放自己的“革命”能量。

## 我担任了交大“大辩论串联会”会长

“文革”时，我们西安地区的大专院校多，我统计过，除了上海、北京，全国排第三。在红卫兵运动时期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期间，我们西安地区大专院校师生是风雨同舟的战友，很团结的，常常一校出事，多校声援，哪怕是夜半三更。交大“六六”事件爆发早，还有毛主席给李世英的“交大学生领袖”批示，各校都很尊重交大在大专院校中的主导地位。先后建立的“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交大的“红卫兵总部”和“文革总会”都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文革”以后我常想，我们西安地区大专院校要是一直和我们交大一样保持团结和统一就好了。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当运动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期，揪各级党内“走资派”的时候，出现了“保皇派”和一批被批判过的干部、教师，如何对待他们？分歧产生了。

西电、西工大等校的部分师生继续坚持谭力夫的“血统论”，主张革命队伍要纯之又纯；对“保皇派”要坚持批判斗争，对被批判过的干部、教师要痛打“落水狗”；宣传“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学校的“军事”、“国防”性质，决定了他们来自“红色”家庭，越“左”越革命成了他们的信条，并且影响很大。

我们交大师生是一个多成份组成的大家庭，这也是国家一类重点大学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不认账极“左”思潮，不承认“老子英雄儿好汉”，更何况“老子”在运动中是不是“英雄”还难说。11 月底，学校大字报栏出现了很多谈“策略”，讲“政策”，批“极左”的文章。12 月初，我发表了一篇“12·9”评论员文章：《论“关门主义”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性》，引起不少师生关注。

我在文章中摘录了 1935 年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一段话：“关门主义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我在评论中阐述的主要观点：“造反派”和“保皇派”是认识上的差别，不是立场问题，革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应该求大同，存小异；革命不分先后，应该欢迎被批判过的干部、教师革命，反对一律打倒“永世不得翻身”。

鉴于学校大字报上的各种提法，我提议召开全校辩论会，以民主的方法统一我们交大师生的认识，高压 11 班班长李丹彦同学首先响应我的提议，并具体建议大辩论会场放在行政楼四〇二大教室，不管是不是红卫兵，只要是交大师生都可以参加。

第一次辩论会由我主持。哪些师生发言，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师生们

踴跃上台争话筒，开场有些乱。我请大家报名排队，观点不同的优先陈述，观点相同的只作补充，辩论会得以有序深入地进行。师生们广征博引，“巴黎公社”的教训，《共产党宣言》的启示，都成了大家统一思想的有力武器。这次大辩论充分展示了交大师生的睿智，最后归纳为一个共识：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极“左”行动，讲究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这便是西安地区有名的“交大观点”。“四〇二“辩论会后来被交大师生称为”四〇二精神”。极“左”派视“交大观点”为“右倾机会主义”，利用一切手段反“右倾”，同时把交大称作“投降派”。道不同，不相为谋，西安地区大专院校出现了分裂。西安地区各行业赞成“交大观点”的干部、群众纷纷成立“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艺总司”以及“高联”、“中革会”等群众组织，称作“交大派”。

“四〇二”辩论会上摆事实，讲道理，大争论达到大统一，这一形式与学校师生对大民主的渴望产生了共鸣。不少人在发言中希望今后学校坚持这种形式解决一切问题。鉴于此，我提议在校文革总会领导下，成立一个民间组织为辩论会服务，我的提议得到“四〇二”大教室内到会师生的鼓掌支持。取个什么名呢？人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最后，一位老师说：“既然专司大辩论，名字应该包含‘大辩论’三字；大家又是自动串联参加的，不如叫‘大辩论串联会’为好”。一阵热烈的掌声，“大辩论串联会”就此诞生。谁任会长？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有人肯定了我的主持能力，推荐我担任，一阵掌声便通过了。我作为“向工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兼任了“大辩论串联会”会长。我介绍李丹彦之后推荐他任副会长，也被鼓掌通过。

“大辩论串联会”成立以后到爆发“八五”静坐，我在校内“四〇二”和西安市的环城、土门、韩森寨等多家俱乐部，组织了十多场辩论会。校外俱乐部的大辩论，开初是宣传“交大观点”，批判极“左”思湖，抵制反

“右倾”；1967 年 2 月份以后批判“革命的打、砸、抢”、“文攻武卫”，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校内组织的“大辩论”内容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两场印象深刻。一场是学校的宣传车被极“左”派砸坏之后，我们召集师生们辩论怎么办？有的说再装一辆，有的不同意。又是一位老师上台建议：不再装也不再修宣传车，采取“人民战争”宣传“交大观点”。怎么打？他说：用马粪纸和大红纸做成“红喇叭”，师生们分成小分队深入全市灵活机动作宣传。全市人民称道的交大“红喇叭”队，便这样诞生在“四〇二”。

另外一次校内大辩论发生在 1967 年 8 月 5 日晚上。我将在回忆“八五”静坐爆发时讲到。

## 我和李丹彦到上海认识“一月夺权”

1967 年 1 月 6 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 32 个上海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主席对这次“一月夺权”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祝贺“一月夺权”，《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一月夺权”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还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月夺权”之后，上海“工总司”等 32 个组织于 2 月 5 日又联合召开百万人大会，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不仅通告天下：“一切权力归上

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还分别在大会上宣布：“一月革命是伟大的人民革命。”“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尽管如此，这次建立临时政权的盛大活动，除了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宣传外，《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按兵不动。而1月31日，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夺省委大权后，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不仅及时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社论，同时新华社转发全国。

“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得轰轰烈烈；夺了权建立政权机构，中央却雅雀无声。这是为什么？没有过几天，《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各种传单满天飞，令我们远在西安的交大师生惶惑。

更令人不解的是从1月6日至2月初，同一个上海市委的权发生多次被夺。

1月15日凌晨，“上三司”和“工总司”二兵团联合带领工人和学生进驻上海市委大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1月22日中午“上三司”在“工总司”二兵团退出联合行动后，重新联络了一些造反组织第二次进驻上海市委机关，宣布正式接管上海市委。

1月24日晚上，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带领22个造反组织采取突然行动，从上到下收走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区党政机关的公章，宣布夺了上海市的所有权力………

这一系列的“夺权”，除了夺权组织自己的小报、传单作宣传报导外，从上海地方报到中央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发消息。这一切令人猜想：上海“一月夺权”不知有多乱？我们学校的大字报栏上出现了大标语：《上海怎么啦？》《“一月夺权”到底怎么看？》……我与李丹彦商量后，决定我俩到上海去走一趟，拜访王洪文，认识“一月夺权”。

我俩2月22日一到上海，便赶到“工总司”司令部。各地来的“红袖章”挤来拥去，找人很难。李丹彦是上海人，他终于逮着一个戴“工总司”袖章的上海人进行交涉。那人把我俩带到大厅内一间办公室，取了几份《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等“工总司”的宣传品，对我们说：“你们要了解的东西，这些材料上都有。”我表示想拜访王洪文，还亮出了我俩是西安交大“大辩论串联会”会长身份。他无奈地告诉我俩：“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我们都难以见到王司令。他们在外滩上海大厦上班。”我说：“我想去闯一闯，也许会碰上。”他劝道：“何苦呢？去了也难进门。只有北京几所大学上海联络站的红卫兵可以进出，他们是‘一月夺权’的发起单位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成员单位。”正当我们道谢准备离去时，他忽然告诉我们：“毛主席支持‘一月夺权’但不赞成夺权后建立公社。后天开大会改名，你们到会上去可能会遇上王司令。”

2月24日下午，“上海人民公社”成员单位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我们没有进到会场，当然也不会“遇到”王洪文。大会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毛主席关于夺权中要实现“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临时权力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等指示。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立即对大会作了报导，新华社同时向全国发了电讯。《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一月夺权”总结性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至此，我们搞明白了：夺权必须实现“大联合”。“红革会”、“红三司”、“工总司”二兵团等拉山头，抢公章，占机关的所谓夺权，实际上是向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权、抢权，违背了运动的大方向，错了。

同时，我们也清楚了：夺权后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应该由军队代表、干部

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名字一律叫“革命委员”。

我俩回到学校，通过大字报和“四〇二”辩论会，把我们的见闻与认识向学校师生作了传达。

## 西安交大赴渝“五一〇”支队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引发“打到一切”全面夺权风暴，全国陷入空前的动乱局面。尽管全国大专院校的不少师生，因为不满、失望而离开运动，成了“逍遥派”。但是，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并未因此降温，反而越演越激烈。有的单位，有的地区，两派之间为了“争权”、“抢权”，不惜动刀动枪“打、砸、抢”，组织武斗，制造流血惨案。而极“左”派仍然继续鼓吹：“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工农业生产。

我们交大师生坚持“交大观点”：抵制反“右倾”，批判“打、砸、抢”，反对搞武斗，实行“大联合”。交大内部坚持以大辩论的民主方法统一认识，团结在校文革总会的领导下开展运动。7月1日建立了交大校革委会。交大师生没有水火不容的两派斗争，对外只有一个派，那就是校文革总会（7月1日以后是校革委会）领导下的“交大派”。而西电、西工大等就不同了，我的高中同学曾祥文是西工大一个班的文革小组长，他在班上讲：“我看交大观点没有错……”就被围攻，说他是“叛徒”，最后他不得不成了“逍遥派”；而他们学校的“临委会”因为赞成交大观点，有的女同学还被极“左”派强行把头发从中间推掉。全国不少处于少数派的大专院校师生赞佩交大的团结与斗争精神，不断与学校本部和驻京办事处联络，结成统一战线。重庆“8·15”兵团司令周家喻、“红卫兵成都部队”总指挥蔡文斌等

还亲自到交大考察学习，愿意与交大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我参加了与他们的交流座谈，并负责接待和送行。

5 月初，从北京传来消息，北大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声明：重庆“8·15”兵团是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聂元梓虽然不是北大学生，但是是毛主席指定的“文化大革命”点火者，她代表北大如此表态，重庆“8·15”和我们交大师生都难以相信，怀疑她蜕变成了极“左”派，或者是受了自己驻渝联络站的蒙蔽。重庆“8·15”决定 5 月 10 日在体育场召开哲师大会，反击极“左”思潮，对交大发出了邀请。

校文革总会作战部指定我负责组织“西安交通大学赴渝‘五一〇’支队”声援“八一五”兵团。

5 月 10 日，我和乔明生、宁伯岩等师生到达重庆，当即受到周家喻等兵团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当晚，当我们举着“西安交通大学赴渝‘五一〇’支队”队旗进入誓师大会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向西安交大战友学习！”“向西安交大战友致敬！”那一刻，我们有“国际主义”战士凯旋般的自豪。四十多年过去了，那热情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我在大会上作演讲，痛击反“右”倾，批判“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呼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我代表西安交大师生坚决支持重庆“八 . 一五”兵团，高呼“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我的演讲获得长时间的掌声。




西安交大驻渝 510 支队从左至右前排：陈章奇、付登华、乔明生后排朱泽一、宁伯岩、刘厚槐

誓师大会以后，我们用几天时间，到离重庆几十公里的北碚，先后在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校慰问处于少数派地位的“8·15”战友，建立相互交流信息和材料的渠道。此后，外语学院一个学法文的小同学一直坚持给交大资料室寄资料，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秦长虹。

## 我所了解的陕西省支左委员会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央军委按照毛主席指示，决定派解放军部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

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由四家部队领导组成。他们分别是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21 军（8133 部队）军长胡炜、兰州空军杨焕民、总后西安办事处（203 部队）主任白辛夫。黄经耀任支左委员会主任。

毛主席要求“三支两军”以“支左”为中心。我们西安地区两大派谁是“左派”呢？谷凤鸣（编者注：时任陕西省军区副政委）和白辛夫赞同“交大观点”，希望通过做工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支左”就是要支持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此，他们同等对待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代表，尽力促联合。以我们交大为代表的一派与他们联络密切，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但是，他们在支左委员会里是“弱势”，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譬如，“八五”静坐的导火索——支左委员会关于同意《红卫兵报》复刊决定，他们没有参加研究。我们建议支左委员会召开会议，商量采取切实措施制止武斗，胡炜不出席，会议无法开。谷凤鸣告诉我们：“胡军长不到，我们作了决定也执行不了。”“九二”武斗发生后，我们找谷凤鸣，他很着急，却无能力制止武斗，只能多次派人带车帮

助“工总司”寻找并拉回尸体……

孙长兴（编者注：21 军 8118 部队师长）以胡炜马首是瞻，胡炜不见交大派代表，他也不出面；胡炜进入陕西“支左”就成了极“左”派的后盾，他紧随其后；胡炜说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电）是准军事院校，戴上领章、帽徽就是军人。孙长兴就补充说，他们的家庭出身都好，不像交大那么复杂。只不过孙长兴没有胡炜那么自我，那么胆大妄为。

胡炜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当时是位年轻的军长，我们开始是很敬重他的。可惜他走错了路，他的“支左”就是支持极“左”派。由于他旗帜鲜明地以极“左”力挺极“左”派，以至于 1967 年 8–9 月份，极“左”派打出“军民联防，文攻武卫”旗号，声称“21 军好，21 军好，21 军支左不支保”，视交大为敌人，架机关枪封锁、监视交大师生，开坦克车向手无寸铁的交大师生示威。再说：“八五”静坐那天晚上，他如果出面会见交大师生代表，同意研究我们的“四点要求”，我们就回校了，就不会有 40 多天静坐。然而，他却坦然地在楼上和极“左”派的首脑们吃西瓜，就是不出面。

胡炜这样有恃无恐地支持极“左”派，原因在于他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陕西的代理人。“九二”武斗发生前，他两次通过黄永胜在西电的儿子与黄永胜联系，然后向极“左”派提供枪支、电台。黄永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由杨君毅、谢诗琪揭发。俩人在“9.13“以后曾以”向东星”名义调查、揭发胡炜、孙长兴，被胡、孙打成反革命分子。杨、谢两人于 1978 年 12 月 19 日平反）。

胡炜投靠林彪，同时极力靠上“四人邦”，与“四人邦”的高参康生沆瀣一气，1967 年 9 月 18 日周总理接见西安群众组织代表时，俩人联手诬指交大，打压交大。

胡炜在西安全力支持极“左”派，引起不少干部群众的批判、反抗。他

利用“整黑案”，抓“5·16”反革命等各种名目迫害这些干部、群众，即使提拔到中央军委工作了，仍遥控迫害不放松。胡炜整了多少人？害死多少人？ 1979 年中共陕西省委平反“01”号案的 175 号文件有说法。

## 在交大主持最后一场大辩论与“八五”静坐

西安“红造司”主办的《红卫兵报》，因为单方面宣传反“右倾”，搞分裂，还鼓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在交大“红卫兵总部”的坚持下，于 1967 年 5 月停刊。此后，“红造司”一直争取复刊，得到支左委员会胡炜的支持。支一派，压一派，搞分裂的胡炜曾提出：让《红卫兵报》复刊，交大另外办一份报。交大“红卫兵总部”拒绝了这个不利于大联合的提议。

1967 年 8 月 5 日下午，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突然给交大送来一份同意《红卫兵报》复刊通知。这个决定既没有征求交大“红卫兵总部”意见，也没有取得支左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同意，是胡炜单方面煽动派性的决定。我们在校革委会作战部开会的师生刚议论过《红卫兵报》可能单方面复刊问题（因为交大“红卫兵总部”仍是“红造司”的主要成员之一），突然看见这个决定，大家气愤之极，我取出纸笔，满腔怒火写了一张大字报：《胡炜必须悬崖勒猪！》同事们立刻帮助我贴到东二楼靠东干道的阳台边上。我在大字报中公开了复刊通知内容，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呼吁晚上在“四〇二”辩论怎么办？

当晚的辩论会最初由校革委会委员叶雄波主持，我在行政楼二楼起草《“惊回首”报》复刊词，胡炜不是讲“你们可以另外办一份报”吗？ 9 点多，有人来通知我：“四〇二”辩论会还没有结论，不少人呼唤“请付登华上台！”我听了立即起身到“四〇二”接过叶雄波手中的话筒，主持了我在

交大的最后一场大辩论。

大约 10 点多，我归纳师生们的意见为对支左委员会的“四点”要求。其中，有不准搞派性的《红卫兵报》复刊，支左委员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不准支一派压一派等。同时决定出发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反映我们的要求，否则第二天《红卫兵报》复刊，出版了报纸就迟了。

当天晚上，大家推举我为临时总指挥，跟着我和叶雄波等人一起到玉祥门市总工会的交大师生有多少？我们事先并没有组织人，至今我也搞不清楚，只看见黑压压地一大片。晚上陆续有“交大派”的群众来声援我们，我心里很感动。

凌晨，李世英也到了接待站，我们把四点要求改成了《五条严正要求》。我们等了一个晚上，不仅胡炜没有出面接见，支左委员会连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见到。我和叶雄波、李世英等商量后征求大家的意见，都同意把人带到建国路去等待。

8 月 6 日下午，“交大派”各总司的司令都到了张学良公馆，建立了以“工总司”司令马希圣为总指挥，交大李世英主任为政委的“西安地区”八五“静坐总指挥部”，我成为总指挥部秘书，直到 9 月 18 日周总理接见我们的代表解决问题前，静坐方结束。

《“八五”静坐声明》由我在 8 月 6 日起草后送回学校，《人民交大》于 8 月 8 日刊出。其中的五条要求其蓝本便是头晚“四〇二”辩论会上形成的“四条要求”。

## 我与李世英“风雨同舟”的日子

李世英微黑稍胖，显得有些老气。其实，他的年龄比我小，年级也比我低，

是我的小弟、学弟。我说这些，是因为后面的经历中，曾有人将我两错位。

1966 年夏天，李世英成为“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有了名气和影响力。那时候，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我们没有打过什么交道。1967 年 8 月 6 日，成立“八五静坐总指挥部”以后，他是政委，我是秘书，此后的 40 多天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多，成了“风雨同舟”的战友。我与他共同经历的一些事，细节已记不清楚了，如今已成历史。

1978 年 12 月 15 日，陕西省革委会和西安市革委会联合召开大会，以“打、砸、抢”首恶分子罪名批斗、逮捕了李世英。同时批斗、逮捕的还有“工总司”马希圣、“工联”张培信、“统指”孙福林等多人。至此，进入陕西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都关起来了。过了 20 天，1979 年 1 月 3 日，西安交大两名干部到西安电缆厂找我作调查，要了解李世英在“九二”武斗期间的表现以及对武斗的态度。

我问：“批斗了，逮捕了，再来找材料吗？”

他们答：“不是，是核实。”

我说：“那好。‘文革’中交大师生一直抵制武斗，批判‘打、砸、抢’和‘文攻武卫’，这是西安人所共知的事实。难道陕西省委不知道吗？交大既没有发生过内部的武斗，也没有组织人参加社会上的武斗，革委会主任却成了‘打、砸、抢’首恶分子，这从何说起呢？难道这也要在两派中搞平衡么？”

两位外调者这才告诉我：“省委把李世英交给交大批斗，交大教职员工不仅不愿批，反而意见很大，看法与你差不多。所以，校党委派我们找知情人作调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我向他俩回顾了“八五”静坐中，我与李世英“风雨同舟”的一些情况。三天之后，作为证明材料交到了交大。

如今又过去三十多年了，1967 年的工作笔记已在 1971 年抓我为“5·16”分子的时候被搜走无归，回忆是粗放的。

**1. 一次与武斗有关的校革委会委员会**

1967 年 8 月下旬，西安地区的“工联”、“统指”在胡炜支持下公开宣称“军民联防，文攻武卫”。西安地区武斗频发，先后有西郊的变压器电炉厂、安装技校等单位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工总司”下属组织被打被砸，造成血案。

面对如此处境，“工总司”里出现了对交大校革委会李世英、武登才等的指责：什么“交大策略过头了！”“交大就是右倾，人家‘统指’的学校都武装起来了。”“你们‘交老总’要靠我们工人保护。”等等；而学校里，“六六兵团”在行政楼大门上贴大字报，炮轰校革委会，说校革委会在“文攻武卫”问题上右倾。

这时候，校革委会在电机实验室召开了一次委员会，专门研究与“武斗”有关的问题。江青 7 月份公开支持“文攻武卫”，不到一个月，全国武斗到处开花，迅速升级，我们交大不少师生正在批判“文攻武卫”。我在政治部的一次学习会上就说过：“‘文攻武卫’与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对立的，不知江青和毛主席商量过没有？‘武卫’成了‘武斗’的借口，‘文攻武卫’使武斗升级，搞乱了全国。”

抓“5·16”的时候，这是查会议记录给我查出的一条“罪状”。所以，这次会上没有研究“文攻武卫”问题，也没有研究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武卫”。中心内容是讨论交大被打怎么办？我们怎样保护全校师生和贵重的实验设备？

李世英提出，挨打的时候，把师生和设备转移南山或东去临潼、渭南。他说：“这两个方向交大派力量强些，相对较安全。”

会上安排张国强、李能贵加强自卫准备，打一批短刀加强校内巡逻；造一批地雷埋在学校围墙里面（编者注，造地雷一事未实施），阻挡对学校的冲击。

会后第二天傍晚，我陪李世英在南山一军校学员带领下，到了丰裕口一所军校的学员宿舍楼。由于不远的大楼由对立面控制，气氛不容我们轻松。我们听完附近两派情况介绍以后，简单吃了点晚饭便往回走。去时，我们走东边韦曲，回城走西边高桥，趁黑穿过陕西师大回到交大。李世英说："学校一旦出事，两条路都可以到南山。"

没有想到，李世英在校革委会上关于撤退的讲话和我俩的南山行，竟然在 1978 年成了李世英的一大罪状："退守南山"云云。交大这种避免师生流血的"退守"是"罪"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公理了！

**2."九二"武斗发生后，我陪李世英两次到省军区求助制止武斗**

1967 年 9 月 1 日晚上至 9 月 2 日凌晨，西安西郊爆发的"九二"武斗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当天晚上，我住在学校东三楼"193 战斗队"。天明，被"工总司"宣传部长崔三合的电话叫醒。崔三合说："凌晨 3 点 40 分，'工联'在西郊开枪了！马希圣和李世英都到人民大厦了。车子在交大门口等你，赶快过来。"我赶到人民大厦，在前楼东四层的一间办公室，看到李世英和马希圣、吴文杰等坐在那里全都不讲话。进屋后，我发现那么大个子的马希圣像个女人一样嘤嘤地哭，李世英紧张地守着电话机，一会电话里传来"工总司"副司令刘安全的声音，说了啥？我没有听清。突然，电话没声了，怎么叫都不管用，房内一片叹息。崔三合告诉我："刘安全带人去西郊救人。现在电话断了，可能老刘出事了。"他俩是新华印刷厂的同事。我分配工作以后再见到刘安全，知道他还活着，也没有再打听 9 月 2 日早上出了什么情况。

马希圣和李世英等商量以后，决定自己到省军区求助救人，避免再派人去不仅救不了人，还会增加伤亡。马希圣去军区后再没有回大厦，直到9月10日，我们到北京后才知道他从军区到了北京，住在纺织工业部招待所。

当天下午，我陪李世英又到省军区找谷凤鸣政委，希望部队出来制止武斗，抢救伤员，帮助要回来被抓走的工人和死者遗体。谷政委客气地接待我们，听说我俩还饿着肚子，马上令人炒了些米饭给我们充饥。关于派人制止武斗，他表示靠省军区一家是不行的。至于解救被抓的人和寻找尸体，谷政委表示马上尽力去办。

9月6日晚上，我陪李世英从兴平回校，全校冷冷清清。武登才告诉我们，在我们去兴平的三天里，“工联”和“统指”打着“军民联防”旗号，派军校的坦克围着交大示威，学校外面的兴庆公园、计量局、陕工大以及和平门城楼和第八设计院都架了机枪，对交大师生实行封锁、威胁。而学校里，除了几十把短刀，没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章泽（编者注：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省、市老干部建议交大疏散，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校革委研究以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学校大部分师生员工都疏散回家或投亲靠友去了，只留了少数师生护校。

当晚，我住行政楼325室，整栋大楼只有值班电话员和我，我担心坦克从兴庆公园冲进交大，不敢睡得太“死”。凌晨，我接到周总理的联络员吴斌打来的电话：“请交大、‘工总司’派3至5人到北京解决问题。李世英一定要来，来之前把静坐撤掉”。

李世英和武登才住在一起，我立即到武登才的宿舍传达了吴斌的电话。我们议论：先撤静坐再去北京，不好动员；只有周总理接见与撤退静坐同时进行才好办。因为胡炜不出面接待解决问题，周总理出面解决，大家都相信周总理。

为了了解情况，9 月 7 日上午，我陪李世英和“高联”“中革会”负责人郭自强、王文贤到西安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伤员。

下午，我陪李世英再次到省军区请谷政委帮助。谷政委说：“这几天我们一直派人带车去找尸体，其他问题一时难办。不过，西安目前的情况北京已经知道了。”他告诉我们：省军区已得到通知，周总理要交大，“工总司”派代表去北京解决问题。

**3.“九二”晚上，受李世英委托，我和孙少华把“红造司”司令李洪明送回交大保安全**

9 月 2 日傍晚，学校“193 战斗队”孙少华报告：“九五”战团有人端着枪在大厦搜查李洪明，要找他报仇。

李洪明是怎么抓到大厦的？我不清楚。只听说，凌晨西郊武斗发生之后，交大和“工总司”人员在玉祥门碰到一辆车，黑灯瞎火中，车上的人自报身份，说自己是李洪明。他可能是出来巡视，误将“敌方”认“己方”了，在场的人也不认识李洪明，便将他带回了人民大厦。学校“817”调查组顾洹证实了李洪明的身份，向李世英作了报告，并建议尽快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以防止发生意外。

“工总司”的“九五”战团由回民组成，十分彪悍，有一个老者是他们习武的师傅（姓名已忘）。他们得知有队员在西郊被打死了，这时候若让他们找到李洪明，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李世英讲：“李洪明过去是和我们一起造反的战友，现在虽然观点不同，但我相信他不是坏人，不能让他被打死。”如何保证李洪明的安全呢？送回西电或“红造司”都不现实，他身上揣着地图，不可能放他回去参与或指挥武斗。送回交大又担心给学校招来“打、砸、抢”。有人建议送纺织城去，东郊交大派人多。我不同意，因为路太远，半路被截住的话，我和孙少

华都回不来了。最后决定，还是送回交大稳当一些。

为了不被“九五”战团干扰，我们找来他们的师傅，要他和我们一起走，负责我们安全离开。孙少华到市“东方红”广播站借来一支枪，我们分乘两辆车，把李洪明和他的随行人平安送回交大，交给了治保部的冯成武（或邵乐冲，记不准了）。我们安排人为李洪明二人买来食品，把他在大厦写的交待材料和地图一并转交了治保部。

9 月 6 日，我陪李世英从兴平回校，得知学校在疏散的时候，顺势把李洪明二人放掉了。

1969 年在汤峪学习班上，我见到了他，当我谈到李世英在大厦的那一番话时，极“左”的“红造司”司令脸上露出了愧色。我调侃道：“要不是交大‘右倾’，司令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了。”

**4.1967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李世英带领我们 10 名工作人员到兴平 302 库完成周总理的委托**

9 月 3 日凌晨，我在人民大厦接到周总理秘书郃贤荣的电话。电话讲，据报告，陕西兴平发生“农造司”抢“302”国防库，总理委托李世英去解决问题。秘书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转告李世英：“党信任你，委托你去！”

我们当即猜想：总理可能认为兴平“农造司”与西安“农总司”一样是交大派，因此要李世英去做工作。不过，面对周总理的委托，李世英没有迟疑，天明即赶回学校，在广播室召开了校革委会紧急会议。当传达周总理嘱托后，委员们异常兴奋，决定李世英放下一切工作，立即带革委会委员李印生等 10 人到兴平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我们一行人当天上午赶到兴平，立即着于调查。我们到 302 部队，指战员们听李世英传达周总理委托后，气愤的反映：302 库根本没有发生过“农造司”抢劫问题！我们感到肩上的压力轻松了很多。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

得到不实的报告呢？指战员们纷纷讲：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欺骗总理，企图赶走多年来和他们并肩联防的武装基干民兵，然后趁机抢 302 库里的武器。

我们通过 302 部队首长请来“农造司”和武装基干民兵负责人，他们与西安“农总司”没有组织联系，不过知道交大观点，挺赞成的，所以对我们很客气。他们听传达总理指示以后，和部队指战员一样气愤，他们说，最近西安不少人来兴平活动，频频进入 21 军驻秦岭公司支左部队，宣传“农造司”等组织是“保皇派”，鼓吹“军民联防，文功武卫”，搅得兴平“打、砸、抢”越来越凶，城乡人心惶惶。如今诬蔑我们抢 302 库，欺骗党中央，这是一个阴谋。我们农村武装基干民兵与 302 部队“军民联防”已经多年。但是，我们从没有越过职责进入库房，谎报情况的人是想以他们的“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取代我们，从而抢夺 302 库里的援越武器。他们请李世英转告周总理：“我们兴平‘农造司’过去没有抢 302 库，保证今后也不会抢 302 库，请总理放心。我们的武装基干民兵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与 302 部队指战员加强联防，誓死保证 302 库的安全！”

我们在 302 部队首长陪同下进地库看了存放的武器，深感震惊：这些武器如果流入社会，那将使多少无辜的人死于武斗！

李世英对他们表示慰问，郑重承诺：一定如实把他们的态度向周总理汇报。

说来也巧，当天下午兴平街上就发生了武斗。302 部队为防止仓库被骚扰，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李世英当即提出要一起到现场去，好向周总理作如实的汇报。302 部队首长认为危险大，不同意李世英的提议。李世英这个人是很执着的，有时甚至是固执，他坚持说：“周总理代表党委托我来这里，我应该向他反映第一手情况。如果被打死了，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而牺牲，死得其所。”最后达成折衷方案：我们的人不全去现场，由我陪李世

英去，人少目标小，形势不对也好立即撤退。

302 部队一名参谋带我俩坐吉普车到了武斗现场，没有见到死人，有伤者，对峙双方使用的土武器，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是用钢丝弹簧绑在长板凳两条腿上做成的特大弹弓，射鹅卵石，幸亏是军车，只给了我们一个警告。

我们在参谋的带领下到了对峙的一方兴平中学。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两位来自西工大的红卫兵，他们带头包围了我俩。喳闹中，我突然发现自已成了他们围攻的重点，推来推去，口水横飞，根本不听我讲什么，李世英那边松活多了。我突然明白：错位啦！他们把我当成李世英了。都知道李世英是革命“小将”嘛，当然年轻啰！而看外表我比李世英年轻。于是，我收起了轻言细语，大声喊道：“我们受周总理委托来兴平解决 302 库问题。同学们想干什么？”趁中学生们一愣神，我宣布：“请李世英传达周总理指示！两位西安来的红卫兵也请安静！“我料定”周总理”能镇住场子。果然，都静下来听李世英讲话了。李世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很快控制了场面。最后，他针对西工大红卫兵有所指地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煽动分裂，也不会鼓动大家搞武斗！”

302 部队参谋见时间差不多了，催着我们出门上车离开了兴平中学。他说，他见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心里很担心安全问题。我很感动地表示谢谢。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到秦岭公司向工人和支左的 21 军指战员传达周总理指示，希望群众组织和部队一起保证 302 库的安全，让周总理放心。遗憾的是，21 军支左的那位营教导员始终不和我们见面（名字记不清了）。

经过两天多的调查研究，我把基本情况作了汇总，拟了一个简单的汇报提纲交给李世英。李世英与总理联络员联系以后，向总理作了尽职汇报。9 月 6 日下午，李世英按周总理的要求，留下李印生等同志在兴平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我陪他回到了学校。

### 5. 周总理要接见交大、“工总司”代表，我陪李世英赴京

周总理要接见交大、“工总司”代表，解决“八五”问题。李世英决定9月10日动身。9月7日至9日三天，我和校革委会办公室一起准备赴京汇报材料，其中包括情报组提供的胡炜、孙长兴支持“武斗”，向一派暗送枪支弹药的统计表等。

由于学校周边被武装封锁，9月10日晚上，我和李世英没有走和平门到西安火车站，而是绕道坝桥从小站登上火车。9月11日到达北京，周总理派联络员吴斌把我们接到西苑饭店住下。除戴慕蓉早已在京外，随后几天，校革委会武登才，沈荣水等人也到了北京。9月14日，“工总司”副司令吴文杰到北京与马希圣会合。

没有想到，胡炜恶人先告状，向周总理反映说交大“工总司”煽动群众反对21军，破坏支左。康生则与胡炜应和，指责说：“你们交大也搞武斗！”更没有想到的是，打倒“四人邦”以后，康生倒了，胡炜也揪出来了，陕西省委竟然还照搬康生支持胡炜罗织的罪名加到李世英的身上，成为批判、逮捕他的又一大“罪状”。

9月18日，周总理在康生陪同下接见交大、“工总司”代表。接见以后，周总理留李世英等在京等待国庆观礼，让他们脱离一段时间西安的两派斗争，思考陕西和西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筹建省、市革命委员会。周总理点名武登才说：“武登才，你是组织能手，要把省革委筹备工作组织好。”

9月26日，我回西安为李世英取衣服、望远镜等，同时了解学校毕业分配情况。9月28日，我又返回北京，随身还带了西安武斗情况汇报材料，想在国庆节晚上直接交给周总理，但是未能如愿。放礼花的时候，周总理陪着毛主席到了金水桥上，毛主席坐到玉石桥面上与民同乐，周总理忙着指挥解放军“标杆”队维持秩序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我和他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

乱动近身。国庆节以后，10 月 4 日，我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分配，李世英他们还留在北京。

## 离校前，我建议交大成立“康生专案组”

1967 年 9 月 18 日，康生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身份陪同周总理接见交大、“工总司”代表的时候，与胡炜一唱一和凭空指责交大：“你们也搞武斗！”不仅如此，康生还诋毁交大，说什么“你们交大是一个修正主义大染缸，你们都是些修正主义苗苗……你们那个草坪用飞机从杭州运到西安，回去以后挖了种麦子！”“彭康三十年代就成了叛徒，你们什么时候批，怎么批都没有错……你们不斗彭康斗胡炜，反 21 军……”

康生对我们交大的无端指责，把交大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是为胡炜纵容、支持武斗，支一派压一派张目，与周总理的循循善诱，对交大的爱护关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指责交大草坪的时候，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暗中攻击周总理。因为他和我们都知道：1956 年交大从上海西迁西安支持西部建设，是周恩来总理主张并亲自安排的，移栽杭州草坪、建兴庆公园、修长乐剧场等工程，都是周总理批准的。

接见以后，大家在西苑饭店校对记录，领会周总理指示精神，研究执行周总理指示的步骤和措施；同时，对康生的讲话进行消化。议论中我们对康生的讲法不仅想不通，消化不了，还极其反感。但是，李世英他们几位校革委会领导还是决定如实向学校师生传达，让师生们判断。结果，1968 年 3 月，彭康校长被红卫兵游斗致死，其罪魁祸首就是康生！

在西苑饭店的议论中，我联想到上海复旦大学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一事，便提出：“康生正确吗？我看他是个极‘左’派。他在历史上各个

时期都极‘左’，最典型的是延安整风，他宁‘左’勿右，整了一大批老红军、老干部，以至于毛主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进行纠正。”“我建议交大成立康生专案组，查一查康生的历史，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10 月 4 日，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分配，离校前，我给还在北京的李世英写了一封信，再一次书面建议交大成立康生专案组，并表示：若不是我已分配工作即将离开学校，我将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1969 年春节以后，陕西省革委会在长安县汤浴温泉举办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开班以后通知我去参加。一到学习班，军宣队通知我先不要参加学习班的集体活动，集中时间交待清楚“整黑案”。我回答：“我没有整什么墨材料。”他们告诉我：“李世英揭发你了！把你写的信交出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给我开“小灶”，一个人关门写交待。我从 9 月 18 日周总理接见开始，详细叙述了整件事的全过程。一周之后，学习班也没有什么结论就通知我参加集体活动了。晨练、爬山、泡温泉……我逍遥了几个月。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以后，校革委会委员赵瑛组织了“康生专案组”。戴慕蓉说：“‘清队’的时候，赵瑛被整得很苦。”

## 清查“5·16”，我被接回交大“办学习班”320 天

### 1.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臭老九”当了工段长

1967 年 12 月 25 日，我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的电缆厂报到。从此，我结束了六年半大学生活，踏进了社会。那时候，西安电缆厂由“工联”派掌权，给我们几个交大毕业生安排的是苦力活。我们在那个在建的压延车间

里抬 400 多公斤重的回线槽，今天抬过来，明天又让抬过去，作着无用功，我们权当锻炼身体。

厂革委会诞生以后，人事科重新为我们作了安排。我到了话缆车间长途工段纸包机小组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完了红卫兵运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的第九位，成了“臭老九”了。

我们小组 30 多名工人，只有我一位男士，成了“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我穿着褙带裤，胸袋里插一把剪子，向那些年纪有的比我还小的师傅学习。班前跳“忠”字舞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连唱带打拍子，不是不“忠”是自律，避免自己的手或脚碰上女师傅们的身体。可是，师傅们不依不饶，硬要拖我下水。虽然出过笑话，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融洽起来，我很快成了她们中的一份子。由于我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每天都提前 30 分钟到机台上做开机准备：上铜线、领纸带、搞卫生。于是机台选我当机长，四个机台组成的小组又选我兼考勤员。

车间党支部才上任不久的书记发现了我的积极性和笔杆子“才能”，让我参加“整风”，帮助车间写总结报告，推选我参加工厂、公司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代会。整党进入“吐故纳新”的时候，我又被群众推荐成为“纳新”对象。

1971 年 3 月，我接替提拔走了的宋工长，担任了长途工段长。三年多的工人生活，我的角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由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变成了工人们最基层的领导者。要不是胡炜还记得我反对他，把我认定为“5·16”反革命分子的话，我的前程应该是不会错的。

**2. 我被“接”回交大参加“学习班”**

1971 年 9 月 15 日早上，雨后初晴。西安交大的一辆“奔驰”小车开进

了西安电缆厂，一位陌生人和我的老师吴力煌持陕西省委介绍信“接”我回交大参加“学习班”。能有机会再回母校学习，我心里激动又兴奋，车间党支部书记肖映春把我送上车，然后告诉我：“放心去学吧！小付，你‘纳新’的所有材料都准备齐了，等你学完回来，我们就召开支部大会。”

与吴力煌老师久别重逢，一路上我兴奋地向他汇报着自己三年多的进步。我想，哪个老师都会为自己的学生取得成绩感到高兴。可是，吴老师却没有吱声，我侧脸一瞧，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心里“格登”一下，便不再言语了。

小车很快从北校门进入交大，一条横幅映入眼帘：“付登华必须老实交待5·16反革命罪行！”我的心一下往下沉：原来“学习班”并不学习！

在东一楼绝缘试验室前，我下车后被拥入一楼左手第一间房，这是我上学时的实验室办公室。除了军宣队、工宣队，我见到了将陪我“学习”的十多位绝缘专业的老师。我不安地扫视了一下这50多平方的房间，窗户上装了全封闭的铁栅栏，进门是一张条形会议桌和十多把椅子，端墙上贴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付登华必须低头认罪！”标语下横放的单人床看来是给我准备的，因为还有三张单人床拱卫着。一位白胖胖的工宣队崔队长，容不得我适应一下环境，平静一下落差太大的心境，便叫着我的名字严肃地宣布：“按一九四三年中央审干文件对你实行隔离审查！”同时，还宣布了不准回家，不准外联，不准这，不准那……我明白了：我失去了自由，被关起来了！此“学习班”非彼“学习班”，这里与“九大”召开前参加的汤峪学习班是两回事。

### 3.“学习班”的“学习”生活和可敬的老师

我的生活起居很有常。晚上有人陪睡（一定不要想歪了），去学生食堂或教工食堂用餐，有人前后“保护”，陪吃。开始一个时期，上午开会帮助我、启发我，下午多半是我写交待材料；后来，我确实无材料可写了，便看

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都在我的要求下，一步一步地进入了我的斗室，每份报我都从报头到报屁股一字不拉地细细品评，不仅仅是关注新闻，更多的时间是找错别字、找病句，斟酌文章结构、语法、标点……努力使“学习班”体现那么一点学习的味道。对报纸的亲近程度，我这一辈子再无出其右。后来，上午的会也少了，不接待其他“学习班”来人作“内调”，或者不“请”到“四〇二”去接受批判、陪伴批判的话，我就是时间的富人了。我常常在窗口透过铁栅栏面对晴好的天空，欣赏上下翻飞的紫燕，猜想它们叽叽喳喳地说了些什么……

终于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你是第一个“接”回学校办“学习班”的，因为你做秘书工作，上面说你是“材料口袋”，要从你这里打开缺口。现在驻京联络处主任贺相和校革委会主要头头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陈柏荣都陆续回校办“学习班”了，他们的“学习班”结束不了，你的“学习班”也结束不了。我听了，在心里暗暗祈愿：李世英、武登才，你们几位的“学习班”快点“毕业”吧！这失去自由的日子毕竟没有我在工厂里过得那么惬意啊！

几个月以后，一个周六的晚上，工宣队员们虽然极“左”，却仍然识得人间烟火，回家与家人承欢去了。他们明白：付登华犯不着越“狱”逃跑。于是指派了屠德民老师来值班。屠老师在专业知识方面是响当当的人才，在革命知识方却缺乏对极“左”的悟性。他“忘记”了我的身份，对我说：“付登华，你晓得不？学校里的学生都分配走了，剩下我们教职员工和才进来的工农兵学员，接你们回来受审查大家根本想不通，军宣队让我们转弯学习了两个多月。”难怪：“学习班”里只要没有军、工宣队队员在，老师们就对我特别呵护，不止一位老师在与我独处时都叮咛我：“要坚强地活下去，相信自己不是反革命！”

1979年平反时我才知道，西安市当时被审查的人已出现了跳楼、割腕者。老师们应该是听说以后，担心我想不开也走哪条路。

我已长时间没看到电视了。那晚天黑之后，屠老师把我悄悄带到一村他的家看了一晚电视。我无法用语音表达对屠老师的感谢！

我妻小李给我送钱、粮来到“学习班”，她无意中讲了一句“林彪完蛋了！”就被叫出去挨了一顿批评，说她不应该与反革命通消息。因为那时我的“学习班”才十多天，是完全封闭着的。从此，小李不仅不再给我送钱粮，还提出了离婚，她吓住了。吴南屏老师送她出门时，诚恳地开导她：“付登华现在并没有定性反革命，你要想开些，坚强些！”

屠德民、吴南屏等我的专业老师，多年来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到德阳创业，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只要有机会回到母校，我都会专程看望他们，尤其是现在已行动不便的吴南屏先生。

### 4. 我的“5·16罪行”

我一进“学习班”就被宣布为“未填表的5·16分子。”“未填表”好理解，就是没有登记办理加入“5·16”的手续，但所犯“罪行”是“5·16罪行”。到底什么是“5·16罪行”呢？起初我不清楚，经过“学习班”的启发我才知道，原来“5·16罪行“一是”清君侧”，二是“反军乱军”。“清君侧”的“君”指的是毛主席，“清君侧”就是要打倒毛主席身边的人。对我来讲，就是我说康生是极“左”派，建议交大成立“康生专案组”，调查整理康生的“黑材料”；另外还“攻击”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说她宣杨“文攻武卫”搞乱了全国。至于“反军乱军”，就是说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搞乱了军队。对我而言，就是策划了“八五”静坐，如康生指责的“不斗彭康斗胡炜”，胡炜是一军之长，反他就是反军。

“学习班”除了要我交待搞“清君侧”和“反军乱军”“5·16罪行”，

还要我交待“八五”静坐声明的“五条要求”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老干部作“黑高参”？为什么要反胡炜？……

1971年才时隔不到四年，我那时记忆力还好，加之工作笔记和一些材料还没有抄走。于是，我充分利用“学习班”的时间，详详细细地，甚至反反复复地交待所有问题的过程，并且不断地“斗私批修”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和缺点。但是，我一直认识不到自己是“反革命”，始终没有把“反革命”帽子朝自己头上戴。

**5. 我的“猖狂反扑”**

9月15日，我被接回交大的时候，林彪一家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两天了。我妻小李来“学习班”敢于说出“林彪完蛋了！”那肯定是工厂已传达了中央文件。我在交大“封闭”着什么也不知道，交大决不可能传达中央文件比工厂还迟！于是，我要求传达中央文件。我说：“我还没有定性成反革命，我还是人民一分子，我有权要求向我传达中央文件！”没有人正面回答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公民权，我提出：“不传达文件我绝食抗议！”后来，他们请示到哪一级领导，我不清楚，反正是召集“学习班”所有人员陪我再一次传达了中央文件。

听完中央文件传达，我问：“我能向党中央专案组递揭发材料吗？”听文件传达时，我联系胡炜的一系列作派，意识到他和林彪反党集团一定有牵连，至于关系深到什么程度？我不敢下结论。“学习班”向校党委请示以后，给予我肯定的回答：“楼书记说可以写揭发材料，封好以后学校负责转中央专案组。”

于是，我写了《揭发胡炜的问题》，在密封好的信封上亲自写了“转交中央专案组”，然后交给了校党委。我当时想过，校党委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楼少文书记是南京部队来的，与胡炜不是一起的。我忽略了陕西省这次

清查“5·16”就是胡炜在主抓，他亲自指示交大“三办”对我们七人要严加看管。我那个信封起什么作用啊？！

不到一周时间，通知我上批判会，内容是批我反清查，搞反扑。我去食堂吃饭，发现学校的大批判专栏换上了新内容：“打退‘5·16’分子付登华的猖狂反扑！”

我挨了大小多少次批判，没有记录，有一次是和戴慕蓉一块批的，有一个伴，神经没有那么紧张。我曾想过从“四〇二”窗口跳下去，一了百了。想起老师们先前的忠告，便狠斗“死”心一闪念，以冷静莫冲动渡过了所有的批判。

**6. 隔离审查了 320 天，最后楼书记说：“是安全措施”**

1972 年 8 月 2 日，我被“隔离审查”320 天之后，不明不白地要送我回厂了。楼少文书记找我谈话，我提出：隔离审查为什么不作结论？没有组织结论我怎么向西电公司和厂里交代这 300 多天？没有组织结论我的组织问题又怎么办？

楼少文回答：“省委通知我们，这不是隔离审查，只是安全措施。”随后便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正确对待”。

此后，我一直不能“正确对待”这次没有组织结论的“隔离审查”，从最基层的西安电缆厂党委、西电公司党委到省委李端山，王任重直至党中央华国锋主席，我不断地进行书面申诉。因为没有被审查的组织结论，我入党成了泡影。我不仅在电缆厂和西电公司由前程光明变得处处不顺，粉碎“四人帮”后，还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电缆厂党委把我与原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一起弄到西安南郊果园办“清查学习班”。其后，因我不断地申诉，又把我划入“不安定分子”控制使用。我提出入党问题，说我是要党票。我不得不承认，胡炜整人有术！

不过，我不会屈服。1978年9月6日，我再次写材料《胡炜问题》寄给陕西省委王任重书记和中共中央华国峰主席。不管我的材料是不是有作用，我只是努力寻求自己解放自己。

胡炜被清查出来以后，我明白，我的审查结论也快出来了。

**7. 中共陕西省委175号平反文件**

1979年2月4日，西安电缆厂政治部主任来应善与组织科王科长，向我宣布对陕西省“01”号案平反。正式通知我，1971年至1972年以清查“5·16”为名对我的迫害平反了！这时候我才听说陕西有个“01”号案，抓“5·16”只是这一案件的一部分，胡炜整人有绝活。

来主任告诉我：“厂党委去人民大厦参加文件传达时，不清楚这个文件与我们厂有什么关系，散会时询问李端山主任，李主任说：‘没有关系的话，不会通知你们来参加会’。让我们查看大会上没有宣读的平反人员名单。当我们看到付登华的名字排在靠前时，我们明白了你这七八年里坚持申诉的原因。”

1979年2月22日和23日，来应善主任陪我到西安市委参加平反座谈会。我发言时指出：这是一起胡炜蓄意泡制的报复性政治迫害案。同时提出：陕西省和西安市目前揭批“四人帮”中，还存在颠倒黑白，是非混淆的情况，特别是李世英“打、砸、抢”首恶分子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恢复其本来面目，予以正确对待。市长张彦博讲话时对我大加恭维，说：“小伙子，你有胆识！那个时候你就反‘四人帮’，讲了我们当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我回答：“张市长，你谬赞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四人帮’，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想什么就讲什么。我像你们那么老成的话，也会保护自己的”。

平反座谈会第二天总结时，张彦博讲：“哪里有一个‘5·16’嘛？有一

个，可以说是扩大化，没有嘛！抓‘5·16’是假案。当时制造这些‘三案’的根据是对胡炜的态度。胡炜自已在指挥……”他要求各单位不要只宣布一下是假案，平反了就完了，要在政治上关心受迫害的同志，做细致的政策落实工作。同时，希望受迫害的同志顾大局，向前看，在新长征中显身手。

9 月 27 日，中共陕西省委下发了〔1979〕175 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平反“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交大的往事，至此应该说是尘埃落定了。

## 我的感悟

### 1. 抱真守朴的交大人

1967 年全国的大专院校都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唯西安交大例外；“文攻武卫”鼓动下，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文化大革命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内战”严重局面，西安交大顶住逆流，内部没有发生武斗，也没有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武斗，万余师生无一人因参加武斗而死伤。四十多年过去了，每谈及此，交大人的理性与团结，我和不少校友都感慨良多！

1971 年，陕西省革委会在胡炜主持下，泡制“01”号案，以莫须有的“清君侧”、“反军乱军”等罪名，借清查“5·16”，以办“学习班”掩人耳目，把反对他的交大革委会常委及少数骨干弄回交大，进行隔离审查和批判。胡炜的打击报复计划遭到交大教职工的抵制，以至于胡炜指示交大党委组织他们转弯学习达两个月之久。即便如此，他们在“学习班”上仍尽力保护我们。交大人敢于拥抱真理，我切身感受，永远难忘！

1978 年底，陕西省革委会以“打、砸、抢”首恶分子罪名逮捕了李世英，当把他送回交大接受批斗的时候，交大教职工不仅抵制批斗，还反过来

为李世英请命喊冤，以至于学校党委不敢盲从省委，派人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这不是派性发作，也不是否认文革中李世英身上有缺点甚至错误，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交大人抱真守朴，我为母校倍感骄傲。

2.“文革”经历是财富

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上演泽了一场大悲剧，这是不容置凝的。然而，这场“大革命”发动群众之深入，参与民众之广泛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灾难之后如何认识评价“文革”经历，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展现。我们不能老是消极地咒骂灾难，应该从灾难中寻求积极的价值。试问，我们还会盲目地个人崇拜吗？还会无休止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吗？还会容忍“老子英雄，儿好汉”像幽灵一样侵蚀我们的干部制度吗？我们不渴望真正的民主吗？……犹如汶川大地震灾难，我们能因为破坏、死人而消沉悲观吗？当然不能！我身处重灾区，在地震经历中体验了人间真情与大爱，从而由悲壮走向豪迈。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在这几十年里，无论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描写或图解千千万万“文革”参与者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群众组织时，一律是那样的灰色、消极与悲观，缺乏客观的研判，这是不公正的。

“文革”的经历应该是财富。对所有经历了“文革”的人们，这是一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常常回忆起当年的忠诚、热情、思辨与抗争。当改革之风吹散“文革”阴霾以后，1985 年，我拉家带口，没有任何户粮和调动手续，从西安到四川德阳创业，就是“文革”经历给了我胆识：思变，思辨！在近三十年里，无论是项目选择、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或管理创新，我坚持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八字方针，是我的“文革”经历与创业实践的总结。

当初那个热爱党，听毛主席话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演变为今天的民营企业管理者，“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回报，为员工创造前途，为社会创造财富。”我难忘“文革”经历，难忘母校——西安交大！

2011 年 7 月 11 日于德阳

**作者简介**



付登华，男，重庆人，生于 1943 年农历 5 月 20 日，中共党员，1966 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

1985 年应聘四川省德阳市创办实业，先后任东方电缆厂副厂长、德阳电缆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德阳森普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安费尔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安交大四川校友会副会长。现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四川安费尔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西安交通大学四川校友会荣誉副会长。

年逾古稀以文养老。2011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杂烩集》、《风雨春秋》和《情感春秋》。曾任德阳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德阳市纪实文学家协会常务理事、四川散文学会德阳市旌阳分会副会长；现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德阳市纪实文学家协会名誉主席。

# 歷史的記憶（文革時期）

■/ 李鏡吾

【编者按】：此文节选自《镜吾文集》。编者对少量文字作了修订。

就在1966年大一年级快结束的6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完全打乱了以后四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就是我们不幸遇到了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 一、天堂仿佛变成了地狱

【题记】这是一段沉重的不堪回首的岁月，但愿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铭记我们的教训——千万不要盲从。

自1966年6月到1970年7月，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被扭曲的大学时代。

1966年的5月1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5月25日，北大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5月28日，中央通过电台、报纸宣布，成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些人都是那几年活跃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上挥舞大棒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那些所谓理论家。

6月1日中午，宿舍楼里的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学校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好像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全国到处都有坏人。


李镜吾大学时代

就在5月下旬，学校领导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让辅导员们安排学生在各宿舍楼下大门口值班，禁止校外人员入内。6月1日晚上，这时宿舍楼里的广播突然响了，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同学们都离开宿舍，涌到楼道内听广播。听完广播，回到宿舍，大家心情都很激动，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议论的主题是，交大校党委有问题。结论是，我们要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第二天一早，有几位起得早的同学就气喘嘘嘘地跑回宿舍大声说：“大家快起来，快起来！中心楼前已经贴出了好多大字报，要求停课闹革命。”

我们急急忙忙起床，到中心楼看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大致和聂元梓大字报类似，矛头直指校党委，说校党委有问题，里面有黑帮，校党委包庇黑帮；校党委压制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停课闹革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等。

吃罢早饭，我们班的男生女生齐聚我们宿舍，群情激奋，决定我们班不

能落后，也要写大字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全班都知道我文笔好，毛笔字写得好，于是大家推举我，让我草拟大字报内容，让几位男生到行政楼前去领取白纸、毛笔和墨汁。不一会，纸笔墨都取来了。但是我在开始写时，我犹豫了。我依稀记起来 1957 年（我当时在上初二）反右时，也是大鸣、大放、大字报，结果，写大字报的人有不少打成了右派分子。想到此，我有些害怕了。同学们都说，你别怕，出事了，我们全班担责任。我鼓起勇气，一口气写了十多张，内容我斟酌好了，大多写的是，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要停课闹革命。攻击校党委的话，我一张也没有写。尽量写大字，一句话，一张大字报，落款都是“铸造五二班”。由于我的字写得漂亮，我们班的大字报贴出去也很醒目，我班同学都很满意。

仅仅一上午，全校就贴满了一万多张大字报。多数大字报都是空对空的放空炮。但是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学生完完全全被煽动起来了。一时间，学校秩序大乱，学校彻底停课了，可叹啦！这一停就是 4 年。

1966 年的 6 月 3 日凌晨，陕西省委派出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交大，领导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后，没有多大的作为，只是把交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抛出来批斗了一下，其他校党委成员都没有动。这样做，就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不满，说工作组是丢车保帅，小骂大帮忙。

6 月 5 日，交大工程物理系 810（41）班党员学生李世英率先贴出了“坚决赶走工作组”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像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交大学生们不满情绪的火药桶。工程物理系是学什么的？是学制造核武器和火箭导弹的。工物系的学生平时都很牛，这是因为，其一是他们是学尖端武器的，其二是他们的出身都很好，都是红五类，其三是他们中党员，团员多。所以他们的政治顾虑少，敢说敢干。

第二天，也就是6月6日，工物系810（41）班贴出了“省委工作组的十大罪状”的大字报，像一颗重磅炸弹把学校炸开了花。大字报的内容大致是说，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一口咬定省委里有黑帮分子，省委工作组就是他们派到交大捂盖子，保护校党委中的黑帮的冒牌工作组。说得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的，极具煽动性。一时间，校园里又一次大乱，又有一大批大字报贴在了中心楼前，与6月2日不同的是，大字报的矛头指向的是工作组和陕西省委。有一批学生围着工作组成员辩论；有一批学生上街，到邮电大楼给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写信，要求派人来交大处理问题，其中有一份电报竟然有1683人签名；另有一批学生由交大学生会主席杨克剑，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等带领到西北局（中央派出管理西北五省的机构），求见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请他解决交大工作组的问题。有些学生到其他院校串联，有些学生在街上拿着自制的喇叭筒，在街上宣传交大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些学生下厂，下农村串联的……真是闹得“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我们班是低年级，开始是看热闹，后来也坐不住了。于是班长召集我们到交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开了一个会。问大家，我们班该怎么办？大家讨论了一阵子，最后一致意见是，用班费给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写信，要求派人来。班长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我。让我起草电文和书信。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受了。我是第一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电报和信，心情非常激动，手有些发抖，手心沁出了很多汗水。我定了定神，心里想着，我还是那个原则，措辞要温和些，要留有余地。我首先写好了电文：“党中央，毛主席：陕西省委派到交大的工作组工作不力，交大局面十分混乱，请您速派人来。交大铸造五二班全体同学。”

接着我又写好了信，信也写得很简短，内容和电报差不多，只不过是前

面带个帽子——“我们怀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这封信的后面穿了一个靴子——“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落款还是交大铸造五二班全体同学。写完后，我想此事非同小可，我坚持要大家在书信的后面签名。大家都签了名，我这才把信叠好，装入信封内，交给班长带着几个同学去了邮电大楼发电报、寄信。

这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西安交大“六六事件”中我班发生的一件事。后来才知道，我们当时是多么的幼稚，那天发往北京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和书信，全部被西安市邮电局截留，一封也没有发寄出去。以后又全部转交给了交大工作组。

6 月 7 日，交大校园动荡继续，学生们焦急地等待北京派人来。

6 月 9 日，陕西省委通过西北局从西北五省抽调了百多名县处级干部进驻交大，交大工作组改名为省委工作团，严克伦任团长。交大每一个系，每一个教研室，每一个班级都进驻了工作团成员。进驻我们班的是来自新疆某县的县委书记，姓李，40 多岁，东北人，是一位很老练的干部。当天工作团就宣布，接管交大全部权力，交大的党团组织停止活动。接着又宣布，6 月 6 日所发生的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并立即清查在”六六事件”中参与组织，策划，带头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隐藏在师生员工中的反革命分子。而那些从西安市邮电局交来的发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和书信，就成了清查反革命的线索和铁证，自不待言，还有那些贴出的大字报更是铁证了。工作团按图索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六六”事件的参与班级和个人。

工作团的老李——我们习惯喊他为李组长，来到我们班，在我们宿舍召开了全班会议，第一是宣布工作团上述的决定，然后把我们班发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单和信件轻轻地放在桌子上，把信封打开，取出信，然后

把信展开，停了一会儿说："这信上的字写得不错呀！"又停了一会儿，敲着桌子，黑着脸问："这些是谁领头干的，这电文和信是谁写的？"



李镜吾在交大校门留影

班长吓得脸都白了，沉重地低下了头。既然班长不敢承担，那只有我承担了。于是，我站起来说："没有人领头，是全班自发的，起草电文和信件是我自告奋勇干的，没有受任何人指使。"

"很好，坦白从宽嘛！你为什么自告奋勇？"

"因为我的文笔快，字又写得好，如果毛主席真的看见了，会高兴一些。"我胡编了一个理由。

"那么，你留下，其他人解散。"李组长脸色好了一些。

"你是什么家庭成分？"李组长问。

"小土地出租者，但是我们家是革命家庭，有两个解放军军人呢。"

"你说说为何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写信。为何要参加反革命行动？"

"我们主要出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热爱，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蒙蔽。不过，我们并不赞同李世英的说法，说省委有黑帮，说工作组里有黑帮。你请看电报和信的内容，我们只是觉得工作组工作不力，学校局面混乱，心里着急，想让党中央再多派些人来，您看，您不就是党中央派来的吗？"我毕竟在矿山小学担任代课老师时，受到过批判，有了一些挨整的经验，于是不慌不忙地回答。

"嗯！你说的这个，这个嘛，从电文和信的内容看的确是没有恶毒攻击省委和工作组的言辞，我们也的确是党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增派来的。

但是你们说工作组工作不力，这也是不实之辞。工作组按兵不动，是策略，就是想让李世英，杨克剑，王永婷这些反革命分子一齐跳出来，然后一网打尽！”李组长狠狠地说。

“都怪我们太幼稚，政治水平太低了。谢谢您的教导！”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幸亏 6 月 6 日那天，我把电文和信的语气写得很温和，没有恶毒攻击省委和工作组的言辞，不然，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你要带头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真检讨，写出书面检查，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管怎么说，你们班，尤其是你的错误是严重的，毕竟你们参加了‘六六’反革命活动，站在后面，为反革命摇旗呐喊嘛！省委工作团要求你们这些学生，要‘查上当，放包袱’，深入清查隐藏在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李组长又铁青着脸说。

“说得好！‘查上当，放包袱’。我一定认真作检查。”我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说。

我一夜无眠，心里想，大不了，我再回大冶农村当农民算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不甘心，就这样回去，怎么面对我的母亲。我还是要争取宽大处理，认真写检查。于是，我一个人来到小教室，熬了一个通宵，工工整整写了一份检查，重点写了我的私心杂念，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想出风头，所以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检查交给了李组长。也许我们都姓李吧！李组长没有为难我，让我在全班会议上念了检查，看看大家没有异议，我的检查也就通过了。

再说说交大校园。自从 6 月 8 日，工作团宣布“六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以后，李世英，杨克剑，王永婷，刘维娜等一大批同学被工作团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6 月 9 日，李世英留下了遗书，遗书写得很感人，我记得最后两句是：“恋恋不舍啊，我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啊，我美丽的交大校园！”

然后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幸亏发现及时，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7 月 9 日，王永婷跳楼自杀，王永婷是应届毕业生（按常规，应该毕业，分配工作了），品学兼优，正是 23 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从 6 月上旬到 7 月底，交大被批斗的学生达近千人之多，当时交大的在校生只有七千余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些学生都是被毛主席称之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的莘莘学子。

另一场灾难又悄悄向交大逼近。

8 月 5 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了进驻北京，西安等地各高校的工作组。当天，交大的省委工作团奉命撤销，灰溜溜地离开了交大。

8 月 8 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被打成反革命的交大千余名学生被全部平反。

然而，交大却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8 月中旬，交大校园成立了各种名称的兵团组织和战斗队组织。随即出现了抓校党委成员游街，给他们戴高帽子，挂黑帮牌子示众；抓了交大多位老教授，挂臭权威的牌子游街，然后拉到图书馆前罚跪示众等错误行动。这其中就有江泽民的老师、我国第一台电机的制造者、电机系系主任钟兆麟教授；有我国著名科学家，在材料力学领域第一个提出多冲理论并发明多冲机的机械系系主任周惠久教授。他们跪在地上，哆哆嗦嗦地看着曾经是那么崇拜他们的学生们。

更有甚者，一伙学生冲进校党委宣传部长吴镇东家里，先是抄家，然后把她拉出来，挂着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把她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脸上涂抹墨水，头戴一顶破草帽，脖子上挂着一串乒乓球，游街示众，最后在二食堂前，交大女子篮球队的两个身材高大的队员把她架上一张饭桌搞活人展

览。可怜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的她，此刻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吴镇东不堪凌辱，当晚跳楼自杀，后被救活，但从此疯了。那些学生给吴镇东定罪名的依据是，她曾经带领中国学联代表团访问苏联，受到苏联共青团书记谢列平的接见，因此诬陷她是修正主义分子。

接下来是红卫兵“破四旧”，随意冲进一些老师家中，烧毁他们心爱的书籍，烧毁他们用心血写成的科研论文；随意批斗费尽周折从海外归来的老师，诬陷他们是美蒋特务。

学生们相互间也发生争斗，主要是各班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的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小队，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学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家庭历史复杂，受到班级红卫兵小队长的恶意攻击，精神压力特别大。别的事情不敢干，只好每天练习书法，临摹《毛主席诗词手稿》。毛主席的书法是师承唐代怀素的狂草，我学得很快，临摹得很像，同舍的同学朱志良，跟我学起了书法。朱志良，上海郊区人，出身贫农，自幼就在农村干农活，吃了很多苦，和我的经历类似。身高比我高一些，皮肤很白，两只胳膊很长很长，篮球也打得好，上得球场，脱光上衣，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浪里白条张顺。性格豪爽，为人正直。

我每天晚上拉二胡，心情苦闷，就拉《光明行》《病中吟》《江河水》等曲子，凄凉，呜咽的二胡声在宿舍楼里回荡，打动了不少同学，同班的石季芜、汪泽怀、杨舟、苏福堂等同学都找我学二胡，给了我很大的宽慰。

我那段时间的心情十分低沉、懊恼、郁闷。曾经是多么美丽的校园，现在却满目疮痍，上演着过激、粗暴的行为；那么多曾经令人尊敬的教授和老师转眼间沦为了阶下囚，住进了“牛棚”；那么多人类文明结晶的图书被付之一炬；那么多亲爱的老师和同学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而变成了阶级敌

人，受到不公正的专政……交大校门前的日本松树因为是彭校长喜爱的，而被连根拔除；图书馆大门紧闭，大门两侧的英姿飒爽的两尊汉白玉塑像被红卫兵们泼上了黑墨水；图书馆前的鱼池里的水被抽干了，鱼被扔掉；校园里种植的牡丹，芍药被拔光；学校实习工厂停工，清洁工人罢工，宿舍楼道里脏兮兮的，卫生间里臭烘烘的；食堂的师傅整日无精打采的，彭校长被打倒，特供猪肉也没有了，食堂的伙食每况愈下。



李镜吾学生时代参加劳动

我整天除了练书法，拉二胡，别的事情不敢干，想读古诗词，怕人说是四旧，想看小说，一是借不到，二是不敢看，怕人说是留恋封资修。整天看到的是人斗人，人整人，有人疯狂，有人自杀，有人喊着口号，有人低头认罪，有人昧着良心揭发自己的朋友、同事或同学；有人却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教学楼大门紧闭，老师不敢讲课，学生不敢听课；整天学《语录》，学红宝书，学完了，很多人心里盘算着怎么整人；又有很多人心里想着如何自保，不被整；好好的学校，被搞得阴云密布，乌烟瘴气，鬼哭狼嚎，杀气冲天……

西安交大，我进校时感觉是天堂的地方，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地狱？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伤心极了。

嗣后，交大 15000 余名师生员工都期盼着能早日结束这混乱的局面。这时，有一个后来被毛主席称之为“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毛主席 1967 年 4 月 23 日批示）的人物站出来了——他就是被工作团打成反革命而自杀未死的工物系中共党员三好学生李世英。

李世英，男，原籍河南，皮肤黝黑，国字脸，两只眯眯的眼睛好像没有睡醒似的，由于是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而被救活的，所以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而虚肿。个子也不高，身体也不太健壮，成天背着一个黄色的旧书包，两条裤腿，总是一高一低的，一边挽起，一边放下，很不起眼，甚至有些土气。看起来，他完全没有造反派“扎皮带、穿军装、带红袖章”的形象。就是他，思维敏捷，善于雄辩。

李世英在 8 月 13 日交大召开的万人辩论大会上跳上主席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第一，他反对校园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反对那些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游街、罚跪、活人展览；第二，他反对校园里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特别是出身好的学生批斗出身不好的学生，反对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谬论……李世英的讲演受到了全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交大万名师生的观点和思想终于统一了起来。8 月 20 日，交大选举产生了“交大文革总会”，李世英任主任。交大的红卫兵总部接受文革总会的领导，严禁红卫兵“打砸抢”。各个班级成立了文革小组，各个班级的红卫兵小队接受班级文革小组的领导，实际上各班的红卫兵就名存实亡了。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文革浩劫中，全国高校大多存在两派，在校内互相斗争，甚至演变成武斗，很多学校，校园变成战场，打得学校一片狼藉，就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未能幸免。唯独西安交大只有一派，校内没有派性斗争，更没有武斗，也不参加校外的武斗，在尔后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中，唯独交大没有死一个人。

## 二、过激行动

1966 年，西安的 8 月中旬至 9 月下旬是既炎热又不平静的，交大造反的风火终于烧遍了古城。我来到西安上大学刚好是一周年了。一年前平静而美丽的古城，现在却古韵不再，破四旧让每一家店面都用红漆刷成了红色；以交大为首的西安大专院校的学生们都被中央文革煽动起来，差不多每两天都会倾校出动，摇旗呐喊，上街游行。把一个和平宁静的城市闹得好像抗战救亡时期一样，似乎敌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民众再不觉醒就要当亡国奴了。闹得省委，市委支持也不是，镇压也不是，不知所措。闹得人心惶惶，不少工厂企业停工，停产。

8 月 14 日，交大部分学生在西安古城墙上贴出了“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引起了轰动。于是，游行队伍里的部分学生又折返到陕西省委门前，受到群众的围斗，殴打。

8 月 16 日，交大与西工大联合，在省委门前举行万人静坐，静坐活动一直持续了两天，到 18 日上午方结束。

后来的游行活动就不可胜数，交大学生动不动就上街游行，比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啦，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发表了一篇文章啦，等等，等等，都可以成为上街游行示威的理由。只要听到校广播台播出：“同学们，现在马上到学校大门口集合，上街游行！”大家也不问理由，正在打扑克的，立即放下手中的扑克；正在打篮球的，立即放下篮球，一起往大街上跑。游行路线是：进和平门，经大差市左转，到钟楼，再向南，走南大街，出南门，再左转，顺着西安古城墙，一直向东走，就回到了交大。回学校后，该打扑克的接着打扑克，该打篮球的，接着打篮球。而西安市民们也慢慢地见怪不怪了，只要一见游行队伍中有一半是打赤脚的，就

知道是交大的学生，还有市民指着我们说，那些打赤脚的都是右派分子。我们班的宗旨是“随大流”，自不待言，这些游行活动我们大都参加了。只不过是走在游行队伍的靠后面罢了。

更离奇的事件发生了。

9 月 6 日，交大广播台播出了一条校文革总会的紧急通知：“今天，西安工业学院的造反派被该校黑帮控制的保皇派包围了，声称不投降就不给饭吃，要把他们活活饿死。现在交大文革总会决定，全校革命学生立即到省委门前静坐绝食，声援西安工业学院造反派战友！要革命的同学们，现在是党中央毛主席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呼啦啦！全校数千名学生排着队，高唱着国际歌，来到了省委门前大街——好像叫建国路，先是高呼口号，喊累了，就席地而坐，唱革命歌曲，唱累了，打扑克的打扑克，聊天的聊天，等着陕西省委和西北局的领导出来解决问题。没承想，午饭时间过去了，晚饭时间过去了……省委大门紧闭，没有一个领导出来接见我们，只饿得我们两眼发花，虚汗淋漓，前胸贴着了后脊背。交大文革总会决心要把绝食斗争进行到底，让学校食堂送来了几大桶盐开水，让交大医院的救护车也开来了，还装备了一辆带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校广播台的女播音员坐在车里不停地广播，给大家打气，把气氛搞得就像我们蹲在国民党监狱里搞绝食斗争一样。本想打退堂鼓，回校吃饭的同学也不敢走了，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煽动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大街上搞绝食斗争。

入夜了，省委指示一些饭馆，食堂给我们送来了一车一车的大肉包子，满大街弥漫着肉包子的诱人香味，真恨不得冲上前去抓几个吃。然而交大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着：“革命的同学们，大肉包子是省委黑帮送来的糖衣炮弹，他们是要破坏我们的绝食斗争，我们决不能上当！谁也不能

吃，谁吃谁就是叛徒！”这么一广播，的确谁也不敢去碰那香喷喷的大肉包子了。

9 月的西安，晚上已经有些寒意，饥寒交迫的交大学生就这么露宿在大街上。特别是那些自费上学的同学心里感到很憋屈，家乡的父母辛辛苦苦地寄钱供自己来交大上学，学上不成不说，还花家里的钱，到西安大街上绝食，睡马路。女同学相互依偎着取暖，男同学不少都垂头丧气……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大家突然不觉得饥饿难耐了，过了饥饿期了。苏福堂悄悄地拉着我的手说：“跟我上厕所去！”于是我们俩回到了学校，洗了一个凉水澡。在回到绝食队伍的路上，苏福堂买了两只牛奶冰棒，递给了我一只，我们一边吃，一边说：“这冰棒怎么就这么好吃呢？”

“这不算偷吃东西吧？”苏福堂惴惴地问。

“这怎么能算偷吃东西？这和喝盐开水一样呢。”我安慰着他。其实我们真是太幼稚，太傻了。那天我们如果偷偷地钻进一个小餐馆吃几个包子，吃几根油条，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第二天的下午，就不断地有同学饿晕倒了，救护车来回奔跑，把晕倒的同学送回交大医院输葡萄糖。有趣的是最先晕倒的都是校篮球队，足球队的身强力壮的同学，而那些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女生倒是耐饿，直到绝食最后，没有一个晕倒的。这个现象，值得医学上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第三天，也就是 9 月 8 日，骄阳似火，我们都饿得没力气说话了，就靠在街道两旁的墙上打盹。就那些播音员们不知哪来的力气，坐在宣传车里不停地广播着：“我们又有一个阶级兄弟倒下了，这笔帐要记在黑帮们的头上！”晕倒的人越来越多，校救护车跑不过来了，省委也怕饿死了大学生下不了台，急调西安市几家医院的救护车来帮助救治饿晕的学生。

绝食持续到 8 日夜，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方到现场答复了学生们提

出的条件，大约五万人的绝食宣告结束。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学校，径直涌进了食堂。食堂的师傅们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凯旋归来”的学生，煮好了香喷喷的小米稀饭，蒸的像发糕那样软和的馍馍，还有清淡的小菜。师傅们大声给我们解释：“饿极了的人，一开始吃饭，千万不能吃得太饱，不然要撑死人的，等明天再慢慢增加饭量。”

这场静坐绝食的活动就这么结束了，我们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过了十多天才缓过气来。

然而仍有三十多位同学坚持绝食到 9 日，被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周总理仔细地询问了静坐绝食的原因，然后作出了几点指示，大致内容是：“第一，你们的革命热情值得肯定，出发点是好的；第二，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新中国，搞这种大规模的静坐绝食，这种方式不好，你们对省委有意见，有要求，可以到北京找我反映嘛！第三，我一会儿给西北局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他出来见你们绝食的同学。以前战争年代敌人都不怕，现在革命学生又不是敌人，有什么可怕的；第四，你们要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饱了饭才能搞文化大革命嘛！”

然后，周总理请代表团的同学吃饭，吃的菜是白菜炒豆腐，主食是一般的米饭。周总理吃完以后，用开水把菜碗涮了涮，然后当作汤喝下。感动得同学们热泪盈眶。不久，在北京的同学打电话回交大，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从此，这种群体的绝食活动再也没有发生了。

## 三、我们有幸见到了一代伟人们

1966年的秋天，秋高气爽，蓝天丽日，红旗飘扬，红色彩球飘荡，把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装点成红色的海洋。毛主席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推向全国。自8月18日至10月1日，他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已经连续四次接见了数百万“革命小将和红卫兵”——其实他们都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及中学的在校学生，所谓红卫兵就是这些学生中家庭出身是红五类的，他们是“革命小将”中的中坚分子。1966年，自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10月，我们交大学生乘坐专列怀着无比激动，无比光荣，无比欢乐的心情直奔首都北京。车厢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伴着列车的轰鸣声在八百里秦川和随后进入的辽阔的中原大地上飘荡，一直持续到入夜。

我和同学们一样，心情一直很兴奋，先前是和同学们一起唱着革命歌曲，随着夜幕的降临，我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我一边凝视着车窗外的夜色，一边思考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好像不仅仅是在文化领域的一次运动，而是比1958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规模还要大得多的党内斗争运动。联系到8月5日毛主席发表的“炮打司令部”的打字报；以及半月前，也就是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锋芒指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10月6日北京十万红卫兵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向资产阶级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中央高级领导人；还有，我们从“炮轰校党委”，到“炮轰陕西省委”，到“火烧西北局”，都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似乎各级党委就没有一个好人。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次文革运动不止是整倒几个人，而是整倒一大批人；这种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由着中央

文革几个文人性子搞，这种混乱何日是个头？

我心里想的这些事那是谁也不能说的，一说就是反革命无疑。正好这时列车通过郑州黄河大桥，乌黑的夜空笼罩着乌黑浑浊的黄河波涛，我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短诗：

高浪啸乌云，怒风卷天庭。

大河十月夜，多少鬼神惊！

这首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以及我当时沉重的心情，我自认为是《李镜吾诗集》中写得比较好的诗。

那时的火车经常晚点，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次日下午的 4 时左右。我们学校被北京外地学生接待站集中安排在清华大学教室里打地铺。吃饭就在清华学生食堂里就餐。当时中央发出文件规定，凡是进京的学生以及到外地串联的学生吃饭一律免费，我们在京的食宿、交通和游览名胜古迹全部免费。当时的学生们的确感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关怀我们，心生感激之情。

休息了一天以后，10 月 17 日的晚饭后，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袋馍馍，几根蒸熟了的腊味香肠和几个盐茶鸡蛋，就被召集上了很多辆军用卡车。卡车一直把我们拉到东长安街，再向北进入农展馆路，那里已有不少解放军在等待着我们，解放军都没有拿枪，只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们热情地招呼我们下了车，让我们原地休息，等候毛主席明天的接见。那时的农展馆路两旁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像农村一样的田地，在田地上，有用草席搭好的临时男女厕所。马路两边栽有高高的白杨树。不多远就有一个装满开水的保温桶，这都是解放军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我们班的同学都集中在马路的东侧席地而坐，相互背靠着背，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第二天，也就是 10 月 18 日，我们迎来了早上的旭日，又是一个极好的天气。早饭是就着开水吃了一些昨晚带的馍馍、香肠和鸡蛋。整个上午我们

都是在马路边等待，整条长安街和农展馆路都戒严了，除了我们学生和道路两旁分两排站立的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其他人和车都不让进。中午午饭时间到了，和吃早餐一样，吃光了昨晚带的干粮，坐在地上，相互靠着打了一个盹，这时，解放军一位班长让我们交出了水果刀一类物品。不一会儿，只见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车开过来了，上面坐的是头戴墨镜，身穿草绿色军装，威风凛凛的叶剑英元帅，他乘车巡视了一遍道路两旁的情况，又见他乘车原路返回。这时解放军示意我们都坐下，说任何人都不能站起来，又说毛主席快来了。我们又紧张，又兴奋，端坐在道路边上，前面是手拿《毛主席语录》本的两排解放军。又过了一会儿，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只听见天安门和长安街方向传来了《东方红》歌曲声，不一会儿，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就开过来了。车队是清一色的崭新的敞篷北京吉普，呼呼呼地大约用 40 码的速度向着我们开了过来。

我们很荣幸，能够近距离看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时道路两旁的同学们激情奔放，欢腾雀跃，形同鼎沸，忘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顾不得喊口号，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车队看，我要用我的眼睛和大脑记录下这弥足珍贵的伟大瞬间。

第一辆车的后排中间坐着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我的总体印象是：毛主席头很大，红光满面，精神奕奕，他没有戴军帽，向后梳的头发有些灰灰的，他在和坐在左边的人（好像是汪东兴）交谈，露出的牙齿有些发黄——可能是他爱抽烟的缘故，他说完一句话，上嘴唇要向下抿一下。当毛主席看到“西安交通大学”横幅校旗时，他站立了起来。毛主席身材十分魁伟，他左手抓着吉普车横杠，右手向我们挥手致意——我注意到那是一只很大，很有力量的手，手掌心的窝窝很深，不愧为是扭转乾坤的手。

第二辆车后排站立着副统帅林彪，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左手抓着

吉普车横杠，右手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他显得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只是眉毛很黑很浓，眼睛很明亮，而鼻子却很尖。他一直在微笑着。

第三辆车后排站立着敬爱的周总理，身穿绿军装，没有戴军帽，形容消瘦，但是看起来面色红润，显得很精神，两道剑眉又黑又长，两只大大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只怪车开得太快了，还没有看够，周总理的车就从我们身边过去了。

第四辆车后排上端坐着朱德元帅，他的坐姿有如泰山一般，巍然不动。他的体态较胖，红光满面，笑容可掬，不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

第五辆车后排站立着中央政治局常委、经济学家陈云，他一直谦和地微笑着。

第六辆车后排站立着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笔挺的中山装，个子很高，满头的银发映衬着白皙的脸庞，他微笑着，那微笑里隐含着共产党人的修养——我忽然想起了他写的著名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书中有“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一句话，似乎是他现在的写照。他已经身处逆境，还能那么泰然自若地微笑着，彰显了修养的力量。这次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露面了，不久他就被“打倒”，监禁了起来，最后逝世于开封监狱。

第七辆车后排站立着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显得很年轻，很精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微笑带着自信和坚定。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后来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道路。

后面几辆车分别坐的是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陶铸，陈伯达，姚文元……最后面的一辆车上站立着留着短发的江青，她显得十分活跃，不停地


李镜吾文革中在天安门前留影

扭动着身体，向着前后左右的学生们招手致意。

车队过去了，还有不少同学在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哭了，是幸福的眼泪，抑或是激动的眼泪？反正大家都在哭，我也跟着哭，哭是有共鸣的，有几个人一哭，大家都跟着哭，只哭得稀里哗啦，天昏地暗。等我们上了军车，返回清华园时，大家又高高兴兴地唱起歌来……

## 四、游山玩水，探亲访友

我们回到清华园，吃罢晚饭，倒头便睡，睡得很香。晚上我做梦，梦见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一次接见我们……醒来自觉是在做梦，这梦倒是反映了那时的有头脑的一大批大学生们的美好的幼稚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党中央再不要搞两条路线斗争，重新团结起来，抓经济，搞建设。然而愿望终归是愿望，"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那汹涌的潮流哪是我们这些像"沧海一粟"的青年学生所能阻挡的。我们谁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那就是：我们退出文革运动，既不做造反派，也不做保皇派，我们做逍遥派。"逍遥派"这个名词就是自从毛主席接见以后产生的。这是因为，就像物理学中的抛物线，当物体到达抛物线的顶点时就会向下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让我们到达了抛物线的顶点，这时让我们看清了文革运动的实质，是党内的一场斗争。毛主席等领

导人是一代伟人，我们当然不会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也是杰出的伟人，我们也不想反对他们，那怎么办呢？我们困惑，我们迷茫，我们万般无奈，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做逍遥派了。

我们在北京游玩了两天，第一天是去天安门，花钱照了一张相，写上地址，照相者就会把冲印好的照片寄来，学生们排着队照，都是千篇一律的姿势，手拿“红宝书”，目光正视前方，一脸的严肃像，而背景都是天安门。第二天是去颐和园游览，我还跳下昆明湖游了一圈，那时也没有人管，真爽！第三天我们接到通知，中央让我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联，坐火车，不用买票；无论到哪儿，吃住都不要钱。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事。我们高兴极了，心想：不玩白不玩，不吃白不吃，这是党中央给我们学生的特权哪！

于是乎交大来京的几千学生就地解散，各奔前程。我想的路线是，南下去湖南湘潭毛主席故乡韶山游览，刚好我们班的宋希俊也有此意，于是我们结伴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临行，清华大学食堂还给我们每人带了一袋馍馍、鸡蛋、香肠等干粮，足够我们吃到武汉的，真是想得周到！

宋希俊，女，宁夏人，原籍山西，身高 1.62m，在当时算是大个子女生了，有着山西人白白的透着红润的宽脸盘，她可以说是专业学生干部了，在中学一直担任学生会主席，进大学后，担任铸造专业团总支委员。年龄比我小一岁，但心理年龄很成熟，为人善良，遇事多为别人着想，据说在高中时就有老师称赞她有“老人心肠”。宋希俊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军训时又在一个班，彼此很了解，算是同学中的知己吧！

到了武汉，宋希俊想在武汉玩几天，她住华师大，有吃有喝的。我则只身回家乡大冶看望了母亲和侄儿，呆了一天，又回到武汉和宋希俊会合，继续乘火车南下长沙，住岳麓山湖南大学，在长沙玩了一天，傍晚我们登上了赴湘潭的小轮船。

唐诗有“八月洞庭秋，湘江水北流“的名句，时值农历九月，序属深秋，湘江的水格外清澈，明净。小轮船在湘江中朔流向南徐徐航行。夜幕渐渐降临，天空显得十分明净，瓦蓝瓦蓝的，群星闪烁，清风拂面而来，江浪轻起涟漪，远远望去，江天相映，湘江两岸的田野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灯光，以及那若隐若现的橘林，那天的夜色真是美极了。远离喧嚣的城市，远离甚嚣尘上的文革运动，我们流连甲板，凭栏远眺，畅谈入学时的理想和憧憬，畅谈对时下文革运动的不理解和迷茫。我含蓄地对她说了我的心里话：

“美国解放黑奴的著名总统林肯说得好，一些人，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或许可以欺骗、愚弄所有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总会被他们一直欺骗、愚弄下去，但是，他们不可能永远地欺骗、愚弄所有的人。”

“这话是不错，我明白你的话的意思，你是在说中央文革某些人，但是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说了，听我的。”宋希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随即点了点头。

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决心做逍遥派。我知道，她是打死都不会出卖同学的人。

第二天一早，轮船到达湘潭码头，我们改乘汽车到韶山，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然后原路返回长沙。在长沙街上，不意遇到了我们班朱志良带领的“大部队”，于是宋希俊加入了“大部队”，好像是去广州方向游览了。我则打我的“小算盘”，想取道南昌，游览杭州，然后经上海，到南京，去看望阔别五年的二哥。

在长沙火车站革命学生接待处，凭学生证每人还可以领到 3 元钱的旅途餐费，离开北京时，我的口袋里只有一角钱，现在有 3.1 元钱了，以后每到一个城市，都可以在学生接待处领取 3 元钱。我在车船上忍着饥饿，不买饭，到了目的地，再猛吃一顿，大串联下来，我足足攒下了 15 元钱。免费乘

车船，免费吃住，免费景点门票，最后还可以领取 3 元钱……这等好事只有文革时期才有。

我登上了长沙至南昌的列车，列车上的人很多，大多是出来串联的中学生，座位都坐满了人。怎么办？我灵机一动，站在车厢里指着我胸前的交大校徽大声说："我是交通大学的，是专管交通的，现在是大串联时期，上级规定，两个人的座位坐三个人，三个人的座位坐四个人！"我这么一嚷，还真管用，站着的学生都找到了座位，我身旁的学生赶紧给我挪出了一个位子。

到了南昌，南昌的接待别具一格，学生都被安排到街道接待，街道的老太太们十分热情，吃住都在她们家里，家家都给串联的学生做一大桌子菜，特别是大碗盛的炖鱼很好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首先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迎面坐落着一排发起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等领导人和元帅将领们的铜像，一个个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我当即写了一首诗：

车到英雄城，胸中涌炮声。
旌旗映夜火，满街尽铁军。
壮志开大业，碧血换天晴。
旧址悼英烈，澄空飘白云。

在南昌，我还独自一人游览了赣江，可惜没有找见唐代的滕王阁，可能是毁于兵燹，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当年唐初四杰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写下的千古丽句所描述的景色，那就是：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在南昌游览了三天，就乘火车经鹰潭来到了人间天堂的美丽的杭州城。杭州很美，我写了两首诗作为纪念：

其一

一派湖光接九天，绿荫如云拥山边。

三潭映月看不厌，林隐月桂散香甜。

其二

苏子堤上惜大苏，大江东去极风流。

淡妆浓抹描西子，何不高唱洞庭秋。

游览了杭州，我又乘坐运兵的铁罐列车，北上上海，那时出来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连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也爬上火车出来串联。客运列车不够了，就调来军车运送学生。铁罐车上没有厕所，就一头放一个粪桶给学生们方便，那男学生好说，一转身就可以尿尿；那女学生只好站一排女生做人墙，挡住男生视线，在桶里尿尿，整个车厢里骚哄哄的。

到了上海，住复旦大学，睡在铺着烂席子的稻草上，惹得我浑身长满了菱形半透明的虱子，虱子专钉在腰部咬，又疼又痒，非常难受，后来，用开水烫内衣才把它们消灭。在上海我游览了外滩，城隍庙，还去上海交大看了看，那时的上海交大比西安交大小多了，房子也很破旧。

离开上海，我转乘火车直奔南京。到了南京发现南京真是气派，到处都是腰挂手枪的解放军在巡察。他们是奉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命令行事的，许世友将军很牛，他一直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

我一出站，就向一位腰挂手枪的军人打听，白水桥炮兵团怎么走？他问我找谁？我说找在那里当兵的李正吾。他说，我就是炮兵团的，是李正吾的战友，你一定是他弟弟了，你们长得很像。他又说，李正吾的名气很大，他是我们团的标兵。他热情地让我等一会，他们有军车回白水桥。不一会我就乘坐他们的军用吉普车来到了炮兵团军营。到了军营大门，卫兵不让我进去，说是奉许世友司令员命令，学生和红卫兵一律不许进兵营。卫兵让我在

门房等待，他立即打电话到团部，告诉李正吾的弟弟来了，请他到门房见面。不一会，团长，团政委和我二哥一起来到门房，团长，团政委和我亲切握手，我和二哥紧紧拥抱，五年不见，他的脸色黑红黑红的，身体变得很壮实。团长政委一再向我解释，是接到上级命令，不让学生进军营的。我表示理解。他们很客气地回去了，又通知食堂给我们送来了很丰盛的午餐。

我和二哥边吃边聊，真是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诉说离别五年的思念，诉说这五年各自的经历。二哥说道，他自 1962 年从上海大学参军，一直在南京军区炮兵团任炮兵计算员，荣立了两次三等功，是全团的标兵。由于自幼擅长音乐，他近年创作的军旅歌曲由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合唱团演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他在冬日里跳入江中救起不慎落水的战友；多次偷偷把钱寄给有困难的战友家中，从不留名……因为我们家有“国共合作”背景，政审过不了关，所以一直不能入党，不然，他当时可能就当上营教导员的职务了。他在部队吃了很多苦，别人付出一倍的努力就能达到的目标，他要付出三倍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部队锻炼了他，使他具有钢铁般的性格和骆驼般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们俩又说起了童年时代的事情。解放后，我们家回到了老家大冶农村。我和二哥自幼在一起，他只比我大两岁，但一直呵护着我，村里有孩子欺负了我，都是他给我“报仇”，他身手敏捷，很会打架，因此得了一个“小霸王”的外号。我总是跟在二哥后面屁颠屁颠的。我们一起下河游泳，捉鱼摸虾；一起上山砍柴，采摘野果子；一起放牛，养羊；一起舞枪弄棒，捉迷藏；一起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代。要说烦心事，也有，就是母亲有些偏心，而且脾气暴躁，母亲疼爱老大和老幺，他们俩从未挨打，可是我们俩没少挨打。我挨打时是撒腿就跑，跑出去，躲起来，想几句歪诗，回家写给母亲看，她就不打我了；而二哥挨打时，他从不跑，让母亲想怎么打就怎么

打，打急眼了，自己伸着头往墙上撞。上小学时，我们是同学，他比我高一年级；上初中，我们还是同学，一起住校，生活上都是二哥照顾我，给我洗衣服，打水洗脸……要说我家弟兄四人中，我们俩的感情是最深厚的了。

我们就在门房里吃着，谈着。不知不觉食堂又送来了更丰盛的晚饭，我们接着边吃边聊。五年的话，哪能在 10 个小时内说完呢？我又给他介绍了大学和社会上文革的情况，他在部队，对社会上的文革运动知之甚少，他完全赞同我当逍遥派的想法。晚 8 时了，临别前，他回营房给我取来了一条新军棉裤和一顶新军帽，还塞给我 20 元钱。然后一直把我送到 6 公里外的汽车站。我们洒泪而别。

我写了首诗，纪念这次兄弟会面：

阔别五载聚钟山，手足情深相见欢。
砍柴割草春山暖，捉鱼摸虾清溪寒。
投笔从戎建功业，光阴如水叹逝川。
灯火有情照惜别，泪洒烟云伴我还。

当我回到南京火车站广场时，已是晚上 11 时左右。只见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大串联的学生。我想，再不走，就回不了西安了。当机立断，我挤进了车站，刚巧有一辆发往西安的列车，但是车里已经挤满了学生，车门、车窗都关得死死的，我就站在车门踏板上，用一根背包带把自己捆在车门把手上。站长说，我这样做十分危险，他让我下来，我就是不下来，而他就是不发开车信号，列车在车站停了十多分钟。没办法，站长就拍窗户，让里面的学生拉开车窗。那时的列车里是没有列车员的，就这么僵持着，站长搞气了，就拿起一把铁鎯头，把一个车窗玻璃砸碎，硬是把我抱起来，从车窗塞了进去。我爬在人堆上，只觉得软绵绵的，而身下的人在大叫：“压死人了！压死人了！……”我这才发现车厢里的确已经没有我立锥之地了。我灵

机一动，看到了行李架，于是我爬到了行李架上，头枕旅行袋，腿一伸，就把行李架当作卧铺，睡起了大觉。我听见下面有人在议论："到底是交通大学的，真会想办法。"不一会，也有人爬上了行李架睡大觉了。

我回到交大，已经是 11 月上旬了。不久中央就发出通知，结束大串联，学生全部返校。更可笑的是，有一些同学组成长征小分队，徒步到延安，还有的徒步到井冈山，一路上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到 11 月下旬才回到学校。

## 五、下厂、军训、登华山

大串联结束后，天气渐渐寒冷起来。这时中央又发出文件，号召革命学生下厂支持工矿企业的左派。交大文革总会通知各系各班级组成支左小分队，自己联系工厂，下厂支左。由于毛主席接见了西安革命学生和红卫兵，表明了毛主席支持西安的造反派，因而这时的西安各单位保皇派都土崩瓦解了，无需支左。既然中央发出了通知，学校内的学生一个不留，都纷纷下了厂。

我们班组成了三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到西安手帕厂，一个小分队到西安缝纫机台板厂，一个小分队到建工局西安机械化公司大修厂（简称大修厂），基本上是以男生宿舍为单位组成小分队。我们宿舍组成的小分队则是到大修厂，成员有苏福堂、张醒民等。大修厂位于西安东郊胡家庙，大家推选我为组长，我也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了。

有意思的是数理系 1 字头（1961 年入学的，现在是毕业班，待分配）有一位男生叫周澍基的要求加入我们小分队，他说他不喜欢他们班同学，在前些年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运动中挨过整，他们班把他作为走白专

道路典型批判，伤了感情。因而想和我们低年级的同学混日子。我当即就答应了。后来我发现他博学多才，而且诗词写得极好，我们互相交换自己的诗词集看，后来我们俩相互写诗唱和，惺惺相惜，十分投机，我们成了“忘班交”的好朋友。现抄录几首如下：

送周澍基毕业分配至武汉

皎皎秦岭月，茫茫大别山。
玉鞭云外指，大雁正飞南。
吴楚豪俊地，江城踞三关。
他日相逢处，笑看白浪翻。

后周君改分配至渝城，周君和诗

霜凋秋木落，惆怅别秦山.。
三峡巫云远，九盘蜀道难。
谁堪闻折柳，何用唱阳关。
耿耿心胸意，离情只浪翻。

**秋意——奉和周君诗**

山黯城阙暮，落叶报时秋。
铅云压断梦，尺书警夜愁。
屈子空帐望，湘江泪谁收?
与君共通达，举杯酣高楼。

秋意——周君原诗

雨歇千山暮，风寒草木秋。

蛩吟惊晓梦，燕字惹深愁。

丛菊和天老，夕霞向晚收。

诗情又寂寞，露冷怯登楼。

好了，再回到 1967 年初的大修厂。我们交大支左小分队进驻大修厂后，按要求做到“三同”，即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按规定，大修厂给我们每人每天补助 2 角钱伙食费。这样，一月下来就有 6 元钱的零花钱了。我们在大修厂钳工车间和工人师傅一起干活，向他们学习钳工技术，倒也开心。有时下班以后，大修厂造反派头头召集全厂工人开开会，我们只需出来表表态，表示支持就行了。

1967 年元月，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实行夺权以后，随即元月 30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当天全国的造反派掀起了连夜抢夺公章的高潮，在这场抢夺图章的争权夺利之中，西安造反派分裂为了两派。一派是交大支持的“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一派是西工大支持的“工联”，成为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交大学生领袖李世英主张，“革命不分先后，”要团结从保皇派倒戈的工人，干部；反对“打砸抢”，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得到了西安多数工人，干部的拥护。但是西工大和工联派指责交大和工总司派是“右倾”，是造反派的叛徒。而交大和工总司派也不示弱，骂对方是“极左”派，是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相互攻击，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派性斗争。

大修厂的极左派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贯调皮捣蛋的青工冯某，一个是冯某的女朋友，他俩家庭出身都不好，就是造反精神强。厂里绝大多数工人和干部都是工总司派的。然而冯某俩夺权行动快，连夜抓住原来的厂长，逼他交出工厂全部图章，他俩以为，这就把工厂的大权夺到手了。大修厂工总司派的头头们，也慌了神，急急忙忙来找我们，问我们怎么办？我随口说

道："抢了几个橡皮图章就以为夺到权了，真可笑！你们可以成立工厂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嘛，再刻几个图章，宣布以前的所有图章废止就行了；其二，工厂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俩若不好好上班，就通知财务科扣发他俩的工资！"头头们恍然大悟，立即出了一个通告，大意是："根据交大支左分队领导的指示，我厂以前的公章一律废止，启用筹委会印章；全厂要抓革命，促生产，无故旷工者，要扣发工资；目前，本厂一切权力归筹委会。"我们看着这通告，心里美滋滋的，第一次感受到自己随便说的话，就成为了"指示"了。有趣的是，后来我们离开工厂，回校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修厂有重大的事情，比如三结合哪位干部啦，成立大修厂革委会啦，大修厂的头头们都会来到交大向我"请示"。

在大修厂还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就是在车间外的场地上，吊装推土机的活动式龙门架突然倒了，刚巧砸在我班同学张醒民的大腿上，大腿骨折，被立即送往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做了接骨手术。张君因祸得福，和照顾他的女护士谈成了朋友；还因骨折，从铸造专业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金相专业。

由于北京的红卫兵在社会上搞"打砸抢"十分严重，毛主席决心让红卫兵们回到学校。又因为这时的各级党委都陷于瘫痪，决定派军队进驻各省市实施"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2 月 15 日，21 军军长胡炜接到周总理命令，率领全军由山西移师西安，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轰隆隆地由和平门驶入西安城内。

3 月 7 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下厂和在外串联的学生一律在 3 月 20 日前返回学校。我们闻风而动，3 月 10 日就离开大修厂返校。临行，全厂职工都到厂门口相送，有一位老师傅开了一辆大卡车来送我们，工人们不由分说，把我们的背包扔上了卡车，把我们推上了卡车，一直送我们到交大宿舍楼下。

3 月 15 日解放军进驻交大，实施为期一个多月的军训。每一个班级都派来了一位排长。我们班派来的排长是北京人，长得很英俊，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很和气，不像我们入学军训时的教官那么凶。这次军训和入学时的军训很不一样，每天有半天时间是在宿舍学习红宝书和《毛选》；一半时间是走队列训练，要求也不严，没有发枪，没有摸爬滚打训练，没有拉练，总之，整个训练松松垮垮，真没劲！ 4 月 21 日，军训结束，解放军也就撤出学校。要说这次军训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那就是解放军都是搞正面教育，没有搞群众斗群众；再就是把学生都收回到了学校内。

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打发了，我们用 21 军的番号“8133”来形容我们的生活，即每天睡 8 个小时，打一场篮球，吃三顿饭，打三场扑克牌。都是些年轻的大小伙子和大姑娘，整天窝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怪心烦的。于是，有的班级开始爬火车去登华山。华山位于陕西东边，临近潼关，刚好华山山脚下有一华山车站。

朱志良、韩桂愚几个同学发起游华山活动，全班男生女生齐响应。大家在食堂各自拿了一书包馒头，外带一小袋咸菜；有水壶的带水壶，没水壶的带一个水瓶子装满开水。吃罢早饭我们就兴冲冲地来到西安火车站。结果发现车站入口管严了，没有车票不让进。我们只好顺着车站护墙往西走，一直走到没有护墙的地方，进入车站区，再向东一直走回到站台。我们在等候东去的慢车（只有慢车，才在华山站停站）。在候车时，一位人高马大的站长，大吼着，要把我们赶出站外。我们赖着不走，有的朝柱子后面躲。就在这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班一向内向的全校最矮的那位贵州小女生出彩了，她突然挤出出人群，连蹦带跳地冲到那站长的跟前大声吵道：“怎么啦！我们革命小将坐坐火车就不行了，你有本事把我们都抓起来！”

“看你这个小不点，还挺牛的。才多高的个子，什么革命小将！你拿镜

子照照自己。”站长一脸的鄙夷的神情。

“小个子怎么啦！小个子招你惹你啦！小个子就不能革命啦！你这说的是人说的话吗？毛主席说了小个子就不能革命了吗？你妈就怎么把你生成这么一个傻大个子？肯定是你妈怀你时吃错药了……”小女生越说越有气，差不多贴到了站长面前，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派，一跳三尺高，她的头部居然和站长的头部一般高了。

那站长被她的气势压倒了，下意识的向后倒退了几步，说不出话来了。小女生不依不饶，用手掌拍着手背，摇着头，铁青着脸，追着站长吵，“你说说，是不是你妈把你生错了？这么没知识，这么个傻大个！你也照照镜子，看你多傻冒！”

“我服你了，我服你了！我惹不起你，随你们的便吧！”那站长说完，转身离去了。不一会，有辆东去的慢车进了站，我们呼啦啦都顺利地上了车。上了车，我们还忍俊不禁地笑，直笑到肚子疼。笑过了，待冷静下来，我们还真是钦佩那小女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大无畏的精神大闹西安火车站。

到了华山车站，我们下了车，这时已是下午 5 时左右。那时大家都穷，没有住旅馆，就坐在车站长椅子上打盹，将就了一夜。饿了就啃馍馍，吃咸菜。凌晨 4 点左右，朱志良喊醒了大家，洗了一把脸，我们就匆匆上山了。

越走天越亮，越走山上的景色越美，越走山路越陡峭，起先是大家一起走，到后来，变成三五一组，相互拉开了距离。体力好的走到了前面老远，体力差的，特别是女生，就掉队到了最后面。我生在山区，登山是我的强项，自然走在最前面，我和苏福堂、韩桂愚等一组。一路上，但见怪石嶙峋，流泉潺湲，山风凛冽，鸟啼清越。走了两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一线天，那真是险峻呀！两面山壁相夹，中间只有一石缝，向上看，只能看到一

线天空。一次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山壁上湿漉漉的，石阶上滑滑的，阴森可怕极了。

过了一线天，再爬了一个多小时的石阶，就来到了南天门，我们休息了一会儿，任清凉的山风吹干了身上的汗水，抬头一望，只见湛蓝的天空映衬着笔直陡峭的南天门万丈石阶，石阶两旁有粗壮的铁索，平添了登天石阶的庄严，着实令人惊叹而生畏。“五岳之中，唯华山最为险峻，”信乎？

我们拉着铁索，艰难地登上了华山之顶——莲花峰。莲花峰有莲花洞，相传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之地，洞外有一巨石，形状似一斧头，传为沉香劈山之斧。站在南峰，极目四望，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真让人心旷神怡！我在南峰即兴写了几首诗，抄录如下：

其一

华山险峻世独称，一线天只容一身。
自古华山一条径，一夫当关万夫惊。

其二

削就青石耸华山，飞瀑带烟湫急弯。
天女早知贵客到，一路玉泉奉客餐。

其三

南天门上望苍天，飞云急下群峰巅。
袒怀一呼松林啸，化作东风到人间。

其四

华岳亭亭立大荒，青松云绕秀发香。
冷艳岂作忸怩像，碧天为镜照梳妆。

其五

爱煞摩崖古碑文，相携谈笑南峰行。
上得顶峰无他事，伸手为天铺白云。

等到正午时分，全班同学才聚齐莲花峰。刚好莲花峰上有照相馆为游客照相，我们全班在此地照了一张合影。付了费，留了地址，照相馆后来把照片寄给了我们。

我们决定当天下山。下山比较容易，但是大家的两腿都是直打哆嗦的。4时左右，我们好不容易下到山脚，来到车站，一打听，这天的下午，去西安的火车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向东步行，来到孟塬车站，在该站，我们爬上了一辆西行的货车，货车沿途不停站，一路顺风，回到西安。

整整一个星期，全班同学都喊腿疼。

## 六、工宣队进驻学校

1968 年的暑假，学校没有放假，我们都在学校内，既没有上课，也没有参加游行一类运动，每天沉浸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热潮中。一个班有几个同学带头，大家都一窝蜂地上。

首先到书店买一本《半导体收音机及其电路》的书，再到钟楼以南的南大街半导体处理元件销售店买一堆廉价的电阻，电容，可变电容器等元件，然后到校办厂木工车间去偷（我们当时说是拿）小张的五合板。五合板通过

锯开，打磨，粘合，上清漆等一套手工工序，做成漂亮的半导体收音机外壳——或者叫盒子。再到电工车间偷一张塑料绝缘板（偷一张板，全班装收音机都够了），锯成一小块，一小块，分给大家做安装元件的底板。然后根据电路需要，在底板上钻出许多小洞，打上铆钉，在铆钉孔插上电阻，电容等元件，在底板的背面，按电路图，用电烙铁锡焊，将细电线把各个元件的地脚线连接起来。最后再连接小喇叭，磁棒，电位器（开关和调音量大小用），可变电容器（调台用），波段开关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装好了。一台机子最贵的元件就是最后这几样。我一向囊中羞涩，买不起这几种元件，只好求助于刚刚转业到上海工作的二哥，二哥立即就买好给我寄来了。

我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不仅性能好——因为关键元件都是上海买的正品，而且外壳做得极漂亮，面板上，我用刻刀雕刻了非常美的浮雕图案。所以有几位同学都请我帮他们做盒子。我做了不少盒子，觉得还不过瘾，便去木工车间偷木板，回到宿舍做木箱子，几个同学凑着买了几样木工工具，如斧头，锯子，刨子，凿子，整日里在宿舍做木匠活，好不快活！做好的箱子，还要做油漆。首先用砂纸打光，然后刮腻子，再打光，然后上色，补色；最后刷清漆。我还设计了小书架，就两层，做好后，安放在床铺的内侧，靠墙放着，可以放几本书和半导体收音机，还可以放一杯开水，很实用。大家都模仿我的做，有的做的比我的还漂亮。我会做些木匠活，就是那时自学成才的。有几位同学跟着我一起干，把宿舍搞得热火朝天，根本不理睬文革运动了。

好景不长，工宣队快要进校了。原来，7 月下旬起，同时期的北京，清华和北大等高校两大派——什么天字派（以北航为首），地字派（以地质学院为首），派性斗争闹得不可开交，同校分为两派，相互武斗。

8 月，毛主席就指示北京工人，组织工宣队进驻北京各高校，让工宣队

来整整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清华大学很牛，就是不让工宣队进校。毛主席就派人把外国政要送给他老人家吃的一筐芒果，送给了围住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这下子，清华的两派学生都没脾气了，工宣队得以进驻学校。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社论，提出大学生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口号。

全国高校都受到牵连，8 月 29 日，西安工宣队进驻交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校的工宣队实际上夺了校革委会的权。交大各个教研室、班级都派来了一个工宣队队员，以教研室和班级为单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教研室里是抓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班级里是斗私批修，对学生们进行再教育，再就是大搞“三忠于”活动。

我们班派来的工宣队员是西安国棉四厂一个车间的副主任，中共党员，女，45 岁左右，名叫赵金环，微胖的身材，圆圆的脸庞，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透着精明强悍的精气神。她的文化水平不高，大约是小学毕业程度，但是口才很厉害，她原籍河南，解放前，全家逃荒到西安（西安人中，有一小半是河南逃荒来的），所以她的口音中是河南音夹杂陕西音，讲起话来，连珠炮似的。一开始，我们都真还有些怕她。

她一来到我们宿舍，就一眼发现我们班三间男生宿舍都像木工车间和电子车间，于是她怒目圆睁，大声斥责道：“这哪像你们大学生的宿舍，这做大大小小的木箱，木盒子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是偷的吧？你看看，你们像什么了！”

“我们是从校办厂木工车间拿的边角废料，不是偷的。”我嗫吁地分辨。

“那和偷不都是一回事吗？这在工厂里叫做偷工厂的材料做私活，是违反厂纪厂规的，是要受处分的，是犯法的。”她继续怒气冲冲地说。

“哦！那我们错了，怎么办？要受处分吗？”我低下了头，自知理亏，赶紧认错。

“就你认错，很好！其他同学怎么不说话？”她的气消了一些。

“我们错了！”我们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轻声回答，就像一群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赵金环忍不住“扑哧”一笑，说：

“算了，算了！谁不犯错呢？总结教训就可以了，装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就算了，凡是做好的空箱子，空盒子都给我送回木工车间。你们班再写一份深刻检查，交给我。你们班谁有两把刷子？”赵金环很聪明，她不是想整学生，而是想搞出一份材料来，好向上邀功。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我的身上。

“好了，就你写，三天以后写好，交给我！”赵金环对我命令道。

我哪敢怠慢，立即就写，哪用三天时间，一个晚上就写好了。题目是“斗私批修，防微杜渐，公物还家。”文中，上纲上线，写了我们拿木工车间材料做私活的过程，突出写了工宣队赵金环师傅如何如何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我们全班如何如何将做好的木箱木盒送回到木工车间；还论述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随时随地斗私批修，防微杜渐，将来就会变修，小言之就会害了自己，大言之，就会害了国家，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二天一早，我就交了卷。赵金环一看那检讨——不，是一份绝好的称赞她的文章，喜出望外，连连说好。她立即送到了工宣队总部，总部觉得很不错，刚好需要歌颂工宣队的文章，就指示交大广播台立即广播；交大校刊《人民交大》全文刊登。文章的署名是，机械系铸造五二班。我们班，以及赵金环一下子在全校出名了。

接下来，全校掀起了公物还家的热潮，还在图书馆举办了公物还家展览。我们班做的那些玩意儿自然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接着有几个系还请我们

班去讲演。自不待言，赵金环都是派我去现身说法讲演。

我就是一个当教师的料，好为人师，嗜好在讲台上表现自我的那种感觉，于是我欣然应允。我用一个袋子，装上我做的各式各样的木盒子，算是做教具，就一个系，一个系地在阶梯教室里演讲开了。首先，我把这些木盒子往讲台上一放，便吸引了大家的眼光。然后我就从怎么做这些小盒子的工艺开始，讲得津津有味，有些听讲的同学还拿出了小本子记呢，到底是记我做木盒子的方法，还是记斗私批修的心得，不得而知。然后话锋一转，问大家，这些小盒子漂不漂亮？大家都说很漂亮，我接着说，盒子是漂亮了，但是我们的内心变了，变得不漂亮了，慢慢变修了，变得一不关心阶级斗争，二不关心路线斗争了……反正是些上纲上线的话，我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讲完了，是一片掌声。接着，总有一些同学围上了看我做的小盒子，问我盒子上的那些浮雕是怎么雕刻的，我耐心地告诉他们，五合板有五层，用刻刀一层层地刻，比刻实木还容易。我知道，他们是在向我学做浮雕盒子的技术。就连李世英，陈柏荣等革委会的头头都听了我的讲演，会下，李世英还对我说，你的讲演讲得很好，防微杜渐，发人深省。

赵金环自然见了我是一脸的笑容，那时学校党团组织已经逐步恢复，她主持召开了班级团支部会议，再一次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然而上报到校团委，又碰到我的家庭历史问题，被搁置了。

这期间，交大校刊遇到编辑缺乏的问题，我被抽到校刊编辑部担任助理编辑，这是技术活，比每天在班级参加空洞的学习班有趣多了。我向编辑部的老师和学友学习怎么编排稿件内容，怎么画板样；到学校印刷厂看工人如何检铅字，如何拼版，打出清样给我们校对；然后送审，付印；最后变成一捆捆报纸。我学得很认真，基本上掌握了一张报刊的出版流程，这为我参加工作后，担任技术期刊的主编打下了基础。

1968 年的五一前，陕西省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李世英被内定为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将军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交大成立专门小组，起草省革委会成立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被抽到起草专班，专班一共有六七个同学，都是交大有名的笔杆子。那时交大发表的文章，比文科大学——陕西师大、西北大学的学生都写得好。

所谓致敬电，基本上是歌功颂德类文章，但对文字要求很严，要求要写出陕西人的风采。我们专班的做法是，每人写一篇，然后由主笔汇总。我是写官样文章的新手，我写的初稿只采用了两句话：“秦岭踊躍唱赞歌，汉水奔腾来报喜。”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无意识间提出“南水北调”到北京的工程技术人员。很可惜，最后正式发表时，被领导们改成了“延河奔腾来报喜”了。真可笑，延河那一点水，流到北京也就蒸发完了。通过起草致敬电，我初步学会了写公文，就是剪刀加浆糊，首先准备大量类似材料，然后这里剪一块，那里剪一块，拼拼凑凑就是一篇文章。

嗣后，赵金环还带着我们班到西安国棉四厂参加劳动，和女工们一起三班倒。我们班都分到织布车间，做挡车工，一开始只是学习摆纬，后来慢慢学习接线头。一位女工看二三十台织布机，遇到线断，织布机就停了，就要跑过去接线，女工们上班都是小跑，一个班下来，据说要跑 80 里路，非常辛苦。让我们体会到“轻工不轻”。

接下来是大搞三忠于活动，赵金环知道我班女生朱秀萍是校文工团的成员，就让她参加了全校忠字舞培训班，她学会后，回来教我们，她还培养了一名助教，就是韩桂愚，让他每天早上带着我们跳，算是领舞吧！韩桂愚平日嘻嘻哈哈，吊儿郎当的，但是当起领舞，却一本正经，那“舞姿”十分滑稽可笑，至今还记得他跳忠字舞的样子。所谓忠字舞，就是跟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跳类似大众化健美操的舞蹈，有些像现在老头、老太太们

在广场跳的广场舞。其实从锻炼身体的角度看，跳忠字舞也并非一无是处。

赵金环要回厂了，我还真舍不得她走。我抽空到飞鸣镝书画社给她画了一幅毛主席穿军装的油画肖像，还在书画社内给配了一个漂亮的画框，然后一个人径直送到她的家中。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兴，请我到饭馆大摆了一桌，席间她老公不停地给我敬酒，借着醉意说："大学生就是大学生，有水平！什么再教育？要说俺家老赵能够教育你们，鬼才相信！要俺说，大学生和俺们工人交朋友，那才叫好呢！"急得赵金环用手直掐他的大腿。

工宣队进校期间，教职工倒大霉了，每天清理阶级队伍，抓反革命，随意关押教师，批斗教师达数百人之多。不少中老年教师挨批斗，这期间，精神崩溃、跳楼、跳湖、上吊、撞汽车和开煤气自杀的就有 13 人之多。

## 七、我当了一回"辩护律师"

工宣队赵金环师傅走后，换了一位男性师傅，是西安国棉四厂一个车间机修班班长，40 多岁，河南人，中共党员，个子不高，又瘦又黄，一脸的肝病颜色，忘其姓氏，我只记得心里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病师傅"。他极其老实，整天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旧衣服，有些像逃荒的难民。第一次进我们宿舍召开会议，他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不吱声，一点也不像是来教育我们的，倒是像来接受我们教育的。整个一上午，他就说了一句话："俺啥都不懂，俺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班，你们看着办，想怎么学就怎么学，只要不干坏事就中。俺说完了。"

后面的日子，可想而知，我们过得很宽松，很惬意。除了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就像敬神一样，早上全班在一起对着毛主席像大声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晚上全班又聚在一起对

着毛主席像重复早上的祝词，一整天，病师傅就不管我们了。其他班级和我们班大同小异，工宣队师傅换过以后，也松松垮垮的了。看着高年级的同学一届一届毕业分配离校，我们也开始着急了，这大学不能白上哦！于是，我们趁机自学"复课闹革命’时没有学完的技术基础课程，不懂的，相互讨论，总算把这些课程草草过了一遍。

有些班没有我们班聪明且心齐。胆小的班级，每天坚持学《毛选》；胆大的同学，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借以发泄心头的不满。全校那时只剩下三千多学生了，其中有几个长得魁伟强壮的男生是打架大王，我们叫他们"坦克"。

机械系机切专业有一"坦克"，名叫 X 君，长得虎背熊腰，不擅言辞，偏爱拳脚，喜欢打架斗殴。他和我们班的 H 君是好朋友，都是系篮球队的队员。H 君，连云港人，比我小三岁，身高 1.78m，别看他个子高，心理年龄却很小，长得很英俊，但有些小坏坏，一副玩世不恭，没心没肺，吊儿郎当的样子。

1968 年深秋的一个晚上，X 君和 H 君，还有其他系的一帮学生在兴庆宫园游玩，遇上了在公园巡游执勤的警察，当时天色已晚，巡警用手电筒直射，照学生们的眼睛。那时西安市的公检法刚刚恢复职权不久，文革初期，与交大学生原本就有对立情绪，双方就发生了争执，越争执，就越激动，双方相互推攘，最后打了起来。X 君在学校打架从未吃亏，兴头上来了，冲进人群，挥动像鲁智深那样"蒜钵般的拳头"狠揍那领头的警察，H 君害怕出事，急忙上前去拉架，他那里拉得住，越是拉，X 君兴头越是高，那二球劲上来了，三拳就把那警察打倒在地，打了一个脑震荡，肋骨也被打断了两根。看看增援的警察快要赶来时，他们全跑回了学校。警察逮了几个看热闹的小男生和小女生，追问袭警者姓名，有人说，其他打架的人都不认识，能认识的只有机切专业的 X 君，还有铸造专业的 H 君。

第二天早饭过后，病师傅就心急火燎地来到男生宿舍，见了H君劈头就问："昨晚，你在兴庆宫园打警察了吧？你怎么就这么糊涂！这不，校工宣队总部通知你去行政楼办学习班呢。还要求你们班派一个代表陪你一起去。"

"这完全是胡扯！我昨晚是去公园了，但是我没有打人，我是在拉架呀！"H君气得脸都发了青。

"打没有打人，你去学习班就会搞清楚的，你说了不算，俺说了也不算。现在是班上要派一个得力的代表帮你去说清楚，大家说谁去？"病师傅一改他的病态，果断地说。

"还是李镜吾去，他比别人老练一些。"宋希俊坚定地提议。全班同学也都跟着附和。

H君瞟了我一眼，是不太信任的那种眼神。我知道，H君虽说平时和我没有什么过节，但彼此不太投缘，他对我学雷锋一直有看法，说我有些虚伪。我也不太在意，我的脾气好，平日不太计较同学们的议论，今天大家都推举我去，说明大家信任我，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我和H君来到行政楼二楼小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正中坐着工宣队副队长，他的左边坐着市公安局一位领导，他的右边坐着校革委会副主任陈柏荣老师；靠窗户一边已经坐着X君和他们班的代表——一位不起眼的女生（所谓不起眼，就是既不漂亮，也不丑）。我向陈柏荣老师点了一下头，他对我笑了一下，示意我们坐下。我和陈老师有些熟悉，我参加起草致敬电时，就是他在负责的。

首先是工宣队副队长严肃地说："今天办这个学习班，就是查证落实昨晚在兴庆宫园袭警的学生，你们中有两个人是嫌疑人，下面证实一下。"说完，只见两位警察搀扶着昨晚被打伤的警察进了门，他先指了指X君，然后犹豫了一下，又指了指H君。

“好了，请送他回医院治疗！”公安局的领导向警察们摆了摆手，然后接着说：

“你们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要清查出学生中的坏分子。我有事，先走了，后天我来带人。”说完，他就离开了。

接下来，是陈老师念了几条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又读了《毛选》中的“反对自由主义”。H 君高喊冤枉，“我没有打人，我没有打人！！！”

然而不容 X 君和 H 君分辩，工宣队副队长就让他俩先回去写检查，还说：“要深刻！”

最后，工宣队副队长对我和那女生说：“你们俩是班级代表，回去要监督他们两个写出深刻检查材料，要组织班级学生看好他们，防止逃跑。胡炜军长批示了，这次交大学生袭警，决不姑息，该抓的要抓。现在散会！”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围上来，关心地问情况，特别是 H 君的球友，朱志良、苏福堂、石季芜等都要求我全力救 H 君，就连我班的女生们都给我施加压力：“无论如何，要救人！”H 君的女人缘好。

轮不到被告说话，轮不到我们班级代表辩解，走一过场，后天就要逮捕人了。可是我怎么才能解救他呢？那时是文革动乱时期，没有法律可言，领导的一句话就是法律，文革期间被冤死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不救吧，一是我对不起 H 君，二是对不起班上同学们对我的信任；救吧，我一介书生，没有权力；我当时又不在现场，又不能为他作证。我的内心十分纠结，十分焦急。我努力搜索枯肠，心想一定要找出一条救他的办法。

我读过一些审案的小说，从古到今，我国审案都是“有罪推定”，就是说有人指认你有罪了，那你一定要找出人证物证，证明你不在犯罪现场，或者证明你没有犯罪，否则，你就是有罪。

我意识到，我现在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位辩护律师。

关于在不在事发现场的问题，已经定论了，俩当事人都已承认在现场。接下来，只有证明你没有打人。有两条路径：

第一是找人证，有人证明你没有打人。但是，袭警那晚，天色昏黑，连H君也记不起围殴中有他认识的人，那些人唯恐避之不及，哪有人会站出来为他作证呢？再说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当晚那些人呢？所剩时间只有一天了，时间上也不允许。这条路肯定走不通。

第二是找物证。找什么物证能够证明H君没有打人呢？看起来也不好找。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如果能够从医学角度证明H君根本就不可能打人，不就成了吗？

我立即找到H君，他正独自一人坐在床上抹眼泪呢。

“你现在得意了，我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啦！”H君说着气话。我哪有功夫和他计较，我急切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么没油盐的话！我问你，听说你今年春天打篮球时，有过手腕骨折，有这事吗？”

“有，是右手腕月骨骨折，不过，早就愈合了，不影响打篮球。”

“你小点声！那时你拍的片子和医院诊断证明还在吗？”

“还在。”说着，他从箱子里找出了X光片和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诊断证明。我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你有救了。”

翌日上午，只有我和X君的班代表参加了行政楼的学习班。工宣队副队长要我们读X君和H君的检查，然后再代表班级表个态。首先是X君班那位女生代表读了一遍X君的检讨书，反正都是些诸如打人不对，下不为例，以后加强学习一类不痛不痒的话。最后，那位女代表说：“X君经常打架，你们什么时候抓他，我们班都没有意见。”

完了！X君抓定了，他们班怎么派来这么一个傻傻的女生，抑或是X君把他们班的同学全得罪完了？

轮到我发言了。我理直气壮地说："H 君没有写检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警察，他是去阻止 X 君打警察的。那晚夜色昏黑，现场又混乱，被打伤的警察记错人了，也就是说误会了。第一，H 君家庭出身红五类；第二，他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第三，他从来不打架，我们班全体同学都可以证明；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根本不具备打人的条件，就是他的右手腕月骨骨折过，虽然接上了，但是一直没有完全痊愈，经常疼痛。我请各位领导试想一下，一位手腕骨折的病人，怎么可能将一位训练有素，人高马大，身强力壮的人民警察打得脑震荡，外加打断两条肋骨呢？我这里有权威的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拍的 X 光片，以及诊断证明，请各位领导过目。"我振振有词地，不慌不忙地陈述着，全场鸦雀无声，他们都被我说服了。接着我把片子和诊断证明递给在场的领导们传阅。

这天上午的会议，类似于法庭的辩论会，以我完胜而结束。

第二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吃罢早饭，我带着 H 君到行政楼。路上，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他问我："今天我真的没事吗？"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准保没事。"我满怀信心地回答。

到了行政楼二楼会议室，我们还是坐着原先的位子上。等了一会儿，人都到齐了。这时楼下响起了警车的呜呜声，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接下来，三位全副武装的警察走进了会议室，为首的警官劈头一句话就是："谁是 X 君？"

"是我。"X 君站起来回答。

"这是你的逮捕证，你被逮捕了！带走！"警官喝道。接着一位警察上前给 X 君戴上了亮铮铮的手铐，两位警察抓住 X 君的两条胳膊，把他押出了会议室，我们站在窗户旁，看着把他押进了警车，然后，警车呜呜地鸣叫着绝尘而去。

“现在散会！”工宣队副队长宣布。

陈柏荣老师走过来，跟我握了握手，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微微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好同学，真有两下子，你的辩护陈词的确很精彩！”

从此，我和H君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从此，我们班对我刮目相看了，但凡遇到麻烦事情，都会第一个想到我。有一位外号叫“大脚”的男生，在毕业前想和他的女友结婚，希望以此能够在毕业分配时留西安，而他的女友要求他一定要买好手表，以及结婚类物品才和他结婚。于是大家又推举我去做工作。我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的女友破涕为笑，答应了他的求婚……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

半年后，X君在监狱里罹患了肝炎，才被释放了出来，“坦克”变成了“破吉普车”。我遇到他，据他说，一进监狱，就关在审讯室内，四面站着四个金刚般的警察，让他站在中间，二话不说，将他一拳打过来，再一拳打过去，一直打到晕倒在地。然后是每天只吃两个黑窝窝头，一碗菜汤，就这样，度过了半年监狱生活。最后他总结说：“我终于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了，再也不敢打架了！”出狱时，警察还警告他，监狱里的事不能往外说，否则，还要抓他。

## 八、我结束了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情

【编者按】：本章所述人物与情节，除作者本人系交大学子外，其他均与交大无关，故内容从略，仅保留章节题目。

## 九、扎扎实实的大五

1969年的春天来到了，推迟了半年毕业分配的68届毕业生已陆续离校。学校只剩下我们69、70两届学生了。一直没有招收新生。一千多万红极一时的红卫兵小将——老三届高中生，“响应”中央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奔赴东北，奔赴延安，哪里最艰苦，就往哪里奔，这一去就是八年。他们一走，城市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们是幸运者，是文革前招收的最后一届大学生，这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鬼混，鬼混一年，等到明年毕业分配。那时，都可以轻轻松松地领到一份大学毕业证书。只要分配了，就算是国家干部了，就可以领到每月50元左右的工资了，这工资在当时是较高的。第二种是学习，就是想办法，找窍门，学习专业知识，等到毕业分配了，走上工作岗位，能够胜任工作，能干一番事业，对得起每月50元的工资。我们班当然是属于后者了。

是年夏天，我们进入大学五年级了。我已经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决心好好地度过大五最后的大学时光

机遇不是等待来的，而是找寻来的。我们首先创办了一个热加工专业，就是把铸造，焊接，锻压，金相四个专业合为一个专业，后接中央通知停止

变动专业设置而流产。嗣后，我们班同学还是不甘心，还是觉得边学理论知识，边实习这种学习方式好。我们找到铸造教研室谭宠予老师，向他打听校办工厂铸造车间能否接纳我们实习。他去一打听，告诉我们，可以接纳我们，条件是每天要跟班干活，因为铸造车间生产任务很重，我们上课只能在晚上，或者周日。待遇是，每天补助 3 角钱，发新工作服，发反毛皮鞋（像军用皮鞋），发肥皂手套等劳保用品。

我们全班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于是欢天喜地地到铸造车间上班了。第一天上班，我们就领到了崭新的细帆布做的铁灰色工作服，还领到了一双我们从未穿过的反毛牛皮鞋——再不用打赤脚了，此外还有劳保用品。我们高兴极了。领到的工作服上衣是学生装领子，不太好看。我们班李君的母亲是日本人——日本战俘，后嫁给了中国铁匠，而且留在中国一直在做裁缝，所以心思细密的李君也会做些裤头一类简单的内衣，还会织毛衣呢。是他第一个想到了将工作服的衣领改一下，于是送到交大一村缝纫店，花了一元钱，将衣领改成了小西装领，非常漂亮。于是，我们都跟着改了衣领。我们班 20 多人穿着崭新的小翻领工作服和反毛牛皮鞋，每天在校园里精神抖数地上下班，成了交大校园一道风景。铸造专业也有铸造专业的威风呢！

我们还到铸造教研室要求谭老师参加我们班的教改，给我们班在业余时间上课。铸造教研室同意了，因为这时校革委会接到了省革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交大校办机械加工厂要参加全省深井泵会战，承担研制第一批深井泵的任务，并制造 2300 台深井泵。

深井泵，顾名思义，就是用于深井，从打好的深井里把水抽出了，最高扬程达到 30 米左右，主要用于缺水的黄土高原。深井泵的关键部件是铸造件，校办厂铸造车间首当其冲，成了攻关的主力车间。谭老师被正式派到铸造车间和我们班一起参加深井泵的会战。早已厌倦在教研室搞“斗批改”的

谭老师自然很高兴。

铸造车间有 30 多个职工，分炉前班，泥芯班，造型板，清沙班四个班组。车间主任姓吴，上海人，40 多岁，五级工，人称吴老总，虎头虎脑，很热情，干劲十足。

攻关的第一战是改造冲天炉。因为深井泵的铸件壁很薄，要求铁水温度很高，不然就浇铸不出来。我，李君，苏福堂被派到了炉前班。

炉前班班长姓史，六级工，人很聪明，性格温和，喜欢钻研业务，乐于技术革新。他教给了我们很多化铁炉和铸铁熔炼的知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立即改造冲天炉。谭老师，史师傅和我们三个学生成立了攻关小组。谭老师是位知识很渊博的讲师，1956 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善良而谦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的夫人也是讲师，在复课中教过我们《金属工艺学》。

谭老师找来了很多先进冲天炉的资料，我们选中了上海机床厂铸造车间发明的多排小风口冲天炉，据说这种炉子还出口到阿尔巴尼亚。大家都知道我画图来得快，让我参照资料上的示意图，画出我们现有冲天炉的改造图。仅用一天的功夫，我就画出来了。而且我和苏福堂、李君商量，在炉子的加料口以上加装一个锅炉似的外胆，焊接上进水口，出水口，以及安全排气口，就是一烧热水的锅炉。在冲天炉开炉时，利用冲天炉最上层的余热，将外胆里的凉水烧热，再把热水接下来，进入炉子边的工具间，然后在墙上装了几个淋浴头，就把工具间改造成淋浴房了。

冲天炉的改造很顺利，加装的洗澡锅炉也很顺利，下料，卷板，焊接，都是我们三个学生干的，因为我们在金属结构厂学过焊接技术，这时派上了用场。

每次开过炉后，下班了，我们班的男生都可以美美的洗个热水澡。后来，女生们不干了，吵着也要洗澡，没办法，只好让女生洗过后，男生再

洗，任何时候，女士优先嘛！看到全班同学都高高兴兴的，我们三人也很有成就感。

吴老总和谭老师看我画图快，脑子灵，又把我从炉前班调到了泥芯班，承担更重要的攻关任务，试制深井泵的核心部件——泵体导流壳的泥芯。那泥芯的形状十分复杂，是一薄壁圆锥体，上面还有很多螺旋状沟槽，用一般的泥芯沙来制作连连失败。于是车间成立了谭老师，我，还有泥芯班班长費师傅组成的攻关小组。

費师傅，七级工，上海人，50多岁，高高的个子，温和的性格。他领导的泥芯班，除了他是男的，其余都是女性大妈，而且清一色是上海人。因为交大是从上海搬迁来的，教职员工大多是上海人。

谭老师对铸造专业样样精通，不愧为优秀讲师。他提出了制作导流壳泥芯的很多方案，如用桐油做粘合剂的桐油泥芯；用各种树脂作粘合剂的树脂泥芯；用水玻璃做粘合剂的水玻璃泥芯。我们攻关小组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多种泥芯的试制。首先，桐油泥芯试制成功，但是，这种泥芯做好了以后，要随金属模一起放入烘箱中烘烤六个小时左右，制作周期长，产量低，被否定。然后又试制树脂泥芯，什么环氧树脂，什么酚醛树脂，什么糠醛树脂……谭老师带着我在铸造教研室的实验室里一样一样地试制。我的化学是强项，只要谭老师一说，我就明白，而且能够写出它们的化学分子式。这些树脂中，还要添加不少的助剂，如增塑剂——三磷酸酰酐二丁酯，如固化剂——乙二胺……等等。这些树脂泥芯制作好了以后也要进行短时间烘烤，我们就在实验室烘箱中烘烤。每天晚上谭老师还要给我们上课，他又有家小，晚上加班加点做泥芯试验，他实在坚持不了，经教研室同意，他给我配了一把实验室钥匙。我每天晚上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实验室做试验了。我不时还带着和我玩得好的同学来实验室一起做试验，我张扬的性格得以彰显，就像老师

一样给他们讲解这些高分子化学品，心里觉得很爽哦！

谭老师和我最后试制成功酚醛树脂泥芯，但是因为树脂泥芯成本太高，又需要用毒性较大的固化剂乙二胺，最后还是被否定。我们接着试制水玻璃泥芯，在石英砂中加入粘合剂水玻璃——化学名叫硅酸钠，使用二氧化碳一吹即可固化，制作成很结实的泥芯了，既简便，又无毒，成本也低。但是，铸件清沙时，很困难，泥芯变得非常结实，像石头一样，很难清理。我们又继续改善这种清沙难的问题，试着在沙中加入一些石墨粉，加多了不行，加少了不起作用。我每天晚上在实验室做配比试验，直到取得满意的效果。

我们终于使用水玻璃沙加入适量石墨粉的方法解决了导流壳泥芯制作的难题，前后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种方法很快在参加会战的其他工厂推广。接着，在谭老师的指导下，我设计了混砂机，并制造出了两台，解决了混沙均匀的问题。在设计中，谭老师告诉我搞一般性设计的窍门，就是在设计一般机械零件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力学计算，一是直接查《机械设计手册》，二是用经验公式计算就行了。他还借给了我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接下来，我自己又设计制作了泥芯工作台，铸铁的圆形台面下面用一立柱和铸铁底座相连，台面和立柱间装有止推轴承，可以轻松地转动；还设计了工人坐着干活的可以转动的工作凳，就像现在白领们坐的转椅一样。把那些大妈级的女工高兴坏了，她们原先都是蹲在地上弯腰干活，现在变成坐着，挺着腰板干活了。她们都亲切地喊我“小李子”！

吴老总很是高兴，干脆不让我干活了，让我专搞技术革新，就是给车间设计专用工作机器。我提出条件，要他给我配一个助手。他说生产任务忙，男生不行，只能配一个女生。于是我挑了军训时经常给我猪蹄子吃的小才女W君，W君正想跟着我学设计，自然很高兴。W君，福建人，荞麦色的脸蛋上缀着闪烁着聪睿的两只小眼睛，是我们班高考成绩总分第二名，她的物

理考分是 120 分（满分），自幼父亲随伯伯下南洋，客死印尼，靠她伯伯接济，读完高中。她的心眼很好，自己很困难，还悄悄帮助别人。缺点是，自恃清高，心高气傲。

吴老总给我们找了一间空宿舍，配备了绘图版，绘图仪等，给我们做办公室。我们俩开始了设计工作。我先在坐标纸上画机器构想图，再到示意图，再到总装图，最后是零件图；然后让 W 君画成加工制造用正式图纸，我们一起商量着在上面标注加工工艺和精度等。晚上也在一起加班。累了，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拉二胡给她听，她喜欢听“二泉映月”曲子。而她，既不会乐器，也不会唱歌，她叹了一口气说：“怎么好呢？我什么都不会。”

“听说你是英语快班的，我一直学的是俄语，你就读英语给我听好了。”我随口说的一句话，她就当真了，真的回宿舍拿来了英语书，读给我听，我又不懂英语，只觉得很好听，就不住的夸她，她也就释然了。时间长了，我们彼此都有些好感，于是我就问她毕业后愿意和我一起到边关工作不？她沉默了几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不愿意！”因为这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是南方一所大学的学生，他们是高中同学。她想回到南方城市工作，最好是回老家福建工作，也好照顾她母亲。我只好一笑了之。我知道，我行动晚了，我们班的不错女生都名花有主了。

“做男女朋友很沉重哦！要背负毕业分配的包袱。做普通朋友反而轻松得多，不会影响毕业分配。我们就做永远的普通朋友吧！”我反过来安慰她。

诚然，那时只要是在本校谈朋友的，毕业分配时俩人都是一起分配到最边远的，最艰苦的地方。有的男生还能承受，一般女生就有些害怕了。所以有些女生干脆在学校不谈朋友，等毕业分配以后再说，因为单身女生不会分得太差。我毕业分配后谈的女友，也是后来成为我终生伴侣的妻子就是这种

心态，在校时拒绝任何男生的追求，单身与我碰巧分配到陕西安康，最后和我结为秦晋之好。她是交大电机系绝缘专业 42 班的，还高我一个年级呢，他们推迟了一年分配，让我捡了一个大便宜，找了一个高年级漂亮媳妇。

话再说回来，我和 W 君一起设计了筛沙机，就是用偏心轮转动，带动连杆动作，然后带动筛子作往复运动，很简单，但十分好用，可以节省抬着筛子筛沙的两个工人，只需一个工人拿铁锹将沙子往筛沙机里填就可以了。我们还设计了松砂机，样子有些像是耙田的犁耙，只不过做成了滚筒状，上面焊接了许多齿，电机带动滚筒转，工人推着松砂机向前走，就把清理过铸件，踩实了的沙田里的沙子松开了，就可以再在上面造型了。

我们班其他的同学在铸造车间都有成就和收获，如李君和苏福堂，他在的炉前班就搞出了稀土球墨铸铁，代替铸钢；朱志良和宋希俊所在的造型班，就解决了大型机床——630 车床床身及箱体的铸造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 1970 年的春天。一个星期日里，心血来潮，韩桂思、杨舟和我还借了两辆自行车去临潼玩了一次，在华清池洗了温泉。在来回的路上，自行车出现了几次状况，不是放炮，就是车后座断裂，弄得我们很狼狈。在返程中，在半途因车后座断裂，杨舟只好坐长途汽车先回去了。为此行，我写了一首诗纪游：

古城三月春意浓，飞车载歌游临潼。
灞桥放炮惊路客，高陵撞车直两瞳。
雪压骊山披白絮，沐浴华清乐融融。
风雨归途车座断，心急火燎饥肠空。
两骑驰入大差市，八盏馄饨果腹中。

在铸造车间实习中，铸造教研室主任周庆德副教授，李金禾讲师等老师都给我们班上了课。周庆德副教授是公认的铸造教研室权威，他的课讲得很

有水平；李金禾老师是有色金属熔炼的专家，让我们初步掌握了铸铜、铸铝的知识。总之，大五这一年，对于我们班来说是扎扎实实地实习加上课的一年。为我们班毕业以后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若干年后，朱志良出任国家特大型企业银川炼油厂厂长，后改任宁夏自治区经委副主任；石季芫出任国家大型企业株洲煤矿机械厂厂长；杨舟出任国家建工部五局总工程师；李君出任密山柴油机厂厂长；韩桂愚出任连云港铸造厂厂长；苏福堂出任宿州市酒厂厂长；汪泽怀出任四川江油汽车大修厂厂长……

## 十、毕业分配有些像宣判

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央通知，全国的高等院校在校的 69 届和 70 届毕业生同时分配，做好毕业生政治思想总结和鉴定工作。学校里只剩下我们两届共 3169 名学生了。校革委会给每个班级配备了一名教师，领导各班学生进入毕业分配程序。首先是自己写文革中的表现和思想总结，然后由班文革小组长负责召集，大家发言，给每一个同学文革中政治表现作出评价，写出鉴定，装入档案，就像老师给学生写评语一样。就这样，总结和鉴定代替了毕业论文，一直存在我们各自的、那份伴随我们一生的、该死的档案中。其重要程度就不可小嘘了。

期盼已久的毕业分配终于来到了，我们班结束了在校办厂铸造车间的实习，回到相对集中的宿舍，认真进行总结和鉴定。来到我们班主持毕业分配的是电机系的一位讲师，姓陈，中共党员，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的确良短袖衬衣，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个嘴很紧，党性很强，一本正经的人。个人总结是各人自己完成；班级鉴定则是全班在一起开会式的一个一个地发言，对每一个同学进行评价。这就需要有一个人做记录，然后汇

总成文字，全班通过后，填入表格中，再装入档案。这做记录，汇总成文，填入表格的工作，大家一致推举我来做了，谁叫我是班上的“臭权威”呢？

总结和鉴定工作很顺利，我都是捡好听的话写入同学们的鉴定中，朱志良也是个与人为善的人，很支持我的写法。我们班的鉴定工作很顺利地完成了。陈老师对我的行文和书写很满意。有的班级为鉴定的文字吵得不可开交，弄得主持分配的老师也一筹莫展。

最后进入制定分配方案的核心时期，分配方案只由主持分配的老师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地需要的分配名额来制定。凡是参加分配的学生，一个人也不许参与，很神秘！在当时看来，毕业分配关乎每一个学生一生的前途，一生的命运，是人生重大的转折，因此每一个同学都很紧张。

那时的学生对于分配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择手段，奋不顾身！”

一是突击恋爱；二是突击结婚；三是给主持老师送礼；四是装病求照顾；五是哭哭啼啼……

突击恋爱很普遍，想分去哪里，就在那里随便找一个男或女朋友，我们叫临时朋友。突击结婚就很悲催了。有些班花级，系花级的漂亮女生为了留西安，不惜以身相许，嫁给武大郎似的在西安市工作的男士。眼看着那朵朵鲜花插到堆堆牛粪上，交大的男生们痛心疾首，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至于其他招数基本上不好使，给老师送礼，刚刚经过文革洗礼的老师哪敢收礼，把礼品扔到了门外；装病，哭泣都不管用，主持分配的老师都有经验，来个不理不睬。

进入到个别谈话程序，主持分配的老师逐一找学生谈话，弄得同学们不思茶饭，十分紧张。大家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男女朋友，这是期望分配到自己心仪地方的一个理由。

H 君的女友是他青梅竹马的邻家碧玉，姓萧，毕业于卫校，他进大学时，她已在南通市一家医院当护士，他们相恋了五年，女友苦苦等了他五年，每月都给他寄零花钱，终于盼来了毕业团聚的日子，只等毕业分配，一锤定音，就花好月圆了。H 君一直对大家保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没心没肺的大男孩有相恋五年的女友。H 君这时倒是很紧张了，我们是铁哥们，我出了一个主意，叫做“造舆论”，就是告诉大家，他有一个厮守五年的女友，在南通工作，如有南方的名额，谁也不要和他争。

于是，我向他要了一张女友的照片——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就在宿舍外面摆出画架，给小萧姑娘画油画肖像。前文说过，我在飞鸣镝书画社画毛主席油画像还是有相当水平的，但画一般人物的油画肖像，还是第一次，画着画着，我不禁对小萧肃然起敬。同样是五年之约，小萧就能够坚守；而我那初恋女友小王，就在快要接近终点时爽约了，良可叹也！画画是要有灵感的，就是画人物肖像，也是创作哦！我专心画了几天，我尽力把小萧的心灵美表现出来，特别是那双波光粼粼的眼睛画得很传神，我终于完成了画作。我画得不仅像她，而且比起照片上的她更美。就照着一张二寸的黑白照片，我在五合板上把她画成半米见方的油画肖像，倾注了我的心血和对小萧的钦佩。H 君很满意，同学们都围着看，都说画得很美。

通过给小萧画肖像，我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馊主意，这个馊主意的实施，让我愧疚了一辈子，展现了在我的人性中，在我的潜意识中，也有十足小人的一面，渺小得像鲁迅先生所描写的“能榨出皮袍子下面的小来”的一面。

这个馊主意就是，我通过武汉的同学，打听到了我中学的同学，也是邻村的一位女孩 L 君的工作地址。我知道她在中学时一直暗恋我，她虽然长得清秀，但是智商不算高，留过两次级。我是只爱智慧型女生的，我对她虽有好感，但没有动心的感觉。听已经分配到大西北边远地区的高年级同学说，

那些边远地区，一是缺水，二是缺女人，但凡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就是长得再丑陋，也是母鸡变凤凰，成为男士们争着追的对象。我的确害怕过那不人不鬼的生活。同学们都在忙着找临时女友，我也想找一个，找L君，总比找丑婆娘好。

于是，我不揣冒昧，试着给已在湖北一家医院工作——也是当护士的L君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希望回到家乡湖北工作，我知道你曾经喜欢过我，所以冒昧地问你一下，你现在有朋友了没有？结婚了没有？如果没有，能否考虑我。若蒙不弃，请立即给我寄一张照片来。如果我分配到了边远地区，我们就此分手，我绝不拖累你，如果我分回了湖北，我会和你逐步建立感情，直至结婚。”我还向她说明了我在大学有过四年的失败的恋爱。没有想到，这痴情的L君很快给我回了信，并寄来了一张照片，女大十八变，她的确比五年前更漂亮了。回信中不仅同意和我谈朋友，还说不论我分配到哪里，她愿意跟着我到天涯海角。我很感动，我知道，她是真心的，她是不愿意做我的临时女友，希望做能够白头到老的伴侣。我是曾经沧海的人，再不相信海誓山盟，我记住了那小王和我诀别时说的话：“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近一些的。”我回信仍然坚持我的想法。

收到L君的照片后，我又依法炮制，在宿舍外摆上画架，给L君画油画肖像。但是无论我怎么画，也画不到小萧的那张油画肖像那么美。可能是一边画，一边有些“做贼心虚”之感吧。是的，我分明不爱她，还把她捧在手心里画，没有灵感，哪能画得好呢？

时间已到7月下旬，快要宣布分配方案了。一天，铸造车间的吴老总神秘兮兮地来找我。问我愿意留在交大铸造教研室工作不？他说已经打听好了，我们铸造专业有一名留校名额，只要我愿意，他就去找人说说，以深井泵会战为名，把我留下来。我想也没有想，就一口回绝了他，说：“谢谢你

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留校工作，我想换一个新环境。”其实我真实的理由是，这时的交大既不是我刚刚进校时的天堂；也不是文革初期群众斗群众，学生整教授的地狱；而是我四年长相思的伤心地。我不愿触景生情，我要彻底忘记过去。

陈老师终于找我谈话了。问我想去的地方，问我女友的情况。我坦诚地回答说：

“我的女友是临时交的女友。我第一是想回家乡湖北，如果回不去，我就和女友分手。”

“回湖北，有困难，全铸造专业，湖北武汉只有一个名额，是六机部的单位，造潜艇的工厂。我看了你的档案，政审通不过。还想去什么地方？愿意留校吗？”陈老师也坦诚地回答，坦诚地问。

“我第一不愿留校，因为有我个人的原因；第二，我爱干净，喜欢洗澡，就是冬天也洗冷水浴的，只想去一个有水的地方。”我回答得很简洁。我猜到了，可能是吴老总找他了。

“好的，我尊重你的选择。有水的地方嘛！陕西南部安康地区如何？那里有一条很美的汉江，我去过，很不错。而且从地图上看，那里离你们湖北很近哦！”

这陈老师一反常态，和我说了很多不该过早说的话。我肯定，是吴老总找他了，要不就是对我在前一阶段写鉴定工作中表现不错，对我有特殊的好感。

“好的，谢谢您！我就去安康。”我高兴地回答。

“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你不要告诉任何人！”陈老师表情严肃地说。

我的心里有底了，但是谁也没有说，只是心里感谢吴老总和陈老师。

第二天，全班到小教室开会，等待陈老师宣布分配结果。小教室里静得

吓人，除了我，每个人的心都在怦怦地跳，等待手拿一张打印纸的陈老师宣布分配结果。一个多月来的紧张，不安，焦虑，纠结，期盼，立刻要见分晓了，有的女生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喘起气来，大家就像等待法院宣判一样。那陈老师这几年一直在搞毕业分配，他见多了，可能他现在心里在暗笑，你们这些“六六”造反的“革命小将”啊，当年是何等张狂，哪把校长，老师放在眼里！现在可好，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了，一个一个都老实了，你们当年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勇气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当年挥斥方遒的意气都到哪里去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把学生们的前途，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你们越是着急，我越是不急！”

“不能再等下去了，快宣布吧！我们当年是受人利用，受了蒙蔽啊，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啊，陈老师！我们同为臭老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我们的心里在呼喊着。

终于陈老师开口了，他一字一顿地念着：“我谨代表国家计委宣布：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铸造五二班毕业生毕业分配方案如下：

朱志良，宋希俊分配至银川市计委报到；

李镜吾，分配至陕西省安康军分区司令部报到；

石季芜，贵淑贤分配至陕西省宝鸡电力局报到；

张如山，分配至陕西省榆林地区报到；

H 君，分配至青海省西宁市机械局报到；

朱秀萍，周智龙分配至新疆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报到；

……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他同学的分配结果：

汪泽怀等三名四川籍同学分配回四川各地工作；苏福堂、W 君等五名同学留西安的单位工作；杨舟分配至西安附近的兴平工作；张朝田分配至甘肃工作；……

从以上分配结果可以看出，本届分配方案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不照顾结婚和男女朋友关系，反而只照顾单身学生。留西安的五名同学，除了W 君有男朋友外，其余四位男生都是单身。这大概是考虑到单身男生到了边远地区不好找对象的缘故。W 君分配至西安市省运输第二大队；苏福堂分配至西安国防工厂 52 厂（离交大很近）。

分配结果宣布完毕，陈老师给每位同学颁发了各自的“国家干部工作派遣证书”，然后离去。我追到外面好奇地问陈老师，我怎么是到军分区司令部报道。陈老师告诉我，是先到军分区农场劳动锻炼一年，然后再分配到具体单位。

回到宿舍，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还淡定，说明大部分同学对分配方案还是基本满意的。但是整个宿舍楼就不平静了，只听见摇头叹气的，黯然流泪的，高声叫屈的，痛哭失声的……

我班分回榆林的张君高声叫屈：“我好不容易考进交大，离开陕北榆林，现在又把我分回去了，我这个大学不是白上了吗？”

我班分到新疆的周君，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哎！我好不容易在西安找了一个女工，又好不容易在学校里举行了婚礼，这婚结了也不照顾，这是什么规矩？哎！”

铸造五一班党员学生杨君被分配到甘肃沙漠地区制造原子弹外壳工厂，据说一辈子都不能回家，探亲时，只能父母到兰州指定饭店和他见面。于是他在宿舍里大声哭泣，男人的哭声比女人的哭声要凄惨得多。

我班分到青海的 H 君黯然流泪，对我说：“这次分配方案不公平，不合理！凭什么把我分到青海？我到青海也没啥，但是等了我五年的小萧怎么办？他在南方生活习惯了，到青海能够适应吗？我对不起她！”说完又哭。

晚上，我一夜无眠，我一想起 H 君的小萧，心里就难过。我和她素未谋

面，但是觉得她似曾相识，我总拿她和我初恋女友比，小萧是那么纯洁，那么坚贞，那么温婉，那么善良，那么刚强！我钦佩她，我愿意为了她做出牺牲。对，“成人之美”，我终于鼓起勇气，做出了在交大毕业分配史上从未有的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就是我决定和H君交换，我去“充军”青海，让H君去安康，然后我和临时女友L君分手，以后的事，我就听天由命了。

一大早，我就在盥洗室里大声朗诵唐诗：“青海黄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给自己鼓气。吃过早饭，我怀着悲壮的心情，一把拉着H君，说：“走！我们找陈老师去，我和你对换，我自愿去青海，你去安康好了。”

“那你的女朋友怎么办？”H君惶惑地望着我。

“和她吹！反正我们是临时女友，我向往青海黄云暗雪山的生活。”我坚定地说。

“那你不也向往孤城遥望玉门关的生活吗？我分配到甘肃，离玉门关不远。我们对换吧？”说这话的是在西安有女友的张君，他听到我们的谈话了，于是说。

“对不起，我不向往玉门关，因为不闻春风不度玉门关吗？”我苦笑着对张君摇了摇头。

我拉着H君找到了陈老师家中，向他说明了我们两人自愿对换的要求。这时我看到陈老师戴在头上的有很多圈圈的眼镜片上布满了问号“？”，他简直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分配方案一经宣布，就不能更改了。你们回去吧！按国家计委颁发给你们的“国家干部派遣书”执行。如果不服从分配，就取消大学生资格，取消国家干部资格，将你们的户口退回原籍。”陈老师黑着脸说。

我只好拉着H君从陈老师家中出来。H君恨得牙痒痒的，想揍陈老师。

我拉住了他，说："你不想要大学生资格了，不想要国家干部资格了？就这么着吧，再说西宁毕竟是青海省会，再差也比新疆，甘肃沙漠、戈壁滩好。"后来，H 君只好去西宁报到，并和小萧结婚，小萧这柔里带刚的女性不畏青海风沙苦寒，毅然调到青海西宁，和 H 君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结婚生女，一呆就是十多年，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调回江苏连云港。

我最佩服的是我班女生朱秀萍，她表现得十分坚强，镇定。她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和她的男友——金相专业的秦君一起去了新疆，在建设兵团吃尽了苦头，用她的的话来说是"那些兵团领导不把我们当人看，只当作牲口使唤。"直到 80 年代初才从新疆调回西安。秦君奋发图强，后出任西安铁路局局长，可谓苦尽甘来了。

再回到毕业分配时期。分配方案，各系各专业，各班级几乎同时宣布，宣布后没有一个更改的。60 年代交大最后两届学生同时离校，交大校园即将成为空城了。离校前，我们班同学卖掉旧书废纸，卖掉旧的反毛皮鞋，把钱集中到朱志良手中，到大差市饭馆作最后的聚餐。在聚餐会上，大家尽情地哭啊，笑啊，吵啊，闹啊……一扫五年心中抑郁，阴霾之气。

我们班还在交大图书馆前照了全班毕业合影，这张合影我至今还珍藏着。

7 月 29 日，是我五年前离开家乡，满怀豪情，奔赴西安上大学只差一个月的日子；五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满怀豪情，踏上了奔赴工作岗位的旅程。一大早，苏福堂，H 君送我到长途汽车站，我记得，H 君是一边走，一边抹眼泪的，到了车站，我们三人洒泪而别。长途客车离开了西安市区，向着终南山开去。进了丰裕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开向秦岭高处，深处。我的内心忽然一阵酸楚，写下了一首诗：

秦岭跃飞龙，云浪拍海空。

怅望雁侣远，泪雨洒尘濛。

生离犹死别，谁与诉肠衷。

千里横天路，黙对十万松。

下午，客车到达了秦岭的最高处——平河梁，极目四望，只见群山在脚下起伏如沙丘，如奔河，如海浪；抬头望天，白云朵朵，如羊群，如团花，如白絮，仿佛伸手可得。银泉淙淙，如少女之窃窃私语，松风呼啸似欢迎我们的歌声。我的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在此地休息了一会儿，司机让我们上了车。

“上山看机器，下山看手艺！”司机自豪地说。下山时，汽车的发动机似乎没有工作，车速也很快。我又写了一首诗：

飞车无声下天墀，白云飘练舞仙姿。

千嶂斗胆阻远客，银泉委婉诉相思。

记忆长安日昨梦，遥指山城意踯躅。

莫负平生报国志，但愿天涯遇相知。

客车在宁陕镇过夜，整整两天车程，才到达山城安康。

说是安康离湖北近，实际上，交通非常不便。那时不通火车，全靠汽车运营。我思前想后，还是痛下决心，给临时女友 L 君去了信，说明我已分配到秦岭深处的安康，这里交通不便，离家乡太远，我不能照顾你，呵护你。前车之鉴，我不愿看到初恋女友的悲剧重演；我已经厌倦异地恋，两地分居的长相思式的生活。至于工作调动，难于上青天。趁着我们还没有建立多深的感情，我们分手吧！我非常对不起你，这是我一生做的最不光彩的事。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恨我！

L 君回信说：“选择分手，是为了对双方都负责任，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从来不会恨别人，更不会恨我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深爱的你，因为我是护

士，是带给人类关爱的天使。”

我收到回信，很内疚，很伤感，我们那个时代是悲剧不断上演的时代，我至今认为，当时痛下决心是完全正确的。我的大学时代就以这封回信作为终结了。我进入了安康六年的时代。



**作者简介**

李镜吾，男，1944年生，湖北大冶人。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先后在安康农机厂、湖北襄樊市科技情报所、襄樊市科委、科协工作。历任《襄樊科技》、《国外粘结》、《襄樊科技）等期刊主编，襄樊市科技馆副馆长、襄樊市科协组宣部部长等职。编著过《日语速成讲义》、《科技日语百日通》，著有《牛棚》、《野菊花》等多篇小说和散文，出版了《镜吾文集》，是襄樊市作家协会、书法协会、记者协会会员。襄樊市翻译协会理事会员。



# 人生的拐點

## ——交通大學生活回憶( 文革部分 )

■/ 李志杰

【编者按】：此文节选自《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文化网》。

我是个政治敏感性不强的人，只知道认真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岂不知，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1966 年初，全国开展讨论姚文元发表的“评海瑞罢官”，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所谓“三家村”，就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他们的散文集《燕山夜话》被打为大毒草，并对其开展了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当时最时髦的名词，许多运动都是“大批判”开路。各种报刊、电台上都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陕西日报收到的这类文章太多，编辑们处理不过来，就要找一些编外人员来帮助处理这些文章。陕西日报让交大找十多个文字功夫好，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帮助他们编稿、审稿，我被选中参加了陕西日报的编稿工作。陕西日报一位老编辑抱来一大堆稿件，把我们十多

个业余编辑叫到一起开会，讲解编辑稿件的方法和要求。这位老编辑给我们讲，编辑稿件的第一道步骤就是选稿，选择观点正确、文笔较好的稿件进行修改和加工。选择稿件要注意以下标准和顺序：第一是中央领导和省上领导的文稿；第二是报社特约的稿件；第三是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著名人士的稿件；第四是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稿件；第五是其他人的稿件。他讲完了注意事项和要求，就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大摞稿件，叫我们分头去处理。我按要求仔细的处理了分给我的稿件。但当时就想，按报社的那个标准和要求，我编辑的那些稿件恐怕一篇也上不了报。

随着形势的发展，陕西日报社内部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吸收我们这些业余编辑参与陕西日报的编报工作。

通过这次给陕西日报当编辑，我真正感到在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回想我在岐山县蔡家坡中学上高中时，我校的一位老师给陕西日报投了一篇诗歌，报社准备刊用前，将电话打到蔡家坡公社，公社又转到学校，了解这位老师的政治背景，最后这位老师的诗歌发表出来了，题目是《老贫农的话》，只有短短的十多行。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6 月 1 日，全校收听《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

6 月 2 日早上，我像平常一样在食堂喝了一碗稀饭，手里拿着馒头边吃边往学校行政楼走，校广播台正转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我觉得今天校园里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有点沉寂、压抑的感觉。走到行政楼，看见大楼外边贴了几张大字报，我没有到跟前去看，这时彭康校长从大楼里走出来，他回头远远望了望墙上的大字报，就继续往东边一村方向走去了。

过了不久，学校里就乱了，好多张大字报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也自动不去上课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全打乱了。

6 月 3 日凌晨，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了以严克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成员是正在西安西北局开会的西北五省财贸系统来的干部。工作组后来扩大为工作团。工作团团员分头到各个系领导文化大革命，有几个工作团团员参加了我们电器专业学生的会议，讲话中对学生的行动暗示出指责之意。

6 月 5 日晚，工程物理系 810（41）班学生李世英等人贴出“坚决赶走工作组”的大字报，校园内先后出现许多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 月 6 日，工程物理系 810（41）班学生贴出大字报，列举工作组“十大罪状”。电制 43 班同学丁传鹤在我们住的第 10 学生宿舍东北角的报亭旁放了一张桌子，拟了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内容是“我校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情况极为复杂，问题严重。我们急需党中央亲临领导。”征求大家签名，共有 1683 人签名。有些学生同工作组发生辩论，有一些学生组织赴京代表团，有的学生上街，到工厂农村串联。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六六事件”。

“六六事件”发生后，工作团宣布接管了交大全部权力，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幕后操纵者。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李世英遭受工作团批斗后，6 月 9 日留下遗书，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后经医院抢救脱险。工作团成员在我们班追查向北京发电报的问题，因为丁传鹤同学平时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很好，他父亲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程师，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我班大多数同学在丁传鹤发起的电报上签了名，电报内容没有反对工作组，大家认为向党中央发电报反映情况在什么时候都没错，所以对工作团召开的会议采取应付的态度，也没有对丁传鹤同

学施加压力。“六六事件”中 1683 人签名活动是事件中的大事件，但在我们班并没有产生大的后果，同学们理智而冷静的对待和处理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冤案和悲剧。

7 月 9 日，我在学校大操场西边的马路上由北向南走，突然碰见几个人抬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急急向校医务室跑，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跟在后边跑着看了一会。看到受伤者被抬进了医务室，我就转身离开了。后来听说是校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不堪受辱，被迫害跳楼身亡。我和王永婷不认识，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一次一些人把她堵在学生会办公室围攻，她态度很好的向他们解释什么事情。她圆脸蛋，剪发头，看起来是个很活泼开朗的人，不知为什么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挫折，竟以死相抗争了。8 月 3 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交大工作团停止工作，学校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李世英任主任，我班丁传鹤同学成了校文革委员会委员。从此开始，学校的一切活动就由文革总会领导了。

我出身富裕中农家庭，不是“红五类”，也划不进“黑五类”，我自知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也由于“与人为善”的本性，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夹杂着打、砸、抢的运动不感兴趣。我坚持认为，不管什么原因，打死人要偿命，被打死了自己倒霉，于是对这场运动采取“逍遥派”的态度；不积极参加运动也不敢公开反对，随大流，混日子。我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因为我不是红卫兵，也没有那个积极性。学校广播号召大家到学校行政楼 402 开会，我也跟着去看热闹；学校组织游行，到省委门口静坐，我也跟着去。大家静坐绝食，我不敢在公开场合吃东西，便偷偷地溜出去到东门外的一个小饭馆里吃面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不能糊里糊涂的饿坏身体。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社会上流传着一份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

第一张大字报》的传单，“造反”一词成了最时髦的名词，人们到处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对于各级政权组织和领导人，群众中出现了“保”和“造反”两种群体，当时被称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由于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所以即使是“保”本单位“当权派”的人，大多也不敢自称是“保皇派”，大家都声称自己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然而这两种群体的人，对待“当权”的态度和作法也就截然不同。两派“唇枪舌战”，往往火药味很浓，大字报相互攻击，大辩论争执不休，有的家庭里由于观点不一致，往往出现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局面。各单位出现两派，社会上也形成两派，两派互相打“派仗”，互相攻击，甚至动刀动枪搞武斗。为了显示自己“革命”，两派都争抢“当权派”搞批判，当然“保皇派”大多是以“批判”为名，实行“保护”之实。

西安交大当时在全国是一个特例：文化大革命兴起得最早，就是当时所号称“文化大革命先锋”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是全国闻名的学术泰斗和革命前辈，也是国家政权中的奸佞之辈的攻击对象。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交大内部没有分成两派，只是一派。在社会上“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之外，西安交大被视之为“右倾交老总”。在人们高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毛主席语录，对“当权派”戴高帽子游街，挂大铁牌批斗，搞“喷气式”体罚的大气候下，西安交大却大声疾呼“反对打砸抢”，于是社会上曾一度出现反交大“右倾”的浪潮。在宝鸡，曾有一个群众组织的文艺演出队为反交大“右倾”，在街头演活报剧，以反面角色出现的“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唱道：“坚决反对打、砸、抢……”，这一现象说明交

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独特的立场和作法。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各单位大都出现过两派争相“夺权”的情况，谁抢到了单位的“公章”，谁就宣布自己“掌权”，交大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当然也像社会上一样，学生和教职工也自发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追穷寇战斗队”，以美工社为基础成立的“飞鸣镝战斗队”，校文工团中部分人员组成的“东方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等，这些都是些自生自灭的群众组织，大家大都是听从“文革总会”的召唤，或开辩论会，或上街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平时大家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事，一派“一盘散沙”的样子。

交大反对文革的过激行动，遭到一些人“反右倾”，但还是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一次，一个群众组织开着大卡车用高音喇叭在西安东大街上反交大的“右倾”，而交大的几个学生在街上用纸糊的喇叭筒向群众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个群众组织的几个人围住交大学生辩论，双方争执不下，“反右倾”的那几个人有点理屈词穷，一怒之下，把交大学生的纸喇叭夺过去，扔在地上用脚踩扁，这位交大学生不急不躁，从地上捡起喇叭，双手把它揉圆，又对着嘴宣传起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这一举动感动了周围围观的群众，纷纷指责这几个“反右倾”的人，大家说，既然是大鸣大放大辩论，为什么只许你们用高音喇叭广播，不许人家用纸喇叭讲话？有几位工人模样的人竟用指头“点”那几个人的鼻子，那几个“反右倾”的人一看“众恶难犯”，开上宣传车溜走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街头辩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辩论往往使用“打语录仗”的形式，一般先是引用毛主席一段语录，再加以引申，阐明观点；对方则引用另一段毛主席语录，驳斥对方观点，这种“断章取义”的作法，完全是拿毛主席语录作棒子，打击对方，而不是真正以毛泽东思想为武

器，去捍卫真理。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面前哼一声呢！”这样引用毛主席语录，未免显得太俗了。



1966 年李志杰北京串连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街头辩论，往往陷入“诡辩”。有一次，我在街上围观两个人辩论，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一个有点招架不住，突然心生一计，挥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问对方：“你带没带‘红宝书’？”那年月，“《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那是“三忠于，四无限”的表现。“三忠于”是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无限热爱党，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社会主义，无限热爱人民解放军。如果不随身带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往往被视为政治问题。这位突然提问对方带没带“红宝书”，想以此撒手锏“转败为胜”，谁知对方早有计谋地用左手从衣袋里掏出《毛主席语录》，右手轻轻地拍着《毛主席语录》的封皮，说：“我带着呢，你能怎么样！”这位诡辩家确非寻常之辈，他话题一转，指着对方的右手说：“你竟敢打毛主席，我和你拼了！”说着向前扑去，要和对方动粗，周围的人把他们拉开了。《毛主席语录》封面有毛主席像，人家用手拍了拍封皮，就说人家“打毛主席”，这样的荒唐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少见。

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批又一批地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0 月中旬，我随全校同学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住在清华大学，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机。10 月 18 日一早，

天还没亮，我们就集合坐着卡车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卡车拉着我们，不知道行进了多少公里，来到了一处公路上。我们大家排成行坐在大道两边静静地等待着，前面有标兵维持秩序。等了好长时间，大约到了快中午，忽然前边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大家急忙站了起来，手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边伸长脖子朝毛主席将走过来的方向眺望。过了一会，我看见毛主席坐的汽车驶过来，后边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因为主要把目光集中在毛主席身上，车队里还有何人也就没注意到了。毛主席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穿一身绿军装，频频向两旁的人群招手，敞蓬汽车缓缓的向远处驶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谭立夫的“血统论”大行其道。红卫兵到处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被称为“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被称为“黑五类”，后来黑五类中又加入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身份会突然发生变化的。有的同学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本来以“红五类”为荣的，突然被查出来爷爷是地主分子，于是一下子又变成“黑五类”，立马被摘掉红卫兵袖章。此类事情屡见不鲜。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运动中，陕西就有“民主革命补课”的作法。有一股极左思潮认为，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了不少地主富农。在进行“四清”运动试点的地方，补划了不少地主富农，把中农、富裕中农升为富农、地主的情况很多，有些地方有把贫农升为地主富农的。幸亏我们村没有进行“四清”运动试点，所以日子过得比较安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农村像城市一样乱了套。正规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瘫痪，农村贫下中农协会、造反组织掌权，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延续“四清”运动的极左路线。家里传来了消息，说村里要把我家成分补划为富农。这真是一个晴天霹

雳。富裕中农的家庭成份，已使我的进步受到一定政治影响，再补划为富农，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我的前途就更渺茫了。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和父母谈起了家庭成分的事，母亲埋怨父亲："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光知道省钱买地，买下那么多地，人家把成分划高了，在人前说不起话。你看有的人抽大烟，把家产弄光了，到头还是贫下中农！"父亲叹息地说："最使我伤心的是连累了娃娃们！"

我不埋怨父母亲。因为我清楚的知道，父亲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劳动发家的。听祖母说，爷爷家里很穷，真是无立锥之地，靠他舅舅家帮助才和祖母结了婚，靠皮匠手艺绱鞋和祖母在阳平秦家沟住了多年。后来回到老家杨柳村，父亲和叔叔慢慢长大，肩挑油担串乡卖油，家庭生活才有了转机，为此父亲落下了一身病痛，经常咳嗽。

解放前夕，社会动荡，精明之人知道时局的变化，纷纷抛售土地和家产。父亲一介农民，不懂政治，过去吃够了没地的苦头，看到别人廉价卖地，便尽量想法多买一点。他曾给我说过，当时一石麦可以买一亩地，我买回来后，当年就能打一石粮食，把本钱就收回来了。以后就是地失掉了，我也不吃亏。因此他陆续购置了七十多亩地，养了两头牛一匹骡子，置齐了包括大车在内的全套生产工具，考虑到叔父以后的生活及生产的需要，置了三院庄基，成为杨柳村富裕户"四大家八小家"中"八小家"之一。

解放后"查田定产"，划分阶级成分，"四大家"被划为富农地主，"八小家"被划为中农及富裕中农。我家土地财产较多，但都是父亲叔父亲自劳动挣来的，虽然也雇过长工短工，但家庭财富的积累中，主要靠自己劳动，而不是靠剥削，因而成分定为富裕中农，是符合政策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交大也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停课"闹革命"。我对这场"大革命"不理解，也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往图书馆跑的时间就更多

了。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图书馆不经常开门了。由于对图书馆的特殊感情，即使不开门，我也时不时地要到图书馆前转一转。



文化大革命中被污损的交大图书馆前的塑像

大约是 1966 年 8 月的一天上午，无所事事的我又转到了图书馆前。那时候，学生大串联已经开始了，四五个带着“南京 XX 学校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门前的雕塑前指手划脚的呐喊着：“交大就是只专不红的典型，你看他们的图书馆修的这么大，门前还立着两个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雕塑……”听着他们的批判，我感到好笑，心想：图书馆大一点，就是只专不红，这是什么理论？连两个雕塑他们都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实在太幼稚了。但在那种形势下，有理说不清，还是不去管它吧！旁边的几位本校同学也对他们侧目相看。

谁知在这个时候，一位南京红卫兵气急败坏地喊：“我们砸碎这个代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雕塑吧！”说着抓起地上的一个墨汁瓶，就向手托火箭的男雕像头部砸去，“砰”的一声，墨汁瓶在塑像头上炸开了，墨汁像头被打破流出来的血一样顺着雕像的脸流下来。这个恶举一下子激怒了我，我忍不住冲上前去，挡住那个南京红卫兵，站在旁边的几个交大同学也忍不住了，围住了其他几个南京红卫兵展开辩论。看见交大同学都站出来说话，我的胆也正了，便和他们辩论。那个砸雕像的红卫兵喊：“我们破四旧，你们竟敢反对，你们是什么立场？”我说：“你们破‘四旧’我们不反对，你凭什么说这个雕塑是‘四旧’？”那个红卫兵说：“‘白专道路’就是四旧，

就是要破！”我说：“你凭什么说这个雕塑代表白专道路？”那个红卫兵说：“你看这两个塑像，一个手托火箭，一个怀抱大部头专业书，不是‘白专道路’是什么？”

这时候，我旁边的一位交大同学走上前说：“你说我们有‘只专不红’思想，我看你才是‘只专不红’思想，那个女塑像抱的书，上面并没有写字，你怎么一看便说是专业书，为什么不把它想象成毛主席著作？”这一问，一下子把那个红卫兵噎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位同学的机敏使我佩服。另外一个南京红卫兵急转话题：“这一组雕像充满资产阶级情调，一个男的，还有个女的……”此话刚一出口，我身旁的一位交大同学立即打断他的话：“有男有女怎么啦？世界上本来就有男的，也有女的，你们几个来西安串联，不是也有男有女吗？“那个南京女红卫兵的脸”唰”的红了，赶忙拉了拉那个高谈阔论的男红卫兵的衣袖说：“走罢，走罢……”于是几个人悻悻地走了。



用毛主席语录板保护起来的交大图书馆前的塑像

望着离去的红卫兵，我们几个互不相识的交大同学露出了嗤之以鼻的微笑。我当时想，外界说交大是牢不可破的一盘散沙，此话还有一定道理。交大师生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热心，“消遥派”多，但在大是大非前面，在维护交大声誉方面，大家都是一致的，关键时刻还是会挺身而出的，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过了几天，不知哪位有识之士想出了一个高招，用三合板把图书馆前面的

两个塑像包了起来，在三合板的外面分别写上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字是我们电机系学生王永祥写的，他的书法造诣很高，后来成为交大老师，可惜英年早逝。交大图书馆前这一组标志性的雕塑能逃过一劫，采取保护措施的有识之士功不可没，学长王永祥功不可没！

在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我的妻子高喜爱说，文革中交大图书馆前发生的这一幕闹剧，她当时也在现场。不过那时我们俩虽为校友，但还互相不认识。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拉开了学生全国大串联的序幕。红卫兵进工厂，下农村，“扇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拿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开的介绍信，有的干脆只拿着学生证，就免费乘火车全国到处跑。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专门安排串联学生的食宿问题。

学校里有许多同学去步行串联，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韶山。我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便同我班崔寿堂坐火车准备去韶山。由于是红卫兵免费大串联，火车上人挤得满满的，连厕所里、货架上都挤满了人，有时站在车厢过道里，只能一只脚踏在地板上，另一只脚半悬空。我们到了郑州，下车准备换乘去南方的车，但是等了几趟车都上不去。没办法，我们只好在郑州游览一下。我们去河南省作家协会，想看看李准的大字报。李准是我比较熟悉的作家，我读过他许多作品，想从大字报里了解他更多的情况，更想借此机会见见他本人。到了河南省作家协会，一打听，李准不在，这使我大失所望，也没有心情看大字报了。于是我们在郑州城转悠了几圈，又坐车返回西安。

学校里乱糟糟的，有些同学显得很狂热，大搞揪斗老师的活动。在第九、第十宿舍的西边院子里，我碰见几个女学生抓着校党委宣传部长吴镇东游斗，有的扭着吴镇东的胳膊，有的揪着吴镇东头发。有一个高个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女生拿了一把剪刀，“嚓嚓嚓”的把吴镇东的头发剪成阴阳头。

看到这个场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那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为什么心肠这么狠？我还看见我们电机专业的几个学生把学号为 44444 的同学抓着在校园里游街，听说他有作风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我很反感。都是同班同学，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竟采取侮辱人格的行动！党的政策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年轻学生即使生活上欠检点，也到不了要游街批斗的惩斥程度。后来我见到我们电机系实验室老师魏雅华，也被带白袖章监督劳动改造，听说是因为他同表妹来往信件中有些私情被发现，就以“坏分子”罪名惩斥。魏雅华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科普作家。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是“革”什么命，我感到困惑！

眼不见心不烦，干脆到外边串联去。我和我的同学宣发荣商量一下，决定到西边去串联。宣发荣是我们杨柳村附近的宣旗营人，是我蔡家坡中学高三时的同学，他当年就考上交大，我复习了一年，第二年才考上了交大。因为这层关系，我们在大学里接触比较多，这次就结伴西去串联。

坐上西去的火车，同样是拥挤不堪，但同东去列车相比，毕竟要好一点。



李志杰在乌鲁木齐公园与在新疆当兵的高中同学张旭海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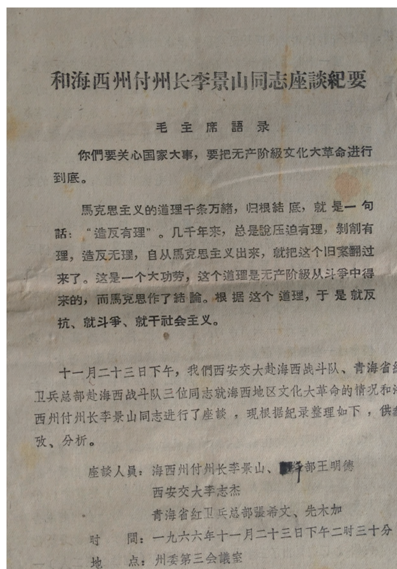
到了兰州，我俩就到处逛，凡能打听到位置的公园和名胜古迹，我们都去，五泉山、白塔山、黄河铁桥都去。在大街岗楼里，我见到了我们村的谢林，他在兰州当交警，当时正在值勤。谢林 1958 年到兰州工作后，把家中的房子卖掉了，父母早已去世，便同杨柳村再没有来往了。

在兰州玩了几天，我们准备去乌鲁木齐串联。听说新疆比较冷，我和宣发荣在红卫

兵接待站每人借了一件棉大衣，坐上西去的火车又出发了。

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比较少，车厢里的拥护程度不亚于东去的列车。乘客们想挪动一下身子都很困难。大家静静地在车轮的“哐当”声中期待着乌鲁木齐的临近。

我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里大有域外风味的建筑令我耳目一新，逛了街道之后，便打听乌鲁木齐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去参观了乌鲁木齐燕儿窝的烈士陵园，瞻仰了毛泽民等烈士陵墓。在乌鲁木齐一个公园里，



和海西州付州长李景山同志座談紀要

毛主席語录

你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緒，归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說压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級从斗爭中得来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会主义。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們西安交大赴海西战斗队、青海省
卫兵总部赴海西战斗队三位同志就海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
西州付州长李景山同志进行了座談，現根据紀录整理如下，供
攷、分析。

座談人員：海西州付州长李景山、[redacted]部王明德
西安交大李志杰
青海省紅卫兵总部張希文、先木加
时　　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　　点：州委第三会議室

和海西州副州长李景山同志座谈纪要

我碰见了我原来在岐山中学高二时的丙班同学张旭海，他在部队上当兵，听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久旱逢甘雨，他乡遇知己，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流传千古的”四喜诗”。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偶遇老乡同学，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们交谈了分别以后各自的情况后，两人怀抱《毛主席语录》在公园里请摄影师合了个影。那个时代的人确实讲信用，摄影师真的把我们的合影寄给了我们。我至今珍藏着这张具有时代特征的照片。

在新疆大学，我对蒙语、藏语书籍很感兴趣，便在校园收集了几本带回作纪念。

在乌鲁木齐玩了几天，我俩返回了兰州。当时我想，我学的电器专业，西北地区这样的工厂不多，毕业分配来西北的可能性不大，干脆乘此机会在西北多逛些地方，以后机会不多了。于是我俩坐火车跑到西宁，在西宁没多停，就坐汽车去了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这一路显得有些荒凉，汽车在途中

休息，周围很少见到树木，有的汽车站周围还有一片一片的沙滩。

到了德令哈，我们住在州委招待所。这里还住有青海大学学生张希文和青海公安中学的几位男女学生，还有早先来到这里的我们交大电机系的同学樊志模。

青海大学的张希文年龄比较大，有政治热情，把串联真的作为“扇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事情来干。他约我们一同和海西州副州长李景山对话。在那个年代，红卫兵要同州长对话，州长是不敢不来的。我们在州委会议室拉开架式进行对话，形式还是正儿八经的。大家围桌坐定，张希文首先自我介绍：“我是青海红卫兵总部的！”我接着说：“我是西安交通大学赴海西串联队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完全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交大并没有人派我们到海西来串联，是自己跑来玩的。所谓“交大赴海西串联队”完全是自封的。张希文要求李景山副州长向我们介绍海西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位副州长有准备地像向上级汇报工作一样，讲述了海西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期间张希文还不断的提出一些问题，大有上级检查下级工作的样子。李景山州长都谦卑的作了回答。这场对话气氛严肃，但没有火药味，因为李景山州长还没有受到冲击。

第二天，李州长抱着一大摞铅印的“座谈会纪要”来到州委招待所，张希文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纪要不行，纪要把关键问题没写上去，没有用！”李州长很有修养的说：“如果不行，我们就另搞，这些东西没用了，我就抱回去。”对于这次活动，我纯粹是逢场作戏，没有当作一回事。看到这个印有我的名字的铅印材料，还觉得有点意思，便要了几册作为纪念。这册“纪要”我至今保留着。

张希文提出要深入牧区接触牧民，州委领导很痛快的答应了，给我们派了一位翻译跟随。翻译配了一杆枪，负责我们的安全。我们每人骑一匹马，

由翻译带领着向草原深处走去。翻译是一位沉稳干练的中年人，态度友好，服务周到。他沿途给我们介绍草原的风土人情，传授驾御马匹的知识。按照他教的方式，我们试着办，确实灵验，有的人好奇，还故意让马走一走，又跑一跑，享受骑马的乐趣。

广阔的草原上很少见到人，有时偶然会看见野兔等小动物从身旁跑过。我们一群人在翻译的带领下慢慢的走着，欣赏着难得一见的草原风光。天快黑时，我们来到一座帐蓬前，翻译说今晚就在这座帐蓬里过夜。

帐蓬的主人是一对藏族中年男女，看样子翻译同他们挺熟悉。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帐蓬，发现两位主人昨晚竟裹着皮袄睡在露天草地上，我顿时产生了不安与崇敬。多么朴实善良的藏族大叔大妈啊！

天气比较冷了。我买了一顶有两只毛皮护耳的棉帽子戴着回西安了。西安毕竟不像青海那么冷，后来，我把这顶帽子放在了老家。村里演革命样板戏，常把这顶帽子借去当道具。《智取威虎山》里演小炉匠的演员带上这顶帽子同电影里的小炉匠造型确实有点像。

西安的文化大革命仍在激烈的进行着。作为一个逍遥派人物，许多重大事件我都没参加，采取逃避现实的方法混日子。

按照学校的安排，我们班到西安纺织城西北国棉四厂去劳动。在纺织厂里，我的生活过得比较愉快。大家跟着工人师傅干活，熟悉了纺织工厂的各种生产工序，知道了梳棉、拼条、筒摇、粗纺、细纱、织布等专有名词。纺织厂女工多，车间里的女工围着白围裙，戴着大口罩，把头发笼进穆斯林们常带的那种小白帽子里，步履矫健的在飞速转动的纱绽中间走来走去，十分好看。

在国棉四厂劳动了一个阶段，我们撤回了学校。在学校里不能读书，又

不想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于是我独自一个人回到蔡家坡陕西第九棉纺织厂参加劳动。

在陕棉九厂，我遇到了先我到厂里劳动的交大同学张长琪，他是我岐山中学的同班同学。张长琪学习很好。早在岐山中学初三毕业时，我看见他复习功课时，揭开课本上的目录，按顺序一课一课的闭起眼睛回忆和默记课文的要点和公式、定理、定义等，他能把课本融会贯通。他在陕棉九厂劳动后毕业又被分配到陕棉九厂工作，后来又回到交大“回炉”，又考上了交大研究生，分配到咸阳一个研究所工作。在陕九，我还遇见交大的陆诗娣及她的一个女同学。陆诗娣是交大教授陆庆乐的女儿，她是数理系学生。陆庆乐在数学界颇具权威，我们学的高等数学课本就是他编写的。

在这里劳动的还有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工业大学、宝鸡中学的学生。大家在工厂里劳动，都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平等相处不讲派别。

陕棉九厂有个老工人也叫李志杰，因为同名同姓的缘故，他喜欢和我交谈。这位老师傅性情开朗，喜欢体育运动，经常在篮球比赛场上当个裁判或搞些场外服务等活动，厂里许多人都认识他。因为成了朋友，他还找陕棉九厂一位毛笔字写得很好的老同志，给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作品我至今还珍藏着。同工人在一起，我感到心情很舒畅。他们坦率、真诚的品德让人感到亲切，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敬佩。从工人身上，我学到的不只是技术，更多的是生活经验和品德的升华。

经过一个阶段的劳动，陆诗娣和她的同学及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工业大学的学生陆续撤走了。宝鸡中学的几位同学也要回宝鸡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大想回学校，听说交大在宝鸡有个联络站，便同宝鸡中学的学生一起撤离蔡家坡，径直到交大宝鸡联络站去要求参加活动。

交大宝鸡联络站的负责人叫周士敏，我同他交谈之后，他同意我留在联

络站参加活动。那时我对联络站的同学不认识，经过一个时期的共同工作，我们都成了好朋友，并且同高喜爱相恋最后成了伴侣。宝鸡联络站的工作，改变了我的人生，奠定了我终生的幸福。

在交大宝鸡联络站工作的日子是清闲而愉快的日子，没有任务，没有压力，更没有烦心事的困扰，生活过得优哉乐哉。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后来在同喜爱谈恋爱时，我说明了家庭情况，喜爱毫不在意的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与家庭没关系，况且我家也不是什么红五类！”喜爱的一句话，使我永生永世保持了对她的忠贞和敬爱。

宝鸡渭河工程管理处是我们宝鸡联络站来往较多的单位。有一位姓李的老师傅是山东人，不知是江青的什么关系的哥哥。此人高个子，方脸庞，皮肤黑黑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但姓情却十分温和，说话声音也不大，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虽然他有江青这个妹妹，但并未沾上多少光，据说毛主席像章盛行时，老李到北京去，江青给了他一些毛主席像章。

我在宝鸡联络站时，和宝鸡人民剧团的演职人员接触较多。人民剧团编剧张戈，和我们交大电机系辅导员景存斌是表兄弟。在宝鸡，张戈给我介绍了景存斌许多情况，回到学校，景存斌又给我介绍了张戈的情况，这是我爱到宝鸡剧团去的原因之一。有一次，我和张戈闲谈，他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红卫兵造反，他外甥给他的同学说：“我舅舅那里有许多四旧，咱们造反去。”外甥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的许多书抄走了，实在可惜，真是娃娃家！说完哈哈一笑，显得很豁达。

宝鸡税务局一位叫舒宏庆的干部，同我们接触较多。他能画木刻形式的毛主席像。他创作了许多毛主席画像，经常叫我们观摩欣赏。在他的影响和启发下，高喜爱还创作了一幅毛主席像十字绣，毛主席像旁绣了《题庐山仙

人洞》的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交大压缩机教研室的赵若茂老师和电机系的赵号民老师后来也参加了交大宝鸡联络站的工作，他俩看到我和高喜爱关系比较好，便经常开我俩的玩笑。玩笑开得多了，还真的促进了我俩关系的发展。

宝鸡成了我的家，那一段时间我和喜爱主要来往于宝鸡——西安之间。有一次，我同喜爱由宝鸡回西安，顺路去眉县马场看望她嫂子贾冬梅。冬梅嫂子下乡后被招到眉县马场工作。我们从宝鸡坐火车到眉县火车站，然后步行过渭河去马场。渭河上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比较窄狭，显得很不坚固，天又快黑了，喜爱抓住了我的手，我们一起小心翼翼的过河。这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以来的第一次牵手，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1968 年 3 月 28 日，我在学校行政楼前去散步，看见几个学生驾着彭康校长从行政楼前的马路上向东走，听说是他们驾着彭校长到图书馆前的毛主席像前"请罪"，"请罪"之后，看到彭校长身体情况不好，驾着往交大一村方向去。我看见他们时，彭康校长瘦弱的身子已举步艰难了，看样子自己已无法站立了，完全由别人驾着走，两条腿无力的在地上交换着步子，耷拉着头，眼睛几乎没有睁。这群人走过去后，我就到别处散步了。事后听说，那是交大"抗大战校"工企排的学生游斗彭康校长，年老体弱的彭康校长就在这次游斗后丧命了。

彭康校长去世后，有一天我在校园散步，看见彭校长的爱人王琏从图书馆东边大道由南往北走，可能是要回交大一村的家里去，她步履蹒跚，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无助地四顾了一下，静静地坐在那里休息。我从她前边走过，心里顿生悲哀。她是交大图书馆馆长，是我国装甲兵司令陈士榘的妹妹，是一位革命老

干部，如今丈夫去世，孤苦伶仃，实在令人悲伤。

1968 年 8 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连同 1967 年 11 月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干部组成了工、军宣队，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

学生们陆续回到学校。我们电机系电制专业的工宣队是来自兴平秦岭公司的工人师傅。秦岭公司是航空工业生产电机电器设备的大型军工企业。工宣队进校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他们带领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跳忠字舞，也安排学生的复课学习。我们电制专业的几位工宣队师傅绝大部分都不错，领头的叫张建钢，高个子，中等身材，说话做事还挺稳健。陈发礼师傅比较热情，爱和同学一块交谈，说笑，很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有个姓郭的师傅性情很温和，同人说话总喜欢用手捂住鼻子笑一阵，和大家关系很融洽。有个年轻的女工宣队员身材娇小，活泼开朗，经常带领同学跳忠字舞。她的一招一式婀娜优美，楚楚动人，据说我们班有的同学竟对她产生了好感。当然工人师傅中也有个别人确实水平不高，有一个个子不高，身材丰满的中年工宣队员，说话做事就显得简单毛糙，同人下棋争强好胜，竟采取偷匹悔招的手法，实在贻笑大方。

喜爱母亲突患脑溢血，我向他请假，说明喜爱她哥在西宁工作，家中无人照顾老人家，我得去宝鸡看一看。谁知他不但不同意，还说出一句不通情理的话：“你女朋友的母亲病了，你去干啥？她家里没人，叫邻居们招呼一下就行了嘛！”我一下子来了气，年轻气盛的我这时候顾不了许多，立即和他吵起来：“如果你母亲病倒了，你让邻居招呼一下行不行？”呛得他无话可说，最后还是同意我回宝鸡去。

复课闹革命期间，交大电器教研室的著名教授“三王一张”都和我们班同学接触较多。王季梅教授是电器学领域的权威，给我们讲课时总是循循善诱，反复询问我们哪些地方没有听懂，在课堂上注意与学生互动。我想这一

方面可能是他的教学特点，另一方面可能他考虑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许多功课，怕我们听不懂，所以讲一会儿，就询问我们听懂了没有。有同学提问，他就不厌其烦的反复讲解，并且总是面带笑容，可敬可亲。王季梅老师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学者，他在学生时代就研制新工艺制肥皂的方法，他的家庭电器厂生产的电器设备是优秀品牌，很受用户欢迎，他研究出独特的热处理工艺，生产的工业电阻器性能优良，价廉物美。我在交大上学时，交大实验室还在使用着他家工厂许多年前生产的普通电阻器。

王哲生老师给我上过电机实验课。我拜读过王其平老师的著作《电弧理论》。张汉扬老师也给我讲过专业课，他是一个老学究式的教授，工宣队组织老师跳忠字舞，他手脚动作不协调，一边看前边领舞的工宣队员，一边跟着学动作，人家动一下胳膊，他动一下胳膊，人家动一下腿，他动一下腿，笨拙之态令人酸楚。

文化大革命中，大搞红海洋、红宝书、跳忠字舞，甚至组织“红恐队”即红色恐怖战斗队》。所谓红海洋，就是到处刷红标语，有的甚至把外墙全刷成红颜色。所谓红宝书，就是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不离身。更为厉害的是全民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不论是小脚老太太，还是刚懂事的小孩子，都要在早上和晚上跳用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颂毛主席的舞蹈，并且要面对毛主席像，怀抱《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

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学校“斗、批、改”，“斗”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是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斗、批、改”中许多事情是搞错了，把革命老干部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把学生中的一些不当言论或甚至无不当的言论当“反动言论”来批斗，把多年来形成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当作错

误的东西来批改，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和巨大的损失。

我们电制 43 班比较平稳，没有对老师、对同学进行什么过激的行动，开会讨论也只是做些官样文章。电制 44 班同属电器专门化，所以有时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同我们接触较多。电制 44 班的“斗批改”就搞得比较激烈。他们班的刘延鸿同学据说搞什么小集团，就被看管了起来，每天安排学生监管他的行动，晚上睡觉也安排学生睡在靠近宿舍门的地方，防止刘延鸿逃跑或自杀。对刘延鸿的批斗和处理，我们电制 43 班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过，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们毕业分配时，刘延鸿被留在学校监督劳动改造，曾在砖瓦窑内背砖瓦。

我和刘延鸿比较熟悉，他家在宝鸡，和他住同一院子的刘润生是喜爱她哥新喜的同事和好朋友。刘润生经常给我介绍刘延鸿的一些情况，后来落实政策，刘延鸿的问题得到平反，被分配到宝鸡市科委工作。他努力搞技术革新，小有成效，后来干脆下海办企业，靠着艰苦的创业精神和非凡的苦干实干，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刘延鸿说，他刚下海创业时，为了省钱，从西安进设备配件，都是自己亲自肩扛手提往宝鸡运。有一次他扛了一百多斤的配件坐火车，车站验重收费，过磅员惊奇的说：“这人怎么能扛动这么重的东西！”刘延鸿说：“为了创业，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力气。”

刘延鸿曾邀我到他的工厂里去参观过，那是他在宝鸡十里铺附近收购的一家国有破产企业，厂房、设备都还不错，是一个中小型企业。

刘延鸿喜欢书法。我因退休后主要编辑书画类刊物，所以同刘延鸿来往较多，他每来国防工办看我，总要给我送点烟之类的礼物。他曾任宝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交大校庆时还给母校捐过款。他给我讲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迫害。他说，其他同学毕业分配后，他们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被留校劳改，在砖瓦场劳动，经常冒着高温从窑里往外背砖头，累得半死不活。

他说，他刚平反时，曾到西安微电机厂门口去等过他们班当时文革小组长牛双强，要揍牛双强，只是久等不遇，只好作罢。我劝他，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不能全怨牛双强，当时咱们都是学生，受政治形势影响，说一些不适当的话，做一些不适当的事不足为奇，事情过去了，就不要计较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惜刘延鸿身患糖尿病，后来不久便去世了。

1968 年的夏天，我们班去徐杨公社参加夏收劳动。我住在一个家庭成分为富农的青年农民家里。徐杨公社是当时很有名的农村先进公社，我们在这里劳动，觉得这个村的农民挺好的，似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太紧，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劳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环境还是不太多的。我们的房东小伙虽然家庭成分高，但在村子里并未受歧视，在村里业余剧团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时，他扮演了英雄人物杨志荣，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电制四三班陕西籍同学有 4 个，刘淑茶是户县人，张睿是乾县人，姬竹莲是米脂人。平时我们几位关中道上的老乡就来往多一些。

我和刘淑茶的来往更多一点，这里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刘淑茶的父亲被查出有任伪警长的历史问题，这件事在同学中传开后，但刘淑茶自己免不了有些政治压力。我的家庭变故同学们一点都不知道，但自己心中明白，思想负担总是有的。这样一来，我就同刘淑茶比较多的进行一些交流，以排遣内心的压力。刘淑茶是个很稳重的女同学，平时不爱多说话，说话也声音低低的，很少见她有生气发脾气的情况。她有些心里话愿意对我讲，也乐意听听我的意见。她的一个男同学叫张德玉，和她从初中就同学，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考上交大，张德玉考上了 030 军校。文化大革命中，刘淑茶她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提出来，030 军校对张德玉进行家庭政审，认为他同刘淑茶的婚姻问题不符合政治要求。刘淑茶同张德玉沟通后，张德玉向学校提出，毕业后宁肯分配到地方工作，也要保持同刘淑茶的关系。组

织上看到张德玉态度坚决，又对刘淑茶的家庭问题进行了审查，认为张德玉可以同刘淑茶结婚。然而毕业分配时，030 部队领导再次进行政审，又不同意张德玉同刘淑茶结婚，也不同意张德玉转地方工作。张德玉一气之下，同老家农村一位姑娘结了婚。一对相爱十多年的恋人，最终被政治大棒打散了鸳鸯。刘淑茶后来在毕业离校前同我们交大的同学高锡厚结婚，一起分到宁夏银川去工作。刘淑茶后任银川市政工程管理处的领导。高锡厚成为市经委的一个处长，可惜未到退休年龄便因病英年早逝了。

张睿家庭是贫农出身，同我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谈笑玩要。我们后来在秦岭公司劳动实习时，张睿还带我到他们乾县老家去过，那时他已结了婚。他媳妇在农村，能演戏，在农村业余剧团中演铁梅。张睿毕业后分配到兴平 408 厂，也就是曾任国家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当时工作过的那个厂。郭伯雄就是从 408 厂参的军。

学校里的“斗批改”实在没有多少事情可干。69 级的学生等着毕业，但中央一直没有下文件，学校里又安排学生下乡、下厂进行社会实践了。我们班于 1969 年 9 月来到了秦岭公司劳动实习。我被分配到一个绕电机线圈的班组劳动。我来到这个班组时，班组里师傅正在参与一项新任务，那是我国打下了美国 U–2 型无人侦察机后，把其零件分解仿制，秦岭公司接受了测绘仿制 U–2 型飞机上的电机的任务。我看了放在班组地上的电机，觉得很一般，没有什么高级精密的地方。我只管参加劳动，用模具绕线圈，至于测绘研制的事没有过多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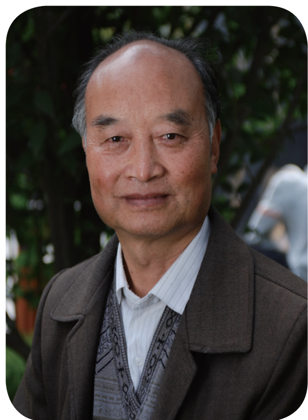
陈发礼师傅是我们班的工宣队，我们到他们厂来劳动，他自然对我们非常热情，给我们介绍兴平地区的历史，兴平的文物景点，哪里是“十里铁板桥”，杨贵妃墓在哪里，“兴平杏核凉眼药”的故事等等，使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可敬。

我在秦岭公司劳动的时候，喜爱正同他们班同学在留坝县两河口公社石门子大队吊坝子小队劳动。关于她这一阶段的生活情况，她发表在交大《校友之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大山里的回忆》有生动的描写。

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1969、1970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规定毕业生从 7 月份开始分配，月底前分配完毕。

1969 级和 1970 级毕业生一起分配，这给我创造了同高喜爱分配到一起的机会。那时毕业分配，完全是工宣队说了算。我向工宣队师傅说明了我和高喜爱的关系，希望将两人分配到一块儿。他们把我们分配到甘肃省重工业厅，因存在二次分配的问题，我担心到甘肃后，若被分到两个地方，这对我俩的婚姻关系可能会造成影响，不如现在就结婚吧。我向喜爱说明我的意思，她欣然同意。我俩就去机械系办公室开了一张介绍信，到兴庆公园北边的挺进街“陕西省西安市向阳区革命委员会”领取了结婚证。

为了早一点赶到兰州报到，争取二次分配时能分得好一点，我俩没有去岐山杨柳村，背起铺盖赶回宝鸡，在喜爱家呆了一天就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开始了大学毕业后的生涯。



**作者简介：**

李志杰，陕西省岐山县雍川镇杨柳村人，生于 1943 年 11 月 7 日，1969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 43 班，就职于新闻出版系统，主任记者，著有《李志杰高喜爱文集》五卷，《孙继元临床实录》《汪应洛传》《钟兆琳传》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居西安市。

# 後　記

編纂《西安交通大學文革風雲——回憶與紀實》，是緣于李世英的不幸去世。

2017 年 3 月 27 日，李世英因病在咸陽去世。他的病逝，使大家感到了人生之苦短，生命之脆弱。不少人都知道，李世英正在撰寫回憶録，要把他的人生經歷和所參與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呈獻世人。誰料天不假年，書未出版，人先西去。一些校友們商議，是否整理李世英回憶録手稿，以完成他的遺願。在得知已有人也在進行這一工作後，大家便商議給李世英回憶録作點補充史料的工作。李世英是我校文革時期的代表人物，曾與他共事及在他領導下的部分校友開始醞釀回憶和撰寫西安交通大學文革往事。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幕。西安交通大學的文革運動對西安地區甚至陝西全省産生過重大影響。正像當時有些中央領導指出的那樣，西安交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全校一派，這在全國都是十分獨特的。正由于它的這個特性，引起了史學界的興趣和關注，社會上也出現了許多關于西安交大文革故事的傳言。作爲西安交大文革的親歷者，我們發現有些傳言，衹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些還與事實大相徑庭，而有的書刊和資料還不斷在“以訛傳訛”，給人們造成思想混

亂與誤導。西安交大當年文革的親歷者現在都已過了古稀之年，有些已經作古。大家認爲有必要回顧一下自己的文革經歷，給後人研究西安交大校史留存一些真實的可供參考的資料。

本文集的作者與編者都已年過古稀，有的人已屆耄耋之年，自發開展這項工作，毫無功利之言，衹是出于對母校的熱愛，作一點有利于後人的存史工作，純屬史學研究領域的事情。

當然，大家也都嚴格按黨的方針政策辦事，注意工作方法，爲黨和國家當前工作的順利進展發揮正能量作用。由于大家都年事已高，健康式微，記憶衰退，再加上人力物力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有關存檔的資料無法查詢，難以收集和查閱更多的檔案文件，本文集中各稿件的疏漏和失誤之處在所難免，有待于後來史學研究者和讀者進行考訂和完善。對于書中的資料，編者難以全面仔細核實，望慎重引用。

衷心感謝爲此資料匯集編纂給予大力支持和提供各種方便的同仁、校友及社會各界人士！